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DENG XIAO PING SHI DAI

杨继绳 / 著

上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DENG XIAO PING SHI DAI

杨继绳 / 著

下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 N G S H I D A I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杨继绳 / 著

上卷

I N G S H I D A I

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杨继绳 / 著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杨继绳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ISBN 7-80109-306-2

I. 邓…

II. ①杨…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474 号

邓小平时代(上、下卷)

杨继绳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480 千字

印 张:19.375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0 册

定 价:32.00 元(上、下卷)

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但对中国经济改革作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
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
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
因为是用记者的生动文笔来表述深邃的学术见解。

——编者谨识

序

刘克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20年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也不能不怀有浓厚的兴趣。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什么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20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有多少历史经验和教训!有多少困惑和启迪!难怪很多中外作家、记者、学者都纷纷研究、著述这一段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深刻痕迹的20年。

当代史是最难写的,许多档案尚未公开,不可能全面掌握材料;涉及到许多尚在进行中的事和有关的人,不能不“为尊者讳”;许多事是亲身经历,有了作者直接参与的感情和利益,不能不包含个人主观的偏见。然而,应该提倡写当代史,姑不论当代人不写将留给后代永无终结的议论和争论,更重要的是把当代实践及时总结,可以更好地指导当代的实践,推动当代事业和历史前进。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来写,从各

个层次、各个角度、各种观点来写,就可能留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所以,只要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来写,都应该欢迎。

杨继绳同志这本书是他 20 年来新闻采访经历亲身见闻,是他的见闻实录,又是他的思考和评述,他用新闻记者敏锐眼光来观察,用学者的头脑来思考,用记者的文字来表达,虽然书中许多观点我难以苟同,但确实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1998 年 9 月 8 日于北京五乐斋

绪 言

当全世界的成千上万个智慧的头脑在反思 20 世纪时，谁都会审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事实：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世纪末最后的 20 多年里进行了一场发人深思的探索：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

在 20 世纪这短短的 100 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上个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这种完全以私人利益为驱动力的社会，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曾一次又一次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本世纪初，人们多方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这个历史的难题在 19 世纪

就提出来了。那时就出现了种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到20世纪初,各种解决危机的理论都寻求付诸实践。当时相当多的人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抑或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都致力于摆脱自由市场的弊端,加强政府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凯恩斯则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革命”。这两方面同时进行实践,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凯恩斯从内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从外部“挽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疾病”进行了诊断,这一诊断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无疑是有益的。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使资本主义感到“大敌当前”,从而刺激了它的生命力。在多种社会试验之外,在20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悄悄地发生了热衷于冷战的政治家们所忽略了的重大事件:技术的飞速进步。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的拯救,比任何制度改革的作用更为深远。当然,技术进步如此之快,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竞争的产物。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批评市场机制的弊端时,却完全放弃了市场机制。他们相信经济的计划者和组织者能够及时地、正确地认识经济运行规律,并能够根据这种认识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要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就必须把财富完全掌握在计划者(国家)的手中。消灭私有制是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这一理想在苏联、在东欧、在中国进行的社会试验,在初期还是有成效的,但是,随着这一试验的深入,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于是,在抛弃市场机制几十年之后,只好回过头来再寻找市场机制。当然不是回到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而是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最后20多

年的探索,一种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探索。这种探索在俄国、在东欧也同时进行,但从20世纪有限的年代来看,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有成绩。

显然,20世纪的历史不能是某个主义失败和某个主义胜利的历史。如果这么概括,那就过于肤浅,过于简单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样,以苏联为代表的体制虽然转向市场经济,但这种体制对人类的影响也有正、反两个方面。20世纪能走到今天,是各种力量的合力推动的结果。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体制,是各种合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分力。当那种体制不复存在以后,我们更要看到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要看到它对今后的影响,要从中吸取对人类有用的思想营养。这种思想营养在时间久远以后也许更有用。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认识要比西方一些学者深刻得多。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国家起主导作用的自觉的制度创新过程。而改革时期的国家是由邓小平这样的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强人领导的。制度创新不是任意的,任何创新者都要受初始条件的约束。这种初始条件对改革的过程、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的目标模式都要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主要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有中国社会5000年的文化积淀、中国的民族意识,以及以人口众多为特点的物质条件。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 诺斯认为,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能否成功或者说制度变迁走什么样的道路,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报酬递增”。在前一个因素的制约下,制度变迁不可能完全按照初始阶段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事件就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就后一种因素而言,当“报酬递增”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能得到支持和

巩固,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环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当“报酬递增”不能普遍产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无效的方向发展,就会在痛苦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中国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改革策略。这一策略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诺斯说的“报酬递增”,从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撑着改革继续深入;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经济繁荣再支持改革。这种良性循环是中国改革避免出现苏东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非良性循环,使某些方面的改革陷入了泥潭。

历史赋予邓小平的任务是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的死胡同,并探索一种能容纳市场机制的新体制。就这一历史任务而言,他对得起历史。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只能在历史所给定的条件下完成有限的任务。理论家应当超越历史,不超越历史就没有理论创新;政治家不可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政治家就不能生存。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也同样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掌权时已75岁了。历史给他的时间是如此短暂。他能把中国引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死胡同,就算做得很多了。再期望他做得更多,那是不切实际的。

二

任何时代的社会改革,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斗争。这种斗争也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也可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一种认识是,维护传统理想的纯洁性,批判各种有可能玷污理想的思潮,抵制各种有可能玷污理想的改革。另一种认

识是,脚踏实地地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并且为了发展经济而突破某些传统教条的限制。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和“理欲”问题争论了2000多年。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类似的争辩。在邓小平时代,所要维护的理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所面对的现实是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国力不强。于是,在这个时代,就出现了两种不同认识的斗争:是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还是放弃某些传统原则以求经济的发展?这种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尖锐地存在。毛泽东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些人把这个理想极端化到了荒谬的地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在中国的70年代到90年代,这两种认识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两种思想派别的互相指责,前者说后者是“右”,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者说前者是“极左”,或“‘四人帮’思想”。邓小平智慧地把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他一方面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高举共产党人理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持两种不同的思想的人,有时各取所需地拿起邓小平的一个方面作为武器,互相攻击。邓小平本人则像一位钢琴大师,为保持音调的和谐适时地敲击不同的琴键。他依据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一会儿强调这一方面,一会儿强调另一方面。

实事求是地说,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过于贫穷。持这两种不同的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的。作为政治领袖的邓小平当然是两者兼有。问题在于,原来作为理想的价值体系,即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了。崩溃的物质大厦可以按原样重建,崩溃的精神大厦是不能按原样重建的。只能根据新时代的情况建立新的价值体系。邓小平在构筑新的价值体系。在另一些人当中出现了两种极端情况:那些希望保持传统理想“纯洁性”的人,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已崩溃,只好屈居抱残守缺的地位,而有一些全心致力于发展经济的人,由于缺乏理想之光,又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

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价值体系的突破,对原有道德准则的突破,对原有是非界限的突破。由于新的是非界限、新的道德准则、新的价值体系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务实者的武器。而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

上述两种不同认识的斗争构成了邓小平时代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线。这种思想斗争是波澜壮阔的,是深刻的,有时甚至演化为激烈的政治斗争。

对普通人来说,盖棺就可以论定。因为他的行为的影响在他生前已经显示出来。对于政治伟人来说,盖棺还不能论定。他做的事情还要影响更长的时间,他做的事的效果要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清。在他生前,人们对他所做的事就有不同的看法;他死后,这些不同的看法的争论,也许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本书客观而详尽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对不同看法的记录没有褒贬之意,只是想给后人留下一些思想资料。

三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中国从贫困中走了出来，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他身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他使政治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在他身后还会继续宽松，这一点也是不可置疑的。有了这两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就有理由得出满意的结论。但是，邓小平也留下了很多尚待解决的难题。他把成就和难题都留给他的继任者。成就是继任者的基础，难题是继任者取得政绩的空间。应当指出的是，他所留下的难题，并不是改革开放之过，很多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不过，改革使过去潜在的问题表面化了。当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经验不足，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是深化和完善改革，而不是对改革纠偏。新一代领导人再三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坚持下去，这表明了中国改革不会发生逆转。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历史时说过：“在这种过分的革命行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由此，有人得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的“矫枉”，有“过正”的情况，认为历史时钟的摆锤向右偏多了一些。对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跨度上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强调效率的时候，有点顾及不到平等；强调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不够有力。这种看法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这不要紧，摆锤“过正”的幅度正是

他的继任者施展才能、取得政绩的空间。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跨度上看,就很难说邓小平时代历史时钟的摆锤是“过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计划经济的残余在不少经济领域还起作用,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怎么能说“过正”了呢?在邓小平身后,也许会有这方面的争论。

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熵是不断增加的。增熵使这个系统混乱。对社会系统而言,熵是社会流弊的积累,是腐败和混乱,也是建立新秩序的催生剂。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时,充满了活力。它的各种机构都按照既定的目标高效率地运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社会流弊开始产生:冗员不断增加,机构不断膨胀,法律日渐失效,权威日益丧失,道德日益沦落,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社会流弊(熵)是时间的函数。如果没有“负熵”的加入,政权建立的时间越长,社会流弊就积累得越多,国家机构就会变成一架生了锈的机器,日益失灵,社会混乱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严重。结果,这个系统就会从有序变为无序。改革和开放,就是向这个系统注入“负熵”。

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就是一个增熵达到了十分严重程度的社会。这时,各种“中兴”的理想就出来了,各种“中兴”的历史人物也重新为人们所注意。“曾国藩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曾国藩是晚清的“中兴”大臣。

“中兴”就是给社会注入“负熵”。要“中兴”,不仅仅搞经济改革,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在邓小平时代,初步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后来,政治改革的停滞又阻碍了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深入要求深入的政治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进展要慢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认识很不一致,各种思想的斗争很激烈。邓小平时代种种政治风波都是因政治改革引起的。今后,中国的政治风波也会因政治改革

而起。政治改革的风险比经济改革大得多。邓小平在晚年的时候面临两种选择：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改革，可能造成社会动乱；回避政治改革的风险，可能使社会问题丛生。他选择了后者：宁可留下一个问题丛生的社会，也不能留下一个动乱的社会。这是通常的选择。他把一大堆社会难题留给继任者，这也是他留给继任者建功立业的机会。

很幸运，在邓小平造就的中国这段辉煌的20年历史，正是在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比较成熟的20年。我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变革，对这场变革有亲身的感受，我和我的朋友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跟踪采访和深入研究了这场变革，比一般的经历者知道更多的事情，了解更深的层次。我比别人更有条件记述这段历史。作为一名记者，我手上拿着人民给我的笔，我感到有一种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如果不向后人介绍这段历史，我就对不起我所经历的时代。因此，我用了10年的业余时间写下了这本书。

这本书从毛泽东逝世写到邓小平逝世；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的分析开始，引出中国改革的必要性；从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斗争，写到中国改革的政治条件、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的建立；从农村改革写到对外开放；对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介绍和分析；介绍了中国这20年改革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除了介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对这场改革对社会、对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作 者

1997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 | | |
|---------------------------------|----|----|
| 序 | 刘吉 | 1 |
| 绪 言 | | 1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遗产 | | 1 |
| 第一节 黑色的九月九日 | | 1 |
| 第二节 权力的集中——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 | 8 |
| 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 | | 9 |
|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 | 11 |
| 党指挥枪 | | 14 |
| 第三节 强盛的贫困——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 | 15 |
| 第四节 面临改革浪潮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遗产 | | 28 |
| 第五节 有待重新构筑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 | 37 |
| 理想 | | 37 |

| | | |
|------------|-----------------------------|------------|
| | 斗争哲学 | 40 |
|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 43 |
| |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 47 |
| | 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 | 49 |
| 第二章 | 十月六日的风雷 | 53 |
| 第一节 | 毛泽东病床前的政治斗争 | 54 |
| | 围绕邓小平第二次出山的明争暗斗 | 55 |
| | 1975:邓小平初试锋芒受挫 | 63 |
| | 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 68 |
| 第二节 |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 74 |
| |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 | 76 |
| | 叶剑英西山串联 | 81 |
| | 投鼠忌器 | 85 |
| | 先下手为强 | 92 |
| 第三节 | 过渡人物华国锋 | 98 |
| | 他的仕途一帆风顺 | 99 |
| | “两个凡是” | 102 |
| | “洋跃进”的是是非非 | 108 |
| | 他只能是过渡人物 | 111 |
| 第三章 | 思想解放运动 | 114 |
| 第一节 | 邓小平怎样向“两个凡是”挑战 | 115 |
| 第二节 | 真理标准大讨论 | 119 |
| |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 119 |
| |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 121 |
| | 坚冰已经打破 | 126 |
| 第三节 | 理论务虚会和“西单墙” | 130 |

| | | |
|------------|------------------|------------|
| 第四节 | 历史的新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136 |
| 第五节 | 思想解放的限度:“四项基本原则” | 146 |
| 第六节 |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挂下去 | 148 |
| 第四章 | 经济改革的组织准备 | 152 |
| 第一节 |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 152 |
| 第二节 | 天翻地覆大平反 | 155 |
| 第三节 | 干部队伍大改组 | 164 |
| 第四节 | 改革者掌握了最高权力 | 167 |
| 第五章 | 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 | 172 |
| 第一节 | 一个古老的事实被重新确认 | 173 |
| | 饥饿逼出来的自发改革 | 174 |
| | 安徽面临四面楚歌 | 180 |
| | 在曲折中全面推广 | 185 |
| 第二节 | 乡镇企业:计划经济的“异军” | 189 |
| | 拿起“榔头”对付“剪刀” | 190 |
| | 从计划经济的岩层里挤出一条缝隙 | 192 |
| | 中国乡镇企业的几种模式 | 195 |
| | “异军”占领了“半壁江山” | 202 |
| 第三节 | “魔鬼”在田野里游荡 | 205 |
| | 解除了一条枷锁:“统购统销” | 205 |
| | 商品经济:从魔鬼到神仙 | 208 |
| | 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 212 |
| 第四节 | 农村改革的新矛盾和新发展 | 218 |
| | 1984年以后的波折 | 218 |
| | 中国农民两个伟大创造的发展 | 224 |
| | 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 | 229 |

| | | |
|------------|-------------------------------|-----|
| | “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形成····· | 234 |
| 第六章 | 敞开大门 走向世界 ····· | 237 |
| 第一节 | 国门是怎样打开的? ····· | 238 |
| | 夜郎大国····· | 238 |
| | 国门先从这里打开····· | 244 |
| |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 249 |
| 第二节 | 香香臭臭话广东 ····· | 252 |
| | 1982:两省会议冲击波····· | 253 |
| | 海南汽车事件····· | 258 |
| | “变通”不通····· | 260 |
| 第三节 | 开放向纵深发展 ····· | 264 |
| | 外贸体制改革····· | 265 |
| | 外汇管理的改革····· | 268 |
| |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 | 271 |
| | 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274 |
| 第四节 | 文化层次上的对外开放 ····· | 276 |
| | 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回应····· | 276 |
| |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 278 |
| | 新时代的“西化”之争····· | 280 |
| 第五节 | 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 ····· | 284 |
| | “铁女人”碰上了“钢铁公司”····· | 284 |
| | 关键在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 288 |
| 第七章 | 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到核心 ····· | 299 |
| 第一节 | 城市经济: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场 ····· | 299 |
| |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 300 |
| | 消灭私有制····· | 306 |

| | | |
|-----|-------------------------|-----|
| | 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 309 |
| |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 312 |
| 第二节 | 理论战：“市场经济论”获胜····· | 317 |
| | 把“异教徒”请入社会主义的圣殿····· | 317 |
| |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 | 318 |
| | “商品经济”怎样写进共产党的文件？····· | 321 |
| | 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 328 |
| | 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市场经济····· | 333 |
| 第三节 | 私有经济的回归····· | 337 |
| | 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 | 337 |
| | 一颗瓜子千斤重····· | 341 |
| | “为主”两个字的分量····· | 344 |
| | 私有经济：还在理论和实践中彷徨····· | 347 |
| | 私营企业主：是否已经形成一个阶级？····· | 350 |
| | 寻找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 353 |
| 第四节 | 难点：国有企业的改革····· | 355 |
| |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 356 |
| | 改革十五年后的国有企业····· | 362 |
| | 在困境中找到了新思路····· | 365 |
| | 产权改革出现争议····· | 368 |
| | 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 370 |
| | “抓大放小”和诸城经验····· | 374 |
| | 大调整 大改组 大联合····· | 376 |
| 第五节 |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 382 |
| |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 383 |
| | 双轨价：一颗难咽的苦果····· | 386 |

| | | |
|-----|------------------------|-----|
| | 1988:价格闯关失败 | 390 |
| | 治理整顿: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剂猛药 | 394 |
| | 1992:价格全面放开 | 397 |
| 第六节 | 财富分配:中国新的富人和穷人 | 400 |
| | 收入分配改革的大体历程 | 401 |
| | 非工资性收入:脱缰之马 | 404 |
| | 转轨时期收入分配的几个特征 | 407 |
| | 中国的两极:富人和穷人 | 411 |
| 第七节 | 复杂艰难的财政体制改革 | 419 |
| | 从统收统支到财政包干 | 419 |
| | “诸侯经济” | 423 |
| | 赤字时代 | 425 |
| | 税利分流和分税制 | 427 |
| 第八节 |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 431 |
| | 从“大一统”到多家金融机构并存 | 431 |
| | 资金市场化的历程 | 435 |
| | 1993年:全国金融大整顿 | 440 |
| | 全面展开金融改革 | 443 |
| | 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 | 446 |
| 第九节 | 邓小平的“硬道理” | 449 |
| | 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 450 |
| | 体制转型期的经济波动 | 452 |
| | 转轨时期的经济难题 | 462 |
| 第八章 | “两个基本点”的碰撞 | 472 |
| 第一节 | “两个基本点”的形成 | 473 |
| 第二节 | 第一次碰撞:1983年反精神污染 | 477 |

| | | |
|------|-----------------------|-----|
| | 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 477 |
| | “异化论”风波····· | 480 |
| | “清污”运动····· | 483 |
| 第三节 | 第二次碰撞:1986年反自由化····· | 487 |
| |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 487 |
| |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 489 |
| | 十二月学潮····· | 491 |
| | “四号文件”····· | 495 |
| 第四节 | 第三次碰撞:1989年北京风波····· | 499 |
| | 1989年面临的社会矛盾····· | 499 |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502 |
| | 从胡耀邦逝世到“4.26社论”····· | 504 |
| | 局势全面失控····· | 505 |
| | 从戒严到“六四”····· | 506 |
| 第九章 | 邓小平的最后辉煌····· | 509 |
| 第一节 | “皇甫平”事件····· | 509 |
| 第二节 | 在南国卷起的邓旋风····· | 515 |
| 第三节 | 为身后确定了改革路线····· | 520 |
| 第四节 | 两代人权力稳定交接····· | 522 |
| 第十章 | 中国的改革推进方略····· | 527 |
| 第一节 | 改革的思想动员策略····· | 528 |
| 第二节 | 渐进式改革····· | 531 |
| 第三节 | “摸着石头过河”····· | 534 |
| 第四节 | 渐进式改革得与失····· | 537 |
| 第十一章 | 邓小平的遗产····· | 542 |
| 第一节 | 繁荣的经济····· | 542 |

| | | |
|---------------------|--------------------------------|------------|
| 第二节 | 有待改革的政治体制····· | 547 |
| 第三节 | 没有上帝的社会····· | 555 |
| 第四节 | 邓小平留下的难题····· | 561 |
| | 人口过多是中国最基本的难题····· | 562 |
| | 十分棘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 563 |
| | 金融死结难解,金融风险增大····· | 566 |
| | 国有企业处境困难····· | 568 |
| 第十二章 |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 571 |
| 第一节 | 新世纪之初:是否有一次大的政治冲突?····· | 571 |
| 第二节 | 政治体制改革: 新世纪的前二十年之内应有突破····· | 576 |
| 第三节 | 中国将为解决世界三大难题作出重大贡献····· | 581 |
| | 中国在处理第一种矛盾中的作为····· | 582 |
| | 中国在处理第二种矛盾中的作为····· | 586 |
| | 中国在处理第三种矛盾中的作为····· | 589 |
| 后 记 ····· | | 593 |

第一章

毛泽东的遗产

第一节 黑色的九月九日

不知是科学还是迷信,中国人总爱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非自然的猜测。1976年3月8日,中国吉林省下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于是民间就有了传说:巨星陨落预示将有伟人辞世。果然,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件:

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

4月4日,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7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朱德元帅与世长辞;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生;

.....

中国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神州大地,到处充满了谣传和猜测。

1976年9月9日。清晨的北京城,微风拂过,偶有几片树叶

飘落。市民们照例起床、早餐、挤公共汽车。一切都和往日一样正常。但是，中南海进进出出的小汽车，北京一些重要机关里人们沉重的神色，却是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锻炼、具有政治嗅觉“特异功能”的中国人，透过那么一点点的“异常”，“感觉”到中南海里出现了异常情况。这种感觉很快走出京城，传遍大江南北。在100公里以外的天津市，唐山大地震才发生一个多月，我正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合作采写一篇抗震救灾的稿子。上午9点多钟，我匆匆赶到天津宾馆的抗震棚里去会见安岗，轻声地对他说：“北京大概出现了‘宏观异常’。”“宏观异常”是我借用当时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术语。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安岗，很快意识到将要发生“政治地震”。他对将要脱手的长篇通讯不作任何交代，10点钟就赶回了北京。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丢下了他的10亿人民溘然长逝了。

从1971年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并且出逃，给他的精神打击实在太大了。1974年春天，老年性白内障又使他双眼失明。1975年8月做手术后，他的一只眼睛也只能看到墙壁的白色。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另一个儿子精神不正常，在晚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和妻子分居。他没有温暖的家庭生活。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中南海的住处度过的。在外面鞭炮齐鸣的时候，他这里只能听到寒夜的风声。他没有家里的亲人陪伴，没有客人来访，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陪伴他的残病之躯。

在病情加重的时候，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交待后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

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①

他离开人世时是担心的，一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怕发生动乱。他是怀着忧虑的情绪离开人世的。

9月9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去了急电，要求各地稳定局势，以备应变。军队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一个政治强人的逝世容易引发社会震动甚至动乱。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正是基于这一常识。

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悲痛的声调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通报了这一噩耗。顿时全国沉浸在悲痛之中。驻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发回了各地的情况：

新华社西安九日电：……在市中心的钟楼一带，许多人泣不成声，有的放声痛哭。全市各电影院里，观众都自动地停止观看，悲痛地离开了影院，电影随即停止了放映。在新华书店，人们排起了长队，含泪购买毛主席画像……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00页。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全市6个新华书店门市部立即排起了购买毛主席像的长队，人们用手绢擦泪，书店里一片哭声。到晚8时止，卖出毛主席遗像21100张。在市区和郊区的8个百货店，到晚8时止卖出黑纱3万多尺……

新华社唐山九日电：……在唐山市内的成千上万名群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声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车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边的墙上掉泪。一位老大娘盘着双腿坐在抗震棚前，拍着膝盖放声大哭。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堆瓦砾上双手掩面痛哭失声。记者在市委大院里看见，六个同志因极度悲痛当场晕倒……

新华社合肥九日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播音员悲痛的声音时，一个55万人的城市突然沉静下来了。所有的车辆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一齐站在高音喇叭下肃穆静听……

各地新华社记者的描述是真实的。我也亲身经历了这一悲痛场面。9月9日午饭后，分社领导让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说是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让我和工人一起收听，并反映收听情况。但他没有说“重要广播”是什么内容。

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时，已有数百人集合在露天广场上（地震期间各种活动都是在露天进行的）。3点钟，厂领导人从市里开会回来。他以手掩面，哭着走下汽车，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逝世了！”他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人放声大哭起来。听广播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哭是可以感染的。当你置身于一片哭声之中，也会情不自禁

地流泪。我平时很少流泪,对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态度。按理说我不会哭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泪流满面。我想:一个伟人逝世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伤感之情油然而生。

几天以后,我一人独自到天安门广场。我在这里漫步、沉思。在学生时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多次国庆活动,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挥动大手向我们致意。现在,我仰望着空空的城楼,深深感到伟人身后的寂寞和空虚,深切体验到一个时代结束的伤感。

不管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承认他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影响的人。他结束了清王朝崩溃以后几十年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他抵御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伟人对社会施加影响,靠的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思想。秦始皇靠权力,孔丘靠思想。毛泽东不仅有支配 10 亿人的权力,还确立了他的思想体系。他运用权力使中国天翻地覆,几亿压在社会底层的人见到了天日,而千百万处在社会上层的人被打入了底层。他用他的思想改变了几亿人的思维方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黯然失色。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是毛泽东生前的抱负，还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9月18日下午3点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追悼会的分会场不计其数。在同一时间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0亿中国人都在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广场也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时，每个单位、每个居民委员会都设立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电视机前、在天安门广场和各地的中心广场同时举行悼念。那时，我因采访任务从天津睦南道骑自行车到中心广场，路过劝业场一带繁华商业区，所见街道上没有一辆汽车，没有一个行人，商店里也没有一个顾客，到处是一派寂静肃穆的气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景象。

对毛泽东的悼念超过了国界。联合国大厦降半旗致哀。123个国家的政府发来了唁电。

一个伟人辞世带给社会的震动，往往多过他带给人们的悲哀。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得知毛泽东逝世时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确实，共和国政治大厦的顶梁柱崩塌了，对在这所大厦里活动的人们造成的心灵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声背后是悲伤，是恐惧，是忧虑，是彷徨，还是期冀？都有。只不过是因人而异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这位伟大舵手的权威打击异己的人，在悲伤中带有恐惧。因为他们所打击的异己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部分已经官复原职，并且成为掌管国家重要权力的“务实派”。在中国，哪一个皇帝驾崩后，这样的人不遭灭顶之灾？这些人私下之间的接触比过去多了，他们说话比过去少了，行动更谨慎了。他们在观察，在计议。他们想干什么呢？

知识分子的忧虑也不少。他们都明白，毛泽东是在争夺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逝世的，因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更多的人在彷徨。“毛主席”，这是一代中国人用得最频繁的3个字。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在所有的书籍上，在所有墙壁的标语上，哪里不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权威的引证呢？从幼儿园的儿歌，到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报告；从家庭里的和谐交谈，到论敌间的激烈争辩，那里没有“毛主席”这3个字呢？“毛主席”充满了整个空间，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毛主席”成了人们的“上帝”。“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也有不少人怀有期冀之心。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怀有期冀，他们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有重见天日之时。在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锢得有点过分的社会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张之日。还有一大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日子有可能过得好一点。在当时，这些人还不是满怀希望的。他们的情绪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测，只是在茫然中存有一丝期冀而已。

他们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在干什么呢？

此时的邓小平还在北京宽街的家中。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很大的黑帽子：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在这个庭院里一圈一圈地散步。在四周的哀乐声中他放慢了步伐。他在沉思。他对毛泽东的逝世持什么样的感情呢？是失去老领导的悲伤？是失去重压的轻松？是重新上台的希冀？还是兼而有之？

不管邓小平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如果他有机会重整山河，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毛泽东的遗产。

第二节 权力的集中——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国家。

自从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中国的国内战争连绵不断。不管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不管是举世闻名的革命者，还是手握重兵的政治强人，谁也不能结束战乱，谁也无法实现中国的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毛泽东是历史的幸运儿。在40年的分裂和战争之后，他赶上了分久必合的历史契机，他运用自己的超人才智和胆识，克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头”。他运用中国共产党这个强大的组织，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几代人没有实现的理想：战乱息，山河一。

这是一个空前统一的国家。从东海小岛上的渔村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木屋，几乎都挂上了毛泽东的画像。从新疆的阿拉山口到南海的曾母暗沙，都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在巡逻。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飘扬着一样的旗帜——五星红旗。56个民族都唱着同一首歌曲——《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新政权把旧社会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乞丐、娼妓、流氓、小偷，都几乎绝迹。赌博、卖淫、吸毒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扫荡殆尽。50年代初枪毙了天津地区的两位腐败的高级官员，使各级政权保持清廉达30多年之久。器具脏了可以用水洗净，社会脏了，脏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就只有用血才能洗干净。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数以千万计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血，把中国社会洗得空前干净。50年代初期的中国，成了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我在系红领巾的少年时代，在偏僻的大别山农村，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温馨。

这个统一的、强盛的国家是由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系的。

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共产党有 3500 万名党员。她已经有 55 年历史，在中国执政 26 年了。在执政前的 1948 年，中国共产党只有 300 多万党员。毛泽东逝世的时候 90% 的党员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入党的。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的。列宁之所以能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取得革命胜利，关键在于他建立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有铁的纪律的政党。苏联在建党时，曾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所谓“不定形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明天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我就不是党员。这类似目前西方国家的政党。在争论中，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以后的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有可能成为个别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这个问题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出现过，在毛泽东的晚年也出现过。在毛泽东晚年，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很微弱。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相平行（实际上是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

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特征,一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实现共产主义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集中多于民主。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党委中相当多的党委书记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来自党外的监督,又缺乏党内的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滋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就是想解决党内的特权问题。但他没有从权力制衡方面来根除特权,而是用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没有制衡的权力来解决特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党内的特权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扩散和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当时的党史专家认为,到毛泽东逝世时为止,中国共产党经历了10次路线斗争。不过,80年代初,邓小平不同意“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①

毛泽东逝世前,中国共产党总共召开了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没有法定的时间间距,而是根据政治形势和路线斗争的需要而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林彪集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团覆灭之后的 1973 年 8 月召开的。毛泽东逝世时留下的是“十大”确定的思想路线和领导班子。毛泽东逝世时留下的政治局常委是：王洪文、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其中两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者（王、张），一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叶），一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升者（华）。政治局委员有江青、姚文元（此 2 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者）、李先念、刘伯承、许世友、韦国清（此 4 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此 5 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升者）。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北京市 3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亲手缔造了一个新生的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青年时代是追求民主的，他曾多次阐述过自己的民主理想。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也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1945 年 9 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向当时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 12 个问题。其中第十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其界说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与各民主强国合作。”^①但是，就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民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

^① 《毛泽东同志回答路透社记者我国需要和平建国》，载 1945 年 9 月 27 日《新华日报》。

议上说：“我们的政权的阶级性质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毛泽东把国家的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关于国体，毛泽东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① 在中国，应当由哪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谈到政体，毛泽东说：“那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他认为最合适的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领导下民主。”根据毛泽东反对议会制、赞同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组织，是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政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3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上面介绍的种种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

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可以置法律于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职务,并将他置之死地。……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是把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他的话成了“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中国人在封建时代对皇帝山呼万岁,现在对毛泽东也山呼万岁。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也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这是因为缺乏法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上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毛泽东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但是,他也是按照金字塔的权力结构整合起来的。

这种结构把领袖推上了金字塔的顶端。毛泽东所整合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是毛泽东的重要遗产。

党指挥枪

军队是这个国家机器的支柱。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真正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愿望。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度末,即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达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①。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她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80年代撤销)、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4个(美、苏、法、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1964年10月16日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9月26日,一共进行了19次核试验和多次导弹试验,发射了6颗人造卫星。

这是一支以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

^①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084页。

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

无论是抵御外患还是防止内乱，这支军队都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在朝鲜战场美国人不得不屈辱地求和；在珍宝岛上，“北极熊”也只能仓皇退却……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寝不安席。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时代，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枪，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且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国防军，它还是一支武装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十分稳定的结构。

第三节 强盛的贫困——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0倍。

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到 1978 年国有经济比重高达 80% 以上。这些国有资产几乎都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政府集中如此巨额的财富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中国 40 年来投入了 800 多亿元的专项资金治理大江大河,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那 30 年是岁岁平安的。全国还修建了 8.6 万座水库和长达 20 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当然,中央政府手中的财富也可以用来馈赠第三世界的穷国以显示中国的国威。毛泽东随便一句话就赠给阿·尤布汗 4 亿元,还轻松地说:“只要我们扫扫仓库就够了。”这位巴基斯坦总统拿到这 4 亿元后,回国就被反对派推翻了。

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强盛的大国,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大国。

先看一看中国农村的情况。

毛泽东彻底毁灭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地主制度。这本来可以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但他留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他给中国农民留下的还是贫穷。

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民真正舒心的日子是 1950 年到 1953 年。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目睹并亲身享受到了“农家乐”:交完了公粮都是自己的,多余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吃饱了饭的农民,唱着歌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我们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长长的送公粮的队伍旁边奔跑、雀跃,分享着大人物的欢乐。

但是,好景不长。1953 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粮食供求矛盾开始尖锐。在 1952 年 7 月 1 日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 40 亿斤的赤字,库存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

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当时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但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强制性地要求农民卖掉所有的粮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了。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乡政府去排队长开条子,每次只开5斤到10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犯法和“自发势力”的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据《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记载:“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对一名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可以说,从“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

在粮食“统购统销”之后,又对油料和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对猪肉、棉布、糖等等也都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样,农村的小商贩就逐渐绝迹,农村经济的活力逐渐消失了。

“统购统销”以后,对粮食凭票供应。后来对布、糖、肉、蛋等也凭票供应。什么短缺什么就凭票供应,越凭票供应就越短缺。于

是,各种票证成了第二货币,也成了贫困的象征。

“统购统销”的收购价格是很低的。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

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随后的人民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1956 年为 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 215 公斤,到 1978 年才达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

到 70 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树木都砍光烧尽。

50 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村庄掩映在密密的树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在树林和竹林里捉迷藏成为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但是,到 70 年代末期,村子里几乎看不见树木,成了“和尚村”。距我家两里地的王家老湾是白鹤之乡。全村所有的大树上都是白鹤筑的窠巢。成千上万只白鹤飞翔,嬉戏,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到 50 年代后期,树砍了,白鹤再也不来了。农村不仅人穷,地瘠,生态环境也遭受严重破坏。

80 年代,我曾同两位 1940 年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交谈。他们的老家都在大别山区。70 年代末期,他们分别回老家去看过。他们两人一致的看法是,几十年过去了,家乡比他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时还要穷。对此,他们感慨万端。

1978 年,全国 8 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 76 元,其中 2 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 300 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中国有 1/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1/3 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毕生奋斗,想解救农民于水火。但事与愿违,他奋斗的结果是,农民还是如此贫困。据说,他在晚年对此感到很悲伤。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最大。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所献身的政权下却处于如此贫困的

境地。

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是合作化和以后的人民公社化挫伤了农民积极性，限制了农民致富之路；二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剥夺农业，以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这两方面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所以，计划经济体制是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城乡差别拉大了。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1977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了，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现将我在天津第一棉纺织厂调查得到的职工生活情况抄录如下：

时间：1975年

天津棉纺一厂电动车间在编人数345人，人均月收入情况如下：

| | | |
|-------------------|-------|--------|
| 平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 占总人数的 | 2.32% |
| 平均收入11元以下的6人 | | 1.74% |
| 平均收入12元以下的7人 | | 2.02% |
| 平均收入13到15元的28人 | | 8.11% |
| 平均收入15到20元的65人 | | 18.84% |
| 平均收入20到25元的231人 | | 66.95% |
| 其中，人均收入达25元的只有几户。 | | |

当时的情况是：人均月收入10元到13元的家庭，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国家标准供应的生活品不能买全（如鸡蛋、糖），很少吃肉，多吃粗粮。

布票等证券不能买全。

人均月收入 15 元的家庭：在没有病人或上山下乡的子女不需要定期补助的情况下，一般都能买全按国家标准定量供应的物品。有时还能吃点肉。

人均月收入 20 元的家庭：一般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天津棉纺一厂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国营大厂。其他不少单位职工的收入比这还低。据分析，当时天津市人均月收入在 12 元以下的家庭约有 6%，这样的家庭可以享受一点困难补助。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呢？天津棉纺一厂二布挡车组工人张淑珍的状况是一个例子：

张淑珍每月总收入 35.7 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她全家一个月的开支帐单是：

| | |
|--|-------------------|
| 粮食总定量 127 斤(面粉 51 斤, 杂粮 76 斤), 计 18.92 元 | |
| 煤 400 斤, 5.6 元 | 线, 0.64 元 |
| 引火柴 1 份, 0.65 元 | 卫生纸两包, 0.52 元 |
| 肥皂 6 块, 1.26 元 | 卷纸两卷, 0.2 元 |
| 食油 2 斤, 1.7 元 | 墨水 1 瓶, 0.18 元 |
| 盐 3 斤, 0.45 元 | 处理白菜 120 斤, 1 元 |
| 酱油 2 瓶, 1.24 元 | 供应白菜 1 份, 0.91 元 |
| 碱面 4 两, 0.06 元 | 灯泡 1 个, 0.03 元(月) |
| 蜡烛 4 根, 0.4 元 | 学生用本 6 个, 0.42 元 |
| 房租(1 间), 1.2 元 | 铅笔 6 支, 0.16 元 |
| 汽车月票 1 张, 3.00 元 | 擦脸油, 0.2 元 |
| 清洁费, 0.15 元 | 卷烟, 2.8 元 |
| 火柴, 0.16 元 | |
| 总计 42.05 元, 人均月消费 10.513 元。 | |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1988年10月14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公布了一个材料：

1985年，上海市区180万户。按国家所公布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困难户，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4平方米的有21.6万户。住房不方便（大儿大女同室）的有24.3万户。这还是改革以后七八年的情况。比改革前还是有所改善了。同一天的《解放日报》还记载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位外国人在上海的观感：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签署著名的“上海公报”的时候，老牌专栏作家赖斯顿也随同到达阔别多年的上海。他的观感是，除了殖民地时代的华丽建筑，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他的脑海里再没有留下任何其他印象。

1974年，法国社会学家朗兹先生私自考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将考察结果写了一篇札记。札记中写道：我看到在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起来的一间小屋。屋顶披着歪斜着的羊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都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状。至多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却住着5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这两位外国人真是少见多怪。我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所看到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比他们所描述的还要恶劣得多。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房间里情况十分普遍。一到晚上，已成年的孙子上了小吊楼，年老的爷爷和奶奶和已成年的孙女儿打地铺。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还没有大的改变。1972年我到天津钢丝绳厂作了一个调查。这个厂6—9口人共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

房的有 29 户,婚后无房的有 47 户,无房结婚的 8 户,危房待修的 7 户。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白天他们是无法睡觉的。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3 平方米。50 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放在只有一米宽的公共过道里,温度高达 39 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钢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古语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妇女们也顾不得羞耻了。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工人在家中居住条件恶劣,在工厂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1972 年 9 月 14 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

在对天津市 981 个工厂的 3.772 万人的不完全统计,对在四种作业(硅、铅、苯、汞)的工人中查出,患了

| | |
|---------|--------|
| 铅吸收 | 343 人; |
| 苯中毒 | 39 人; |
| 白血球降低 | 86 人; |
| 汞中毒和汞吸收 | 134 人。 |

这个统计的确很不完全。我的同一时间的采访本上另一个资料可能更反映真实情况:天津干电池厂干汞电池车间的 125 名工人几乎人人汞中毒,一度造成停产。天津红卫皮鞋厂、十月皮鞋厂苯中毒十分严重。天津化工厂周围 1500 米的范围内空气中汞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电解车间 85 人中有 76 人患汞吸收,占总人数的 79%。

工人的工作环境如此恶劣,国家贫穷是原因之一。尽管劳动

卫生部门、工会一再呼吁，但国家拿不出钱来治理环境。

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一心想把中国搞好，这一代领导人也有非常卓越的能力，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都节衣缩食，为什么搞了几十年中国还这么穷呢？

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中国千万颗智慧的头脑。

当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领导经济的权力太集中。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他在1956年春天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权力太集中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因此，他们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探索中国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就是下放权力，中心内容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改革以前，曾三次比较大的举动。

第一次是1958年。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扩大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管理权限。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性的”企业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地方管理。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到年底，中央直属企业放下了87%，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比1957年减少了75%。同时在6个大区设立了协作区机构。

1958年权力下放以后各地都有权投资建设，一时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这为以后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是乡镇企业最早的基础。但是，地方政府官员把高指标当作自己的政绩，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宏观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6月，毛泽东说“应该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中央部门开始收回企业。到60年代初，又回到“一五”计划时期高度集中的状况。经济又失去了活力。

1964年是第二次权力下放。将19个非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划归地方安排；“五小”企业的产品基本归地方分配；适当地扩

大地方的财力；适当扩大地方调剂物资的权限等等。

1970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各部门要实行“虚君共和”。毛泽东说：“中国很统一，但经济发展慢，欧洲不统一，但经济发展快。还是虚君共和好。”因此，再一次给地方和企业一些机动权力。

每次下放权力都要出现经济混乱，为治理混乱必然集中权力；而每次集中权力必然挫伤经济活力。“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中国经济总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事实证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但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被人们认识。遗憾的是，直到80年代，人们还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从而使中国的改革走了弯路。

集中可以造就强大。热力学告诉我们，能量集中才有温差。温差越大，做功的本领就越大。原子弹、氢弹其所以有威力，在于能量集中。激光其所以有强大的穿透力，是因为将强大的能量集中到一点上。同样，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对一个国家来说，强盛和集中统一是分不开的。

但是，集中造就的整体强大是以牺牲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如果超过了集中带来的好处，说明集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这时集中就会向分散转化。

分散意味着整体的削弱。这种削弱是以个体的生机勃勃为补偿的。如果每一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不伤害整体总目标，整体就会有更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如果分散的个体偏离了整体的目标，分散就会向集中转化。

集中和分散是客观世界各类事物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能量、物质、财产、权力等等都是以集中和分散两种形态交替存在的。集中同时也集中了分裂的因子，过度集中必然转向分散。分散同时也分散了分裂的因子，极度分散一定走向集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而复始，经久不息。

认为对国民经济管理是集中了或者是分散了,都仅仅是对某一发展阶段的认识,并不是对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它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呢?在毛泽东时代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一种最普遍的认识是,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里所说的主观判断就是人们制定的计划,这里说的经济运行规律就是市场规律。

毛泽东等一代人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过来了改造社会和管理经济的理论: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使几千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这样,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将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将消灭,贫富悬殊和城乡差别将消失,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这一切都是消灭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制。

然而,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千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这个设想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

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供给和需求,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千百万种产品之间也要互相衔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比例关系是瞬时变化的动态体系。谁要控制这架大机器,使它正常运转,谁就得每时每刻地了解这个动态体系每个参数的瞬时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制定出详细计划,准确而及时地实施这一计划。

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人们不可能了解这个动态体系各个参数的瞬时变化。

要掌握千百万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市场对每一种产品需要多少？各种产品库存多少？每种产品生产多少？……这些信息来自每个工厂、车间、商店、家庭。不管投入多大的人力，都不可能准确、全面地采集到这些信息。采集到的信息经过层层管理机构向上反映时，层层加工，层层筛选，在加工筛选过程中加进了很多主观的东西。最高决策机关得到的是失真了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中央计划机关要耗费时日，中央计划机关接到信息的时候，动态体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计划机关用失真了的、过时的信息作为制定计划的依据，这种计划必然是错误的计划。

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即时得到了准确的信息，他们也很难从这些信息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一个中央计划机关，不管其机构如何庞大，不管其工作人员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那么在短的时间内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出规律，从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即时得到正确的信息，也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一正确的决策也不能及时地执行。生产是有一定周期的。你想增加某些产品的产量，不是马上就能增加；你想减少某些产品的产量，也不是马上就能减少。硬要一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苏联在 60 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著名的苏联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① 1964 年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也说，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制计划的工作中去，到

① 亚历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中文版，第 185 页。

1980年才能编成1964年的计划。

由于技术上不可行,不管计划机关多么庞大,不管计划长官多么英明,不管计划工作人员多么悉心尽职,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决策。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因此,所谓计划指导,不可避免地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中国人有句古话:“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定受穷。”在不断的错误算计中,中国人怎么能不穷呢?

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个重大缺陷是,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但是,一旦真正剥夺了个人利益动机以后,就又出现了另一个社会弊端: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和器官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个个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懒惰之风盛行,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力。“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这种常用但效果很有限的办法。动力机制麻痹一个最可怕的后果是技术进步停滞。尽管计划经济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在生产领域的技术状况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且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和前面所说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互依存的。

第四节 面临改革浪潮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一个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中国放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才能准确认定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对这个问题我曾同朱厚泽先生(曾任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进行过讨论。下面的内容吸收了他的看法。

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改革目标。要考察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考虑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上的种种危机。

19世纪中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农民生活状况愈加恶化,工人每日工作长达16—18个小时,工资很低,食不果腹。工人中开展了自发地捣毁机器的运动。法国在1831年和1834年发生了两次工人起义。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给劳动群众带来了灾难,1834年,50万名工人在短时期很快组成“全国工会大同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从1838年到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3次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在德国,纺织业中心西里西亚3.6万名工人中就有6000人直接死于饥饿。1844年西里西亚爆发了震撼全欧的纺织工人大起义。

1848年,滚滚的革命浪潮淹没了欧洲大地。从巴勒摩到巴黎,从柏林到维也纳,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都爆发了革命。

从1873年到1895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衰退。企业破

产、银行倒闭、股票暴跌。这显示了早期资本主义调节手段的无力,也显示了早期资本主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的战争将欧洲打翻在地,加快了英国的衰落,加强了美国的力量,却丝毫没有解决1914年以前出现的种种内在矛盾,反而加深了危机。

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自19世纪以来,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武器进行过尖锐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危机。

早期资本主义到底有哪些危机呢?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

这些危机造成了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了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20世纪初,人类面对这些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4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失望中寻求的第一种出路。法西斯的本来意义是古罗马执政官权力的标志,即用红带捆绑的一束棍棒,上面插着斧头,象征众人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权威。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信仰、服从、战斗”。在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在1902—1914年间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激派,后来他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希特勒的重要帮凶。即使是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头子,当时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不过,他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他认为雅利安人是地球上唯一富有创造力的种族,对其他种族、特别是对犹太民族

实行种族灭绝。纳粹党在 1920 年的纲领中就提出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法西斯主义有几个特征：一是以一个有高度权威的领袖为中心的极权统治；二是反对民主，扼杀人权，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三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四是在口头上宣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些特征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针对性。法西斯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苦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失望和贫困的深渊之中的德国，法西斯有很大的号召力，有一大批狂热的信徒。

寻求出路的第二种探索是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在北欧一些国家的实践。它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提倡按照现行的政治程序实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渐进的演变。德国理论家伯恩斯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 年)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克服自身的缺点，如失业、生产过剩、财富分配不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执政，如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极权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但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种探索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完善和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困苦中不断地从自身演进和改革中寻求出路。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 1935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劳合·乔治曾任英国首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几年间是英国政界的首要人物。1911 年他提出国民保险法，对患病和失业者给予补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劳合·乔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先驱。民主党人罗斯福在 1932 年的大选中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 32 届

总统。接着“罗斯福新政”很快出台。新政包括一系列法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妥协方案,如禁止童工,工作周在办公室实行40小时工作制,在工业部门则为35个小时,并且规定了最低工资,工人可以自由组织起来,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劳合·乔治和罗斯福的改革,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残酷的方面,从而减少了社会摩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变革:

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工会不是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它保证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得到了相当稳定的份额。工人收入的增加,也就增加了社会需求,从而缓和了生产过剩的矛盾。

二、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如上面所介绍的,英国的劳合·乔治和美国的罗斯福所作的努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福利更加完善。

三、国家干预经济。资本主义的这项改造是和凯恩斯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最初的意图是,用国家预算来补偿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总需求一旦不足,国家就采取减免税收或增加开支的办法,或者兼而用之,以提高需求和生产,恢复充分就业。

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资料,1952年美国仅有650万人持有股票,占总人口的4%,1980年有2980万人持有股票,占总人口的13%。西门子公司今天仍然是世界闻名的跨国公司,但西门子家族的股份只占4%左右。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中已没有西门子家族的成员了。与此同时,不少企业职工拥有股权。

五、经理阶层的出现,接管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企业不再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管理人员也是受聘的。他在这个企业可能没有股份。他

的财富是管理业绩,而不是股票。他的管理业绩显著,名声鹊起,各家公司就争相聘请,他的工资可以高于总统;他的管理业绩不好,就声誉扫地,就没人聘请他。

第四种探索就是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由来已久,其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莫尔的《乌托邦》,后来发展为各种流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词出现于1830年前后,例如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所有以前的社会主义可以说都是一些支流,它们最后都汇入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把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当时他所了解的一切优秀成果批判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实现,列宁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有的历史机遇,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在贫穷的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中国人是很熟悉的。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被一些不发达国家所仿效。中国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中国能走上这条道路,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以上这4种道路几乎同时在20世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进行了试验。到20世纪末,实践基本作出了结论。法西斯道路受到全人类的唾弃。虽然到20世纪末还有一些信徒,他们不可能再掀起大的风浪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自我改革基本合流了,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造就了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生产力,又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整整300年的总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由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斯大林手中成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些落后国家的旗帜，在十几个国家中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它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它的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的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到毛泽东的晚年，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并且逐渐形成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浪潮。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并不想急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想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和亚洲、南美国家中将来还有用。”他还批评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民粹主义倾向”“就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

毛泽东后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而且批评了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这中间是如何转变的，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有专门的著作对此作过论述。^①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但基本特征还是相同的。毛泽东留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毛泽东

^① 见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

逝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 2093 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1980 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 5.4 万个,生产大队 71 万个,生产队 566 万个。有 1.7 亿户、8 亿人口、3 亿劳动力参加人民公社。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① 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60 年代曾给每户农民留下一点种菜(仅够家庭食用)的自留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留地也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收归集体了。

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 1978 年占 80.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 19.2%,没有私营工业。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营商业占 90.7%,集体所有制商业占 7.2%,个体商业只占 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 2%。

第二,人剥削人的现象基本消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所谓剥削,就是一部分人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1956 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人基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也就不可能有剥削。而且出租土地、房屋,私人借贷等被禁止。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开始几年还可以拿定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定息也被取消了。雇工也被禁止。到 60 年代,由于把商业也当作剥削,连小商小贩也没人敢做。虽然私人不能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但劳动者的大量剩余劳动被国家占有。国家把这些剩余劳动所积累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建设,一部分因决策失误等原因而浪费了。

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国家统管的物资 700 多种。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

^① 见 1981 年《中国经济年鉴》张思睿文:《1980 的中国农业》。

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到了“文化大革命”，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第五，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承认商品经济。还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迟早要消灭。

第六，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了中国社会一种特有的基层社会结构。经过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几乎中断，在城市和农村形成了同构同体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共省委——省政府各委办局——中共市委——市各委办局——中共县委——县各局。这种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金字塔网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每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建国初期，在经济规模比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对外交往比较少的情况下，这套制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它较好地集中了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令人尴尬的是，几十年实践的结果，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它的实

践出现了强烈反差：

理论：计划经济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防止资本主义那种经济危机；**实践：**计划经济也经常出现比例失调，不得不周期性地经济调整。每一次调整就是对生产力的一次破坏。

理论：社会主义会逐渐消灭城乡差别；**实践：**几十年来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践：**群众很难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少数领导人说了算。

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要逐渐消亡；**实践：**国家功能不断强化。

理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廉价政府，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最轻；**实践：**国家政府机构空前庞大，行政开支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在其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晚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改革。这时，毛泽东已经看到了面临的危机，所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①

即使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也是不允许别人反对的。他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②

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留下的就是一个问题丛生、面临改革浪潮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第五节 有待重新构筑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在中国,有一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这个词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写一部专著才能说清。这些,不是我这本著作的内容。我这里需要阐述的是,毛泽东离开了人世,它的思想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人世;毛泽东再不能运用权力来控制中国,但它的思想还在控制着中国。

理 想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思想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天国:共产主义社会。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

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一段富有激情的词句，曾使多少青年为共产主义献出了青春和热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确定建国方针时，毛泽东虽然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现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但同时还是毫不隐晦地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主义理想提得更加明确。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都持续不断地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对所有的青少年，都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不仅被当成每一个青年人的努力方向，也是成年人思想改造的任务。1956年农村合作化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也被当成一种崇高的信仰，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这一目标、信仰、世界观，像夜行军队的火炬，像大海航行中的航标，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把各方面的人集结起来，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时间，共产主义这个理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人们的心。

但是，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接连3年的大饥荒，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打击，这个理想的火炬开始逐渐暗淡了。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带有很大成分的中国色彩。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小说杂记读得很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很深。他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难免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混融在一起,又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毛泽东还把共产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联系起来。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书》提出要消灭家庭,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思想还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匈牙利事件和苏联批判斯大林感到忧虑和伤感。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

为什么这些国家丢掉了信仰呢?毛泽东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却没有从经济基础上找原因,而是主观地认为: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到自己头上来了。^①

毛泽东决心用阶级斗争来把理想的火炬重新点燃,从而出现了他的政治学说。毛泽东留下来的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斗争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矛盾论》、《实践论》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哲学思想渗透在《毛泽东选集》的所有篇章之中。

“对立统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世间一切事物都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分为二”),但这两个方面不是平起平坐的,必然有一个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对立的两面不断地进行斗争,但又是“统一”的。统一,就是这对立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相互依存就是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也随之消失;对立面的转化是一方可以转化为另一方,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转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毛泽东用对立统一思想分析了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民主和集中、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党内和党外、好事和坏事、敌方和我方、革命和反革命等方方面面,给各级干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立统一”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各项政策、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

恩格斯把辩证法概括为3个基本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与康生、陈伯达等人进行关于哲学的谈话时说:“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在1965年的杭州会议上他又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人们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对辩证法的上述发展,正是他崇尚斗争的哲学根源。他用这一哲学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并处理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反对中庸,反对折中,反对调和。因而处处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他虽然说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这种区分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从党的主席毛泽东到一个小小的基层党支部书记,谁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我矛盾”,说成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的哲学又是积极进取的哲学。

毛泽东认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军事家不可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在军事方面,也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作为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是条件论者,但他坚决反对唯条件论。他反对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无所作为,主张努力改变条件、创造条件,从而有更大的作为。这一哲学思想使他毕生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不断地向客观世界挑战。

但是,到了晚年,毛泽东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得过了头,因

而出现了唯意志论的倾向。“大跃进”、“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都是唯意志论的产物。

毛泽东的认识论是“两个飞跃”,他更强调“第二个飞跃”。

毛泽东是主张调查研究的。他年轻时自己进行了很多调查研究。他强调认识来自实践。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产生正确认识的?毛泽东认为认识分两个阶段,他称之为“两个飞跃”。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五官反映到头脑中来,形成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变成理性认识。这是第一个飞跃。第一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第二阶段是从精神到物质、从思想到存在。这就是把第一阶段得到的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就产生第二个飞跃。他写道:

这次飞跃,比起第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提出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毛泽东不会想到,他逝世后仅20个月,《光明日报》就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毛泽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的思想,竟成为批判他晚年思想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两个飞跃”的认识论比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表述的认识论前进了一步。列宁只认为,“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虽然说过人认识事物“不是简单地、直接地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地、二重化地、曲折地……”但是,认识主体在列宁那里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有主动性和有生气。然而,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正是在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上,毛泽东这个唯物主义者,有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晚年的有些看法,和社会实际相差很远,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丰富了这一理论。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编辑部文章是这样概述这个理论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

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

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冲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当时称为“两报一刊”，联合发表文章，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声音。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上述解释，应当是最权威的解释。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由于有一定的逻辑力量，毛泽东在世时，在青年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由于它的矛头是指向领导干部,而群众对领导干部中的特权一直怀有不满情绪,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这一理论在毛泽东身后还有很大的影响。

在上述解释中,第一条是哲学思想,早就深深地扎根于很多中国人的脑海中了。

第二条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构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执行了几十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仅制造了成千上万的人间悲剧,也使经济建设一直摆在次要地位。它制造了无休止的斗争,也制造了贫困。毛泽东逝世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还作为政治遗产传给他的继承者。

第三条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主要是针对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其打击对象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它像如来佛压制孙悟空的五指山,把邓小平沉沉地压在下面,没有期限地等待着翻身之日。一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要继续批邓,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还喊得震天价响。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打击党内领导干部的无情棍棒。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这一条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对群众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他们直观地理解为“坏事就在党内”、“问题就出在党内”、“特权就在党内”、“危险就在党内”。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反映了实际情况,甚至认为是代表了群众的呼声。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既打击了领导干部,又

打击了知识分子,又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在所有人的头上都悬上了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有两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基本接受了其中的主要思想。虽然,苏联的经济学是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那是斯大林僵化模式的图解,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相距甚远。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其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并提出如何消灭剥削。他的价值概念是为了引出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逻辑结论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价值,这个“抽象的幻影”,其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剥削关系。消灭私有制后,就可以消灭商品,消灭货币,消灭一切引起剥削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他的其他学说一样,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正如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总体上不是具体指导人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学说(这不排除某些个别结论和某些研究方法对经济建设有用处)。但是,马克思的后人却把它当成了指导经济建设的学说。问题就从这里出来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排斥市场经济,都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经济制度。苏联通过实践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才后退一步,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这种承认是暂时的,今天不消灭,总有一天要消灭。在共产党内也就很自然地有这样一种倾向,谁想消灭商品,谁就最革命。这种倾向在实践中常常碰得头破血流。

不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把刀子”,不仅是指向资本家,也会指向控制生产资料,并运用这些生产资料组织生产的个人

或集团。国家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成为生产的组织者,也逃不出剩余价值的逻辑。特别是当工人为国家干活几十年,还得不到一间像样的住房,他们会问:我们的剩余劳动哪里去了?斯大林回答说,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概念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在这里,斯大林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划了一个等号,又在工人阶级和工人群众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两个等号把剩余价值“这把刀子”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身上排斥掉了。这一看法毛泽东当然是同意的。

1958年,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同一些领导干部谈到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感想。

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即:只要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必须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社会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存在的条件说得

不完全,因为除了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这个条件之外,生产力水平低也是一个原因。另外,斯大林认为商品的活动范围只是消费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个范围划得太小,有些生产资料,例如农业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比斯大林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还认为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要时刻加以警惕。他认为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是修正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主张搞计划经济。他和斯大林一样,认为价值规律对经济不起调节作用。但是,他苦于没有找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他也知道计划工作并没有反映客观的比例关系。计划经济怎么搞,他还在摸索之中。“鞍钢宪法”是摸索的成果之一。1960年3月提出的“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他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前五个关系是讲宏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比较适合当时的情况,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这样做。例如,他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但在实际上,他却大搞“三线建设”,把有限的资金都投到山沟里去了。

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

在晚年,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三篇文章)要天天学、时时用。这3篇文章包含了毛泽东的道德观的主要内容。白求恩、张思德、雷锋是当时道德观的样板。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的主要内容是:

在处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处理个人和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时,提倡每个人都“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时,提倡为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在事业观方面,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崇尚革命英雄主义。

在苦乐观方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生活上,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反对享乐主义。

怎样保持精神的净化?斗私批修。怎样斗私批修?党的组织生活会,群众的斗私批修会。当时党的生活会还真正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员的不良行为还有相当的制约力。

毛泽东时代曾批判过“道德继承论”,认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不能继承。实际上,中国很多传统的道德观在毛泽东时代以新的内容出现了。中国过去就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现在把“义”的内涵换成“共产主义理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从形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全部内容,而且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出现了真正的献身精神。

这一整套道德观使人们压抑个性、牺牲自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时的人们除了共同的事业没有个人的事业,生活上也没有很高的追求。虽然很穷,但生活很安定,也比较满足。社会安定,社会秩序比较好,没有抢劫凶杀,没有卖淫嫖娼,没有赌博吸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毛泽东时代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等,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价值体系。这种由多方面的价值观构成的体系,就是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由于多数人接受了这一标

准,并用这种标准指导自己的行为,这种价值体系在社会上占了统治地位,因而这一套价值体系成了人们心中的“上帝”。

“上帝”的地位一经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种力量有强烈的排他性,它会强烈地排斥其他价值观,包括一切正确的价值观。为什么1960年全国饿死那么多人,社会没有出现动乱呢?价值体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人如此疯狂?也是由于价值体系的力量起作用。

“上帝”的地位一经确立,为了维护“上帝”,父子可以成仇(毛泽东时代不少儿子以揭发背叛父母亲为荣),夫妇可以反目(“文化大革命”中因观点不同,夫妻吵架的事经常发生),朋友之间可以大动干戈。所谓“大义灭亲”,义,就是当时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为什么能建立起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呢?

一是原有价值体系崩溃已久,人们渴望新的价值体系。封建主义礼崩乐坏,资本主义一开始是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国,群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而共产主义却在短期内解决了中国的不少问题。

二是中国文化水平低下,缺乏国际比较。人们容易接受这一价值体系。

三是政权力量对价值体系的建设。通过政治运动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对异端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讨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批梁漱溟,批胡风,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在这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中节节胜利(至少是表面上的胜利),使有不同思想的人臣服。一些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停止了思考(至少是停止了宣扬自己的思想),广大群众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没有“杂音”,没有“噪音”,群众的思想就“单纯”了,“统一”了。新一代人就

把这单一的思想当作真理来吸收。这就形成了思想上的“一元化”。

但是,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数十年竭尽全力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已经开始崩溃了,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就流露了这种悲观情绪。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遗产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宝贵的财富,也有沉重的包袱;既有令人留恋之处,也有令人不快之处。毛泽东遗产中的包袱主要是两个:政治上高度集中和经济上贫困。他的继承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在20世纪末的世界潮流和价值取向的条件下,解决高度集中问题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管理法制化,解决贫困问题就是经济市场化。然而,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令人留恋的东西对他的继承人来说也是可怕的。例如,在进行社会变革时,有可能打乱原有的价值体系,有可能出现一定时期的社会混乱。这时,人们就会以原来良好社会秩序为标准来批评继承人:还是毛泽东时代好!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正是邓小平时代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中国20世纪末这一场社会变革的初始条件。

第二章

十月六日的风雷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仅限于经济领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没有政治改革为先导,经济改革是无法进行的。有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则政治改革不知从何处下手;如果先搞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条件,则经济体制改革又无法进行。

1992年7月6日,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的文章。我是这样写的:

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家鸡是由野鸡进化来的。野鸡又是由更低级的种类进化而来。沿着这个进化链向远古追溯,它的远祖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更低级的动物和它的胚胎。如果说先有蛋,这个“蛋”也不是今天家鸡的蛋;如果说先有鸡,这“鸡”也不是今天的鸡。

先有政治改革还是先有经济改革?我国的实践是先有初步的政治改革,然后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又推动政治改革。每一次政治改革行动都不能建

成新的政治体制；每一次经济改革行动，也不能建成新的经济体制。二者轮番推进，逐步演化，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会应运而生。

我这里把政治体制改革说得过于乐观。事实上，在初步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创造一定的条件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再向前推进了。

第一节 毛泽东病床前的政治斗争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一幕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政治活剧。

毛泽东逝世之前，在他周围就有几股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行明争暗斗。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势力遭到彻底清洗。剩下来的有两股政治势力。一是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毛泽东亲自提拔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和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4人为首的“左派”。与他们相对立的，是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主管经济工作的务实派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界的元老派。务实派和元老派都拥戴周恩来。在林彪垮台之后，周恩来实际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他处理国家的日常工作。周恩来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一些跟潮流的话，但他和江青等人还是格格不入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4年，他实际上是务实派和元老派的代表。

这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搞经济建设（即四个现代化）；是全面肯定“文化

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尽快把“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

毛泽东在世时，显然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并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底”在哪里。不过，由于林彪事件对他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他的思想天平一度向务实派这一边倾斜。如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重新起用邓小平等。

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掌握着舆论宣传工具，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另一派则对“文化大革命”持反对态度。毛泽东在世时，他们不敢公开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在政治上他们还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经济部门和军队中，他们有强大的支持者。

围绕邓小平第二次出山的明争暗斗

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真算得上是一个特殊人物。说他特殊，是因为像他这样身居高位又三起三落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的。

邓小平第一次起落是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左”倾领导人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他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和他一起挨整的还有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左”倾领导人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令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开展了一场批判“邓、毛、谢、古”的斗争。在邓小平遭受打击时，他的妻子阿金离开了他。他遭受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双重不幸。

当时邓小平挨整还有一个大背景。在1930年到1934年间，

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5次围剿。在红军如何同处于优势的敌人作战的问题上,领导人中间一直存在着分歧。毛泽东主张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毛泽东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免除了他在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邓、毛、谢、古”和毛泽东持同样的主张。

在“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同刘少奇一起,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67年6月20日到7月5日,邓小平写了长达3万言的《我的自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心迹。

可能是他这篇《我的自述》打动了毛泽东,也可能是毛泽东念及30年前他们同受“左”派打击的历史,毛泽东对邓小平手下留情,使邓小平没有遭受刘少奇那样的命运。

1969年10月20日,一架专机押送他到江西省去劳动改造。具体地方是距南昌不远的新建县。这里原来是一所步兵学校。邓小平、卓琳和他的继母,住在步校的“将军楼”里,每天到附近的一个小拖拉机修配厂里参加半天劳动。在这里,他们一住就是3年零4个月。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上写了4个字:“林彪死了”。原来他们听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在信中他谈了自己对林彪的看法并且表示了重新工作的愿望。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给毛泽东写了一

封信。邓小平在这封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的信中，谈到他第四次同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林彪罪行的文件，再一次谈他对林彪等人的看法，重复了1971年11月那封信中请求工作的内容。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30年代的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和毛泽东划到一条战线上去了。毛泽东记住了，而且记了40年。这一记忆，在邓小平第二次起落中起了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多次路线斗争，在用人方面，很注意划“线”。毛泽东也是如此。

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将会大大加强周恩来同左派斗争的力量。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以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一家祖孙四代一起乘火车回到北京。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3〉14号)下发到基层。当时我在天津听传达时,大家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有改弦更张的趋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十分欣喜。

显然,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的一个胜利,而“左”派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想寻机阻挠。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反对邓小平去。会后,周恩来置江青的意见于不顾,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要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就邓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事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的意见转告政治局其他人。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问题。江青仍不同意。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4月6日邓小平赴“联大”,周恩来来到机场送行。4月19日,邓

小平归来，周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①

1973年6月，邓小平协助患病的周恩来，负责中央日常事务。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1974年6月1日开始住院，继续在医院里视理国事。

1973年8月24—2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12月12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担任参谋长。他对大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改一改吧。”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站在周恩来一边。从此，“左”派和务实派的斗争日益激烈。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发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种阻力在1972年的“二月逆流”中是一次集中表现。所谓“二月逆流”，就是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元老们，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发了一些牢骚）。这种阻力来自一些重新工作的老干部。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尽可能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其中大部分站在务实派和元老派一边。“批林批孔”的矛头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的。“左”派利用“批林批孔”的武器同务实派进行斗

① 《大地》1994年第6期，《危难之秋举“邓公”》。

争,把斗争锋芒指向了周恩来。

林彪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变成要置毛泽东于死地。这件事对毛泽东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另一方面也比较倾向于过去受林彪排挤的务实派。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张玉凤用电话向王洪文传达,毛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两年多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作的安排。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7年了。毛泽东希望国家尽快走上正轨,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又成了双方斗争的焦点:“左”派想阻止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上。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了“风庆轮”问题。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风庆轮首航欧洲。起航后,有些人要批判造船和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风庆轮政委李国堂不仅不批判,反而说了一些对“左”派不满的话,例如议论了“样板戏”,结果被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整周恩来。当时国务院为了尽快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在国内造船工业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要从国外买进一些船只。“左”派认为这是“崇洋媚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要邓小平表态。邓小平毫不退让,双方发生比较激烈的争执,邓小平拂袖而去。

姚文元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斗争形势突然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经有庐山会议的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认为,在人事安排上,必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估计,在“批林批孔”这个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会

支持他们。于是，他们兵分两路，立即行动。

一路是让王洪文第二天一早飞往长沙，面见在那里的毛泽东。毛泽东在7月18日下午两点接见了王洪文。在场的张玉凤于1980年11月在审判“四人帮”的证词中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另外的一些资料则说，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没有表态。

与此同时，江青约请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希望通过她们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晚年时，只有毛远新和王、唐等几个人才能接近他）。10月18日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3人

一起向王、唐介绍了情况，谈了他们的看法。但是，第二天王、唐二人就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等人向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问题，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像江青说的那样，是他们4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王海容、唐闻生在场。事后，王、唐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发生的情况。毛泽东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主席还对王、唐二人说，因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12日，邓小平飞到长沙。毛泽东接见了，并且表示了对他的支持。邓小平又就自己的工作问题对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问题，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起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12月23日，已经动过多次手术的周恩来，和王洪文各乘一架专机到长沙。就“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在毛泽东面前最后敲定。毛、周、王，是当时党中央的第一、二、三把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毛之下，周、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4次谈话。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还指出江青有野心。又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张春桥有才干。当确定副总理名单时，周恩来念道：“邓、张、李……”即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

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①

1975年1月13—18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这和当时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旋律不太协调。新一届国务院名单是:总理周恩来,副总理的名单排列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在国务院里的13人当中,除了来自工农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以外,其余10个人中务实派占绝对优势。坚定的“左”派只有张春桥一人。“左”派虽然在宣传舆论上占优势,但在组织上已经失败。

这时邓小平已经身兼多项要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当然,在组织上他还是受到制约的。除了毛、周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以外,在党内,王洪文的地位在他之上。在政府里,张春桥仅在他之下。在军队里,张春桥是政治部主任。此外,江青还是他的一个有力的对手。但是,在上述这些机构里,他的支持者更多。

邓小平可以放手大干了。

1975:邓小平初试锋芒受挫

邓小平大权在握。他决心大干一番。在当时情况下,最需要他干的事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偏差。而他真要这么做,势必要和“左”派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他在政治上也必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① 王年一:《大动乱时代》,第511页。

邓小平打出了“全面整顿”的旗帜。

所谓“全面整顿”，就是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把经济搞上去。要搞好经济，就要有安定团结的环境。要有安定团结的环境，首先就要反对“派性”。所谓“派性”，就是为自己政治派别的利益，挑起政治争斗。当时各级政权是由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革命委员会。这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经常为自己这一派的利益进行明争暗斗。1972年以后，由于老干部绝大部分已官复原职，在运动初期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造反派，已经失去了运动初期的权力。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总想挑起政治争斗。而革命委员会内的权力斗争又和外面的造反派联结在一起。从安定团结的要求来看，他们是不安定的因素。所以，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铁锤，首先就敲在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身上。

整顿是从铁路开始的。3月5日，邓小平主持制订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他的得力助手、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大会，根据9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厉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撤职调离。对社会上煽动派性的极端分子，逮捕法办。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形势明显好转。

当时毛泽东的话是全国必须执行的最高指示，而这些指示多数是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为了使整顿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致起来，邓小平把毛当时发表的内容不同的“三项指示”捆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认为毛主席的指示“不能分割，必须综合起来理解”。

“不可分割”是邓小平为了回避毛泽东某些具体指示的一种手法。在以后同“凡是派”的斗争中，他又一次用了这个手法。

5月29日，邓小平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

再一条就是关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指示,还有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就是指当时公布的几条“最新最高指示”: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①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②

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和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把经济工作和它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发表过多次这类讲话。为了宣传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邓力群的主持下,起草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工业方面,邓小平还主持制订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即“工业二十条”,提出整顿企业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措施。

在教育界,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也开

① 1974年10月20日同丹麦首相的谈话。

② 1974年12月26日,在长沙就筹备四届人大问题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

展了整顿。在整顿中,邓小平对全面否定17年(1949—1966)的教育,全面否定知识分子队伍的看法提出了疑问。

在科技界,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大力开展了恢复科研秩序的整顿工作,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提出了和文化大革命主流思想不同的看法。

就在邓小平大搞整顿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奉毛泽东之命,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共33条语录)小册子,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毛泽东批发全党全民学习。张春桥又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这篇文章也是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发表的。这本小册子和这篇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到空前高的程度。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强调搞建设时不能忘记反修防修,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这样,在邓小平大搞整顿、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偏差的时候,同时在全国掀起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学习运动。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两场对台戏。在这两场对台戏中,邓小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1975年,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几经波折。这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系。他在两种力量之间搞平衡,一会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会儿用党的纪律来约束江青等人,防止他们过于激进。

在学习理论的运动中,江青等人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在宣传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为了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姚文元让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4月21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正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很清楚,这段话是批评江青等人的。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一次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根据毛泽东这些批评,邓小平连续两次举行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叶剑英、李先念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江青则说邓小平等人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最后王洪文、江青还是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他们并不认输,等待机会对务实派进行反攻。当然,反攻还得借助“钟馗”——毛泽东。

从1975年9月底到10月初,毛泽东的侄子(也是他的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几次汇报,主要内容是指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等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向他汇报的意见向他们全讲出来。在这个小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异议。接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邓小平对批评又提出了异议。毛泽东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

绩,三分错误”。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东西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没同意,但让邓“专管外事”。^①

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把邓小平打下去的决心。毛泽东在接见重要外宾时,邓是少数在座者之一:

10月2日,毛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10月31日,毛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邓小平在座。晚间,邓还以周恩来的名义宴请施密特。

11月14日,毛会见缅甸总理吴奈温,邓小平在座。

12月3日,毛会见美国总统福特,邓小平还在座。

但是,12月24日,毛会见达科斯塔总统时,邓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后毛接见外宾,邓小平再也没有陪同过。

进入10月份以后,邓小平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干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把赵紫阳从广东调到中国第一大省,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当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为他以后的改革事业作了一个重要人事准备。

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1975年冬天,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决心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因此,他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态度,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站在“左”派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批评邓小平的“最新最高指示”:

^① 王年一:《大动乱时代》,第553页。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时党内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这几条“最新最高指示”，都是针对邓小平的。“走资派还在走”，是指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官复原职的老干部，还在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形象的说法在1975年在全国广为流传。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还不是一棍子打死。他说：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根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5年11月，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继“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又一次保卫“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开展的持续9个月的全面整顿就此中断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开始的。这两封信是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迟群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名干部，谢静宜是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们二人是毛泽东派往清华大学去搞教育革命的。信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11月3日，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4人的信的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当时，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很不以为然。朋友们私下议论：“一个共产党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被定为路线斗争，今后谁还敢反映情况？”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相当多的人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他们是官复原职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和一些不希望再乱的群众。当然，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持积极态度的人也不少，主要是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失去了权力的造反派和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毛泽东一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最高指示”，对那些不满官僚主义的群众也很有号召力。当时我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棉纺一厂采访，看到满墙满院的大字报，还颇有声势。

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了。周恩来1972年5月18日确诊为癌症，1974年6月1日住院，从这时开始，共做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6次。但是，在这期间，他时刻密切关注着、参与着中国政坛的复杂斗争。直到12月间，他对

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使政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周恩来又说,邓小平比他干得好。邓小平是他的交待和寄托。

周恩来要做最后一次大手术,躺在车床上时,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目送他进手术室。他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这是难以预料的。这时,已经使用了麻醉但还没有发挥作用的周恩来,突然异乎寻常地把邓小平叫到车床旁边,大声说:“这一年多来你干得比我好,你比我强!”周恩来垂危时,邓小平通宵达旦守候在病榻旁边。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会。他忍住悲痛,为周恩来致悼词。当他们走到周恩来的遗像前鞠躬时,全家人失声痛哭。^①

周恩来逝世后,“左”派加紧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火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务实派及其广大支持者用悼念周总理的方式暗中对抗。“左”派就限制群众的悼念活动。可是越限制就越激起群众的不满,越限制群众就越是怀念周恩来,悼念活动的规模就越来越大。在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中,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对“左”派不满的言论也发泄出来了,于是“左”派就进一步加强控制。这样,在群众和“左”派之间,就形成了悼念和限制悼念的对抗。由“左”派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个时候却公开称周恩来是“走资派”,在3月25日刊登的一篇新闻稿中写道:“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就是指“周恩来把邓小平扶上台”。这一下更加激怒了群众,到清明节时矛盾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关于“四五运动”的记述已经很多,本书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对两种力量搞平衡的情况下,两种力量中任何一种走过了头,都会走向反面。毛泽东既不允许“左”派否定周恩来,也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23页。

不希望务实派打倒“左”派。悼念周恩来的人们明确提出要打倒江青、张春桥等人,这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而令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在4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上,200万人情绪激昂地发泄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提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还发生了暴力冲突。这叫如何能够容忍?何况这种情况不只在北京,在上海、南京、杭州也有成千上万的情绪激昂的群众聚会呢!这么严重的事态在建国以后还是第一次。“左”派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向毛泽东加油添醋地反映情况,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

4月7日,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悼念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解除邓小平的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决定,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4月7日晚,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会,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终于第三次下台。“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声势越来越大。邓小平又一次成为全国所有报纸、电台声讨和批判的对象。邓小平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在当时,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头衔。

4月8日,北京100多万军民上街游行庆祝。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重新在游行队伍中震天价响。

4月9日,北京市1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

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伟大的胜利》。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阿!”

各省和各大军区都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接连几天的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全国各省委、各大军区党委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这些电报都表示:“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全国造成了万众一心声讨邓小平的气势。邓小平似乎被打进了永世不能翻身的十八层地狱。

5月16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又进一步对邓小平进行了清算:

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制造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受到了群众的批判,说了一大堆“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的话。可是,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他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邓小平这次下台以后,中国的权力结构明显地向有利于“左”派的方向变化。主管军队的叶剑英元帅被迫“因病休息”了,由毛

泽东和毛远新信任的陈锡联接替他的工作。李先念也失去了权力。务实派这次受到了严重挫折。不过,他们还有很强的实力,还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如何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继承人,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

在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始皇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就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苏自尽。胡亥登基以后,为了消灭政敌,一次就杀了12个哥哥,10个姐妹也被车裂。此后的数千年间,为争夺继承人的位置而流血冲突的事件不断发生。到最后的一个清王朝,兄弟之间的争夺和残杀,母子间的明争暗斗,也几乎是代代不绝。

为了防止因继承人位置的争夺而造成社会动乱,封建时代采取了长子继承的方式。这种办法的弊端是众所周知的。它排除了择优而用的原则,甚至连最小范围内(几个亲兄弟之间)的择优也不允许。不管能力高低、品质优劣,只要是长子,就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利。用天然的、无可争议的标准来防止争端。这个办法也没有避免悲剧的不断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封建王朝,但缺乏选拔继承人的良好机制,最高领导者一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样,在他生前,即献媚和阴谋环绕;在他身后,则对立和争夺丛生。毛泽东先后选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人,都是十分悲惨的结局。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位置的斗争,其实质是在毛泽东身

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改弦更张，把经济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希望的结果，别说受害者希望改弦更张，就是普通群众也都很厌倦。所以，相比之下，务实派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周恩来病危期间曾十分坚定地告诫务实派：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在“四人帮”手里。“四人帮”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在权力面前寸步不让。双方有剑拔弩张之势。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9月11日到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7天的吊唁仪式。在这期间，30万人来吊唁，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佩带黑纱的人川流不息。

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一同站在毛泽东遗体前面显悲戚的人们，心里都在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急切地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从事后披露的材料知道，王洪文想当委员长，江青想当党的主席，张春桥看不起江青和王洪文。而江青那种胡搅蛮缠，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把华国锋当作他们夺权的直接障碍。当197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时，张春桥就写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1975年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从这个《三月二日有感》，可以看到张春桥对华国锋是多么怨恨。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先沉默不语。停了一会，说：“对邓小平当然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

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

患！”

叶剑英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他望了望大家，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华国锋说：“是阿！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几天以后，江青到清华大学说：“我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有人要替他翻案。”

9月12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她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她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他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

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

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9月21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份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要，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的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钟打电话给华国锋，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哭哭啼啼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

争夺毛泽东留下的文件，其实质就是争夺继承人的位置。大家都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这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在叶剑英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军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其中的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师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8月底就发出了7万多件。9月21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

3000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9月28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9月29日,晚11点。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毛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她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夺权,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回合失利后,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1964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传达了。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中国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江青等人一边。毛泽东逝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毛远新去留的问题需要讨论。江青等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当时,华国锋明确表示,让毛远新回辽宁。

江青很生气,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不让步,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

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了，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下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还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①

“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之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而他们却在毛泽东逝世后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是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已经发表的记述中都和事实真相有出入。这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 1977 年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② 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原来也写成叶为主

① 见《叶剑英在 1976》，第 259—262 页。

② 《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 311 页。

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

注 157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 9 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 月 21 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 月 24 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 10 月 6 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①

叶剑英也多次讲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华国锋等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措施后,9 月 24 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元帅征求意见,和叶剑英一拍即合。

叶剑英西山串联

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十分张扬。他们的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从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

^① 《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 518 页。

已经怒不可遏。

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他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罗、傅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这里的罗、傅是指罗瑞卿和傅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另一件事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1976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写出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

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

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务实派和元老派在毛泽东逝世前就私下串联。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合法的地位。他就很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王震一下怔住了。叶又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①看来，抓“四人帮”是酝酿已久的事。

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飏，李强，罗长青，熊向晖，王诤，杨成武，梁必业，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接触最多的是粟裕，宋时轮。这些都是军政要人，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们的接触更频繁了，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其中最有意义的接触是和邓小平的接触。

毛泽东逝世后这一段时间，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住在小翔凤。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处。他们对形势的

^① 范硕著：《“四人帮”末日》，载《瞭望》周刊。

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陈云见叶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叶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主席刚逝世,弯子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陈云对“四人帮”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一方面同意对江青集团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还说了一句清醒的、富有历史远见的話:“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他的意思是,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必须按法律行事。

邓颖超先到小翔凤,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后来又西山会见叶。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她交底。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她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出一场‘贺后哭殿’。她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叶说:“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于众,她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邓颖超说:“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

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御林军’成不了气候。”

邓颖超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要站出来。”她指的是华国锋。^①

其实,叶剑英和华国锋早有接触。华国锋当总理不久,叶剑英经过一番考察、试探,提出要看望新总理。华国锋知道了,表示先要去看他。叶说:“你住的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晚就驱车到了史家胡同。华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打开车门,迎到房间里。

^① 《叶剑英在1976》,第211-212页。

叶提出要依靠解放军,不能搞“第二武装”,华国锋同意。

7月份,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发生了争吵。在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四人帮”写的通报说:“毛主席的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叶剑英坚决反对这样写。江青、张春桥坚持照样发出。汪东兴等支持叶剑英的意见。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华国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会后,他在签发这份通报时,删掉了“毛主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这句话。

这件事使叶剑英对华国锋产生了好的印象。

以后二人多次接触。从多次谈话中,叶发现华对“四人帮”反感,也在考虑如何处置他们。^①

聂荣臻元帅也在西山和叶剑英频频接触。他们在一起议论:“这几个东西闹腾得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特别是那个人,不太好办。不解决也不行。”“看起来,得想个办法,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两位元帅机警而又深入地研究了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投鼠忌器

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这个中国成语的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叶以“鼠”喻江青,“器”是指毛泽东。

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1937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的婚姻破裂了。1938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为夫妇。应该说,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进入北京以后,江青很

^① 《叶剑英在1976》,第202页。

少抛头露面,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当时到他们家作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也许,她以当第一夫人为满足,并不想有所进取;也许,这时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从她的一首诗看,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这首诗是:“江上有青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方面并不协调,有时还闹些矛盾,后来还长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关键时刻让江青出来帮他。1959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毛泽东面临党内外的反对。在这个背景下召开了“庐山会议”(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青在北戴河给毛泽东打电话后立即飞到庐山,进行会外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题了一首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还写了“赠李进同志”,李进是江青的别名。这首诗表现了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的态度。

建国以后毛泽东处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江青参与。

1950年3月到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放映。江青看了以后,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仅仅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才没有掀起批判运动,但在事隔1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重提这件事。而刘少奇则因当年反对批判《清宫秘史》,在“文化大革命”成了自己的一条“卖国主义”罪证。

1951年,江青看了电影《武训传》。她认为这部电影“有严重

问题”，而社会上则认为这部电影不错。《大众电影》杂志还把这部电影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这次又是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毛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从1950年开始，江青一直担任中宣部电影处长（叶永烈在他的书中错写为副处长）。如果说上面两件事在她工作范围之内，那么下面一件事就越权了。1954年，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的文章，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他让江青出面，让《人民日报》转载。但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最后达成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了。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第一次露面是1962年9月29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9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出的接见照片上，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站在中间的江青在微笑。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20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这次露面就是一次重要突破。不过，这时已经过了24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

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1966年2月，林彪元帅委托她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这之前三四年，她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开始插手文化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应当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6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江青在文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

些看法合拍的。林彪投毛泽东所好，拉上江青搞了这个《纪要》。事后人们才知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江青是比别人较早地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人写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官》，没有得到支持，再到上海找张春桥（张曾写了一篇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张指定《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成。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在一封信上。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6月15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一个山洞里（滴水洞）住了十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三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

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

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我们当时听传达时，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作如此严重的估计，既是毛泽东要“打倒一切”的认识基础，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要职的“中央首长”，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1966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喊出了“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

为什么这时突然争先恐后地“大树特树”江青呢？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毛泽东没有制止，至少是他默认了。

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她的这一特殊关系。不管在什么公开场合，她总是用她那很尖的嗓音，高声对听众说：“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直到在若干年后对她进行法庭审判时，她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咬谁呢？当然是咬那些毛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当然，她也要乘机咬她自己的仇人，咬妨碍她夺取权力的人。

江青和毛泽东的这一特殊关系，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

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报告，我亲眼看到天津的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她面前献媚讨好。天津市委书记的名字叫解学恭，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江青对他说：“叫学工多好，向工人阶级学习嘛！”解学恭欣然从命，在以后签发文件时，就用“学工”二字。江青还用摹仿毛泽东的狂草笔迹（不懂书法的人看来摹仿得十分逼真），写了一些条幅，送给一些军、政要人，不少人奉为至宝。

1976年8月，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以慰问抗震救灾的战士、工人的名义，第八次到天津。我作为记者，随同采访。江青在夺权斗争激烈的时候外出怀有很高的警惕性。她觉察到我坐在她身后记录时，猛然回头，满脸凶相地问：“你是谁？”看到她的眼光，我想：“坏了，可别把我当特务。”那时，江青到处讲有人派特务监视她。我只好急忙回答：“我是新华社记者。”没想到她马上满脸笑容地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自己人，自己人！请你转告其他新闻单位，写的东西一定要给我看看，不要帮倒忙。”当时，工人、解放军战士把她当作毛主席身边的人。天津钢厂平炉车间一位副主任说：“江青同志来我厂视察，带来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江青同志自来视察工作，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回答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把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江青到天津警备师一团一连，战士们在发言中，都认为“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我们，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在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干出不得体的事。因此，他申明：“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所以他多次批评江青。1974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写道：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

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圈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很快站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务实派这一边。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圈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日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阿，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

在9月18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献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

先下手为强

9月21日，华国锋特意到李先念那里，商讨解决“四人帮”问

题。他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带着华国锋的意见专程上西山会见叶剑英,进行了具体商谈。这时聂荣臻元帅也派杨成武将军上西山找叶帅,一再嘱咐:防止“四人帮”先下手暗害邓小平和叶帅。现在用处理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粉碎“四人帮”最后决心的下定,李鑫起了重要参谋作用。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保密电话)向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李鑫就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在这以后,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这边报告。10月4日早晨7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

其实,他们也不必担心。中央军委早就把28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报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有趣的是,在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在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

头上。

10月6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电话的内容是通知他晚上8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座车7时到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

7点55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槛,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坐、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

“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

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了。

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横刺里走过来。王洪文见势头不对，就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接着，他准备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带他进入正厅。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叶剑英，他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两眼射出凶光，从几米以外猛扑过去。警卫人员就势将他推倒在地。他站起来以后，不声不响地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被带走的时候，他还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有这样快！”

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宣布的。念完决定之后，行动组的另一位负责人和几个卫士把他带走了。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带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 201 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她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在同一时间内，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给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

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

样。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

“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

“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

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阿！你来抓我？”

“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接着，李连庆向毛远新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汇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晚9时，叶剑英、华国锋命耿飏带一个营的兵力，立即去接管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收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号楼开会。”晚10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10月7日，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后，在8日晚上开会，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12日，中央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集体谈话，让他们回去做工作。13日他们回到上海，不再讲武装斗争，而是讲“搞合法斗争”。后来，中央派苏振华、倪志

福、彭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

10月10日,欣喜万分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重见天日。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利用这个好机会。事实上,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不会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元帅又把邓小平一家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给他送一套文件。

10月18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历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她的被捕,同情者甚少。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郭沫若写

了一首打油诗,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
消灭“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

在庆祝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打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传诵着郭沫若的打油诗。

第三节 过渡人物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力保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3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3项重要职务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

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1月23日,《人民日报》再次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3篇宏文都是以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出的,暗示着强

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华国锋。显然,这是叶剑英元帅的良苦用心。

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威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但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觉得,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矛盾也会集中于一身。这个“一身”如果缺乏必要的实力、能力、资历和魅力,他将在矛盾的焦点中倍受煎熬,最终可能失去权力。知识界对这种“大树特树”华国锋的权威的做法也有看法。

他的仕途一帆风顺

华国锋,原名苏铸。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在他17岁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他的家乡,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华国锋19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兼任武装大队政委。这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需要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在上级的号召下,华国锋第一个报了名。他先到湖南湘阴县,不久就担任湘潭县委书记。1954年,他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这不能不是他今后仕途畅通的一个重要条件。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等3篇文章。这些带有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在看法上又和毛泽东一致,毛泽东当然会喜欢的。后来毛泽东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作者华国锋。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这个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为列席代表。在会上还让他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称他为“父母官”,夸奖他是“老实人”。从此,这位面容敦

厚、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干部官运亨通。

1959年,毛泽东到长沙。华国锋安排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并全程陪同毛泽东。毛泽东在韶山写下了对故乡情深意切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在谈到农村形势时,华国锋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不过,华国锋认为要克服当前的困难,还得依靠集体,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从此以后,毛泽东每次回湖南,华国锋总是热情相待,虚心求教。毛泽东常对人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3年,华国锋到广东参观学习以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华国锋不仅在湖南的地位更加稳固,在全党也有了名气。

在“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负责修了一条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就能比较方便地去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华国锋此时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时,他还是一个地方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从湖南调来了华国锋。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王洪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比较坚决,是作为接班人调来的。如果不是后来王洪文的表现使毛泽东失望,华国锋也不可能进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峰。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接替谢富治为公安部长,不久,就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1月21日,经毛泽东提名担任国务院总理,接替逝世的周恩来。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厚重少文”。

华国锋对毛泽东是很忠诚的。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到他的厚道。1976年5月，毛泽东病重，医生决定给毛泽东下胃管。毛不同意。当时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以及毛泽东身边的人先试一试，从鼻孔里将管子插到胃里。在中央领导人当中，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找各种藉口逃避了，只有华国锋真的试了。

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上西山，商议这晚要召开的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的事项。在决定党中央主席人选的时候，华国锋说，我提议，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待，你应当担此重任。”

为什么叶剑英力保华国锋呢？叶剑英有这样一段回忆：

“毛主席在临终之前，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到了毛主席这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地同主席见面。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跟前。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我剖析毛主席逝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①

叶剑英把自己当成了刘备托孤时的诸葛亮。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事后，刘备之子虽然“不才”，诸葛亮并没有“自取”，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叶剑英谈到他辅助华国锋时，在中央一次会上讲过这个故事。他是毛泽东的托孤老臣，他是要对毛泽东效忠的。他不仅把华国锋扶上了台，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内，每次出席群众聚会时，华国锋走在前面，在他后面，总有身穿军装、面容慈祥的叶剑英。人们很

^① 《叶剑英在1976》，第203页。

自然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军事实力的保护人的形象。叶剑英还在各种场合下,大力树立华国锋的权威,称华国锋为“我党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是在毛泽东在世时被钦定为继承人的。但华国锋真正成为继承人,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之所以钦定华国锋为继承人,一是毛本人对华有很好的印象,二是当时两种政治力量尖锐对立,只有华国锋是双方暂时能够接受的人选。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外历史上,最高领导人在世时指定的继承人,在他逝世以后不能接班的大有人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什么能够走上权力金字塔的最高位置呢?这是因为,务实派不愿意让权力落在“四人帮”手里,他们要合法地搞掉“四人帮”,而借助钦定接班人之手,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合法的办法。而在当时权力斗争的力量对比上,务实派占有优势。而“四人帮”又不能容忍华国锋,把华国锋推到了务实派这一边。总之,华国锋能够走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是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有关联的。

“两个凡是”

华国锋为了证明自己的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3条指示是1976年4月30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3句话。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

为了进一步向群众表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当时华国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的遗体,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著的位置;

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言论。华国锋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

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

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像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不过在毛泽东那种狂放不羁的字迹面前,华国锋的字更显得过分拘谨和呆板。两个人不同的字迹正像两个人不同的风格;

一首歌曲也风行起来:“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使人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过,这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 21 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 30 多年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人物中,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却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例如,他宣布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

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都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而且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就造成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局面。

当时报刊的宣传就最是使人尴尬。例如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

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批评邓小平拿工资不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1974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2月4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受到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严厉批评,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

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从历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做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毙……

揭批“四人帮”也是以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的。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对一般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早在1977年1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由于几十年对毛泽东权威的不断强化,由于思维的惯性,由于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普通群众对于“两个凡是”并不反感,甚至觉得是合理的。从政策的运行角度方面看,毛泽东逝世后,还要保持

政策的连续性。“两个凡是”恰恰可以给人们一个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感觉。但是,从深层次看,“两个凡是”无论是对华国锋还是对邓小平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

“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1977年3月10日到22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让邓小平重新到中央工作。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①

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王震等人。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页。

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它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不过，他在这次讲话中也说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阻止天安门事件平反，拖延让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对他的政治前途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洋跃进”的是是非非

华国锋继承了两份政治遗产，一份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一份是从周恩来那里继承来的“四个现代化”。他要显示自己是毛泽东的合法的继承人，他就必须珍惜和维护毛泽东传给他的遗产。他要取得务实派的支持，他必须珍惜和维护周恩来传给他的遗产。而把“四个现代化”变成现实，则可以显示他的治国才干。

他太需要显示自己的治国才干了。华国锋在湖南的政绩是平平的。他的经历并没有显示出他有治国的才干。一个没有公认的才干，没有显著政绩的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就像坐在炽热的火炉上一样，是非常危险的。

华国锋深知这一点。11年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停滞不前。他决心在经济建设上大干一番。但是，他还是沿用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思路。不顾客观条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急于求成，急躁

冒进,片面追求高速度。这也是“两个凡是”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当时,在国务院的报告和在报刊上不断鼓吹:“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大概出于统一的宣传口径,在我1978年发的题为《工厂也要搞好科学研究》的述评中,编辑还加上了一句“国民经济正在进行新的大跃进”。

这一次“大跃进”有那些目标呢?请看:

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国后奋斗了20年,到1977年,农业机械作业率还不到10%。也就是说,华国锋要在3年之内,使机械作业率达到70%!

1985年,石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1978年石油产量只有1.04亿吨,在没有地质勘探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十个大庆”的口号。

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1978年实际产量只有3178万吨。

在工业方面,新建成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型油气田,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型化纤厂,10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0个大型化肥厂,6条铁路干线和若干个大型港口……按照规划,1978到1985年,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些项目的设备都需要从国外引进。1978年一下子签定了22个大型项目引进合同。所需的外汇,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承受能力。所以人们称这次大跃进为“洋跃进”。

不切实的高指标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在石油行业表现得十分明显。1979年,我到港油田采访,恶果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油田1975年原油产量是468万吨,1979年下降到290万吨,这4年平均每年下降29.5%。为什么下降这么快呢?因为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使得一些人采取杀鸡取卵的开采方针,使地层遭到破坏。在开采石油时为了控制生产压差,求得稳产高产,每口自

喷油井都装有油咀，油咀的大小是由地质参数决定的。随意放大油咀，石油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地下能量释放太快，地下资源就要遭到破坏。当时大港油田为了追求高产，就命令工人随意放大油咀。工程技术人员愤怒地说：“这是掠夺性开采！”当时我写了《欲速不达——从大港油田看高指标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稿件，批评了大港油田这种做法。

由于急于求成，“洋跃进”中不少引进项目决策比较草率，在建设中又不按基建程序办事，因而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

“洋跃进”在宏观上的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力，国际贸易连年逆差。不得不从1979年开始进行连续3年的经济调整。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评论华国锋的“洋跃进”时写道：“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灾难。”

事过十几年之后，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洋跃进”的责任不全在华国锋身上。当时经济上这些决定都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华国锋虽然是第一把手，但他羽翼未丰，还需要元老们扶持。他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专断。如果中央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洋跃进”是“跃”不起来的。目前所能见到的不同意见的记载，仅有一次在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前，李先念对规划的意见是，“要研究清楚以后再说”。为什么在中央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呢？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的停顿，全国上下，都希望经济发展快一些。“憋足了劲，希望甩开膀子大干”这是当时的民心。二是追求高速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到华国锋之后若干年。在华国锋之后不也出现了多次因高速度而带来的比例失调吗？不也是经过了多次经济调整吗？此外，在十几年以后看来，“洋跃进”中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如宝钢、贵州铝厂、咸阳彩色显

像管厂、吉林化学公司等。当年引进的那些化肥厂，正在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化肥厂，今天的化肥供应一定会更加紧张。

但是，从组织原则上，“洋跃进”的责任，还是在华国锋的身上。

他只能是过渡人物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他主政以后，在最高层依靠力量选择上，他面临着两难困境。要么依靠“文化大革命”中的受益者，要么依靠“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和幸免于难者。依靠前者势必要得罪后者，而后者比前者力量要强大得多。要依靠后者，而后者最终还是要支持邓小平的。他其所以失败，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他没有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地组建自己的队伍。他没有从湖南调干部到中央来。在军队里、在警察部队里，甚至在中央警卫部队里，他都没有安插自己的人。在各省，他也没有派出忠于自己的干部。他虽然身居高位，但还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也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君王论》第七章）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的困难。

在强大的邓小平面前，华国锋只能是一个过渡人物。

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打倒1年零3个月之后，他又奇迹般地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出山，其中经历了9个月。

这9个月,对于年届73岁的邓小平来说是漫长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在9个月之前,邓小平还是“全国共讨之”的阶下囚。在9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弯,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出山扫清了道路。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对邓小平出山呼声最强烈。因为邓小平出山就是他们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一批党政干部,也支持邓小平出山。至于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高层人士,更是积极推动邓小平立即出山。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要解决毛泽东遗留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才能够解决。这个强者当然是邓小平。这是就眼前而言。从深层次上讲,毛泽东遗留的问题更多。毛泽东身后,必须改弦更张。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就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

但是,邓小平出山是有重重的政治阻力的。这个阻力是毛泽东生前设下的。既然打倒邓小平的决定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而毛泽东又长期作为真理的化身,谁敢推翻毛泽东的决定?此外,当时的确有一股反对邓小平出山的势力:“文化大革命”受益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四人帮”的支持者……还有一批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对邓小平复出,虽然不会强烈反对,但还需要一个思想转弯过程。

人们说华国锋企图阻止邓小平出山。他这个企图可能是存在的。他冒着生命危险粉碎“四人帮”,才得到这个国家元首的地位。邓小平出山对他这个地位是有威胁的。如果他意识到这种威胁,

他就不会轻易让邓小平出山。不过,80年代汪东兴对人说:“华国锋没有阻止邓小平出山,不同意邓小平出山的是我。我怕邓小平一上来,华国锋就呆不住了。”

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说过,“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也许是他认为需要一个转弯过程。华国锋过高估计了反对邓小平出山的力量,把这个“适当的时候”估计得过长了。如果不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邓小平复出,这个“适当的时候”一定会更长,不会是9个月。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新选的5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叶剑英已年迈,他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也许,这就是邓小平的聪明过人之处。

第三章

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着3种前途：一是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二是回到50年代；三是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相当多的人对50年代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坚持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的人不很多，但是主张开辟新路的人也只是少数。思想解放运动是开辟新路的思想准备。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政治改革的起点，那么，一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政治改革的深入。粉碎“四人帮”从政治上、组织上扭转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方向，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促使冰川解冻，为后来的改革扫除思想障碍。

邓小平要有所作为，首先要解除毛泽东设下的精神枷锁。而解除精神枷锁，最紧迫的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又为邓小平打破毛泽东的精神枷锁设置了障碍。只有去掉“两个凡是”，才能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节 邓小平怎样向“两个凡是”挑战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

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地、完整地”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思想抽象化了。也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

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所有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行山那么沉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样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讲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呢，人们各有各的解释。关键在于谁掌握这个解释权。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

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泽东设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毛泽东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第二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则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裁决，而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这样，无疑于在失去一个毛泽东后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一句话，必须有一艘破冰船来打破坚冰，开辟新的航道。

这条“破冰船”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胡耀邦驾驶的。

1977年底，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许多难以解释的难题。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们提出的编写要求是：“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

办了一份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

在这个时期,不少报纸和社会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建国以来对一些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有过明确指示的。但是,要改变是很难的。例如胡耀邦让中央党校组织讨论“走资派”问题时,就有人出面阻止,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禁区”。

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约请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一篇有关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文章。10月,胡福明就向《光明日报》寄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当时以马沛文为主任的理论部,对该稿进行了5次修改,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准备放在理论版的《哲学》专刊上发表。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时,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在一版发出。正好这时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题目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又修改了3次,即到第八稿才定稿。为了扩大影响,《光明日报》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等,并商定文章由《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先送胡耀邦审定,题目最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7个月、修改了10次的文章终于发表了。它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的社长，和胡绩伟在《人民日报》是老同事。接电话时胡绩伟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问题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了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

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在电话里对胡绩伟说：“这是我个人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他们虽然是多年的老同事，但在政治斗争中无情谊可言，胡绩伟把吴冷西的谈话很快公布于众，在新闻界很快传开了。

后来，吴冷西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

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段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提出这个学说的时候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基础。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从上面两段文字来看,其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吴冷西自己提供的是一段更准确、更富有论战性的文字罢了。吴冷西这样郑重其事地提供准确的“版本”,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场争论的严肃性、重要性。他要给历史留下证据,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还是坦诚?也许二者兼有之。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次讨论是利用这个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但在政治斗争中,还要求在哲学方面也能站得住脚。从纯理论角度而言,吴冷西有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笔者所接触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提出类似吴冷西的看法。当然,吴冷西也不是从纯理论上考虑。他是很懂政治的。他在上面的那段话中谈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个团结的基础被伤害了,又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使全国人民信服的思想基础,使得社会问题丛生。

但是,吴冷西在对时代的把握上,没有显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没想到毛泽东时代业已结束,新的时代必须破除毛泽东设下的禁锢才能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破除这一禁锢的第一声。吴冷西机警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欢呼,而是忧心忡忡,甚至是愤怒。

当时和吴冷西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不少人。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多年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

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7月份，他到山东视察，又谈到真理标准问题，他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坚冰已经打破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

……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

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②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在这期间,在思想战线之外,邓小平同华国锋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一次较量。

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06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当时的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4月12日,他到华国锋那里去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国锋表示支持苏振华,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就到大连检阅你们海军,表示我的支持。”苏振华回去就对海军党委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布置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准备在华国锋朝鲜归来后接受检阅。在实际上已调动了70艘舰艇、20多架飞机到大连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坚决制止了这次检阅。

事后,邓小平面对面地对华国锋说:“这是一次较量。”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6月24日,《解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19页。

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7月21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0月下旬,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这篇文章本来是《红旗》编辑部约写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编辑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却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

11月14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

人。”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红旗》第12期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

邓小平在这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本书作者还没有掌握更详尽的资料。但他自己在1982年9月18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①除上面介绍的以外，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元老也支持这场讨论。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这个“两位主席”，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华国锋。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姓，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自然科学发展实例言之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0页。

凿,说服力强,他们的文章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对于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干部和知识界中的分歧比较小,而对于是走50年代的道路还是另辟新路的问题,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则出现了分野。这是后话。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他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他各省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播发了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第三节 理论务虚会和“西单墙”

林彪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几句话有阿谀奉承之意。但是,这几句话又是对当时现实的残酷写照。

几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雷蓉、王小平等)到人民大会堂开一个小型座谈会。会的内容是就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问题听取学生的意见。本书作者就是参加这个会的学生之一。周恩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当时对政治不知深浅的我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伟人周恩来也得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的印象十分深刻。

20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10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约束。

就这样,中国人民的思想被禁锢了20多年。而现在,这个精神枷锁终于被砸碎了!

人们的精神枷锁一旦被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思想解放的浪潮。这股浪潮,大有要冲垮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6点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没有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这个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间是春节

休息了5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10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3月到4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胡耀邦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合。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但是,这次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有的发言者对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运动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批评,有的对毛泽东的批评接近于否定。最突出的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会上甚至有人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和评论。我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一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

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以致邓小平不得不出来“纠偏”,从而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和理论务虚会一起,形成内外呼应之势的是“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的冲击波,“西单墙”是群众的冲击波。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二者构成了中国70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这场民主运动是由邓小平发动起来冲击“凡是派”的,后因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由邓小平所制止。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十字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两米左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民航大楼等建筑,路边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摊贩。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从1978年11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开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大字报是针对汪东兴的,其内容是控诉《中国青年》杂志被禁止发行,因为这一期刊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章。后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

气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都是一些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因为这类大字报比较少,我当时还抄录了几段。

11月27日,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等11人贴出了题为《呼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

曾经有些人,把毛主席捧为偶像,把毛泽东思想僵化了,变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现在又有一些人以历史评判者的姿态出现,对毛主席进行所谓“三七开”或“二八开”的评论。甚至公开进行砍旗宣传,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妄图全盘否定毛主席,否定我们的党,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要前进,不能没有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亡。中国一切真正的坚定的革命者,今天都应该起来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

12月8日,署名陈继东的小字报《谈一点看法》,其中写道:

今天有人借题民主,明目张胆地把靶子指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

坏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制造思想混乱……不能容忍有人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别有用心活动。……既然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无耻的诽谤,我们就必须不惜一切来保卫。

12月10日,一张没有署名、没有标题的大字报写道:

我热爱周总理,但有人把周总理利用了。为什么有些人这样起劲地抬高总理而对毛主席却三七开?这是打着周总理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华主席率领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这类大字报旁边,一般有很多批语。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批语要多一些。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12月28日晚7时,本书作者到西单墙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5000人左右。有的演讲者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

记者职业的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当时,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

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①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2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晓町主持的《中国人权》。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化大革命”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所谓“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西单墙”已发展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步了。

第四节 历史的新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两个凡是”业已打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

^① 见197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历时 36 天，到 12 月 15 日才结束。

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为三中全会做准备工作的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却着墨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 210 多人。除了解学恭、刘建勋、吴桂贤等文革派的 25 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没有出席以外，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和汪东兴掌握着主动权。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据说，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 9 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华国锋没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一经确立，就使中国开始从贫困走向繁荣。

在会上，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很快得到通过，但在讨论政治路线时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当时，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部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会上会下互相呼应，互相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在这种气氛中，陈云作了一个使华国锋接受不了的发言。

以善于领导经济工作而闻名于世的老资格的领导人陈云没有谈经济工作，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 6 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

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①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 he 比“四人帮”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了。死前，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已经“盖棺论定”。直到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才把他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页。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了高潮。

在井冈山时代就有相当高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历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了为“二月逆流”(1967年2月,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为“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①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不管是在分组会上还是在大会上,发言都十分热烈。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倒转过来,还要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清算,并且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宣布平反了,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了。这些,大大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了。恰好在这个会议期

^① 《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第160页。

间,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12月16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少有的轻松气氛。

12月13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在邓小平这个讲话的所有内容中,在后来的实践中真正付诸实施的只有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①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53页。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到来。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10亿中国人有了盼头。

“凡是派”彻底失败。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会上批评了他搞个人崇拜。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却写成华国锋的自觉要求:“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

这次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1956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1956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后来很快被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所取代。21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重新确认。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21年不能落实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1956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评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纲。20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落后。从共产党的纲领看,共产党没有党派利益,只有民族利益。站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处看,停止“人整人,人斗人”的阶级斗争,

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10亿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①当然,在我们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但是,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干部们不是一下子都能理解的,其中有一个转弯过程。在1979年初的一个高层次的宣传干部会上,他们反映,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一些领导干部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反映了部分高层干部的思想状况。现将我当时的采访本记录的问题摘抄如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干部的思想转弯情况: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当前工作重心问题

1. 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过去一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现在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必须全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如何理解?
2.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抓上层建筑革命呢,还是抓发展生产力? 1956年毛主席提出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后来没有实现,这是什么原因?
3. “八大”决议中讲,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07页。

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前几年批评了这一提法,现在怎么看?

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1. 公报中没有提三大革命一起抓,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提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什么原因?

2. 1957年以来,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搞上层建筑革命。这条路线到底对不对?

3. 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要月月讲,天天讲,现在又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似乎阶级斗争今后不要强调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到底如何搞法才对头?

4.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始终存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激烈,还是越来越缓和呢?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

5. 公报中讲到阶级斗争时,强调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人民内部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公报中讲到敌人,只提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改变了过去“地、富、反、坏”的习惯提法。这应如何理解?

6. 过去说苏联其所以变修,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没有抓好上层建筑的革命。现在我们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建设上,还说过去政治运动搞得太多了,苏联变修的基本教训到底是什么?我国应如何反修防修?

7. 公报说,“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和毛主席批判过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有何本质区别?真理有没有阶级性?在真理面前是不是应该人人平等?

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1. 过去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现在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是全党的工作中心。那么,政治和经济是

否等同？抓“四化”是不是等于抓阶级斗争？

2. 华主席讲要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以精神鼓励为主。而现在实际上是强调物质鼓励。过去我们批判苏联搞物质刺激，说他们出了高薪阶层。到底如何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恰当地结合起来？

3. 公报中没有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是否意味着现在可以不搞“双学”了？如果说还要学，那么到底学什么呢？

4. 公报说，要“在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下，认真解决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这与过去宣传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政社合一”是否矛盾？

5. 公报没有讲“抓革命，促生产”。为什么？党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又说政治工作服务于生产，这样是否可以说，抓生产就是促革命呢？

四、关于社会主义

1.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搞了30年还没搞清楚。划分社会主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应该如何表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经济上看，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不如台湾；从政治上看，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当然是先进的。如何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表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 过去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至今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个“前夜”到底有多长？

高级宣传干部提出的以上种种理论问题，反映他们在时代转变时期的彷徨，也反映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疑虑。这预示着贯彻这一路线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第五节 思想解放的限度：“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一再讲要解放思想，一再讲要有民主。但是，他所讲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理论务虚会上的过激言词，西单墙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少人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多的人害怕这样下去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有一些人士认为，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邓小平当时一定也听到不少类似意见。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务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说：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提出这些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①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对在北京市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通告中说: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12月8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174页。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

第六节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挂下去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法拉奇提出了世人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对待毛泽东?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

它涉及到邓小平时代的指导思想;

它涉及到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功过的评价和共产党的形象;

它涉及到对毛泽东一大批同事的功过评价(包括邓小平在内);

它要触动千百万群众的感情。

对上一代领导人的评价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先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他不允许中国有这样的冲击波。

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如此敏感,所以邓小平格外重视。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文件。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他曾参加起草过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写过《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起草前,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后,认为没有抓住要领,明确指出了决议该写哪些内容。他说,这个决议总的指导思想有3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写出草稿后,他看后否定了,推倒重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给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历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不可能是历史的最终总结,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来评价毛泽东?因为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来,有一股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在理论务虚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有一大批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老干部坚定地维护毛泽东。如果不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在党内外就可能造成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便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是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前者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3.8万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而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6个方面重新作了阐述。当然，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精心选择的。例如，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3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持肯定的态度：“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有人从邓小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出发,认为邓小平执政的这个时代是“后毛泽东时代”。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毛泽东时代已经面目全非了。的确,邓小平对毛泽东是有继承的,但其发展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继承部分的影响。从根本上说,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部分,是为他的开创服务的。

邓小平精心地解决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难题。他走出了毛泽东这棵大树的阴影。

第四章

经济改革的组织准备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改组，着手建立执行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第一节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1977年12月10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1915年11月生于湖南浏阳。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1937年5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1938年初，胡耀邦成为抗大的

政治处副主任。《胡耀邦传略》(杨中美著)中称,在这期间胡耀邦曾培养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入党。这一说法似乎不确。卓琳(当时叫浦琼英)是1937年11月到达延安的。她到延安后进入的是陕北公学,而不是抗大。她入党是1938年初,和胡耀邦担任政治处副主任几乎是同时。卓琳是1939年夏天才结识邓小平,9月他们才结婚。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1949年。这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的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1952年8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50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这一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批判“白专道路”。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他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不少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

1974年,邓小平复职,1975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

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文化革命中科技战线遭受破坏的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汇报提纲》被当作“大毒草”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由于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1977年12月10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当时，老宣传家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人们称为“三胡”，是当时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急先锋”。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他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

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胡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

第二节 天翻地覆大平反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2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一个调查材料称,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返回农村老家的有3.8万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获得恢复和解决。全市有重大冤假错案371起,逼供信迫害致死的有944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我参加劳动的天津汽油机厂只有491名职工,“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就有100多名。“文化大革命”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

平反冤假错案在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已经有4600多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上任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上任后的第五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文章。强调有错必纠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原则。

我在这里列举从1978到1980两年间平反的重大案件,就可

以看出当时的声势：

1978年8月12日、16日、19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他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的。

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250万人的全省广播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1978年9月11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1978年9月29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1970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5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90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上宣布：1976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16日到20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1976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

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1979年1月22日到2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1979年1月28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关押多年。

1979年2月22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2月18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1979年2月28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1979年3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1979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一灭”是指向帝、修、反投降,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部分思想障碍。

1979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即17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郭兴福是南京部队一位军事教官,在1964年大练兵时是全军的先进典型人物。文革中遭受迫害。

1979年4月3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黄罗斌是白银公司主要负责人。1964年“四清”时他所领导的白银党委,被定为地主资产阶级篡党集团。在这里搞四清的是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家陈正人。他写了一篇关于白银公司阶级斗争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重要批示,毛肯定了陈的看法。陈正人本人在文革中也深受迫害。

1979年4月15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1968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1979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化大革命”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1979年7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800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

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予平反。

1979年8月2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化大革命”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冤案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1979年8月18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被“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1979年8月25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79年8月27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5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7年到1972年先后逝世。

1979年9月6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受迫害,于1966年5月18日被迫自杀。

1979年9月10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1979年9月14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

悼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自杀。

1979年9月18日，为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举行追悼会。章汉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于1972年1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1958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时认定全总这次整风会是摆脱党的领导。

1979年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1962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1979年11月17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6年1月31日逝世。

1979年12月29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1974年、王于1970年含冤逝世。

198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诬陷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

1980年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因刘少奇而受株连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给以平反。5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所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1978年第四季度、1979年一整年和1980年春天,到处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谓上访,就是受害人自己到上级单位要求平反昭雪。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报道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一度把分社的小院挤得水泄不通。传达室的生连起老头只好提前发号,每天限定接待人数。有的来访者为了拿到生连起的“号票”,头天晚上扛上行李卷在门前的墙根下睡觉。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

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1950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15年有期徒刑。幸亏30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70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了“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他的困难也得到了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还有大量受害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使政府感到忧虑。政府不得不用强制办法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激行为。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1957年打成的60多万右派分子问题。1978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60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的转换,一般都从平冤狱开始。这次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平冤狱。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期待着。

第三节 干部队伍大改组

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都带来了根本性的震撼。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一直受到严重迫害。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金关押了118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1980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决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是有道理的。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正因为这样,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重大的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成成分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的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8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201名中央委员,到1982年9月的“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再次当选的只有90多名,没有进入新“中委”的100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40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者。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二大”产生的210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1979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1977年到1980年换的新人。上海在1976年10月就全部大换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任省委书记的只有赵紫阳(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东)继续留任。他们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撤换以后,省里的其他领导人随之也大部分被更换。在省以下的单位,干部也是大规模地换班。

换班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从我亲自经历的天津市的情况可见一斑。

天津市原来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对江青是百依百顺的。江青对天津市委很信任,曾先后8次到天津。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学恭等人千方百计地保自己,对下面搞大规模的“清查”,整群众,对市一级领导却紧紧地“捂盖子”,不让揭发。1976年12月23日凌晨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天津市委,华主席批准解学恭同志去北京。27日下午6点,华国锋接见解学恭,汪东兴也在座。解向他们汇报了天津运动的情况,包括王曼恬的情况(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妈,和毛泽东有亲戚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同时在中央文化

部任要职,很受江青信任。天津市委把王曼恬当作和中央联络的“天线”,倍加重视)。华国锋对解学恭谈了4个问题:

一、关于王曼恬问题。华说,王曼恬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王曼恬同志应当起来彻底揭发“四人帮”,特别是揭发江青,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这样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对立是不好的。市委还是要帮助她认识错误,划清界限。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批评是帮助,批判也是帮助。现在对她不宜采取组织措施。

二、关于小靳庄。江青很坏,到小靳庄放了很多毒。要彻底揭,坚决批。小靳庄的人民是没有错误的。江青到小靳庄和到大寨的态度不一样。到大寨是压,到小靳庄是捧,说到小靳庄是“到家了”。大寨顶了江青,小靳庄没有顶。应当理直气壮地起来揭发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深入揭、批,特别要在批判上下功夫,提高批判质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讲吕后,讲“女的是最大的生产力”,“将来还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批。这样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稳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闹地震,困难不会少。稳定,人心安定,这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整个形势的需要。狠揭狠批“四人帮”带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形势就会更好,更稳定。

华国锋是不想撤换解学恭的。解学恭吃了“定心丸”。回来传达时一连串说了4个令人肉麻的“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温暖,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他把天津问题的责任完全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为“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1977年1月4日下午6时20分,王曼恬到办公室。她对司机和警卫员说:“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这儿睡。你们休息吧!”当晚,她服用大量的“苏

克敏”(安眠药)自杀。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市委已全体通过我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学恭终究没有保住自己。1978年7月,在邓小平复职一年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学恭,天津市委被改组。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传达中央改组天津市委的决定时,气氛热烈而轻松。不久,解学恭被开除党籍。改组天津市委是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出面的,胡耀邦也参加了。人们分析,其中邓小平起了作用。

第四节 改革者掌握了最高权力

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造就了深厚的组织基础。现在,邓小平有条件重新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了。

这时,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位置的时候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职务。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被解除的。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化大革命”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的还有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

时,赵紫阳还是河南省滑县一个小地主家庭的两岁婴儿。但是,他有机会很早就接触了革命。13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到开封、武昌求学。1938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19岁的赵紫阳担任中共滑县的县委书记。

1939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名县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1945年晚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围内推广。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第一次交往。1947年赵曾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区党委任副书记。建国初期,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这小小的一步经过了十年的历程。1951年4月,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涯。

1965年,经过15年的奋斗,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秘书长(不久改称为办公厅秘书长)一步一步地升任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开始是叶剑英的部下,后来是陶铸的部下。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初期,广东省委像其他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广东省委还坚持工作。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赵紫阳就受到更多的批判。1967年5月5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人实行“监护”,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后来因他没有“死不悔改”,才称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1971年4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内蒙第一书记是尤太忠。赵紫阳是第五把手,分管农牧生产。

第二年3月又奉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回粤路经北京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在场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孔石泉。周恩来明确指出,赵紫阳回广东后主要负责党的工作。丁是林彪的老部下,后来在林彪事件中有严重错误。赵回广东后丁盛没有让他管党的工作,而让他分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在这期间,赵紫阳很谨慎,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赵紫阳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1974年4月,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将军。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揭发批判的重点是黄永胜。黄是林彪死党,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很有影响。

1975年10月,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阳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不带家眷,只身赴任。他刚到成都,邓小平就第三次失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如果晚半个月,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手。

在1975年去四川赴任前,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对赵紫阳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顶不住压力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起来造反,地主逃离了家园,农民分了他的地土和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报复。“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报复。“四人帮”找赵紫阳

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赵紫阳掩盖过去了。相比之下,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

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5年。他在治蜀5年中,针对多年“左”的政策对农业的破坏,对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在政治上他还是很小心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打倒,他都跟着潮流过来了。例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时,四川省委和其他省一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1977年7月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第三天,成都就召开了30万人的大会,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唯一的。万里在安徽搞包产到户,赵紫阳没有像贵州的池必卿和辽宁的任仲夷那样跟得快。而是派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宗棠去安徽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才开始行动。

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4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姚依林等11人为书记。

此时,华国锋在政治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1980年8月18日到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1980年11月10日到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短暂的华

国锋过渡时期从此结束。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应该肯定;但对此功绩要作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个人。会议认为,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对1977、1978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同志在过去4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宜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建议。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在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共汽车站,一位候车的妇女说:“他是一个老实人。”

第五章

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不是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者的有意安排,而是中国农民的自发行动。这种自发行动农民过去也曾有过,但都遭到到惨重的打击。农民的自发改革能够得到当局承认和支持,这要归功于初步的政治改革——粉碎“四人帮”和真理标准讨论——所造就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也要归功于像万里这样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人。

要了解中国农村的改革,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历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苏联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发展重工业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这笔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重工业部门的职工是要吃饭的,粮食从哪里来?靠农业。除了发展重工业以外,还要生产日用工业品。发展日用工业品的原料从哪里来?靠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穿了,就是让农民承受着上述各项沉重的负担。农业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其主要方式就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一点本书后面还要介绍。

为了让农业这个“基础”不动摇,就必须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怎样才能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呢？一靠农村组织，二靠经济政策，三靠户籍制度。农村组织就是“集体化”，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一个农民都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中劳动、生活。经济政策主要是统购统销。农产品统统由国家收走，每个公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凭证供应。没有粮票、油票、布票等等票证，人们就没法活下去。而这些票证是按行政管辖地区分配给辖区内公民的。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这3个方面结合起来构筑成一堵“高墙”，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这是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农村改革，归根到底，就是要破除上面所讲的桎梏。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农村的改革实质就是政府对农民让步。当然这指的是初步改革。深入改革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农业运行机制。

第一节 一个古老的事实被重新确认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对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说：“毛主席讲了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想消灭家庭。在改革以前，中国的血缘家庭虽然没有被消灭，但是，作为经济家庭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家庭再也不是生产和经营的细胞了。中国农村最早的改革，是恢复家庭这个经济细胞。这只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事实重新被确认，然而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饥饿逼出来的自发改革

中国农民的自发改革是饥饿逼出来的。

农民是种粮食的,但中国农民总是食不果腹。自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一直半饥半饱。60年代中国因饥饿而死的2000多万人几乎全是农民。我的家乡湖北省浠水县是粮食产区,每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和一季麦子。但在当时,每年一过春节就要闹粮荒。春耕大忙季节农民也只能喝很稀很稀的粥,农民用“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来形容这种粥稀的程度。改革前,在我们家乡这个鱼米之乡,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口粮不到200公斤稻谷。这些稻谷只能出150多公斤大米,平均一天不到8两。这几乎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的全部热量的来源,而食油和猪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妇女和儿童一年只有一百多公斤稻谷。儿童的食量不比成年人少,“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如果全家人平均每人每天有半斤(250克)大米,农民就要对政府感恩戴德了。农忙过后,农家一般每天只吃两餐饭,晚上只好早早地饿着肚子上床。

饥饿来自僵死的农业管理体制。每一个生产队种什么作物都要得到上级批准。农民每天干什么、在哪块土地上干,都必须由生产队长安排。上级不了解情况,常常是瞎指挥,使农民的汗白流。在生产队这一级,农民没有个人自由,每天早上都要集合在村头等着队长派工。在分配上又是吃“大锅饭”,劳动效果和个人收益没有关系。所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很低。效率低下的集体劳动不能养活他们,又不让他们寻找别的活路。他们不能干集体劳动以外的事(除了很少量的自留地以外),连出村都要请假。不过,每逢在遇到严重的饥荒时,个别地区的农民就不顾一切地挣脱这种僵死体制的枷锁,把土地分给个人耕种,而土地一旦分给个

人耕种，产量就会大幅度提高，农民就可以度过灾荒。但这种分田到户的做法违背了毛泽东的集体化、合作化的目标，实行分田到户的干部都会受到严厉的政治惩罚。轻则开除党籍，重则投入监狱。“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由买卖、包产到户”统称为“三自一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中，“三自一包”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谁要被扣上了搞“三自一包”的帽子，谁就要被划入“专政对象”之列。

但是，一些深知农民疾苦、思想比较开明的共产党干部，对农民始终抱着负疚之心。万里就是其中之一。

1978年3月，新华社记者张广友随同万里到安徽省定远县考察。万里和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交谈。万里问：“你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打开空心破棉袄，拍着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民又拍拍肚皮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事后，万里对张广友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阿！他们的要求不高阿！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么低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万里还深有感触地对张广友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管。农民生产产品的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里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这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阿！”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北京市副市长，1975年他当铁道部长时，密切配合邓小平，率先在铁道部门抓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万里也受到批判。张广友是当时新华社派驻铁道部的“蹲点”记者，他的任务本应是向上面（主要是“四人帮”）反应万里的情况，但是他站在万里一边，支持万里。从此，他和万里建立了莫逆之交。

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是有名的穷省。每遇灾荒,都有大批农民到外地讨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正是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情况的: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这种情况建国后更为严重。凤阳县委给上级的报告中列举了逃荒的人数: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9900多人,至3月18日达1.8万多人,大部分去南京和苏北。1969年3月,37%的农户和23%的人口外流,流动范围是皖、苏、浙三省。1970年春节,又有4000多人外流。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正如当时一段凤阳花鼓词唱的:“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1977年11月万里等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订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要个别人干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

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这些内容不少是过去批判过的，但深受农民欢迎。张广友随同农村干部一起，下乡向农民传达《六条》。听传达时，会上鸦雀无声，念了一遍，农民还要求再念一遍。

在《六条》的鼓励下，农民创造了很多按劳分配的方法，在这些探索中他们知道，只要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在一起干活，就很难实行按劳分配。因此，农民把劳动单位分得再小一些，以小组为单位，即“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凤阳所在的滁县地区比较多的生产队采取了这个办法。

1978年，安徽省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减了产。但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地方却获得了大丰收。这一年，安徽9个月没下过透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不少地方干脆由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小岗生产队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们这样做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

20户人家的小岗生产队，先分成4个作业组，没有干好。又分成8个作业组，还是干不好。刚担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去向老农关庭珠请教。关说：“1961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严宏昌说：“好，就那么干，干脆一杆子包到户！”关老汉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严宏昌说：“时代不同了，现在讲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只要对国家、集体个人有利，就可以干。”队长严俊昌也表示同意：“只要社员都赞成，出了事，我们几个人顶。”

在社员大会上，严俊昌说：“咱们干脆承包到户，秋后打下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再也不用记工分了。”参加会议的人一致叫好。

严俊昌站起来说：“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么干。但是要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不能‘肉吃千口，罪落一

人’。口说无凭,得立个字据。”他刚说完,大家齐声说“同意!”于是就当众写了这样一张字据: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到会的21位农民,3人盖了私章,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几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张字迹歪斜且有错别字的契约,预示着农村一场伟大变革的开始。所以,这份契约送进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若干年后,一些考据家们对这个“契约”是当时写的还是几年以后补写的有不同看法。其实,这对小岗农民冒着极大风险这一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小岗农民为什么这样担惊受怕?因为过去农民为包产到户遭受过三次严重打击,历史教训记忆犹新。

第一次打击是在1957年。1956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之后,农民们对在生产队内部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形式,进行过一些探索。在探索中觉得“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比较好。不少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1957年8月,中共中央开始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认为包产到户是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的报道,指出了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严重的危害性”。后来《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少数富裕中农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此之后,《南方日报》、《四川日报》、《广西日报》相继发表了《包产到户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主张》、《迁就

顾私不顾公的教训》、《借推行包产到户变相解散农业社》、《农民需要什么样的自由?》等文章,对包产到户大加挞伐。当时搞包产到户的人也受到严重打击。

第二次打击是在1959年,一些地方在吸取了1958年“共产风”的教训之后,又搞起包产到户来了。这次,包产到户正好成了当时“反右倾”的典型材料。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统统烧毁,一丁点也不许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这次搞包产到户的人受害更深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1961年。在大批农民已经饿死或将要饿死的时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安徽省搞“责任田”,希望用这种办法度过饥荒。全国很多地方为了度荒也都搞起了称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农民称之为“救命田”。但是很快受到了严厉批评。全省有10万名农村干部被斗、被关,不少人家破人亡。

除了历史的教训以外,小岗农民所做的和当时中央的某些文件相抵触。197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都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到农村宣讲这两个文件时,农民很不满意。他们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农民要求中央修改文件,去掉“两个不许”。周曰礼感到难办,回到省里向万里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是一件大事,省委要专门讨论一次。”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主张到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

1979年2月,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万里和省委常委的意见,到山南区搞试点。四五天内,山南的6个公社全都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周曰礼有点害怕,急忙向万里汇报。万里说:“不要怕,让

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里调粮食到山南区。”在山南的影响下，肥西县40%的生产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周日礼向万里汇报，万里还是那句话：“让他们搞。肥西收不到粮食，省里调粮食到肥西。”

试验的结果是成功的。安徽省凤阳县1979年70%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度，这一年粮食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99.9%，调出的粮食超过了1953年以来26年调出粮食的总和。但是，在试验过程中人们还是担惊受怕。

1979年5月21日，万里驱车去肥西县山南公社，沿途一派丰收景象。万里问公社书记王立恒：“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王回答说：“是有点怕。”万里说：“不要怕。在你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是我点过头的。”“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不过要注意，集体财产不能分解，不能分掉。”午饭后，万里和群众闲谈，一位农民问：“万书记，上边可允许搞包产到户？”万里回答说：“大胆干吧，省委支持你们！”一位农民说：“我们有点怕。”万里问他怕什么，他说怕变。万里肯定地回答说：“不会变！”

安徽面临四面楚歌

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引起了不少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纷纷仿效。这样一来，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对这些做法就有了抵触情绪，许多机关干部也有疑虑。当然，这些抵触情绪和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从1958年以后的20年来，哪一项农村政策不强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呢？哪一次政治运动不批判“三自一包”呢？20年的灌输，几乎造就了一代人的观念。

安徽面临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 12 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表，其余的都已写好待发。

江苏省在安徽边境地区用大喇叭广播，竖起大标语：坚决反对分田单干风。

新华社记者赵华胄是一位农业问题专家。1979 年底，他先到浙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不仅不让搞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不让搞。他又到福建，差一点闯了一场大祸。

建瓯县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省里派工作组来“纠偏”，这些被“纠偏”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下降。赵华胄写了《福建建瓯县包产到户走了一条“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报》收到新华社的通稿以后不敢发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那里。廖志高把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林麟找去，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写这种稿子！”林麟推说：“这是总社记者写的，我们不知道。”

过了两天，华国锋在北京农业经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省里工作期间，做过一些调查。农业许多工序一环套一环，要配套作业，一家一户不容易干。特别是割稻，一个小组没有十来个人干不起来。前面几个人割，后面打禾桶脱谷，还要递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时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包产到户还不让步。

当天，参加会议的福建代表就把华国锋这段讲话传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当时正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立即向参加会

议的干部传达。廖志高在会上说：“新华社的赵华胄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来写了建瓯的稿子。我们要组织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还对在场的林麟说：“分社也出一个人参加调查组。”后来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仅在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有不同看法。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新华社记者尹建华访问了一位名叫刘开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坦率地告诉记者：“农村搞起各种责任制，还让搞包产到户，我怎么也想不通。以为党不革命了，社会倒退了。我想，革命流血几十年，好不容易走上集体化道路。现在又各种各样的地，这不是眼睁睁地走回头路吗？”刘开吉是山东枣庄市刘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1948年参军，解放上海时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回家当了18年党支部书记。因为对包产到户想不通，还申请退党，后来赌气撂下支部书记的“挑子”跑了。他在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包产到户带来了大丰收，到1980年思想才转过弯来。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辑作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简短的常规，其篇幅之长，编排之显著，使人感到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表态。“编者按”写道：

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

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发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张浩的信是这样写的：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关于“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于下：

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干部和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问我：“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党中央不会有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过20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太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际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一般来信是很难发出来的。张浩来信为什么能这么隆重推出呢？这与新上来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有关。当时，《人民日报》把一篇春耕的社论送来审定。王任重看到华国锋在社论的清样中有一段批示，其内容是批评农

村中出现了抢农具、闹分队,影响集体经济巩固的。根据华国锋的这个精神,3月14日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正好这时收到了张浩的来信。这是体现王副总理精神最好的稿件,总编室没有和农村部商量就发出来了。《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来,人们都是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中辨别政治方向的。这个“编者按”和《张浩来信》态度如此明确,很自然地在全国、特别在安徽引起了激烈的骚动。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学祥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从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仿佛爆炸了原子弹。有人狂喜,有人丧气,有人欢呼,有人气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报纸,像拿到奖旗;有人义愤填膺把报纸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机关,当天上午几乎没人办公,各办公室在并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开起了激烈的辩论会。有人希望当天的报纸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全省散发,对资本主义的春天来场狂风大雪,也有人希望把当天的报纸扣发,来个滴水不漏。在安徽广大农村,本来很少看报,常把生产队报纸糊墙卷烟的农民,却一反常态地到处找报纸。许多人读完后,把它扔进粪池,再压上石头,把它用石棒捣烂扔进泥塘,把它用来当手纸,即使没有大便,也要在肛门上蹭一蹭。有个农民甚至跑到城里邮局、报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买下登载这则报道的所有报纸,然后一把火当众焚烧,引起一大群人跺脚拍手叫好!更多的农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麦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县委,奔到地委,来到省城。人们说,上面就是有人怕农民高兴,农民一高兴,这天总变,过去有好几回了!

《人民日报》3月15日发出这组稿件,由于对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冲击之大,被人们称为“三·一五事件”。几天之内全国就冲垮了2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

在曲折中全面推广

《张浩来信》发表过后,万里来到安徽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人民日报》文章一播,不得了哇!乖乖,全椒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

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一封是安徽省农委的两位干部,批评了张浩来信,指出“‘编者按’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但是,这天报纸在同一版还发表了河南省兰考县一位干部的来信,题为《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肯定了张浩的来信。在这组稿件前面的“编者按”写道:“本报3月15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做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

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前后,七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召开。安徽省的代表是省农委主任周曰礼。

华国锋问：“你是安徽来的？”

“我是安徽代表周曰礼。”

“噢噢，你们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

不等周曰礼回答，华国锋又说：“你们省委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我有具体的数字和全面情况。肥西县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积包产的，实践结果，麦子总产 2010 万斤，比历史最高年份增长了……”

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他问“你讲的情况省委知道不知道？”

“我是省委派来的。”

华国锋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对他说：“安徽包产到组我批了，包产到户我也批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王任重回答说：“试验可以，但现在不能宣传。”

王任重和万里通话半小时后，走到华国锋身边说：“万里同志的电话打通了，和周曰礼同志说的一样。这些情况是省委同意的。”

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

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是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

1978 年 11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三个可以，两个不许”。这“三个可以”是针对“大寨式的工分经验”，是反“左”的。但是，“两个不许”是阻碍农村改革的。“三个可以”是：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记时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两个不许”是：不许分田单干，

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多次提出取消“两个不许”。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前,万里找胡耀邦,郑重其事地提出:“文件中不要提‘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后来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放开了一个口子,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起了重要作用。1980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①

陈云、胡耀邦也支持安徽的做法。1980年春天,陈云见到万里,拿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1980年9月召开了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万里已于年初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他想在这次会上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支持包产到户”。但会上争论很激烈。公开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的只有三个人:贵州的池必卿,内蒙古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多数人表示沉默,有的坚决反对。但还是前进了一步。9月2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把农村分为3个不同地区,即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认为只有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1号文件)比75号文件再进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包产到户彻底取得了合法地位。

1983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1983年1号文件)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更高的评价,把它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这一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的一年。

1984年的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使农民吃了“定心丸”。

中共中央对各地区的不同态度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等待,让实践去说服各级干部。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下一个文件,全国统一实行,而是让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愿实行。1983年,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达98%,1984年达99.1%。^①直到今天,还有些地方继续搞集体经济,没有包产到户。如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刘庄,江苏的华西大队等。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这种制度,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清晰,正如农民自己总结的“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所以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总

^① 唐仁健等:《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系列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产量大幅度提高。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0254万吨,增长幅度为33.6%。这6年全国增产的粮食,相当于从1957年到1978年21年增长的粮食。1984年全国的棉花总产量也相当于1978年的2.89倍。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仅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农民自身。过去农民被集体紧紧地拴住,不能离开土地;现在农民完成了责任田上的作业以后,多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在当地从事其他工作,也可以远离家乡去赚钱。过去,农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受到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严格控制。从分粮、分柴到分草;从夫妻生活、妇女怀孕到孩子上学;每天在哪块地上干活,干什么活等,都要受干部的支配。现在,干部管的范围比过去少了,而农民得到的自由则多了。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家庭这个经济细胞在中国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古老的事实。农民自发的改革只不过是恢复了这个古老的事实。其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显示了产权明晰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威力。这一点,对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一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它先天的缺陷。如农民对产前、产后的服务项目办不了,也办不好;造成了土地过分分散,很难造就现代化农业。以后的情况还证明,农民解除了人身约束之后,形成了数千万人的流动人口,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第二节 乡镇企业:计划经济的“异军”

人们把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合称为“中国农民的两项

伟大创造”。这两项创造的共同之处是，政府官员事先都没有想到，完全是农民的自发行动。这两项创造（即改革）不仅使中国农村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全面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拿起“榔头”对付“剪刀”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国家的建设投资向工业尤其是向重工业倾斜，另一方面工农业的产品价格比例也不合理，形成了所谓的价格“剪刀差”。这就是说，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时，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通过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无偿地转向了工业。

“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同时，除了缴交“明税”，即公粮，还要上交“暗税”。1976年，种植业的“明税”和“暗税”加在一起，税率超过了20%。而1952年，种植业的税率只有7%。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是大同小异的：

一种说法是，“剪刀差”的相对量1952年为12%，1957年为18.7%，1965年为28%，1978年为28.1%。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前，农业通过“剪刀差”向工业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本积累，这相当于1982年工业固定资产的原值。^①

另一种说法是，从1952年到1989年27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和农业税（扣除同期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从农业中拿走了7000

^① 唐仁健等：《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系统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多亿元,超过了1987年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原值。^①

对“剪刀差”的最低估算是,从1950年到1978年的农业净流出4481亿元。“剪刀差”流出5239亿元,直接税流出819亿元,共6058亿元;扣除财政对农业投入1577亿元后,农业净流出4481亿元。^②据《中国统计年鉴》载:197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为3193.40亿元。就按上述3个数中最低的数算,农业净流出也相当于改革前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1.4倍。

“剪刀差”剥夺的结果,使每个人民公社平均只剩下2715.9万元的财产(若扣除地产仅有534万元);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平均不到1万元;每个农户平均拥有财产不超过550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③

这就是中国农民贫穷的原因之一。

通过农业积累来发展工业,而且主要是发展重工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农业作出了牺牲,却建立了庞大的国防工业体系;铸犁为剑。

农民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剪刀差”,但他们对“剪刀差”都有直观的认识:搞农业只能受穷,搞工业就能致富。后来总结为“无工不富”。从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对付“剪刀差”的办法:拿起“榔头”来对付“剪刀”,自己也搞工业。也就是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严酷的价格“剪刀”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卫战”。

① 牛若峰:《论我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载《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5期。

② 徐从才、沈太基:《论我国工农产品贸易条件及其完善》,载《财贸经济》1993年12期。

③ 唐仁健等:《中国农业政策改革系统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这是中国乡镇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顺便说一句,以后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农民对付“剪刀差”的手段,即少生产“剪刀差”大的产品,多生产“剪刀差”小、没有“剪刀差”的产品。

乡镇企业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剩余,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这是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快的原因之一。江苏省南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亩左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而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一矛盾就更为尖锐:到70年代末,光是苏南就有上百万的农业劳动力要找出路。

从发展渊源来说,中国的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企业。从1958年开始,在人民公社里办了一点工业,从事农机具修理和农副产品加工,这种工业实际上很少生产进入市场的商品,其运行机制也不是企业性质的。所以,它长期得不到发展,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的状态。真正的乡镇企业是在7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

所以,中国的乡镇企业完全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他的发展出乎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在计划经济的思路下,中央领导人根本不可能想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叛。因此,邓小平用4个字来描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计划经济来说,乡镇企业的确是一支“异军”。

这支“异军”一出现,就和“正规军”发生冲突。这里说的“正规军”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与此同时,代表“正规军”的管理体制、意识形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生的乡镇企业形成一种压制。

从计划经济的岩层里挤出一条缝隙

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

这条缝隙是农民千方百计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岩层里挤出来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它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例如,国家下达某钢铁工厂生产100万吨钢材的任务,生产出来以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国家再将收购上来的钢材分配给以钢材为原料的工厂。这些钢材的价格和工厂之间相互付款只是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并不意味着工厂之间的买卖。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工厂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那时,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只能分配,不能买卖。哪些工厂能分配到钢材呢?只有纳入了计划内的工厂才能分配到。农民自发办工业是不可能纳入计划的。

在当时,农民办工业是很难、很难的。他们得不到办工业的基本条件:原料、技术、设备、资金。

所以,农民办工业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起步。而砖瓦业常常是乡镇企业的起点:用手工做砖坯,用土窑烧制,烧出砖瓦用手推车送到城里去卖,然后买回一点简单的机械,投入生产后稍稍扩大一点生产规模。在有石灰石资源的地方,农民就烧石灰,或者用小窑制水泥。这也是办乡镇企业的一种起点办法。人民公社时建立的小型粮食加工厂和农机修理厂也是某些乡镇企业的雏形。

对于靠近大城市的农村,他们不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建材工业。为国营工业加工零件是他们理想的选择。正好国家要求大工厂实行专业化协作,要把一些原先由自己生产的零件扩散出去,农民则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取得加工这些零件的权利。当然,这是简单的粗加工,如生产铸件毛坯、电子产品的铸塑件的粗加工等。农民在取得加工零件的权利的过程中,送礼甚至行贿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是农民挤进工业领域的“润滑剂”。一些工厂的主管人员自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于是,城市的污染和噪音开始向农村转移。不过,那时人们把“烟囱林立”和“机器轰鸣”当作繁

荣的表现。对农民来说,和贫穷相比,污染算不了什么。

以上情况发生在70年代中期。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农民开始办自己的工业了。农民办工业的一个先天条件是,国家计划留下了很多需要填补的空隙。例如农民盖房子需要钢材,国家不给供应(因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有些小商品国家没有安排生产(计划机关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到)。于是,小轧钢厂,小机电厂,小纺织厂,小化工厂,小食品厂等就应运而生。他们的起步资金一部分来自生产队的集体积累,一部分来自农民集资。那时银行是不给他们贷款的。天津市静海县的大邱庄就是靠办一个小型轧钢厂起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起用了能干的刘万明,刘是1960年下放回来的,他原来在天津某轧钢厂从事设备管理工作。刘万明利用大队凑给他的10万元钱,低价从天津某轧钢厂买回一些旧部件,串成了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5万元。第二年又赚了60万元。他们用这些钱陆续办起了焊管厂、电器厂、印刷厂。

农民办工厂时由于没有经验,由于产品方向选得不对,常常是今天开业,过了不久不得不关门,再找门路开业,再关门。农民把这种工厂自嘲为“开关厂”。

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就和国营工业展开了竞争:争原料,争市场,争技术。早期的乡镇企业没有竞争实力,只好采取一些其他手段。如为了得到原料,就和掌管原料的官员搞好关系,请客送礼是常有的事。我到天津大邱庄采访时,看到餐厅里不停地为来往业务人员免费供应丰盛的午餐。大邱庄还经常给掌握原料分配权的官员送礼。这个村庄的领导人禹作敏对我说:“送的都是农村的土特产品,不会让他们犯错误。”的确,那时人们的胆子还不大,没有出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那种大宗行贿受贿的情况。然而,这些做法也引来了人们对乡镇企业的种种批评。

不过,乡镇企业的原料主要还是靠用物资换物资。当时称之

为“计划外的物资协作”。例如,农民用自己超产(超过收购计划的那一部分)的棉花拿到城市去换钢材,或钢厂拿自己超产的钢材去换自己急需的木材。当时城市副食品比较短缺,农村就用自己生产的这些东西到城市去换原材料。在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江苏省,1978年计划外协作的物资占全省物资总消耗量的比重:钢材为23.6%,煤为19.9%,木材为22.2%。江苏省物资局的一位处长提供这组数字后向我解释说:“这是省里统计的数字,实际计划外协作的比重要大得多,因为地、市、县自己协作进来的物资统计是不完全的,例如单是苏州地区消耗的煤,就有三分之二靠协作解决。

今天看不出这些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在当时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说明了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打开的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很自然地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指责。认为这种做法冲击了国家计划,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助长了不正之风,带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等。当时的报刊上就经常有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集体挤国营”,“以落后挤先进”等等指责。1982年我在苏州采访了当时苏州地区乡镇企业局长潘水。这是一位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在我的住地阊门饭店向我倾吐了满腔苦水,并且驳斥了社会上对乡镇企业的种种指责。他说: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工业记者,不要再写“以小挤大”了。

中国乡镇企业的几种模式

中国的乡镇企业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而各自有着不同的特色,例如“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等。

“苏南模式”是人们对苏州、无锡、常州3个城市所属农村的乡镇企业的概括。这一概括反映了苏、锡、常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特点。

“苏南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以乡办企业来说，这个乡集体投资兴办了若干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这个乡的全体劳动者所有。村办企业也是这样。人们称为“乡办乡有”、“村办村有”。1985年苏州、无锡两市农村的工业总产值中，集体经济占了90.8%。到80年代后期，由于发展了不少的私有企业，集体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还是占优势。

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共同富裕。在这个集体内，收入可能因贡献不同、职务不同而有差别，但是，只要这个企业搞得好的，所有的成员都会有较高的收入。在这个集体内的任何成员，只要他好好劳动，就不会受穷。

但是，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又给社会带来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农民的收入来自集体，而集体又由个别强人所掌握。这个企业所有成员是贫穷还是富裕，这个领导人起关键作用。这个企业如果很有成绩，他就可以在这个企业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农村，一个村子就是一个企业集团，实际上包罗了这个村子的一切经济活动。如果这个村子的领导人的个人素质不高，他就会成为“土皇帝”，他所领导的村子就会成为“土围子”。天津大邱庄就是典型例证。这个村（即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的领导人禹作敏说一不二，没有人敢说和他意见不一致的话。1983年，村里有一位小学教师经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了禹作敏的一些问题，禹作敏就不让他教书，不给他安排工作，村里的人也不敢跟他来往。他成了这个富村里最贫穷的人。1984年我到邱庄采访时，到村西头的一个破落的小院里去看望这一家可怜的人。我看到的这一家人像“文化大革命”中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分子”一样，不仅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也受管制。需要指出的是，“禹作敏现象”在“集体致富”的中国村庄中不是个别的。所不同的是禹作敏触犯了国法而已（90年代初，大邱庄打死了人，禹作敏包

庇杀人犯,还抗拒警察到村里抓杀人犯,因而被判刑)。如果禹作敏不触犯国法,他一定会是大邱庄的终生最高统治者。他头上一定还会戴上更多的桂冠。

“苏南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乡镇企业和它们周围的城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成千上万户乡镇企业,与上海、无锡、苏州、常州的工厂在原料、信息、技术、人才、供销等方面,有一种辐射和被辐射的关系。

“苏南模式”是不断发展的。进入90年代以来,苏南的乡镇企业引进先进技术,采用国际标准,大量引进外资,正以超常速度发展着,到1994年江苏省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已达5670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2/3。乡村企业提供的出口货源936亿元,也占全省商品出口额的2/3。

乡镇企业的另一种模式是“温州模式”。这种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的是,不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而是以家庭工业为主。据1986年的统计,温州家庭工业的产值约占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税收约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3。当时有家庭工业14万家。

家庭工业,前店后厂,边产边销。各家庭工厂之间分工细密。如生产铝制徽章,就分成了设计、写字、刻模、戳材、成形、点漆、镀黄、穿孔、制针、装配、包装等10多道工序。这些工序分别由10多个家庭承担。家庭工业的产品小,市场却很大。一般是家庭成员干活,也有雇佣一些工人的。

然而,这些一家一户的生产是怎样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的呢?靠购销员,靠专业市场。据温州市政府农委估计,温州的农民购销员有14万以上。这些农民购销员和各类专业市场结合起来,足迹走遍全国各地。温州到80年代末有10大专业市场,在这些专业市场下面还有四五百个小市场。

从温州乘汽车颠簸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永嘉县的一个山岙小镇——桥头镇。这就是全国闻名的纽扣市场。只见上千个摊位一

个紧接一个排列,五彩缤纷的各种纽扣争奇斗艳,叫卖之声此起彼伏。市场管理人员向我介绍说,这里纽扣有12大类、1300多个品种,品种之全,全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这里汇集了全国7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纽扣,又通过各种渠道行销到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温州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称为“华夏第一市”,1994年的成交额达102亿元。这个市场面积为22.8万平方米,从业人员4.6万人。它专门经营的小商品共分19大类,品种应有尽有。义乌小商品市场不仅在国内几个省市建立了分市场,还与美国、巴西、墨西哥、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建立了业务联系。

专业市场是家庭工业的信息来源,也是竞争场所。家庭工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改进,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专业市场通过供销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例如,桥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申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销售网;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农民销售员常年跋涉在全国各地;金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各地推销产品,承揽订购合同;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挑着一袋袋毛衣在全国各地走街串巷。

这些年,我不管到哪里采访都碰到了温州的推销员,都看到了温州专业市场的影响。在兰州的东部市场,在新疆的霍尔果斯,在莫斯科,在巴西,在巴黎,都看到了温州人的奋斗精神和温州经济的活力。

在温州,这些农民供销员被称为“天兵天将”。他们是信息的采集者,产品的推销者,市场的开拓者,也是家庭生产的组织者。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揽来产品订购合同,再把这些合同分散到家庭工厂去生产。他们又把家庭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家庭工业只和供销员打交道,再通过供销员和市场联系起来。

家庭工业的主人和供销员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家庭工业的主人同外界的联系多了,有了自己的供销渠道,他的事业就发展得更快。他可以把合同分给其它家庭工厂去做零件或初加工,自己只管总装配。进而他可以把这些为他加工的小工厂变为自己的分厂,逐步发展为小型企业集团。供销员也有自己直接办厂的。有的供销员后来拥有多家工厂。小型的家庭工业便逐步走向规模经营。

在“温州模式”中,工业完全在市场的统帅之下:先有供销员拉来的订购单,才能安排生产。所以“温州模式”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温州是私营企业的天下。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主主宰这里的一切。这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百万富翁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有相当大的阵容。

在这些私营企业里,财富增值的速度相当快。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达炯向我提供了一个材料。这是他在1993年对50家一般私营企业和18家百万富翁企业进行的调查。这50家一般私营企业共有初始资金为483.79万元,平均每家企业9.67万元。其中企业主自有资金295.18万元,平均每家5.90万元。经过从1990年到1992年3年的发展,50家企业新增资产(扣除各种债务)1133.55万元,平均每家新增资产为22.67万元。年资产递增率为56.6%。

百万富翁的企业资产增值更快。以被调查的18家私营企业为例,它们共有初始资金655.70万元,平均每家36.43万元。其中企业主自有资金为281.70万元,平均每家15.65万元。经过五年零四个月的发展,这18家私营企业的新增资产3722.3万元,平均每家新增资产206.79万元,资产年递增率为67.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职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只有一小部分转化为企业主的资产增值。因为国家已经通过各种税收拿走了企业利润的

72%。企业主只得到利润中的28%。

温州是中国人当中个人利益动机觉醒得最早的地区。这里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得也比较充分。温州人在追求财富、发展经济中创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新华社记者陈坚发和朱幼棣所著的长篇纪实文学《温州大爆发》中记述了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

在温州的私人企业里,企业主和工人的收入差别很大。在郑达炯调查的一般私人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8.03万元,而职工的年收入仅3672元,二者相差21倍。在百万富翁企业里,企业主年收入为38.81万元,职工年收入仅4848元,二者相差79倍。

进入90年代,“温州模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股份合作制逐步取代了个体家庭经营。二是专业化市场和城镇规划、建设结合,小城镇得到发展。三是融资方式逐渐规范化。四是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并列的还有“珠江模式”。“珠江模式”的特点是和香港、澳门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也是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所有制形式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以顺德市为代表的是镇办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南海市则是“四个轮子一起转”,即市、乡、村、个人都可以成为投资主体。实际上南海的私营企业占主要地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他们都从港澳地区得到资金、技术、管理经验。

珠江三角洲地区同港澳地区的经济联系,“三来一补”是一种流行方式,即从港澳那边来生产原料、来产品样式、来生产设备,这里只负责按样加工,产品则返回港澳并由那边的老板销售,所以这种方式又称为“出口加工”;如果进来的设备是用加工产品费用逐步偿还的,则这种方式称为“补偿贸易”。出口加工业发展得最早、最快的要算距香港最近的东莞。东莞原来是一个县,后来改为地

级市。这个 120 万人口的市,在改革的最初 10 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 40% 的幅度递增。1986 年以前,东莞每个星期签订“三来一补”合同 4—5 宗,1987 年平均每天要签合同 4—5 宗。因此,他们不得不扩大涉外经济机构,专门成立了一个有 80 多人的对外加工办公室。

1987 年夏天,港督卫奕信宣布他的估计,在广东大约有 100 万人以上的工人为香港厂商加工产品,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香港本地制造业工人的总数。但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马上打电话告诉他,中方的估计是 200 万人。^①

在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也发展得很快。所谓“三资”是指中外合资、中外合营、中外合作三种形式的企业。“外方”主要是香港的商人。“三资企业”比“三来一补”的水平要高一些,它们可以独立地生产产品,独立地销售。

和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联系密切的是香港的一些中、小型公司。老板大多是 60 年代或更早一些从珠江三角洲偷渡过去的农民。在改革前的 20 多年中,东莞约有 20% 的青年人偷渡到香港。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当了老板。他们在香港筹划、设计和取得订单,利用老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厂房加工产品,再把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样,既可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过去,防止偷渡和抓偷渡犯是乡村干部的重要职责;而现在,欢迎和联络过去的“偷渡犯”则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而在佛山市所管辖的地区,则以独资自办的企业较多。不过这些企业也充分地利用了靠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发展外向型企业。他们利用从香港引进的资金,先后进口了 21 万台(套)设备,1000 多条生产线,从而提高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产品大

① [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 74—75 页。

量出口,而且还在国内市场上有很大的覆盖面。仅10多年时间,佛山市就逐步建成了纺织、建材、陶瓷、电子、家电、塑料、食品6个在国内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1994年,这里的电风扇产量占全国的40%,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燃气热水器占全国产量的1/3;落地式组合音响占全国产量的1/3;电饭煲占全国产量的1/3;电冰箱、空调器等都在全国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

珠江三角洲依托港澳,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形成了著名的华南“四小虎”。它们是:顺德,南海,东莞,中山。这4个市原来都是佛山地区管辖的县。中山、东莞先后升格为地级市,脱离了佛山的管辖。顺德、南海也改为县级市,并多次提出升为地级市的要求。

上述的中国乡镇企业的3种模式,并不仅仅局限于这3个地区。华北的大邱庄也应当属“苏南模式”。安徽的阜阳也和“温州模式”相近。后来各地的乡镇企业也像珠江三角洲一样,都和境外密切合作。在所有制结构上,后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地的乡镇企业中私营经济者发展很快,并且逐步向国有、集体、外资、私人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演变。

“异军”占领了“半壁江山”

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产生的。它虽然得不到计划体制分配的一勺羹,但却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它是自由的。“笼鸡有米汤刀近,野鸟无粮天地宽”。这种自由在每次国民经济大调整时,就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进行了4次大调整。每一次调整都要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都要限制经济发展速度。当然,经济调整大多是采用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只能限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对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作用不大。所以,每一次经济调整,其结果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乡镇企业比重上升。当然,乡镇企业发展快与它的

活力是分不开的。因为它的成败和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成员的积极性是国有经济无法相比的。

在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在全国的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93年,乡镇企业就占领了“半壁江山”。这一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47%和出口商品收购总额的45%。

从1981年到1992年间,全国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平均每年以30.9%的速度增长。上缴国家的税金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4%,从1987年到1993年,乡镇企业出口商品交货额以60%的速度增长。

1994年,乡镇企业出口商品交货额达3398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3;出口创汇400亿美元;外向型乡镇企业13万多家,一大批乡镇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1993年,全国有乡镇企业2300多万家,其中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企业。下面略举几例:

鲁冠球领导的万向节集团公司统帅了17家企业。其主导产品汽车万向节覆盖了国内60%的市场,还远销到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这家公司1993年总资产达5.9亿元,销售收入4.38亿元,创利税7251万元,出口创汇1078万美元。

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集团公司,是农民企业家吴仁宝领导的。这个集团下属38家企业,其中6家中外合资企业。华西集团是一家纺织、化工、机械、冶金、轻工、建材等多门类的巨型企业。1993年,全公司产值达10.5亿元,创利税1.22亿元。

河南省新乡县刘庄农工商总公司共管辖28个企业。有医药、造纸、机械、化工、食品、铝箔、淀粉等工厂和商业、服务及畜牧业等企业。拥有100多辆各类车辆的车队和一个机械化农场。

吉林省四平市红嘴集团拥有7家分公司,生产和经营啤酒、钢铁、包装、商贸、农牧、房地产、食品等多种商品。拥有固定资产原

值4亿元。1993年全公司共实现产值4.6亿元,创利税1.07亿元。红嘴公司拥有全国第一大啤酒厂,全省第二大钢铁企业,东北第一大饮料厂。

山东兴华集团总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乡镇企业。他们兴建了全国最大的村级高科技开发园,研制出多种高技术含量产品,有6种填补了国内空白。1993年,这家公司完成产值4.2亿元,创利税4500万元,出口交货3000万元。公司拥有固定资产3.2亿元。

辽宁省大杨企业集团有42家企业。生产西装、风衣、羽绒服10大系列服装产品,出口到欧、亚、美、澳四大洲的25个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各地60多家外商和国内数百家客户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并设立了连锁店。1993年的销售收入达3.6亿元,利润3200万元,出口创汇4200万美元。

上海市郊的望春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兼营纺纱、织造、印染、制品、科研等多种行业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平绒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1/6。在俄罗斯、波兰、美国设有子公司,进行跨国经营。

从上面介绍的这些企业中,可以看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气势。这支“异军”不仅在市场上拥有“半壁江山”,其发展势头,其竞争活力甚至超过了国营企业。

乡镇企业不仅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为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到1994年为止,乡镇企业吸纳了将近1亿的农业劳动力。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围,构造了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它为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

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为缩小城乡差别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的城市化开拓了前景。到90年代中期,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城乡差别了。

当然,乡镇企业发展到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本书将在后面继续介绍。

第三节 “魔鬼”在田野里游荡

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社会的繁荣。改革以前,中国农村凋零不堪的原因之一,便是扼杀了农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家庭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呼唤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引发了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商品经济,这个被认为会腐蚀人们灵魂的“魔鬼”,在城市经济改革之前,就在中国古老而广阔的田野上游荡。

解除了一条枷锁:“统购统销”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通过“统购统销”来实现的。“统购统销”不仅是农产品的购销方式,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统购”时压低农产品价格,然后低价出售或分配给城镇居民和工业企业,从而降低企业的工资成本和原料成本,产生超额利润,再通过上交利税的形式把这笔超额利润交给财政,使之成为工业建设资金。

中国农村的改革初期,不管其形式如何,其实质是向农民“让步”,对过去的剥夺进行补偿,让农民休养生息。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休养生息制度。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进行自我补偿。接下来就要在流通方面,即在购销方式和价格方面向农民“让步”了。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迫在眉睫。1976年,全国1296个生产队

的6种主要粮食成本加农业税,平均每百公斤是23.2元,而当时平均“统购”价格才21.5元,低于成本1.7元。不少地区的农民劳动一天只有三四角钱。^①

1979年3月1日,是中国农民十分高兴的日子。国务院决定,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额收购的由原来按“统购”价加价30%改为加价50%。这样,全国6种粮食的统购价格,提高了20.1%,第二年又提高了8.1%。据国家物价委员会办公室测算,1979年农民因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收入为129.2亿元。

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总共才1103亿元。农民手上的钱一下子多起来了,城里一时出现了农民富起来了的各种传说,城市的日用工业品在农村的销路也打开了。农民除了改善生活以外,还可以买一点简单的农机具。当时我到天津一家生产水泵的工厂采访,一种适合小块耕作的小水泵十分畅销。为了满足包产到户后农民的需要,工厂加班生产,还是供不应求。可惜好景不长,不出几年,工业品涨价,特别是农用工业品涨价,不仅把1979年和1980年给予农民的好处全抵消了,还造成了新的“剪刀差”,以后是农产品和工业品轮番涨价。这种轮番涨价,实际是城市利益和农村利益的“拉锯战”。这是后话。

农产品低价政策和“统购统销”,是一把“三刃刀”,一方面剥夺了农民,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还造成了城市经济和工薪阶层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城市职工享受着低价格的农产品,实际上在享受着一种补贴。在1979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前,这种补贴是农民给的(国家只承担流通过程中的一部分。1978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财政补贴只有32亿元),它暗藏在价格里面,是“暗补”。197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后,城市职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国家不能提高粮食销售价格。所以,国家只好高价购进,低价

^① 王仕元等:《中国改革开放事典》,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23-324页。

卖出,有一部分的“暗补”就由国家财政承担了。从此开始了由国家和农民共同负担对城市居民的“暗补”,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这是改革以来财政连年赤字的原因之一。在这期间,由于“剪刀差”还没有消除,农民还继续承担一部分“暗补”。

能不能取消“统购统销”呢?农民强烈主张取消,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的办法,逐步推进。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国家先减少了“统购”和“派购”的品种。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到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取消。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订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所谓合同订购,就是在播种季节前,国家商业部门和农民签订订购合同,确定按订购价格向国家卖多少粮食,收获后按合同执行。订购以外的粮食,农民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价低于订购价,国家就敞开收购。

但是,合同订购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困难。订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农民不愿签订合同。政府要同一家一家农户签订合同,工作量太大。正好这一年粮食减产,市场价格和合同价格差别拉大,政府无力提高合同订购价格,使合同订购更难实行。政府一方面同农民签订收购合同,而农民这方面缺乏足够的可靠性;政府另一方面还通过“统销”的方式向城市供应粮食(当时“统销”粮食占社会商品粮总量的80%),这一头的数量和价格几乎没有弹性。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因此,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定购数由850亿公斤减到750亿公斤,再减到600亿公斤,最后稳定在1988年的500亿公斤。这就是所谓“稳一块,活一块”。这种方针就是粮食收购的“双轨制”。在定购这一块,农民必须完成;农民完成定购粮以后剩余的粮食,农民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这一块就放活了。

为了补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之间的“剪刀差”,国家又实行了“三挂钩”政策。即把粮食定购和化肥、柴油销售3者挂起钩来,用一定量的平价粮食可以交换一定量的平价化肥和平价柴油。平价就是低于市场价格的计划价格。

在一定时期内,在粮食收购上国家和农民不可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政府必须用行政手段取得一部分粮食。实行“双轨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在粮食还没有完全放开时,水产、水果、肉类就完全放开了。过去,水产和水果都很短缺,放开以后,生产就大幅度上升。改革前,城市每人每月凭证供应半市斤咸带鱼,到了90年代,就满街都是活鱼了,肉类的生产也增加得很快。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全国平均每人只增加了50克肉。从1980年到1984年,全国平均每人增加了500克肉。

商品经济:从魔鬼到神仙

农村改革中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就是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

商品经济,过去认为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受到严格限制。“统购统销”就是由国家统一购买、统一销售,除了在城市实行粮食统销以外,农村的一切工业品也都由国家“统销”,供销社实际上是第二国

营商业。国家做买卖是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私人做买卖就是搞资本主义。买卖都由国家统起来了,商品经济没有存在的余地。在五六十年代,农村几乎没有商品交换,农民手中连货币都没有,粮食是他们的“等价交换物”。在那时,我放学以后,经常奉家长之命,背着几斤稻谷,到几里以外的供销社去换盐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国家统一定价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障碍。1978年,在农副产品中,92%由国家定价,1980年以后逐渐减少,到1985年,国家定价的(包括计划价格和指导价格)不到60%,市场价占40%。在国家定价中,指导价格占31%。价格管制的松动是和打破“统购统销”并行的。

1979年以后,在农产品收购方面逐步打破了“统购”的同时,也开始打破“统销”。

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是打破“统销”的第一步。集市贸易,过去称为自由市场。“文化大革命”中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受到了批判并且被取缔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农民互通有无的定期集市,也受到了限制。当时规定下乡的机关干部不能到集市上买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认为“农村集市贸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见197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集市贸易悄悄地恢复了。农民在这里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但看法还很不一致。人们还心有余悸,不敢放手大搞。1978年11月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四川省大竹县召开了全国集市贸易座谈会。50多名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重新讨论了集市贸易问题。会上对集市贸易的性质、集市贸易是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开放集市贸易会不会影响农业大干快上、开放集市贸易会不会影响国家收购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多数人主张要发展集市贸易,但还有人认为,集市贸易属

于资本主义范畴,开放集市贸易会诱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会干扰国家收购计划,等等。

然而,随着对农产品“统购”的逐步打破,农民交售完了定购任务以后,剩余产品就需要进入交换领域。集市贸易也就日益发展起来。到1989年底,全国有集市贸易市场7.213万个,成交额1974亿元,占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20.97%。^①经过3年治理整顿以后,“集贸”市场的数量少了,但是规模扩大了。到1992年末,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已达6.2万多个,成交额1700多亿元;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9500多个。其中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700多个,成交额亿元以上的市场有160多个。^②这是当时农村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

集市贸易打破了长期由国家垄断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打开了一条生路。在这之后,国家又允许多种流通渠道。

从1982年开始,中央允许在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以外,试办和发展社队集体商业。于是,各种贸易货栈、联合供销经理部和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各地迅猛发展。这时,私人商业也开始出现。当时最为敏感的是私人长途贩运。不少人认为这是搞“投机倒把”,应当禁止。胡耀邦则极力支持,说:“什么投机倒把?他们是二郎神!”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肯定了长途贩运:“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有利于农副产品销售,有利于解决产地积压,销地缺货的矛盾,也应当允许。”

从此,农村私人和集体商业很快发展起来。从1981到1984

① 唐仁健等:《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系统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9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国家统计局农村司:《1992年中国农村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年,农村个体工商企业由 96.1 万户发展到 708.2 万户。1988 年发展到 1070 万户。这使城乡市场空前繁荣起来。过去,到四川省出差,要背回几十斤桔子;到新疆出差,要买上几个白兰瓜和几斤葡萄干;到宁夏出差,要背回几十斤土豆;到广东出差必须买十几斤荔枝……当时人们的负重能力在今天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小贩把各地的土特产都运到家门口来了,出差的人再也不用背负沉重的包袱了。城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也就丰富起来了。

随后,各大城市相继建立起来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把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密切联系起来了。在这些批发市场和农村之间,是通过各种商业渠道沟通起来的。

在农副产品购销中,除了棉花、烤烟和蚕茧以外,都可以自由流通。这剩下的 3 种产品直到 90 年代中期还没有放开。

在农村市场形成以后,农村的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农村各类市场的形成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温州的资金市场是最骇人听闻的一例。

温州的资金市场是在野蛮、残忍、贪婪中产生的。开始叫“抬会”,“排会”。会主以一定的利率,集中群众手中的闲散资金,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商人、小工厂主。这本是民间的资金融通,如果正常操作,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对这种类似“民间银行”的金融组织缺乏最起码的法规,连管理的部门也没有,使得一批不具备信用条件的人甚至骗子,当上了“会主”。他们以奇高的利率,把一箱一箱的钞票骗到手中,没有时间点钱,只好用尺子量,用秤称。整个温州有 30 万人卷入了这个巨大的金融诈骗活动之中。还不了钱的会主挟款潜逃,被骗的农民疯狂地讨债、报复。愤怒的人们用竹签刺入“人质”的手指尖,要他们交待会主的下落;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会主的妻子,被 20 多个债主在光天化日下轮奸;数百名债主把会主的漂亮楼房

化成焦土……从 1985 年秋到 1987 年冬发生的这一场金融灾难中,总共有 63 人自杀,200 多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关押、拷打、摧残,无数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将来,人们看到井然有序的资本市场,还记得温州这骇人听闻的一幕吗?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经济改革出了难题,在商品经济包围下的城市,能够长久作为计划经济的孤岛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

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我永远记得这样一句话:“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这是在 70 年代我的老家一位农民、也是我儿时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这句话并不是否定大寨本身,而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当时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集体自杀的事件。这位我儿时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小姑娘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不堪忍受人民公社对个人自由的严酷控制而死的。当时我的心颤抖了。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新华社湖北分社,希望他们到浠水去作点调查,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湖北分社的一位老记者对我说:“少女集体自杀的事,最严重的是红安,不是浠水。”我又向总社一位内参编辑反映了湖北的这一情况。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湖南,不是湖北。”

这时我才知道,少女集体自杀这种惨案,在各地都有发生。那时我就希望中国农民早一天摆脱人民公社的桎梏,尽管我在 1958 年也曾多次真诚地喊过“人民公社万岁!”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2 年 4 月四川省广汉县取消了人民公社(1979 年 3 月,这个县就在向阳公社进行行政社分开、建乡改社的试点)。这件事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人民公社的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的领导机

构”，这是写进了《宪法》的，广汉县竟敢如此作为！人们议论纷纷。

人民公社的解体是以政社分开的名义进行的。根据这个原则，广汉县把人民公社一分为三：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总公司下面又分设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在乡政府以下，设村民委员会。

1982年10月通过的新《宪法》，使广汉县的改革合法化了。这个新《宪法》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具体布置了政社分开的工作。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全国5.6万个人民公社就被9.2万个乡、镇政府取代；55万个生产大队被94万个村民委员会所取代。按规定，这一级人民政府再不能像人民公社那样行使领导经济的权力了。

人民公社是1958年建立的，它是“乌托邦”在中国的再现。毛泽东想把它建成“大同世界”，他曾经说过：“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路。”在1958年，毛泽东认为已经找到了“通往大同的路”。在成立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送给徐水县干部两本书：《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都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脱离现实的东西越是想得美好，给现实世界带来的苦难越多。它不仅给农村带来了贫困，使农村那种田园诗般的情趣化为乌有，而且破坏了农民的温馨的家庭生活。由于“一大二公”式的共产主义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在1958年的惨痛教训下，不得不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但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种什么，怎么种，都得由上级决定。打下粮食以后，农民吃多少口粮，还得由上级作决定。生产队没有生产

自主权,没有产品支配权,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人民公社严密组织下的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农民早就期待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人民公社是在喧天锣鼓中建立起来的,但它的消失却是静悄悄的。不管是哪一级政府,还是哪一个领导人,都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解散人民公社。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已经使人民公社成了一个空壳,它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人民公社的消失,使农民从金字塔网络的网眼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人。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60年代初,因其著名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引起人们的注意。应该说,在它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之前,的确是令人钦佩的。大寨的农民也是很了不起的。1964年2月10日,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等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在全国引起了轰动。1964年3月,毛泽东肯定了大寨的经验。在同年6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同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从此,大寨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先进单位,而且被作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种宣传工具的推动下,大寨成了全国各界人士朝觐的圣地。从1964年到70年代末,共有700多万人到这里来“取经”。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作过种种说明,也许大寨的本来经验并不是这样,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即开山造田或围湖造田;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的意思就是打击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在有些地方,修“大寨田”不但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

役之中。“大寨式工分”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在中国,一件事情一旦成为政治运动,就必然要排除种种阻力,对这项政治运动持消极态度的人就要受到迫害。同时会出现迎合上级、弄虚作假的现象。为了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不少地方对有不同看法、持消极态度的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仅大寨所在的昔阳县,挨斗、挨批并且被带上各种“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超过3000,每70人中就有一个。^①虚报学大寨成绩的更加普遍。在陈永贵的统治下,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给国家卖粮的指标是按虚报产量计算的,虚报的结果是农民挨饿。陈永贵还对昔阳的气象报告进行审批,以保证“大灾之年大丰收”。除了虚报粮食产量以外,为了求得单位面积产量高,还少报土地数量。新华社记者李玉秀曾怀疑大寨少报了土地,被陈永贵弄到大寨开山造地,“让他把多说的地造出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寨又成了反江青的英雄。这是因为1976年夏天江青曾去过大寨,大寨农民对她那很不得体的讲话不以为然。由于大寨“顶”了江青,“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继续强调农村要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教育”,提出“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还提出“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时,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各省提出限期“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要求。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绷紧阶级斗争弦,大批促大干”,不仅农业学大寨,工厂、学校、商店、国家机关也要学大寨。我所在的单位新华社也层层开会,讨论的不是如何宣传大寨,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学大寨。陈永贵到处作长篇

①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第314页。

报告,气势汹汹地批评一些省市领导。报纸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他这些报告。但这毕竟是“农业学大寨”的最后的冲击波,也可以说是回光返照。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农业学大寨”也就偃旗息鼓了。

但是,放弃学大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胡耀邦对大寨式的农田水利建设早有看法,认为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听后火冒三丈,大骂:“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和胡耀邦在农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很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下,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胡耀邦对陈永贵不记恩怨。陈永贵下台以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并且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①

显然,这并不是胡耀邦和陈永贵个人之间的看法。在理论务虚会之后不久,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在大寨旅行社,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向36位县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理论务虚会的情况。他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泽东主席。这是大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李副主席(指李先念)说,还是大寨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

①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第309-310页。

副主席没有说把大寨搞掉嘛！”陈永贵还说：“总会有人讲理的。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谈到昔阳取消自留地，搞大队核算时，陈永贵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当坚持。大队核算也应当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冈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①

当时，坚持学大寨的不仅仅是陈永贵。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的一封信说：“这个时期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的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宣传放到适当位置。”1979年3月2日，李先念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表示同意薛宏福的意见。^②

但是，种种阻力还是挡不住对学大寨问题的揭露。1979年3月19日以后，《山西日报》连续发出一组文章公开点名评了大寨。新华社的内参也揭露了大寨虚报粮食产量等一系列问题。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极“左”路线，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分东西南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搞生搬硬套，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哄而起，形式主义，这样的错误绝对不要再重犯了。

喧闹了十五六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此正式终结。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多年来官运亨通，一直当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①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第314页。

② 同上书，第309页。

国务院副总理。从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他头上总是包着白羊肚巾。这是他的特有形象的标志，像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一样。不过，他的头巾比阿拉法特的小得多，他只是一条毛巾。当然，在村里他是很少包白羊肚巾的，在政治场合是必包的，特别是见毛主席的时候。陈永贵毕竟没有“永贵”，最后还是丢了官。去职以后他不愿回大寨，在北京木樨地 22 号楼当上了“寓公”，成了提篮子买菜的“大叔”，大寨也搞起了联产承包。陈永贵 1986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病逝。逝世的前两天，两名新华社记者在他身边等了很久。他们不是怀着深情为他送终，他们在等陈永贵最后的一句话。他们设想，陈永贵会对大寨的过去有什么重新的说法，对中国农村新的面貌会有一句半句的赞美。这些话还是有新闻价值的。但是，陈永贵至死还是说过去的老话。

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业学大寨的终止，把农民从严密的组织和无效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劳动者。这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四节 农村改革的新矛盾和新发展

上面介绍的中国农村的种种改革，有的先天就有缺陷，在发展中其缺陷进一步显现；有的在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新矛盾。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在不断地解决旧问题、克服新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

1984 年以后的波折

中国的农村改革从 1978 年到 1984 年是让步阶段，即国家向

农民让利、让权,农村藉以休养生息。从1984年到1992年是停滞阶段,这是出于对农村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既停止了让步,又没有制度创新。从1992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让步政策,各地先后出现了制度创新的苗头。

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很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使人对中国的农村问题得出了过于乐观的结论,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同时对农村市场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的新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在政策上出了偏差,使农村改革一度停顿,农村形势出现逆转。

农村的非农业的发展和机制的作用,使农业在和非农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据对1985年我国农村各行业收益的比较,以第一产业每个劳动力的人均年产值为100,则第二产业为433,第三产业为533。其中工业为533,商业为449,运输业为386,建筑业为353。另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对3万农户的调查,农村不同行业中每个工作日平均收入为:种植业4元,农产品加工业8.4元,运输业和加工工业15元。^①由于比较利益的差别,各种生产要素大量向非农业转移。例如因为农业的资金回报率低于非农产业,大量农业资金向非农产业流出。仅1992年初到1993年第一季度,就有524亿元农业资金流向县以上的非农业部门。这就加剧了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农用土地也在向非农产业高速转移。从1979年到1993年底,耕地减少的数量相当于四川省全省的耕地面积。这些耕地一部分被用作房地基,大部分被改作非农产业用地。到1993年底,全国各类开发区2000多个,规划总面积近3000万亩。农村壮年劳动力也流向非农产业,农民自嘲地说:“农业劳动大军是‘九九三八六一’部队。”(“九九”为重阳节,

① 牛若峰:《论我国农业问题的症结和出路》,载《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5期。

“三八”为妇女节，“六一”为儿童节。即农业上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

农民收入低、增长慢。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重新拉大。到199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由1978年的2.4重新拉大为2.5，城乡社会零售商品份额差异系数由1985年的2.3扩大为1993年的3.7，城乡综合福利差异倍数扩大为5:1。^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是农民就业不充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从1984年到1988年，5年间乡镇企业吸收农业劳动力6300万人，平均每年吸收1260万人。而从1989年到1993年5年间，乡镇企业吸收的农业劳动力只有1911万人，因而44%的新增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

农业投入减少，发展后劲不足。国家对农业(包括农、林、牧、渔、水利、气象)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1978年的10.6%下降到1985年的3.3%，1993年下滑到2.8%，已经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1994年又下降到2.6%。农业投入减少的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旱涝灾害频频发生，成灾面积有增无减。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1984年，比上一年上涨了8.9%，从1985年到1987年分别上涨了4.8%、1.1%和7%。1988年上涨了16.2%，1989年上涨18.9%。因此，粮食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和非农产业相比，种粮更不合算了。这也是粮田撂荒的一个原因。再加上社会上错误地以为农民收入多了，各方面都向农民伸手，使农民不堪重负。

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跌。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4.0731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34%，是历史最高水平。而1985

^① 牛若峰：《我国工农业发展失衡与对策思路》，载《农村改革与发展》1994年第4期。

年下降到 3.7991 亿吨,以后一连 4 年都没有恢复到 1984 年的产量,但人口却由 1984 年的 10.3876 亿增加到 1988 年的 10.9614 亿,增加了 5738 万人。这使全国上下十分紧张。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1989 年全国粮食产量才达到 4.0755 亿吨,比 1984 年多 24 万吨,而由于人口比 1984 年多了 7315 万,人均占有粮食反而下降了 20 公斤。^①

1984 年粮食创历史最高水平以后,各地出现了“卖粮难”的情况。1989 年粮食总产量打破了 4 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1990 年粮食获得了空前大丰收,总产量高达 4.4624 亿吨,却又出现了严重的“卖粮难”问题,使粮食价格下降。实际上,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1992 年比 1984 年还低 4%,为什么农民“卖粮难”问题持续 3 年没有解决呢?副食品的增加,城市居民粮食消费量比过去少了是一个原因;粮食结构中低档的比较多,高档的比较少也是一个原因;粮食的收购、储备系统和市场经济不适应更是一个重要原因。1994 年因自然灾害减产了 2.5%,使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了 50.7%,带动食品价格上涨 31.8%。使这一年通货膨胀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显示了中国粮食供应的脆弱性。^②

1984 年以后出现的情况,使人们对中国的农村改革重新进行思考。人们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二是农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弱质产业,必须扶持;三是农村改革还仅仅开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在总供求上形势是很严峻的。改革 15 年来,中国人口增长了 2.2 亿,相当于两个四川省的人口,而减少的耕地面积却相当于一个四川省的耕地。到 2030 年,中国人口将

① 据《中国统计摘要》计算。

② 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达 16 亿,耕地面积将进一步减少。此外,中国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按照国际上以往的经验,这是农业削弱的阶段。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在这个阶段粮食产量都下降了 30% 以上,使得进口粮食占粮食总需求的 60%—70%。中国人口这么多,只要进口总需求量的 20%,就超过世界粮食市场的总交易量的 50%。因此,美国学者 L. BROWN 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世界恐慌。那些大的粮食进口国更为不安。

对于中国粮食缺口到底有多大,中外专家及政府组织看法不一。据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学者研究,提出了 1995 年到 2030 年中国粮食供求预测如下表:

| 项目 | 单位 | 1995 年 | 2000 年 | 2010 年 | 2030 年 |
|----------|----|---------|-------------|-------------|-------------|
| 总人口 | 亿人 | 12.11 | 13.00 | 14.00 | 16.00 |
| 城市化 | % | 29.04 | 32.00 | 38.00 | 50.00 |
| GDP 年增长率 | % | 8.0 | 7.0 | 5.0—6.0 | |
| 粮食消费需求总量 | 万吨 | 45509.1 | 48280—49750 | 53580—57380 | 63280—72580 |
| 粮食生产总量 | 万吨 | 46661.0 | 49020 | 54120 | 66250 |
| 最大供求缺口 | 万吨 | | 730 | 3260 | 6330 |

此表假定 1995 年粮食库存不变。

资料来源:马晓河:《我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状况分析》。

根据这个研究,到 2030 年中国粮食 90% 以上可以自给,进口不会超过 6330 万吨。不会得出“中国会让世界挨饿”的结论。中国农业部的预测比这一预测还要乐观。不过,我觉得马晓河先生的预测比较客观。国外其他研究者还有不同的研究结论。现列表引述如下:

中外专家及政府、组织对中国粮食的预测(亿吨)

| 预测者 | 2000年 | | | 2010年 | | | 2030年 | | |
|----------|-------|------|-------|-------|------|-------|-------|------|-------|
| | 生产量 | 需求量 | 余缺 | 生产量 | 需求量 | 余缺 | 生产量 | 需求量 | 余缺 |
| L. BROWN | 3.42 | 4.05 | -0.63 | 3.17 | 4.72 | -1.55 | 2.72 | 6.41 | -3.69 |
| R. M. M | 3.85 | 4.03 | -0.18 | 4.53 | 4.68 | -0.15 | 6.46 | 6.82 | -0.36 |
| 黄季昆 | 4.10 | 4.50 | -0.40 | 4.69 | 5.13 | -0.44 | 6.50 | 6.88 | -0.38 |
| USDA | 3.62 | 3.87 | -0.25 | 4.03 | 4.43 | -0.40 | 5.00 | 5.79 | -0.79 |
| 世界银行 | 4.11 | 4.20 | -0.09 | 4.83 | 5.02 | -0.19 | 6.67 | 7.17 | -0.50 |
| OECF | 3.67 | 3.85 | -0.18 | 3.89 | 4.92 | -1.03 | 4.18 | 8.06 | -3.88 |
| 梅方权 | 5.0 | 5.2 | -0.2 | 5.6 | 5.8 | -0.2 | 7.20 | 7.20 | 0 |
| 丁声俊 | | | | | | | 6.0 | 6.4 | -0.4 |

注:R. M. M 指 ROSEGRANT. M. M. USDA 指美国农业部。OECF 指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本表中的梅方权、丁声俊等预测粮食的定义是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粮食概念为准。其他专家和政府组织的粮食概念包括小麦、大米、玉米、高粱、燕麦、大麦、黑麦等。

本表资料来源:马晓河:《我国中长期粮食供求状况分析》。

表中的 L. BROWN 先生,中国译为布朗,他预测到 2030 年中国粮食缺口 2.36 亿吨,而目前全世界的粮食贸易总量才 2.2 亿吨,按每年增加 1% 来计算,到 2030 年,也不会高出 3 亿吨。这样,全世界的粮食都卖给中国也不够。所以他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的预测引起了世界粮食进口国的恐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到中国访问也十分担心地问起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学者和政府曾批驳布朗的看法。中国政府虽然不同意布朗等学者过于悲观的预测,但从工作上还是极为重视的。从 1993 年 10 月到 1995 年 2 月,不到两年时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 3 次农村工作会议。江泽民在 1995 年 2 月 27 日农村工作会议上说的一段话应当是 1984 年以来人们认真思考的结果: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新的矛盾。一方面,农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农业又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因此,工业化程度越高,越要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客观规律……

怎样对农业进行保护和支持呢?在80年代,主要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到90年代,中国的鲜奶、奶粉的成本比国际市场价还高。糖、植物油、棉花的价格已经接近或高于国际市场价。1995年,在国际市场上买美国的棉纱比在国内买棉花还要便宜,这使中国的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十分困难。从1990年到1994年,中国的粮食成本翻了一番,靠提高价格来保护农业是行不通的,必须降低消耗、降低成本。而要降低成本,就必须改变生产方式,即改变过度分散的生产方式。这是中国在跨入新世纪前必须解决的课题。

中国农民两个伟大创造的发展

前面说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两个伟大创造,自出现的那天起,就带有天然的缺陷。怎样克服这些缺陷呢?

在80年代中期,各地用“双层经营”来克服生产过度分散的问题。一层是家庭经营,土地还由家庭管理;一层是社会化服务,如机械化耕地、供电、检修、灭虫防疫、水利灌溉、新品种推广、产品销售服务等由社会有偿提供。这些服务可以达到规模经营,如一家一户很难实现机械化耕作,而拖拉机专业户就可以为千家万户耕地。这些社会化服务是由各种各样的专业户承担的,由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村长往往是服务组织的负责人。服务是有偿的。后

来社会化服务又发展到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领域。以社会化商业服务为龙头,带动了一大批家庭经济。有的成了“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公司是指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公司,如鸡肉加工公司。这样的公司和千家万户养鸡的农户建立关系,公司为农户提供雏鸡、饲料和技术,并收购肉鸡进行加工销售。双层经营造就了村一级以服务为内容的经济组织,从而加强了村一级的经济实力。除“双层经营”以外,各地创造了更多的克服分散的办法。

1994年,我到珠江三角洲对这两个方面的情况作了一番调查。珠江三角洲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都是先行者,矛盾暴露得比较早,采取措施解决也比较早。他们克服新矛盾的探索,有一定的代表性。

家庭联产承包制在珠江三角洲实行了10多年。它使这里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珠江三角洲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要求对土地整体布局、合理使用、统一规划,要求对土地实行规模经营。这和土地分散地固定在一家一户的矛盾日益激烈。

珠江三角洲的干部和农民为了摆脱这一矛盾的困扰,在土地问题上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

(一)使土地逐步向少数农户集中。顺德市的均安镇,前几年经济发展不快,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大。该镇采取4年调整一次承包土地的办法,把零碎分散的土地相对集中起来,改平均分包为自报领包,改无偿承包为有偿达标承包。经过1985年、1989年、1993年3次调整承包土地,全镇已有40%农户退出土地承包,实行规模经营的达到884户,占总户数的5.1%,规模经营的耕地面积达1.406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5.8%,户均规模经营达16亩耕地。

(二)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二、三产业发达,农民经营土

地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把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迅速向种田能手集中,发展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模式。顺德市桂洲镇容里管理区,已有90%劳动力转到了二、三产业,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由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每人每月提供20公斤的基本口粮,引导农户放弃土地经营。他们用两年时间,就集中了占总面积97.4%的3174亩耕地,由68户种田能手(其中外省来的有4户)承包经营,户均达54.6亩。这68户种田能手,在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资料赊销、机耕、机割、烘干、植保、排灌等服务的支持下,取得了相当好的经济效益。

(三)使土地向经济实体集中,实行现代企业化经营。顺德市的北窖镇,为了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采用土地返包和土地租赁形式,每年每亩付出400—650公斤稻谷作为有偿返包费或租赁费。采用这种办法把农民分散的、边远的低产耕地实行集中连片开发,发展水产养殖业。该镇共集中了占土地总面积14%的1.05万亩土地,创办了37个水产养殖场,以集体经营为主,也有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户联营,以及联户经营或独户经营。现在,北窖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水产养殖基地。

(四)使土地向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南海大沥镇联社管理区,已有90%以上的劳动力转到了二、三产业,1991年经济联社的纯收入已达220多万元。在这种条件下,1991年他们用“两田制”办法集中土地,即对16岁至59岁的劳力分给少量的“口粮田”,对15岁以下、60岁以上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每人每年由经济联社无偿供应250公斤稻谷作口粮。这样就把1000亩水田集中到经济联社,再由经济联社组建农业发展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化经营,并对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实现现代化装备。

南海市通过建立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分散问题。他们在原来的合作经济组织(即原来的生产大队——近几年称“管理区”;生产小队——近几年称“经济社”)的基础上,把属于

集体的土地、财产、资金以股份的形式,明确量化到组织内部成员共同所有。以产权明确的股份合作制,代替原来产权模糊的集体所有制。

当然,珠江三角洲是经济发达地区,这里的做法不一定能在其他地方推广。对广大农村,国家还是再三强调,在若干年内保持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

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这里乡镇企业中的问题,外人都并不了解。而这些问题正是推动这里的乡镇企业深化改革的动因。1993年底和1994年初,应中共佛山市委的邀请,我同北京及广东的几位经济学家一道,到佛山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咨询,从而了解到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深刻变化。

乡镇企业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是,集体所有的实质是政府所有。哪级政府办的企业就是哪级政府所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乡镇企业既有国营企业的弊端(大锅饭、铁饭碗),又有封建家族管理的弊端。乡镇企业普遍实行的厂长承包制,由于监督不健全,企业的要害部门都由家族掌握,有的让自己的亲属在外面办一个业务相近的厂,通过这一渠道使公有企业的资产大量流向个人。“有钱分光,没钱去贷,还贷靠下一届(厂长),出了问题一走了事,最后是政府背了烂债。”有一家工厂1992年上报利润600多万元,实际上几百万元的贷款利息没进成本,折旧没有提,而厂长还是按600万利润分成。还有一个出名的“乡镇企业家”,自己兼任厂长、财务科长、供销科长,每年上报利润数很大,每年得奖金一二十万元。1994年初清产核资,才发现亏损2000多万,已经资不抵债了。由于产权不清、缺乏约束、浪费惊人,职工对厂长的挥霍浪费无能为力。不管企业亏损多少,厂长照样坐高档车、喝洋酒。佛山一家卖酒的公司透露,1994年春节期間,仅“路易十三”就卖出了180瓶(每瓶售价8000元,在宾馆里卖1万元)。这些酒都是公

款买的。很多企业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留下了很大的窟窿。

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和金融体制改革,使乡镇企业的这些窟窿逐渐暴露出来。产权改革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样的大环境,又为他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因此,从1993年开始,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从产权入手,深化企业改革。其思路是把单纯的公有制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在公有制企业中引进多种经济成分,使之成为多种所有制混合于一个企业的格局。其具体形式如下:

一是中外联营。把产品市场前景好、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的一部分股权卖给境外商人,使企业变为中外联营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资金、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二是公私合营。将集体企业的股权的一部分卖给私人。其中经营者买较多的股权,中层管理人员股权数量次之,其余卖给全体职工。有的地方规定集体要保留51%的股权,有的地方没有这个规定。

三是公有民营。这方面又有两种形式:一是把设备卖给经营者,集体保留厂房、土地。即不动产归集体所有,设备和流动资产卖给个人。二是把整个企业出租给经营者,在出租期内由经营者自主经营。

四是改组成股份制企业。佛山市到1994年成立股份制企业37家。其中有万家乐、美的、电器照明、南海发展4家股票已经上市。

五是拍卖。即将亏损或微利企业拍卖给私人经营。

上述企业改制工作,珠江三角洲各市的进度不一样。其中珠海、顺德较快。1994年春我到顺德采访时,顺德已完成了169家企业的改制工作,其中中外合资的30家、公私合营4家、公有民营90家、拍卖的29家。

企业改制的具体做法是先请权威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

再选择转制方式。不管哪种方式都公开发榜、公开竞争。向境外出售股权是按市盈率计算,不按净资产计算。

据当地干部介绍,这些措施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效果。

一是进一步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企业经济效益上升。勒流镇环球风扇厂,1993年5月拍卖给私人后,1个月的产量相当于转制前4个月的产量,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增加了130元。北窖电器总厂的盈亏分界点是每天生产8万件,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每天亏损数千元。转制后每天生产10—12万件,每天盈利9000元。

二是盘活了资产,盘活了资金。顺德市通过转让产权得到了30亿元的收入。他们用10亿偿还债务,用10亿为职工建立社会保障,剩下的钱用于搞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形成了自我约束机制。过去挥霍浪费是公家的钱,不心疼。现在是自己的钱了,就注意控制开支、精打细算。有的拍卖了高级轿车,有的取消了出国计划。上基建项目时过去搞“可批性研究”(想办法让上级批准),现在真正搞“可行性研究”(研究资金投入的回报率)。

此外,政府再不直接管企业了。政府从“无限的责任,有限的收益”变为“有限的责任,固定的税收”。政府从繁琐的经营活动中解脱出来了,为转换政府职能创造了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

中国的农村改革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持续了30年的整合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新的整合正在进行之中。农民、农村组织、农村基层政权等都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农村的人际关系、社会风气、农民的精神面貌等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分化程度低、分化速度慢,具有较强同质均等的社会。改革以来,社会分化加快,新的角色群体大量涌

现,由单一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民工、雇工、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家等多种角色。就一个一个的地区而言,过去是同质同构的“相似体”:公社——大队——小队——农民。广东省的一个公社和山西省的一个公社,虽然相隔千里,但其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都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公社里任选两个农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也差别不大。现在不同了。由于地区间发达程度已拉开差距,他们再不相似了。农村社会的异质性增加了,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了。

首先是农民群体开始分化。过去农村按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这个系列把农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在政治上给予不同的待遇。现在这个身份系列已被抛弃,而由新出现的新的利益集团所代替。

一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承包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劳动。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农村居民的主体,也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

二是农民工。他们常年在厂矿或商店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劳动。工资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还有承包土地和自己的农村住房。他们没有城市正式工人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待遇,不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补贴。90年代初,这种农民工(进城做工和在乡镇企业里做工的)有1.5亿左右。

三是私营企业的雇工。他们的社会地位、劳动保护、生活保障程度不如农民工。据统计,1994年全国的雇工大约有1000万到2000万人。

四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中期约有400万人左右。他们是农村的工薪阶层。

五是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六是私营企业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雇有相当数量

的工人,自主经营。他们中根据财富多少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数万级、数十万级、数百万级、数千万级、亿万级。雇工由数人到上千人不等。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有私营企业主数十万人,他们是农村很有影响的风云人物。

七是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主要科室干部和供销人员。他们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在政治上也有地位。

八是乡村干部。他们是农村的管理者。由于乡镇企业政企不分,这些乡村干部掌握着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大权,他们的收入很高。当然这是指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集体致富的地方。在贫困地区情况有些不同。

上述8个类型的人群,实际是8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过去的单一农业劳动者分化为上述8个利益集团以后,农村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后4种人的收入比前4种人高很多倍。

在农民群体发生分化的同时,过去旧体制对农民的约束也被解除了。“现在比过去自由了!”这是农民最深刻的感受之一。

改革以前,中国农民生活在严密的组织之中。组织(人民公社,生产队)控制着全部的资源:土地,信息,发展机会……集体对农民的生活实行全面而严格的控制。每个人都在集体规定的框架内活动,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严格的规范加以控制。那时的农村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社会。农民其所以不敢超越规范是因为组织控制着他赖以生存的一切:住的户口,吃的粮票,穿的布票,出门的证明信。那时农民的信息渠道很单一,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除了吃饱穿暖以外,没有更多的要求。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的政治运动,农民不敢有任何“越轨”行为。

现在这些约束都不存在了。农民对乡村干部的态度是“有田有地不靠你,有吃有穿不求你,不批不斗不怕你,有了问题就找你,解决不了就骂你。”农民出村再不请假了。粮食和副食比过去多了以后,城市居民家家都有多余的粮票,这些粮票也私下进入市场交

易。开始两角钱一斤粮票,后来一角钱一斤粮票。80年代虽然没有取消粮票,但农民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粮票,出门不怕吃不上饭。90年代取消粮票以后,吃的问题更不愁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户籍管理也比过去松多了。因此,农民真正成了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地走南闯北。过去农民中进县城的机会不多,进过省城的人是极少数。现在去省城、上北京、下广东的人越来越多了。过去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形成了几千万人的流动大军。

其次是农村原有组织体系涣散。1989年3—4月间,民政部组织了168人分为29个调查组,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17个省、市、自治区的47个县、103个镇、504个村的基层组织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能按时完成国家各项任务,主动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较好地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的村占30%左右;班子有名无实,不能完成上述三项任务的村占20%左右;处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占50%左右。根据对4379份村民答卷的统计,41.9%的村民认为村级组织对家庭生产、生活没有帮助或帮助不大;50.2%的村民在生产生活发生困难时首先想到邻居和亲友帮助,52.1%的村民除了有事开介绍信外,很少与村级组织联系。据山西省对50个村的抽样调查,1988年有半数以上的村没有开过村民会议,中央的方针政策很少向村民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 and 有关规定,43%的村民从广播、报纸上知道个大概,30%的村民是道听途说,28%的村民什么也不知道。^①

过去农村社会主要靠行政整合来维持其秩序。党团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是这种组合机制中的三支重要力量。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民和集体经济纽带的弱化,使行政权力系统失去了过去那种整合力量。另外两支整合力量也基本失去了原来的效力。农村的党、团、妇女联合会、民兵等组织也基

① 包永辉、王满:《农村社会变迁及其走势采访录》。

本处于瘫痪状态。党团员、民兵常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外出做工,各种活动很难开展。妇联的主要任务是抓计划生育。民兵基本不进行训练。包产到户以后,没有集体财产需要保卫了,也不需要站岗放哨。

农村改革对原来的整合模式造成了毁灭性冲击。使农村由过去那种停滞的有序社会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无序社会。这种无序状态使农村中的能人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农村的经济生活显得空前活跃,对于商品经济的萌发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无序状态对农村也带来了破坏性的混乱。例如赌博盛行,盗窃活动猖獗,绝迹多年的丑恶现象复苏,不少地方流氓团伙横行乡里,有的地方黑社会现象开始出现。

原来自上而下的行政组合大大削弱以后,农村社会正在寻求新的整合模式。但新的整合模式发展十分缓慢。在这个新旧整合模式交替的过程中,宗教势力、家族势力趁虚而入,对农村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在1988年,河北省邯郸县虽然有270人加入共产党,却有813人加入天主教。1982年,河南省有基督教徒40万人,1988年已发展到100多万人。还有一些共产党员退党加入教会的。有一些孤寡老人长期得不到村组织的照顾,教会却给他们以关心,这些老人就成了虔诚的教徒。有些地方,乡村干部说话没有号召力,而宗教人士却一呼百应。1988年夏粮征购,河北省宁晋县完成任务有困难,乡党委书记让爱国神父出来做工作,几天之内就完成了征购任务。农村党支部开会很困难,但教会活动都准时踊跃参加。^①有一些地方,家族势力起重要作用。族长的权威远远超过了村干部的权威。续家谱活动在不少地方盛行。共产党的组织观念在淡化,家族观念在强化。

中国农村社会新的整合模式应当是契约性社会整合。在这以

^① 包永辉、王满:《农村社会变迁及其走势采访录》。

前,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先赋性整合(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到改革前的行政性整合。契约性整合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整合。但是,目前社会的整合明显滞后于社会分化进程,这是农村社会出现混乱的原因。在混乱中出现了家族这种先赋性整合复活的现象。

农村原有价值体系崩溃。原来对农民有约束力的价值体系也受到严重冲击。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被家庭利益至上所取代;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完全淡化。“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绝迹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泛滥起来了。

“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形成

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是很成功的。这说明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一是因为农村最穷,对改革的要求最迫切。二是因为农村和城市隔绝,留下了没有“大锅饭”的一块空地。在一定的意义来说,改革就意味着要改变“大锅饭”体制。在被“大锅饭”包下来的地方,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对于旧体制来说,农村没有既得利益,阻力当然要小得多。三是农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突破比较容易。当然,把农村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不是改革指导者的自觉选择,而是客观条件决定的。这一阶段的改革的显著成效,对改革全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大规模的让步政策和原有行政整合的力量的削弱使农民得到了解放。农民不再是农村组织机器上的小螺钉,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经营,可以自由地安排休闲和家庭生活。农民不再是土地的奴隶,他们可以“离土不离乡”,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也可以“离土又离乡”,到大城市里去赚钱。农民能够脱离土地,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它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它大大增强了社会的活力,使人们的思想冲破了牢笼,加速了社会

观念的更新,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它又使一个有序社会变成了无序社会,加大了管理社会的难度。它使数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这是一支农村冲击城市的无序大军。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商品量大幅度增长,粮食、肉、蛋、禽、鱼、虾……比过去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市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繁荣。乡镇企业的商品也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对城市经济的冲击。“小骆驼闯进大上海”,就是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生产的“骆驼牌”电风扇,和上海名牌“华生”电风扇争夺上海市场的一件趣事。

显然,农民收入的增长为城市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市场,促进了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8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增长以后,轻工业产品严重供不应求,国家不得不通过多种途径加速轻工业发展。1982年全国的主要轻工业产品和1978年相比,自行车增长2.83倍,缝纫机增长了2.65倍,手表增长2.44倍,合成纤维增长2.22倍,农用化肥增长1.47倍。仅4年的增长相当于过去10年、20年的增长。显然,这都是农民需要的产品。

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在国有经济之外造就了一支活力很强的经济,它是国有经济的强大竞争对手,又是推动国有经济改革的外部动力。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就其所有制性质来说,是集体经济或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相比,它的经营成果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的联系比较密切。它的经营自主权比国有企业大得多。所以,它的活力超过国有经济,它的发展速度超过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在一定的程度上处于劣势。这为加速国有经济改革形成了一种外在压力。

农村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造就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的体制形成了对城市旧体制的包围圈。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基本是按市场规律运行的。它们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过来的,而是天生的市场经济机制。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有了这么一

大块按市场运行的经济,为城市改革建立了一个参照系,也给城市改革造就了“大兵压境”非改不可的强大压力。

农村的市场经济已经兵临“城”下。城市的经济改革再也不能“按兵不动”了。

第六章

敞开大门 走向世界

在邓小平时代,把改革和开放并提。改革是制度创新,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没有政治上的初步改革,就不能破除“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等等意识形态枷锁,就不可能打开国门;没有国内制度的初步改革,开放就处处掣肘。对外开放之初,无论是国际经济技术交流,还是建立开放型经济,都和原有的经济体制处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实质是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开放推动了改革;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改革,又扩大了开放。开放对改革的促进,直接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凡是对外开放早、开放程度大的地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得就早,经济发展就快。中国沿海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 90 年代初就已基本形成。

广东、福建、海南、江苏、浙江等省,那时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中就起主导作用。由于沿海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又推动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加速建立。

第一节 国门是怎样打开的?

夜郎大国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把自己周围看成全是不开化的荒蛮之地: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明永乐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虽然是了不起的航海伟业,但其目的还是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并不是和国外互通有无,没有任何商业目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国门紧闭。

从明清以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都希望到中国来开拓市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求通商。这个规格很高的使团由著名的外交官马嘎尔尼率领,共700人,带了丰厚的礼品(包括最新的科技成果和一门先进的大炮),航行了9个月才到达中国。而清政府误以为英国想臣服中国,是远道来进贡的,把这个外交使团当成贡臣,把礼品当成贡品。还要求马嘎尔尼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马嘎尔尼不从,经再三交涉,马嘎尔尼同觐见英王一样屈一膝。对于他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的要求,乾隆的答复是:“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

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使团无果而归。^① 中国的大门依然紧闭。中国人对世界依然一无所知,把西方的先进技术称为“奇技淫巧”。47年以后,发生了鸦片战争,列强用重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那时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常用的提法,说过去“闭关锁国”,而历史学界一直用“闭关自守”。这是因为“锁国”是日本德川幕府时的特定概念。天皇曾三次下“锁国诏书”,不允许日本和其他国家往来(当然,“锁国诏书”并没有锁住日本的大门)。中国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锁国”的说法,但近代的中国不开放是肯定的。

中国的近代史是列强的入侵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在近代中国人的感情中,既残存有中央大国的自傲,又有战败者的自卑。西方文明既然是同鸦片和大炮一起进入中国的,它到底是毒品还是营养品,是具有先进性还是具有侵略性,在中国一直争论不休。这种争论进行了一个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

所以,中国的闭关自守,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

从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门基本是关闭的。客观地说,闭关自守并不完全是毛泽东的意愿。

中国闭关自守的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上的两极政治。一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另一极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阵营互相对立。一开始,毛泽东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他曾向美国投以希望的目光。但美国人没有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那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结盟。但是,在毛泽东的心里,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惊人地相似)。但

^① 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第576页和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据专家称,后一本书比较准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说马氏提出传教要求系误传。

是,美国当时的政府,却把中国视为仅次于苏联的敌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及其盟国的策划下,联合国对新中国强行封锁。不仅经济上“禁运”,还在中国东部太平洋上形成了半月形军事包围圈。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敌视西方的政策,同苏联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也从苏联引进了不少先进的工业技术。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从中国撤走专家,使中国真正处于孤立境地。那时只同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古巴4个又穷又小的“兄弟”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后来古巴一度 and 苏联站在一起批评中国,中国只剩下3个小“兄弟”了。这时,在全国上下,不得不把“自力更生”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这是出于无奈。

6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所以,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口号。但是,随着“自力更生”和“反帝反修”调子越唱越高,自己的对外封锁的观念也越来越强。对外国人的警觉、敌意是同对外国人的排斥伴生的。中国人自己也在封闭自己。毛泽东也不愿意这样长期处于封闭之中。他在等待机会。

1972年2月21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重病中的毛泽东对尼克松此行十分重视。为了迎接尼克松,他20多天以前就配合医师治病(过去他常常不和医师配合),使他的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律衰竭引起的水肿有所消退。在尼克松来华的一个星期以前,他就开始锻炼身体,练习起立,蹒跚走路。后来可以在服务员的搀扶下走一点路了。据毛泽东周围的人回忆,尼克松来北京的那一天,毛泽东怀着很少有的高兴,一大早就不断地打听尼克松到达的时间。5个月没有理发的毛泽东这一天理了发,刮了胡子,头发上还擦了点有香味的油。他坐在游泳池内的书房兼会客室内等着,报告尼克松行踪的电话不断打来。当得知尼克松已经到达机场时,他立即传话给周恩来:立刻会见。周向毛说明,按照迎宾惯

例，客人应先到住地，稍事休息，换衣服，再行会见。毛没有反对，只是不断地催促，并询问客人情况。午宴以后，毛就接见了尼克松。事后，毛泽东认为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精神好了，健康也大为好转了。

毛泽东这样重视、这样急切地会见尼克松，说明他多么想打破封闭、孤立的状态！他是用尽生命最后的余力打开国门的。不过，毛泽东和美国改善关系，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在利用国外资金方面，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没有表述出来，却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失掉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件事是80年代我到广东采访时从一位老干部那里得知的。

那是在1956年，毛泽东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带领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等赶到毛下榻的小岛宾馆内，郑重其事地汇报一件事。

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有29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这是亚洲和非洲全部独立国家的盛会。这次会议显示出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使亚非国家的资本家们惶恐不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富商巨贾，急忙把资金转移到较为自由、稳定的香港，以躲避风险。其中不少是华裔富商。一时香港银行资金大量聚积，不得不以极低的利率向外贷款。香港的大小企业家们遇到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放手利用这些低息贷款建大楼，办工厂，获利十分丰厚。能不能利用香港银行的低息贷款发展我国南方的工、农业生产呢？陶铸觉得机不可失。他就这个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在陶铸等人的汇报过程中毛泽东没有讲话。汇报完了以后，毛泽东走出宾馆，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广东的报告很快呈给了毛泽东,却如石沉大海,直到毛泽东逝世也没有得到答复。而香港则利用这笔资金,借日本等国产业升级的机会,接替下日本换下来的产业,使经济蒸蒸日上。内地却失去了这次良机,在国际竞争的跑道上被别人远远地扔下了。

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长文,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当时国人为此很是自豪了一阵。从此,不借外债,特别是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的期刊,工厂里没有国外的新技术……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基本停止。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以外,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出国的机会。在70年代末期,出国服装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动的单位,根据本单位人员的身材,做几套服装,像道具一样,谁有外事活动谁穿。那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也并不多。街上很少有外国人。偶尔来了几个外国人,群众感到十分新奇,对他们的蓝眼睛、黄头发看个不够。围观、尾随的现象经常发生,以致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时,不得不教育群众不要围观、尾随外国人。

闭关自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12位,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这就是封闭的代价。

^① 见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

中国还是一个夜郎大国。多数中国人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直到开放之初,处处都会遇到封闭观念的掣肘。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在80年代初,还有一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有的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度。1980年6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他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长期被认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时刚刚划入了“劳动者”的行列,天津化纤厂很聪明地把“劳动者”的桂冠赠给了外国专家),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7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1982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

经许可不得超越”的中英文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 10 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 1953 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为了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9 月 16 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

“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面,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面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新局面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4 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10 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 5 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的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中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他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国门先从这里打开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他们想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

1978 年 10 月 22 日到 29 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3 个月以后,邓小平又到美国进行了为期 7 天的访问。他那潇洒自如的风度,大胆和幽默的谈笑,给

外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两次出访的电视新闻在国内播发,被一些人指摘为“崇洋媚外”,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却是开放观念的普及教育。他在日本工人家庭里称赞人家富裕的生活,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绝对贫困”的理论;他对丰田公司和松下公司现代技术的赞美和羡慕,使人感到资本主义的“垂死说”的荒谬;当他在美国高兴地穿上牛仔服时,中国的电视观众想起了过去党报的宣传:“穿牛仔服的美国青年是颓废的一代。”

邓小平的出访所造成的国际影响,外国人称为“邓小平旋风”。但是给中国电视观众造成的心灵冲击,也许比外交上的冲击影响更大、更深。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中国的电视观众说:“中国再不学习外国,又要当亡国奴了!”

中国人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开始了解世界。过去人们从媒体了解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此以后,中国的报刊也开始如实地介绍一些外国的情况了。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中国的最高层在寻求进入世界的种种方式,一个又一个考察团派往国外。在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方面,华国锋也很坚决、积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按照中央的意图负责这项工作。

据谷牧回忆,1978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代表团成员中有6位省部级干部。他们从5月2日到6月6日,走访了上述5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他们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汇报。汇报内容是: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很落后,

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二、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有很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我们都可以采用。7月上旬，国务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有关部委负责人都参加了，开了20多天，总结30年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务虚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了多次会议，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这些思想最后都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这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北京王府井最繁华的地方，有人高托着收音机，和周围簇拥着的一大群过往行人共听中美建交的喜讯。在《人民日报》社门前（当时在王府井大街），索取《号外》的人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在天安门的金水桥畔，索取《号外》的人排成了几条长龙。

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早在4月间就启程了。经过考察，他们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6月3日，华国锋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听完后华国锋说：“总的同意”，还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根据华国锋“说干就干”的指示，宝安、珠海积极行动。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招商局的一个分支机构。中国招商局是李鸿章1872年建立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招商局总部设在香港。1950年，香港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以后就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

务院”报送了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中对建立出口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

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认真研究了这份报告。马上决定请交通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局长袁庚到他那里去，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袁庚早有准备。1978年他在任交通部外事局长的时候，奉命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代交通部起草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了“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10月12日，中共中央5位主要领导人对这个报告全部圈阅同意，并作了批示。10月18日，他被调到了香港招商局工作。

1979年1月31日，彭德清和袁庚应召来到了中南海。一坐下，李先念就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胸有成竹的袁庚谈了自己的想法。

当袁庚谈到要把香港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内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时，李先念插话道：“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

袁庚接上说：“我们准备先行一步，要求在蛇口划出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

李先念看着宝安县地图，指着深圳西南角的蛇口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他接着说：“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个特殊政策，不然他们是要管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李先念又征求谷牧副总理的意见：“对招商局的报告，你看怎么办？”谷牧回答：“你批个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李先念说：“好，我批。”说着，他就在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 1979.1.31

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具体落实李先念的批示。谷牧开诚布公地说：“现在议一议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厂的问题。在这里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除了地方行政按国内的一套以外，在经济上要闹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他接着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以后作了批示。”他宣读了先念的批示后，请袁庚介绍情况。

袁庚介绍了50年代中期失去利用香港低息资金的机会造成的损失。他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高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港元以上。劳动力工资也很高。我们经过多方面研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吸收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如果这样做，香港任何财团都无法和我们竞争。”

袁庚看到听的人都点头称是，他乘机提出了要求：“交通部与广东省已经商定了具体方案，但进出口交税的问题要中央定才行。”

谷牧一语道破：“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

袁庚进一步介绍了搞工业区、办工厂的具体想法，明确提出：“这个工业区的建设不用财政部一分钱，只要求财政部免税10到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财政部长王丙乾思索了一下说：“其他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问题，不按国内办法，而按香港办法。在香港你们怎么交税的，在蛇口就怎么交税。”

外贸部刘希文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税问题可以给以优惠。具体怎么办，我要回去和海关商量一下。”

经过各主管部门充分议论以后原则已定。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在国内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敢想过。

顺便说一句，这时中央已经打破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观念，积极吸收境外资金。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使吸收外商资金有了法律保障。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1962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

据宝安县反映，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

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

梧桐山海拔 998 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①

1978 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并且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 1978 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 2000 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 3000 元港币。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外逃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 100 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 30 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 7 月份收到了 9000 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 月 10 日用 4500 元买了 450 公斤粮

① 《洋参大王自传》第 60 页。

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级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没有示弱：“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会后，习仲勋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态度有了转变，第二天就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广东要搞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示意习仲勋继续说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50号文件是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从此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这里需要交待一下，1980年，江泽民参加了特区的早期筹建工作。他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刚率一个代表团考察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士、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的出口加工区，返京后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出口加工区考察报告》，就飞到南方来了。9年以后他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随后，国务院批准上述4个特区的地理位置的区域范围，各特区就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第二节 香香臭臭话广东

对外开放一波三折。而这些波折一般是由在开放中出现的问

题引起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而中央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措施,又常被一些人变成阻碍改革和开放的手段。一旦改革开放受阻,就又会排除阻力的行动,从而为改革开放造就新的动力,而这些阻力一旦克服,开放就又前进一步。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总是波澜起伏,一波三折的。

广东的香香臭臭,是对外开放一波三折具体、生动的反映。

1982:两省会议冲击波

80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来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冲击和破坏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原来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

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赵紫阳是支持广东放开的,但他

也不得不说：“你们啦，对农副产品都‘放羊’了。”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68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

“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

国家计划。

(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3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1982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

10多年后的1998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

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

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

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我们坚定不移地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大家对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

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梁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可能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1983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梁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真正为广东正名的是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

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

海南汽车事件

广东的第二次臭,是由 1984 年到 1985 年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引起的。早在 1983 年 1 月,胡耀邦、赵紫阳、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就视察海南岛,探讨加快海南的改革开放的问题。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文件。同年 10 月,又发出了《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自主权的八项规定》。根据这 8 项规定,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 17 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在《八项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海南进口的这 17 种商品不能转卖到大陆腹地。也许,这是文字上的疏忽。但如果海南将国家控制的进口商品转卖到内地,是一条很容易的致富之路。当时,一辆 12 座的客货两用车,进口价 5000 美元,转手即可净赚 12000 美元。一时海南成了全国炒汽车的天堂,转卖汽车数以万计。雷宇(当时是海南特别行政区负责人)初到海南,提出了一个海南追赶台湾的宏伟设想。1983 年,在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雷宇对我畅谈了海南追赶台湾的具体设想,使我感到他的设想既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题为《海南岛怎样才能赶上台湾?》的访问记。追赶台湾需要的大笔资金从哪里来?正好当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一个规定,内地持县级机关的证明,可以到海南买进口汽车。海南就利用这个政策,把进口汽车倒卖给内地,从中赚取利润,藉以积累发展资金。1984 年初,雷宇批准下属单位进口了 1.6 万辆面包车。由于把车转卖到内地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海南下属各县,以及党、政、军、国营农场、工厂、商店都参与了倒卖汽车的活动,在全国造成了不好

的影响。这时国务院下了一个文件,明确规定不能向内地转卖进口汽车。任仲夷立即给省政府党组写了一个条子:“党、政、军、民都按国务院方针办。”这个条子放在一位政府副秘书长那里,他出差了,条子一压就是2个月,致使汽车事件没有制止住。事实上,这个倒卖浪潮一起来,谁也没有办法制止。海南的领导人对于停止进口汽车也犹豫不决:海口市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在倒卖汽车中占了便宜,若停止进口汽车,那些远离海口市、本来很贫困的地区会有意见。另外也担心那些靠借债订购汽车的单位因停止进口无力偿还债务。后来中央和省里态度十分坚决时,为了执行省里的命令,雷宇亲自到码头制止船只将汽车运往内地,遭到干部们的强烈抵制。到最后制止时,已经批准进口了8.9万多辆汽车。花掉了10亿多美元。进口和倒卖汽车这一事件尽管有很复杂的原因,最后还是雷宇被撤了职。从这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来看,让雷宇承担全部责任是不很公正的。但他还是默默承担了。这样,他虽然丢了官,却成了海南人心目中的英雄。有人买了3卡车鞭炮,准备欢送(挽留)雷宇。雷宇得知后,只得深夜乘游艇过雷州海峡,只带走他来海南时带来的一个背包,没有多带走一分钱。他离开海南以后还有人说:“海南有个五公祠,现在应当再为雷宇建一个六公祠。”因汽车事件雷宇被贬到花县当县委副书记,1988年又提为广州市副市长。1992年,我在广西南宁再次见到雷宇,这时他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谈到海南汽车事件时,他说:“这些都是往事了!”他这时想的是如何引进外资开发广西。

汽车事件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失去了雷宇这样的领导干部,使整个干部队伍大伤元气,还使海南因进口了又不能出手的汽车而负债累累。一大批在汽车事件中有牵连的干部忧心忡忡,害怕上级进一步追究。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1986年我在北京见到了雷宇的继任人孟庆广,这是一位很善于记数字的东北人。他对我说:“汽车事件使海南的改

革和发展推迟了 10 年。”

在汽车事件发生时，海南还属广东省管辖，称为海南特别行政区。汽车事件的发生，又使广东的改革开放形象蒙上了阴影。

1986 年 1 月，赵紫阳视察海南时，宣布拨款资助海南建设 24 项大工程，允许出售已经进口的汽车和其他物资。而且向忧心忡忡的干部们保证，只有极端恶劣的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刑事处罚，其他不予追究。使海南度过了这一难关。

“变通”不通

在这以后，广东的改革和开放不断进展，但也不断有舆论压力。广东实行政策“变通”，即地方想采取某种改革措施，但这项改革又和中央的现行政策冲突，就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对政策进行“变通”，使改革能得以实行。这种做法的形象说法是：“遇到绿灯跑步走，遇着红灯绕道走，没有灯时摸着走。”后来全国各省市都相继效法，也有些地方把“变通”地执行中央政策弄成了“变相”地违反中央政策，使得中央的政策无法贯彻，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宏观失控。1988 年秋天，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夏阳在一篇调查报告中反映了各地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引起了李鹏和赵紫阳的重视。这是 1989—1991 年间“治理整顿”的起因之一。从全局来看，治理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改革开放起阻碍作用的传统思想得到了起作用的机会，使得改革开放一度停顿或放慢速度。传统思想的抬头和改革的停顿又引出了邓小平 1992 年的南方讲话。邓在广东参观工厂时，对厂长明确表示对他那种“三灯”做法的首肯。南方讲话给传统思想以强有力的冲击，为广东省以至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又踩了一次油门。当然，也是对广东的又一次正名。

1998 年 5 月，任仲夷与本书作者又谈到变通问题。他说：“至

今有些人还把‘变通’当贬义词。查遍词典,‘变通’一词都是积极的。”他还说:“变通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

然而,对广东的批评并没有停止。最新的一轮批评是1995年。1994年,顺德两项措施引起争议。一项措施是针对乡镇企业的。谁也不会否认,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内在的危机日益严重。顺德的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实际是哪级政府办的企业,就属哪级政府所有。这种企业规模扩大以后,既有国营企业的弊端(大锅饭,财务缺乏约束),又有封建家族管理的弊病。乡镇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企业的要害部门都由承包者的家庭成员掌握,公有资产大量流向私人腰包。

针对这种情况,顺德等地把单纯的公有制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即在公有制企业中引进多种经济成分。具体的做法,一是中外合营。把产品市场前景好、规模较大的企业的产权,卖一部分给境外商人,使之成为中外合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资金、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二是公私合营。将集体企业的股权卖一部分给私人。其中经营者买较多的股权,中层管理人员的股权数量次之,一般职工股权更少一些;三是公有民营。这方面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设备卖给经营者,集体保留厂房、土地,即不动产归集体所有,设备和流动资产卖给私人。另一种是把整个企业出租给经营者,出租期内由经营者自主经营;四是改组成股份制企业;五是拍卖,即将微利或亏损企业拍卖给私人经营。

顺德的这一做法招来一些人的批评,认为这是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因而也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顺德的另一项措施是党政机构改革。他们的说法是“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加强党的领导”。其做法是,党委、政府、政协、人大常委4套班子的一把手和市政府主管重要工作的副市长都是市委常委,而党委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不一定是常委。由市委常委

对全市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开常委会就确定各项重要工作，会后由分工各方面的常委分别贯彻。这种党政一体化的做法被指责为削弱党的领导 and 取消党的领导。顺便说一句，顺德这种党政一体化的做法代表了一种政治思潮。1994年，《中国政协报》宣传过这种看法，它的总编辑因此被解职。

对广东的新一轮的批评带有全局意义。它涉及到公有制和党的领导这两个实质性的重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不只是在广东省，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中都有不同的看法。就拿顺德的做法来说，1994年春天，我同著名经济学家王珏联袂到顺德采访，同时了解到上述情况。虽然我们两人是忘年之交，但我们两人的看法就不一致。我们在从顺德回来的汽车上交换看法。王珏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从理智上说，我认为顺德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作为一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感情上难以接受。”我说：“余生也晚，没有资格有您这种感情。我从理智上判断，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当时我在佛山发表的演说中对他们企业改革的评论是“尽管对这些举措还有见仁见智之议，但它的确是面对现实矛盾寻求发展之举”。而事后王珏先生著文《放弃公有制为主体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批评了顺德的做法。

1996年11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学习心得，内容是针对关于所有制的传统理论。这篇东西很快受到一些人士的批评。在批评者散发的厉有为的稿件中，加上了这样一个按语：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做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

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为此事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厉有为解了围。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所有制方面的决议,使广东彻底得到了解脱。

不管广东的改革开放如何一波三折,不管它在舆论上如何香香臭臭,但是,由于它先行一步,它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人们借用一个历史词语“北伐”。这些年来,广东一次又一次地“北伐”。80年代初是走私货的“北伐”,大量走私货从广东运往北方。后来是真正广货的“北伐”,广东的产品竟然在不少地区把上海产品打败,抢占了上海的传统市场。不说家用电器,就连饮料市场也被广东占领,“珠江水”淹没了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的宴席。再后是资金“北伐”,广东的企业把资金投向内地,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建立自己的分厂,大量利润流回广东。“北伐”的档次越来越高,威力也越来越大。

令人吃惊的是,在“经济北伐”的同时,广东的文化也“北伐”了。广东话成为北京年轻人的时髦。广东的地方用语,几乎成了全国的通用词汇:坐出租车叫“打的”,交饭钱叫“买单”。广东的流行歌曲、广东菜、广东发廊等风行全国。表面看来,文化也是如此“趋炎附势”,你越富有,你的文化越有人模仿。但往深处看,这些广东时髦的后面是新思想、新观念。近百年来,中国的新思想不少是从广东传向北方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些近代思想的

先驱,都是广东人。“南风北渐”已经近百年了。在本世纪末的这场大变革中,广东又先走一步。这次传播的新观念是市场经济观念。

第三节 开放向纵深发展

继4个特区之后,1984年4月,又将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给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除北海和温州两市外,其他12个城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给予类似特区的政策。

1985年2月,国务院又批准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1991年,国务院继上年批准上海设立外高桥保税区之后,又批准深圳设立福田和沙头角保税区,天津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对外开放大踏步前进:开放长江中下游的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等沿江6个港口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又将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的伊宁、塔城、博乐,云南的瑞丽、畹町、河口,广西的凭祥、东兴共13个内陆边境城市对外开放。这一年还批准了所有省会城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到1994年,中国的开放地区已经遍布沿海、沿江、沿边和内地,覆盖354个市、县,55万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同时,还兴

办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1个接待境外游客的旅游度假区。至此,从地域上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方位对外开放。

然而,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开放,也不仅仅是吸引境外的资金和技术。如果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开放的目标就是使中国向全球化迈进。向全球化迈进,一要建立开放型经济,二要广泛吸收人类创造的各方面的优秀成果,在诸多方面要和国际接轨,三要放眼世界,胸怀全球,树立全球观念。

建立开放型经济,就是把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从而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要建立开放型经济,关键是改革对外贸易体制。

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独家经营的国家垄断型外贸体制。这个体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由国家确定的外贸口岸对外成交。当时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有轻工、化工、纺织、粮油、五金矿产等10多个,外贸口岸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上海5大口岸,后来又允许江苏、河北、浙江、广西可以直接对外成交。除上述外贸公司和外贸口岸外,任何机构、任何地方都不能做进出口买卖;

——一切外贸活动都由国家计划安排。外贸计划包括:出口商品收购计划、出口计划、进口计划、进口商品国内调拨计划、国内销售计划、储运计划……国家计委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平衡的需要,将年度进出口计划下达给外贸部。外贸部再将计划下达给各外贸公司。

——在财务上,实行中央统负盈亏的中央财政包干制。对外贸易公司的盈利一律上交给中央财政,亏损由中央财政统一报销。外贸是一个亏损大户,每年外贸亏损补贴以百亿元计。

——在价格上,实行国内外市场价格割断的办法。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出口商品一律按国内价格收购;进口商品的内销,原则按国内价格作价。

——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外贸公司出口所创外汇及其他部门所得外汇一律上交国家;各部门、各地区、各外贸公司所需外汇,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按进口用汇计划统一拨付。汇率由国家确定。

——出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互不见面。生产厂家不能参与出口销售活动,不了解国际市场需求情况,不了解在外面卖的价格多高。国际市场上的盈亏与生产厂家关系不大。外贸公司对生产厂家的管理办法是“少了赶,多了砍”。

改革前,中国的进出口基本模式是,由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需要进口多少设备、多少原材料,从而算出需要多少外汇。再根据外汇的需要量来确定出口规模。也就是说,由经济发展计划决定进口计划;由进口计划决定出口计划。

这种外贸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也是封闭经济的体现。

在1974年到1978年间,经过5年试点,作了少许改革,上述体制稍有松动,但总的格局没有触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外贸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深入。

改革外贸管理体制,首先是打破国家外贸部门独家垄断的局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一是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进出口商品经营权。例如,从1979年开始,批准京、津、沪3市和广东、福建、辽宁成立以地方领

导为主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授予冶金、机械、兵器、航空、船舶等部门进出口权。接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外贸公司、工贸公司、农贸公司、技贸公司,一大批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有了外贸经营权。到80年代后期,除了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的、资源性的重要商品由国家经营以外,其他商品都由有进出口权的企业放开经营。外贸部门的一家垄断的局面完全打破。

二是由计划直接调控改为间接调控。80年代以来,逐步缩小计划管理的商品的品种,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取消了出口货源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到1988年,在出口商品中,指令性计划出口商品有21种,占出口总额的30%;指导性计划出口商品有91种,占出口总额的15%;不列入计划的出口商品占出口总额的55%。在进口商品中,指令性计划占进口总额的20%,指导性计划占进口总额的20%,不列入计划的商品占进口总额的60%。

从1988年开始,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一是由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各外贸专业公司,承包出口收汇和外汇上缴计划指标;二是轻工、工艺、服装3个进出口总公司进行进出口自负盈亏试点;三是在外贸系统实行责、权、利统一。国家将大部分外贸专业总公司和部分工贸总公司所属分支机构下放给地方政府领导,由地方政府组织他们承包。中央直属外贸企业对主管部门承包。

下放外贸经营权以后,的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出口大量增加,但也带来了混乱。各地利用手中的外贸经营权,对内抬价收购,对外压价销售,造成“肥水外流”。为了得到出口货源,“兔毛大战”、“苎麻大战”、“蚕丝大战”等连绵不断。

为了克服对外贸易中的混乱,1991年国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地区间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实行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办法;二是各类企业从事对外经营活动时,依据公开的、无歧视的统

一政策。

然而,各地争相出口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口亏损仍由国家承担。所以,使外贸企业逐步走向自负盈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改革以前外贸公司和出口商品生产厂家是收购关系。外贸公司把生产厂家的产品收购上来,再拿到国外去卖。生产厂家不了解国际市场,使市场需求和生产脱离,生产的产品很难适销对路。1988年改变了这种制度,实行外贸代理制。生产厂家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生产什么产品由自己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出来以后,由外贸公司代理销售。生产企业根据代理人是否以最优的价格成交,是否以最快速度和最低的费用出口,自行选择出口代理商。

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工贸、技贸、贸工农和进出口结合的试点。有的生产厂家在经济特区开设外贸窗口,有的生产厂家组织专业性出口联合体,有的外贸专业公司同地区(部门)、企业组成出口联合体,有的生产企业直接出口。

以上种种改革,使生产企业由脱离国际市场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直接参与国际竞争。

外汇管理的改革

从1980年开始,打破了外汇由中央统收统支的做法,给地方和企业实行外汇留成。也就是说,地方在自己的出口创汇中,可以按比例留下一部分由自己支配。当时规定,福建、广东两省,以1978年实绩为基数,5年之内外贸外汇增收部分70%留省。福建1981年以前增收部分全部留省。对其他各地区、各部门的出口换汇,也都有不同比例的留成。随后,国家允许留成外汇的单位、企业,通过银行将自有的外汇,以高于牌价的价格卖给需要外汇的单位。

外贸出口亏损,基数部分仍由国家补贴;其超额部分按分成比例及实际汇率换算,由中央和地方分担。这就形成了外汇管理的双轨制。

过去的官定汇率是限制出口鼓励进口的。在改革前的很多年,汇率一直保持1.7不动。由于官定汇价中人民币的币值过高,从国内收购的商品拿到国外去卖就要亏损;而从国外买的商品拿到国内来卖就很赚钱。过去长期的出口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合理的汇率造成的。财政给出口商品以亏损补贴,实际是对外汇价格压得过低的补偿。过去进口、出口都是由国家独家经营,进口赚的钱都交给财政了,出口的亏损当然也应由财政来补贴。

改革以来,为了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官定汇率不断调整。见下表:

改革年代人民币和美元年平均比价:(100美元兑换人民币数)

| | | | | | | | | | | | | |
|----|--------|--------|--------|--------|--------|--------|--------|--------|--------|--------|--------|--------|
| 年份 | 1981 | 1984 | 1985 | 1986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6 |
| 比价 | 170.51 | 232.70 | 293.67 | 345.28 | 372.21 | 376.59 | 478.38 | 532.27 | 551.49 | 576.19 | 861.87 | 831.42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当外贸打破了国家垄断以后,外汇也不能是一种价格了。外汇调剂市场是和外汇留成制度同时存在的。地方有了留成的外汇,就必须有一个互通有无的地方。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官定汇率不断调高,人民币不断贬值,由1981年的1.70逐步调到1993年的5.76,但离均衡汇率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调剂市场的汇率比官定汇率高。但是,国家开办的外汇调剂市场的汇价还没有达到均衡汇率。因此,民间外汇调剂市场(又称“黑市”),比国家调剂市场的汇价还要高。黑市价格比较接近均衡价格。这样,外汇实际有3种价格。企业出口亏损,可以通过在外汇调剂市场上出售

外汇得到补偿。

这样,外汇的分配、使用和汇价就出现了“双轨制”:一轨是中央外汇体系。它由国家计划部门按指令性计划下拨,有时同项目一起下拨。其汇价按官定汇率。另一轨是留成外汇分配体系。按不同的留成比例,留给创汇单位。其汇价按调剂价格确定。此外,还有外汇“黑市”。

在外汇的分配和使用中,曾经采用过“外汇额度”的办法。“外汇额度”就是外汇使用权。外贸企业在每次出口创汇之后,便可得到一定比例的“外汇额度”。凭“外汇额度”可以向国家购买官价外汇。外汇调剂市场实际上是企业之间买卖“外汇额度”。

双轨汇率比过去单一的官定汇率前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一种过渡办法。它带来了许多弊端,最主要的是造成腐败。谁能拿到官价外汇,谁就可以得到外汇差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种差价在50%—100%之间。谁得到进口许可证,谁就能得到官价外汇。这样,掌握进口计划和进口许可证的人就成了人们的“进攻”目标。在这中间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是很难避免的。一些有权力的或者接近权力的人大发其财。

这个弊端一直到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时才得到解决。在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主持下,取消了外汇留成和“外汇额度”管理,改为结汇、售汇制度。同时将官定汇率5.76和市场汇率8.6,一律改为市场汇率,当时为8.6。企业出口得到的外汇,由银行按8.6结算,付给企业人民币。同时实行在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有条件的兑换。企业需用外汇,凭有效凭证(如进口单据)可以到银行用人民币买到外汇。

从对外开放角度来看,外汇管理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即除了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以外,资本项目下也应当能自由兑换。而没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就不会有外向型企业真正的“放开经营”、“自负盈亏”。没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没有

开放型经济。1994年,国家在非正式场合下曾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由于中国在资本项目下没有实行自由兑换,国际炒家不能进入中国,中国幸免于难。这时很多人认识到,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不能轻易开放资本项目。2000年这个时间表将要推迟。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国在建立开放型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吸引外资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3年就成了除美国以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389.6亿美元。1994年又增加到432.13亿美元。资金和技术是同时进来的。这些年,国外大量的先进技术被引进来,提高了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增加了出口。按当年汇率计算,1978年中国出口额仅有97.5亿美元,1994年达到121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算增长了61.05倍,按美元计算增长了11.4倍。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商品占53%,工业制成品占47%。随着对外开放,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上升。1991年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78%,1992年占79.99%,1994年占83.7%。开放前完全依赖进口的彩色电视机、收录机、组合音响等产品也大量出口。过去,中国是技术引进国,现在既引进技术,又出口技术。1991年,中国引进技术35亿美元,出口技术13亿美元。

在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中,按进出口贸易额排列顺序,1978年中国为第32位,1994年跃升到第11位。

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78年底,中国结

存外汇只有 1.67 亿美元,1986 年为 20.7 亿美元,1991 年底为 217 亿美元,1994 年底为 560 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经济开放度。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开放度逐年提高:1978 年为 9.79%,1985 年为 22.9%,1988 年为 28%,1990 年为 29.9%,1994 年为 45.3%。^①

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也相当高。1994 年中国进口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2%,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3%。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出口商品总额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1978 年为 5%,1983 年为 8%,1985 年为 9%,1988 年为 13%,1991 年为 19%,1994 年为 23%。到 1992 年,中国纺织品产量的一半、销售额的一半多靠出口完成。中国丝绸 90% 出口。国际市场景气程度对中国经济景气与否有重大影响。

中国经济对进口也关系重大。进口不仅是调剂余缺,而且是解决中国资源矛盾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进口国,每年进口的化肥占世界化肥贸易量的四分之一。中国进口的农药、农膜、棉花、粮食,在世界同类商品贸易额中也占很大的比重。

中国对外债向来颇多指责,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议论归议论,政策归政策,政府对引进外资的态度始终是 6 个字:积极,合理,有效。到 1994 年底,中国的外债余额 928 亿美元,其中长期贷款 728 亿美元,短期贷款 196 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仅次于巴西(1515 亿美元)、墨西哥(1360 亿美元)的债务大国。不过,按国际通用的一些债务指标(如债务率、偿债率、负债率等)来衡量,以及中国的经济实力、规模、外汇储备而言,中国的外债规模仍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① 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计算。

中国外债余额(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 总计 | 214.83 | 302.05 | 400.03 | 412.99 | 525.45 | 605.61 | 693.21 | 835.73 | 928.06 | 1065.9 | 1162.8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经济对外开放度和依存度大幅度提高以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渐融为一体。国际社会不得不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更加关注世界。任何国家也不能再把中国排除在外,而中国再也不能关上国门了。

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问题。人们是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

除了前面说的在出口方面对内争夺出口货源,对外竞相压价以外,在引进中的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是盲目引进。我们在采访中常常看到,花大量外汇进口的设备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只能发挥部分作用。干部们对进口小轿车十分积极,大量外国汽车涌入国内,中国成了万国汽车展览馆。开放以来,中国平均每年要花 20 多亿美元进口轿车。按 80 年代末期的价格,如果拿出进口轿车所花外汇的四分之三,3 年时间就可以建一座年产 30 万辆的现代化轿车厂了。

在办“三资企业”方面也有深刻的教训。由于国家对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境外独资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不加选择地吸引外资来当地办厂,其中上当受骗的很多,新华社记者调查中发现有以下几种受骗的情况:

一是进口原材料、设备报高价,出口产品压低价格,造成合资企业亏损,而外商却能从中渔利发财。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外商包销产品的合资企业。

二是借办合资企业之名,行倒卖设备之实。外商投资,常常要求由他负责进口设备。而他进口的设备,有的是他自己卖不出去的,有的是低价从国外买进而高价卖给合资企业。

三是买权利不投资,等待时机赚大钱。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房地产业。外商利用各地建开发区的机会,以办合资企业的名义要一块地皮。然后“圈而不开”,等待地价升值后大发其财。

四是签了合同不投资、少投资,或设法在境内贷款,或资金不到先开业,迫使中方贷款经营。有了利润他按合同分成,亏损了他不承担风险。

五是名为外资,实为内资。有的国内企业先把自己的资金划给外方企业,再让外方企业拿这笔资金进来“合资”,使内资也享受到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还有很多不正当的甚至欺骗手法。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情况有些好转。在这些挫折中,人们也逐渐聪明起来了,认识也不断深化了。在引进外资的结构和投向上,也比过去有所改进,再不像80年代那样饥不择食了。

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今世界,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是从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出发,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二是从本国的外汇平衡出发,不能逆差过多。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有种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矛盾和斗争将是长期存在的,但是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少。1947年10月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中国是23个缔约国之一。到1995年,这个《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了。

中国若要回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也面临着上述种种矛盾。但在总的趋势上,中国是要敞开贸易大门,即降低关税、逐步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很弱。不管从民族工业的发展上,还是从外汇平衡上,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进入90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有很大的差距。

1992年,中国平均关税为42.5%,1993年降为39.3%,1994年又降为35.9%。中国还准备继续降低关税。世界的情况怎么样呢?1947年,刚成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全世界的平均关税为40%,到1994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已降低到13%,发达国家平均为5%或更低一些。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再降三分之一,则发达国家关税率平均为3.5%以下,发展中国家平均在8%到10%。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大阪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在1996年将进口关税降低30%,同时取消现实中存在的大量优惠性的减免税措施。中国的名义关税高,而实际关税很低。各种各样的减免太多了,而这些减免很不规范。1992年中国的关税212.75亿元人民币,当年的进口额合4443.3亿元人民币,平均进口关税只有4.79%;1993年中国关税256.47亿元,当年进口5985.7亿元,平均关税为4.28%;1994年中国关税为330亿元,进口额为9996.9亿元,平均关税为3.30%(《中国统计年鉴》1995)。如果减去进口商品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三来一补”的免税,则1994年的税率为4.7%,如果再减去进口商品中大约有20%的外商直接投资,则1994年的实际进口关税率为6.6%。

近年来,中国正在努力减少非关税壁垒。到1994年底,1000多种非关税壁垒指标降到200多种,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例如,1994年底的53种产品的进口许可证,到1996年将取消其中的48种。

中国在经济活动中,对外不公开的“红头文件”很多,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中国的法律还不太完善,各地区之间也不统一,等等。这些都影响了经济的开放程度,都需要尽快解决。特别是在贸易规则方面,要尽快地和国际接轨,而在贸易管理方面,则要进一步弱化行政干预,强化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的管理。

第四节 文化层次上的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要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的同时,学习和掌握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经验,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了关于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关于管理方式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对外开放,本书将在后面作系统全面的介绍。这里先讲文化层次上的对外开放。

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回应

随着大门的敞开,洋货大量输入,先进技术源源而来,国际规范不断进入旧体制,各种信息大量涌进,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加速传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来说,真有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又受到几十年共产主义的强化灌输的中国,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势如潮水般的急剧冲击,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回应。

最初的回应是矫枉过正。人们过分崇尚西方,盲目接受西方。在青年人中间,从服装到发型,从言谈到行为,从偶像崇拜到生活方式,统统以模仿西方为时髦。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宣传和灌输的一种反抗。

人们对过去称为“水深火热”、“地狱”和“罪恶”的西方世界十分向往。出国是人们最强烈的追求。在开放的头几年对出国还有种种限制。1984年底,国家放宽了自费留学的政策,出国潮便势不可挡。从1978年到1991年间,公派出国留学生6万多人,自费留学生总数却达14万人。此外,据公安部门数字,批准因私出国的中国公民人数:1986年7.76万人,1987年10.73万人,1988年21.22万人,1989年23.83万人,1990年27.9万人,1991年37.74万人。从1986年到1991年,平均每年增加37.2%。在闭关自守的年代,出国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轮到普通人了。

工商界为迎合人们崇尚西方的心理,一大批中国企业挂起了“哈勃特”、“英斯泰克”、“来博瑞”等莫名其妙的洋招牌;一些国产的商品也用上了“美尼斯”、“奥尼”、“兰波万”等洋名。以迎合顾客的崇洋心理。

崇洋之风过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多少年来,求同,从众,害怕与众不同,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性格特点。服装、发式、行为、言论,都以“随大流”而心安理得。二三十年来,不管男女老少都穿蓝色或青色制服,男人一律短发,女人没有烫头。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中间出现了一股“求异”新潮。一些留长发的男青年被人们斥责为“颓废派”、“不男不女”;工厂领导不让青年们穿“喇叭裤”,甚至让人拿着剪刀站在工厂大门前,专剪青年人的裤腿。青年人的这种表现个性和求异的思维,随着对外开放的日渐扩大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宽松而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即使是很保守的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在性、婚姻、家庭方面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性封闭、性神秘一直主宰着中国,谈论性问题被认为是下流不堪的事。80年代初,一部描写妓女悲惨生活的日本电影《望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电影里有两个裸体镜头,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一些家长和教师给报纸写批评信,指责这部电影“毒害青少年”。

后来还是邓小平肯定了这部电影的积极意义,才平息了风波。在这以后,这类电影大量涌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有性爱描述的著作也大量涌入。有些中国作家,如宁夏的张贤亮,也大步闯入描写性爱的“禁区”。过去,中国人是很少离婚的,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不仅男女双方丢人,对双方家庭来说也很不光彩。这种观念维系着大量不幸福的家庭。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了,离婚率逐年上升。1986年,中国的离婚率为1‰;1990年为5.9‰;1994年上升到7.1‰。这是总的平均数,居住着70%以上人口的农村,离婚率低于城市。1993年,北京市离婚和结婚之比超过了20%。过去离婚都是大吵大闹、互相攻讦,以对簿公堂而分手。现在“好说好散”的协议离婚逐渐增多。北京市进入90年代以后,协议离婚的占离婚总数的40%以上。随着性观念的开放,性混乱、性放纵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婚外性行为的妇女占被调查人数的16%。“情人现象”比较普遍。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开放,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与过去所说不同的外部世界,旧的思想观点、政治理论甚至政治信仰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有的已开始或已经动摇。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等等。

怎样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标准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一定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

大门打开以后，出国的人多了，成千上万的人到西方去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成千上万的驻外商务人员、访问学者，亲身体会了资本主义。这时他们才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个样子。在现实面前，人们沉思着。他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

邓小平就能较早地、实事求是地面对资本主义。他第三次出山以后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就以反传统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在这以后，他又多次讲过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批评一些思想僵化的人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既然邓小平都这样说，其他人就更大胆地正视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了。

首先，人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垂死”。他们有比我们更高的生产率，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人民有比我们富裕得多的生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一个社会还有足够的发展生产力的潜力时，它是不会灭亡的。那里并未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输出革命”，鼓动那里的工人“造反”。我们还得老老实实地向资本主义学习。

接着，就有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新的研究，主要是：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垂死”，为什么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我所熟悉的学者童大林、吴明瑜和我的学长刘吉，对上述问题有较深的研究。他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合写了《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篇出国考察报告，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篇不到6万字的考察报告中，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功能问题”、“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劳动结构问题”、“跨国公司和资本

输出问题”等分别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和过去有很多不同的结论。

他们用大量的资料说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第一,这些国家出现了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1979年,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意大利24.7%,法国13.5%,联邦德国12%,日本11.1%。第二,企业股份化。股票高度分散。西门子公司中西门子家族只占4%的股份;杜邦公司中杜邦家族的股权已经无足轻重;英国近年推行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时规定,任何个人或集团,购买非国有化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5.5%。一大批非股东的专家担任了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要职,企业大权掌握在职业专家手中。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了。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虽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多年来,由于向群众灌输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所以一旦开放之后人们就被资本主义的光明面所吸引,结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随着开放的深入,人们才慢慢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弊端,开始客观地认识西方世界,客观地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放之初,羡慕美国的人很多,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很多。到9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种种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相当多一些原来崇拜美国的青年人也对美国的很多做法持批评态度。

新时代的“西化”之争

刚刚对外开放时,有不少的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有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只要我们敞开国门,就会学到现代化。我亲耳听到的、最典型的看法是林乎加的。1978年,他从上海市委副书记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后,狠抓出口,希望天津能创汇50亿美元(当时只有几亿美元)。在一次局级干部会上他说:

“只要有外汇,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的现代化买来。我们可以买来西方先进设备,使我们工业现代化。我们电子工业落后,可以请来西方电子学教授,买来外国电子学教材,我们就能迎头赶上。”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面对开放过程中的现实教训,即不仅要看到西方国家的长处,也要看到它的问题。于是,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就重新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这样,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

“西化”,就是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追赶西方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在国家政治制度(属于精神文明的一个内容)方面也学习西方。也就是说,不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实行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制度。“西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直在发生的现实。《共产党宣言》就揭示了这一现象:“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反对西化,就是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是清朝末年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就是只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而在政治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但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已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持“西化”观点的人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

在制度层次和文化层面上也要学习西方。“西化”和反对西化两种看法各执一端的争论,到20世纪20年代演化为“中西互补”论。实际上,那时“中西互补论”的骨子里还是“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用“孔化”代替“欧化”。到20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10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其本意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了冲击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力量,这个时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当时的“全盘西化”只是表示一种“西化”的决心和冲击力,是矫枉过正的意思。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全是好的,中国的传统也不全是坏的,想“全盘”也“全盘”不了。这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曾经说过“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觉得不够科学,自己又改为“充分西化”。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后来也没有坚持这个提法。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用“现代化”代替“西化”和“中国化”的概念。冯友兰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①为什么“近代的”、“现代的”就优越呢?因为它进化的时间长,对人类优秀成果积累得最多,对过去的弊端淘汰得最多。

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争论过程中,“西化”论中有忽视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口号,特别是作为反对民主、维护专政的手段。著名哲学家艾思奇1939年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一个特殊传统……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的一般规律,认为中

^① 《新事论》。

国的社会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①

在“西化”和“孔化”激烈争论的同时，“孔化”和“西化”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孔化”分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西化”分为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到20世纪中期，苏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种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打倒了，另一种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由于近百年来在中国人感情上没有留下好印象，被推上了对立面。在苏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批判“清官”，提倡“厚今薄古”（即厚苏式西化之今，薄中国文化之古），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了，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等等。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全盘西化”。这说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方励之又重复前人的口号：“全盘西化”。这种不科学的口号显然站不住脚，其基本含义是：既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又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

20世纪末空前规模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得到了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机会，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思想资料。而与此同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为学习西方提供了广大的实践空间。所以，这期间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程度，远远胜过了一个世纪。

中国的现代化，无疑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要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是，现代化要在中国成功，一切外来的东西都必须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进行生命基因的对接，才能生长发育。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成功经验都使中国

^①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

得益,而所有的失败教训却教中国人更加聪明。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开放,不再是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了。

第五节 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

邓小平生平还有一个宏愿:实现国家的统一。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邓小平时代正值香港新界 99 年租期届满。他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完成香港主权回归的重任。解决台湾问题还没有合适的历史契机,但他不遗余力地做了不少工作,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香港主权回归是邓小平的得意之笔。他洗刷了百年耻辱,为中华民族挽回了尊严。他还为两个不同的制度的对接,设计了一个方案——“一国两制”。他希望这个方案也适合台湾。

“铁女人”碰上了“钢铁公司”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 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于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1856 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 年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 年,英国政府乘列强瓜分中国之际,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 200 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 99 年,1997 年 6 月 30 日期满。这就是所谓“三个条约”。中国近代史一直把这三个条约作为丧权辱国的标志。

99 年的租期,如果租期届满没有谈判收回,根据国际法上的

所谓“默认”，它就成了别国领土了。99年以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小的渔村，现在会变成世界上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因此，有国际法知识的人都特别关注99年这个期限。香港的客观情势使香港回归问题比较复杂。既要收回主权，又要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对这个难题，邓小平胸有成竹。

邓小平面对的是号称“铁女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一名外交老手。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来到了秋高气爽是北京。临行前，她宣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她是在英国和阿根廷在争夺福克兰群岛时打了胜仗之后来北京的。她带着胜利的余威而来，想继续坚持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这暗示英国为了保持它的殖民地不惜一战。但是，她也知道，香港不是福克兰群岛，中国不是阿根廷。她带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一大批智囊策士和一个庞大的记者团。她想在谈判桌上和舆论上形成压倒优势。

9月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穿一条蓝底红点丝织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佩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她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和迎候在那里的邓颖超交谈片刻，就前往邻近的福建厅和邓小平会谈。

撒切尔夫人从新疆厅走向福建厅时，走了一半路程还不见邓小平的踪影，福建厅也大门紧闭，与刚才邓颖超在门外伫立恭候的情况大不相同。当她迷惑不解地走到距大门20步左右时，大门豁然大开，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向前走了五六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问好。

撒切尔夫人一见面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两人落座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

这位铁娘子没有料到，她碰到的却是一位号称“钢铁公司”的人。邓小平非常强硬地回答说：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①

撒切尔夫人看到邓小平态度如此坚定，口气也变得严厉起来：

香港问题的解决决不可能像邓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中国政府领导人是否考虑过，中国政府如果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我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个影响在今天就已经有迹象可寻了。

邓小平针锋相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

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①

邓小平还坚定地告诉撒切尔夫人,在一两年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肯定不能再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撒切尔夫人说:

香港的繁荣对中国现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是有利的。我想贵国政府不希望因为收回香港而影响贵国的建设。”

邓小平回答说:

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

撒切尔夫人说:

香港今天的繁荣证明,我们英国的管理是极为成功的。如果贵国政府允许的话,我们愿意继续提供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也可以在贸易方面采取优惠政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页。

撒切尔夫人委婉地提出了如果让英国继续管理香港,可以考虑中国的主权要求。实际是用治权交换主权。邓小平没等她说完,就直截了当地回答: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

会谈是严肃而紧张的。预定一个半小时已到,但福建大厅还是紧闭着大门。会谈时间延长了 50 分钟。

“铁女人”在“钢铁公司”面前碰了一个硬钉子。她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时脸色凝重。她下台阶时,闪失了一下,跌倒了,马上有人把她扶起来。虽然这是出于意外,也显出她和邓小平见面时受挫之重。然而,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愧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她迅即掩饰她的挫折,突然绽开笑脸,向台阶下的记者点头示意。

邓小平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而在 1997 年如何管理香港的问题上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他明确地指出,1997 年以后,“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他说至少 50 年不变,香港和内地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他这个构想后来推广到作为处理台湾问题的方针。

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特别关注。他还表示,到 1997 年香港回归时,他想到香港去看一看。

关键在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按简单思维,香港主权回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强行收

回香港,中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行事。香港不是一个普通城市。她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香港的面积只有世界总面积的百万分之八,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但进出口贸易额却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6%。1995年,香港进出口贸易额1.7228万亿港元(2200多亿美元),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八位。

香港是国际运输中心。1995年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量达1256万箱,居世界第一。启德机场1995年处理货物达145万吨,居世界第二。抵港航班15.0118万,旅客2740万人次,为世界五大繁忙空港之一。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名列世界前100名的大银行中,有85家在香港营业。香港银行及接受存款机构共有5900亿美元的境外资产,占全球总额的8%。香港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股票市场分别排列世界的第五位、第四位和亚洲第二位。香港还是居世界第三位的银团贷款中心。

香港是国际信息中心。香港的信息事业机构、信息传播系统、信息技术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电话密度高居世界前列,人均国际电讯使用率及拥有传呼机数高居世界榜首。香港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全数码系统电讯网络的城市。

香港是国际旅游中心。1995年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720亿港元。

香港回归后能不能保持繁荣稳定,能不能保持和巩固其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地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接手以前的上海,也是远东的经济中心。而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政策,使上海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在20世纪末期,再不能允许香港成为第二个上海了。这一点邓小平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提出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但是,保证归保

证,香港总有一些人士不相信这种保证。其实,只要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会坚守邓小平的这个诺言。对台湾问题也是如此。只要台湾不向独立方向迈进,可以维持现状,等待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台湾不谋求独立,外国人不插手,北京也不会诉诸武力。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是相关的。只要香港能真正保持资本主义,真正繁荣稳定,台湾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也会影响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处理好香港和台湾问题要有耐心。

1996年9月4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在“21世纪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国时说:

30年后中国将在经济和军事等硬功夫方面强大起来。但要在文化即软功夫方面取得影响则需要更长时间。在一个处于核威慑之下的世界上,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先进的文明的无形力量产生的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的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的,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它的知识和文化……

另一个问题可能是香港问题,再一个则是台湾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们(指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引者注)有机会使之“国际化”。世界之所以对香港和台湾感兴趣,就是因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特别是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扮演了关键角色。香港一直是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进入中国的最佳渠道……

这些不友好人士怎样利用香港和台湾问题呢?(北京的)任何拙劣、高压和横蛮行为,都在香港和台湾引起愤怒和恐惧。事情将由此而变糟,成为他们借助传媒来加以利用的突

破口。在这两块土地上居住的都是中国人。其中香港人口600万,台湾人口2100万。但是,由于多年的分离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中国不能处理好香港和台湾问题,其政治和经济代价将是高昂的。如果中国所作所为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中引起愤怒和恐惧,它们就会被别人所利用。因此,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采取耐心、平心静气的渐进政策是最佳选择。

李光耀先生是最精明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之一,他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中肯的。香港如果地位下降,新加坡可以分享到国际经济中心的利益。他的上述谈话也可以说是真诚地为中国着想的。不过,中国是否有“耐心和平心静气”还需要台湾方面采取理智的态度,也需要美国实践对“上海公报”的承诺。

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就必须坚定地实行“一国两制”。即坚持邓小平说的“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都要保持。”“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更没有必要改变”。这一点,中国的明智之士已有共识。

1997年7月4日,在香港回归、举国欢庆的热潮之中,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先生约我到他办公室,就“一国两制”问题进行了一次冷静而深刻的对话。乌杰先生不仅仅是政府高官,还是著名系统科学专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事后我们整理了一个谈话记录,还给这个谈话记录起了一个题目:《从一国两制到世界大同》,现将这个谈话转录如下:

乌:从7月1日开始,“一国两制”开始启动。邓小平的构想变成了切切实实的实践。这个实践在世界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香港回归是重大事件。“一国两制”意义更为深远。首先,它是对国家学说的发展和深化。是对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认识的升华。

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要砸碎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调和”;“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的国家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矛盾,就不需要国家。所以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国家就会立刻开始消亡”。从这里列举的马列主义经典言论来看,“一国两制”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同意您“一国两制”是对国家学说的突破的说法。

乌:国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学说。在中世纪社会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出现了马基雅弗利为代表的国家主权说。20世纪中叶,由于国家主权成了国际秩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出现了否定国家权威的理论。洛克和卢梭的自由民主思想反映了当时反对君主统治的时代潮流。黑格尔的国家思想反映并加强了争取德国统一的运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是针对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福利国家理论则反映了自由民主社会业已发生的变化。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总结20世纪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学说当然也会有新的发展。“一国两制”是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对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杨:严格说来,“一国两制”过去在中国也有过。就清代而论,它就是一个一国多制的国家。当时中国总体的封建社会,而大小凉山却是奴隶社会。不过,在现代中国,“一国两制”的确是一种伟大的试验,这一试验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香港问题的本身。

乌:香港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区。这个试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原来的试验区是深圳等特区。现在的试验区是香

港。香港这个试验区的内容要深刻得多,意义要深远得多。说这一试验是中国的,因为它的成功,为澳门、为台湾提供了示范。澳门问题不大。关键是台湾。别看台湾现在有人说“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如果10年后,甚至5年后,香港的发展比英国统治时期还要好,这种看法就会改变。如果执行得好,“一国两制”可以成为和平统一中国的道路。说它是世界的,是指它为世界不同制度共存、共融提供了经验。为解决世界上的各种争端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范式。

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首先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尽管当时没有用这个词。可惜台湾当局缺乏发展观念,用静态思维看未来,坚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底用什么“主义”统一中国,香港的这一实践是解决这一争端最好的办法。50年以后,香港和内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大概既不是现在内地的制度,也不是现在香港的制度,而是一种融合二者优点的新制度。香港的这一实践结果,台湾和大陆现在用什么“主义”来统一中国的争端就会消失。

乌:是的。“一国两制”启动以后,我们要看到它运行的结局。无非是三种情况:永远一国两制;一个吃掉一个;这两种结局都不可能。只有第三结局:两种制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制度。五十年后不是香港内地化,也不是内地香港化。内地现在正处在改革时期,现在的制度是过渡的,不是长期不变的。五十年后肯定不是现在的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高科技发展机制差,住房、社会保障问题多,等等。香港的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五十年后,香港制度也不会是现在的制度。在“一国两制”运行期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也向社会主义学习,双方取长补短、互相融合,五十年后形成一种新的、更美好的制度。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实际上,五十年

后更没有必要改变。

杨：看来，“一国两制”不仅是国家学说的发展，也是哲学思想的发展。过去，我们在相当时期内奉行的哲学是反对中庸，反对折中，反对调和。因而处处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要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在冷战时代这种哲学也许是无可非议的。在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非此即彼的哲学大概需要重新审视了。

乌：“一国两制”和传统思维是有冲突的。两点论，一分为二，不能解释“一国两制”。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把地球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为好与坏。这是冷战思维。一极思维是霸权思维，两极思维是冷战思维。这两种思维都是世界不稳定的认识根源。21世纪应当是多极思维，系统思维，整体思维。两极思维，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是解释不了“一国两制”的。董建华先生对“一国两制”说得很精辟：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利，文化上互通，生活方式互相尊重，努力开创一个融洽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局面。这就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

现在中国有三种制度：大陆、香港、台湾。“一国两制”中的“两”是多的意思，多种制度共存，多种制度试验，结果会出现一种融合多种制度的优点的规范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谁也吞并不了谁，只能互相融合。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大趋势的缩影。一国两制不仅适用中国，也是世界进步的方向和潮流。

大陆只要有吃掉香港的想法，香港经济就要衰退。大陆的改革倒退，香港经济就会受影响。“一国两制”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香港可以成为大陆的一种“社会预警器”。大陆一有“左”的政策，香港马上就有反应。这个“预警器”很敏感，很有

效。“万言书”香港反应最强烈。“万言书”多了,就会影响香港经济。“左”的政策一出台,恒生指数就在下跌。所以,香港的存在,不仅是大陆的“预警器”,也是大陆的“限左器”。

杨:我很同意你说的香港这个试验区是世界试验区的看法。多种制度共存、融合的思想,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地球。“一球多制”。地球上现存的多种制度也不是谁吃掉谁,谁战胜谁,而是相互融合。把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美好的制度。

乌:我们可以把这种美好的制度叫做共产主义制度。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中国古老理想“世界大同”。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实际是多种),这些不同的制度是背道而驰还是走向共同的方向?我觉得是走向共同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叫做共产主义。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改革,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改革。中国改革的程度要深刻一些。资本主义在改革,社会主义也在改革。邓小平说当今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实际也是改革的时代。改革就是各种制度相互吸收优点,不是冷战时代的互相排斥。这也是和平发展的特征之一。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规范的、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资本主义改革也是为了消除制度弊端和社会弊端,也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也要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不管改革者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什么叫社会主义?资本社会化,劳动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消费社会化,服务社会化,统称为社会主义。然后就是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的网络化。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希特勒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搞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为世界带来一场灾难。

杨: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对社会主义诸多不同的理解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就是追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过去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些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过去把目标忘记了,把手段放到第一位。真是本末倒置。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对美好制度的追求,那么今天世界各国不分东方和西方,不管现在贴着什么样的标签,都在探索美好的制度。这种美好的制度,当然不是现今存在的某一种制度,而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晶。

乌: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还在完善、还在创新的概念,那就谁也不能当“姓资姓社”的审判官。不能对改革的探索进行“姓资姓社”的指摘。改革就是对合理制度的探索,判断制度是否合理只有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不能再增加别的判断标准。

杨:社会主义的改革也好,资本主义的改革也好,都是对美好制度的探索。孙中山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也有人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病理的诊断从外部挽救了资本主义,凯恩斯的制度创新从内部挽救了资本主义。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改革在凯恩斯之前就开始了。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劳合·乔治和罗斯福的改革,削弱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残酷的方面,从而减少了社会摩擦。这些改革实际就是采用了马克思的诊断,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当年马克思批评的资本主义。

乌:像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还在改变。不断地变动政府行为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政府的关系是在不断地变动的。北欧也在改革。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太多了。政府和市场两极如何处理,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关。有什么样的市场发育程度,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干预程度。在政府、市场之外还有第三极,这就是企业。现在有些人不认识三极结构,只在两极间折腾。

公有化、私有化是两个极端概念。应当集团化。既不是个人所有,也不是国家所有,而是中观的集团所有。国家所有制不是最先进的,国家占多大比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集团化,是指财产的使用权集中在一个一个的集团手中,而所有权分散到更多的社会成员。股份制就是使用权集中、所有权分散的一种形式。也就是所有权社会化的形式。

杨:你说的意思是不是逐步淡化国家功能,强化社会功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社会的功能健全了,国家的功能就要相应削弱。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而我们几十年来却迷信国家,人为地强化国家功能,已经带来许多不良后果。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生活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很快消亡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家要逐渐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改革以来正在实行的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之间的协商、对话,用契约来联结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乌:国家主义当然不是进步思想。但目前还不能没有国家。国家的消亡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国家就会自动消亡。社会功能和国家功能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功能不断

增强的过程。社会制度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1958年那种生产力水平下推行全社会平等分配,只维持半年就跨台了。民主、自由也是这样,也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而定。

第七章

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到核心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主体是城市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个主体的外围开始的。虽然,过去毛泽东一再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家对农业也有严格的控制,但是,无论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还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是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的,对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的触动也不大。到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后,改革的浪潮涌向城市。由于城市经济改革触动了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因而出现了波澜壮阔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第一节 城市经济：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场

还是在195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时说过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坦率地说,不搞上一百年左右,分不清

是成功还是失败。”^①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试验呢？当然是社会主义理想的试验。从世界范围来说，现在这一试验还不到100年。虽然前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也已发生了剧变，但若评论社会主义的成败还为时尚早，所以，回顾一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也许是很有益处的。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1516年，英国人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中指出：“假如私有制存在，假如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当每个人可以假借法律去拼命捞钱，而就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其余的人变成贫困不堪。”莫尔的这种“乌托邦”思想本来是针对当时的基督教欧洲被权力和私利弄得四分五裂的情况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才是根治利己主义的唯一良方。从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深深忧虑。这些忧虑充分反映在那个时期的一些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传世之作中。私有制、经济危机、贫富悬殊、金钱至上，良心和人格都成了商品，这种情况在这些名著中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莫尔的“乌托邦”理想令人向往，当时出了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即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他们不仅提出理论，

^① 转引自吴江：《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向》，明窗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还进行了社会试验。虽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天才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接受了莫尔的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的想法,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②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接受了从莫尔到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739页。

② 同上书,第740页。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①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②

……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86页。

② 同上书，第237—238页。

发展到私有制和资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①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用动人的篇章向青年们灌输“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思想。著名作家李准的成名作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用震撼人心的故事来批判农村的“单干”。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这些正是在农村搞“穷过渡”、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由于在农村的1958年“穷过渡”的失败，2000多万人死于饥饿，才刹住了“一大二公”的狂潮。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仍然没有放弃对这一理想的追求。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各个产业这间，各种产品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关系失调就会出现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38页。

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②

没有全社会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③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④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和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这一思想也深深会灌输到中国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之中。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生活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757页。

② 同上书,中文第2版,第660—6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7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44—345页。

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①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②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③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他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批判。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腐朽的,进入20世纪已经是垂死的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曾有过十分乐观的期望,几次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他们强烈的期望而在欧洲投下足迹。列宁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垂死阶段。但他预言以后70多年了,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反而生命力更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0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04页。

了。

马克思极力回避对未来社会作出预言。但是,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及其理论体系反复阐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用社会所有制(有时又译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计划调节取代市场调节,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也是十分明确和统一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说过一些留有余地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划出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用的,他们曾设想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具体蓝图。在他们晚年对共产主义斗争还持十分冷静的态度。列宁一开始也是企图按照马克思的书本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但他很快在实践面前退却了。毛泽东是一位最敢于独创的人,他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国的体制虽然从苏联那里来,但还是有很多与苏联不同的东西。然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实践面前的一些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仅仅看作实现前面所介绍的那些理想的策略,丝毫也没有改变、减弱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地宣传和灌输。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就是以上述理想为出发点的,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消灭私有制

根据上述理想,全民所有制很自然就成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而集体所有制只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阶梯而已。所以,在农村,先是把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

制,进而想通过人民公社变成全民经济(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在城市,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利用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赎买政策,把私人工商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尽管在这场斗争中,国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在时间上是逐步完成,在方式上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剥夺),但由于长期的思想灌输,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程度越高越好”,“所有制过渡越快越好”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大城市时,已经没收了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最初部分。1949年,在微薄的工业基础上,国营工业的比重为26.2%,集体工业占0.5%,公私合营占1.6%,私营工业占48.7%,个体手工业占23%。^①

建国以后,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同时控制了私营企业。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41.5%,集体工业占3.3%,公私合营占4.0%,私营工业下降到30.6%,个体手工业为20.6%。(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营占34.4%,公私合营占0.4%,个体占60.9%,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4.3%。^②

在这个期间,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以及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实行了“统购统销”,私营企业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当时的私营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是纺织工业,“统购统销”从两头卡住了他

① 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们,使他们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同时在政治上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连子女也感到不光彩。

私营企业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国家一号召公私合营,他们就积极响应。著名企业家李烛尘、荣毅仁又带头大力推动。按原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是要在1967年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的批示,说中央设想提前到1962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这叫毛泽东怎么不高兴!他在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十分得意地说:“公私合营走得那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①对于私营企业家来说,公私合营是唯一的选择,但他们的心理是痛苦的。有的人白天在街上敲锣打鼓,庆祝进入了社会主义,晚上和老婆抱头痛哭。

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0%,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营工业只占0.1%,城乡个体手工业占0.8%。^②

在改革前的1978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80.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2%。二者囊括了所有的工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占90.5%,集体所有制占7.4%,个体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2.0%。^③

对于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09页。

② 1986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第49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按1997年《中国经济年鉴》,则国营工业占的比重为77.6%。

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因为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在向我們走近了。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有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游行中，连老太太也穿上漂亮的衣服组成了秧歌队。在那个时代，沾了私有经济的边，在政治上就要受到歧视，自己也感到很不光彩。青年人家庭出身如果是资本家、企业主，在升学、就业、入团、参军等方面都要受到影响。“一大二公”是最光荣的。在60年代，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我们班一位名叫张自立的同學朗诵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当他用激扬的声调念到“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这句时，全场掌声雷动。

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基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企业生产什么品种和生产多少数量，完全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来确定。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由国家计划调拨，其价格由国家决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营商业部门或物资部门收购调拨，企业的名义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交，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钱，以及生产流动资金，都由财政调拨。流动资金中，季节性、临时性的超定额部分，由国家银行贷款。企业的职工人数由国家定编，工人由国家劳动部门分配。企业领导人由国家任命。整个国家仿佛是一座大工厂，企业则是一个生产车间。很多企业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与所在地方没有关系。1953年，中央直属企业2800个，而1957年增加到9300个。^①

计划经济一开始就遇到了技术上的难题。工业产品成千上万，国家计委不可能全管起来。改革前，国家计委直接管的产品有

^① 周太和、詹武等：《建国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几百种,按产值计算约占总产值的半数以上,^①各部管的产品也有数千种。就是由国家计委直接管的几百个产品也只能管品种,其规格、花色都没法管。例如,钢材这个产品,据1982年资料,全国共有15大类、300多个品种、1700多个组距(指钢材的尺寸)、2万多种规格。国家计委和冶金部只能管到品种这个层次,再具体就无法管下去了。国家管不了,又不让地方和企业自主经营,所以生产和需求脱节的情况十分严重。妇女们买不到头发卡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要由国家计划调拨。1953年,计划分配物资227种,其中统配物资112种,部管物资115种,以后逐年增加,到1957年,计划分配物资增加到532种,其中统配物资231种。1958年,实行权力下放,统配部管物资有所减少,但到1978年,统配、部管物资还有689种。^②这些物资的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无权支配。由于物资管理的高度集中统一,国营物资部门和国营商业管不过来,又不允许私人贩运,许多山货土产运不出来,只能白白地烂在山上。山区、牧区有很多种土特产的产量比1949年减少了70%—80%。^③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一五计划”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理想。“一五计划”的头三年并没有具体的计划。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计划”头三年的依据。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因

①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147页。

② 钟朋荣:《十年经济改革》,河南人民出版社,第9—10页。

③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48页。

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不得不在 1955 年 7 月进行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正式的“一五计划”是在时间过了一半以后才拿出来的。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例如 1956 年比例失调,1957 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期间出现了“以钢为纲”和“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 1961 年比 1957 年下降了 26.4%,被迫进行了 5 年调整(1961—1965 年)。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实际是以国防、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元投进了大山沟,其损失和浪费是极为惨重的。1970 年又出现了冒进,又一次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年)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上下折腾。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 3500—4000 万吨,唯一的根据是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讲过的 15 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四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 51 种主要经济指标有 25 种没有完成,计划力保的 30 种重工业产品有 18 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年)又出现了“洋跃进”。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经济调整。1980 年 12 月,又决定实行进一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经济调整。每一次冒进是一次资源大浪费,每一次调整是一次生产力大破坏。广大群众节衣缩食,而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则付之东流。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间,用于基建投资 6000 亿元,其中 1/3 因投资失误而浪费了,有 1/3 没有达到设计能力。

上面所说的这种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主要是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退让。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改变过分集中的体制,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但由于不承认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只是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系统上进行权力分配,这样就一直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在商品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实践上的困难迫使斯大林倒退了一步:承认在社会主义时期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斯大林只承认它在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而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只是经济核算的工具,不是调节经济的杠杆。毛泽东虽然也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但他只停留在斯大林所划定的界限之内。在1978年以前,中国虽然也进行过多次体制上的调整,但总是在“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这个限度之内进行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

尽管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很多困难,但人们对它还抱着很大的期望。因为这是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着的。多少年来,人们都在努力改进计划工作。他们天真地相信,有一天如果用电子计算机来管理计划工作,各种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原来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是指劳动者只得到实物形态的消费资料,劳动者只能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决策,而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决策,都在著名的“六项扣除”中,由政府去统一考虑了^①。所以,按劳分配是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由于计划经济在技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按劳分配

^① 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03页。

也就不可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又由于商品和货币关系还存在，按劳分配也不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凭一张证明他付出多少劳动量的证书，领取相当于这分劳动量的消费资料。按劳分配最方便的形式还是货币工资制。国家把每个职工在一个月内提供的劳动所应得的劳动报酬，归结为一定的工资；职工拿到工资后，再到商店去换取相应的消费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继续实行供给制。对从国民党政府和外资手中接收过来的企业，职工报酬基本维持原状。后来实行工资改革，对生产工人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虽然强调“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在执行中，除了计件工资以外，很难做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虽然天天喊“按劳分配”，可是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按劳分配”。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厂调查，在生产第一线，80%的工人都是二级工，不管劳动好坏，工资都是41.5元。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全国各地、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在50年代后期，中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如列宁说的“就产品‘按劳分配’这一点来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①），开始否定按劳分配。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批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说这是对“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的一种侮辱”，批评“等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说这是“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极力赞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说“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交《人民日报》发表。^②“文化大革命”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喊得更响，按劳分配基本上被“政治挂帅”所代替。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② 见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无疑,这种“左”的思想对按劳分配是一种冲击。但实事求是地说,按劳分配其所以在中国没有真正地实行,其原因还在这种制度的本身。马克思等人的本意,按劳分配是在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正如本书前面介绍的,实践中还不能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在分配中还得借助价值转换过程。价值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影响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是不规范的,是人们难以把握的。它会使“劳”和“酬”之间的关系扭曲、模糊。此外,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在某一个企业中劳动。他和社会的联系是通过企业来实现的。他的“劳”实现得好坏,决定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所以,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企业的经营条件不同,企业的经营水平不同,劳动者付出同等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会有很大的差别——等量劳动不可能得到等量报酬。^①

在实际操作中,按劳分配在技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什么是“劳”?现代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有第一线的直接劳动,有第二线的间接劳动,有生产劳动,有经营劳动……这些劳动的性质、内容、功能、效果差别很大,相互之间很难比较,更难用一个“劳”字来界定它。第二,怎样计量“劳”?除了计件的手工操作以外,在生产中很难公平计量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简单劳动如此,复杂劳动更无法量化到个人了。复杂劳动成果转化为简单劳动成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想用简单的“倍加”(马克思语)作为按劳分配的方法,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按劳分配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在实践中就很自然地很不合理、很不公平。职工的工资由国家直接掌握,每隔几年调整一次。在6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内,工资基本没有调整。到70年代后期,开始每隔几年调整一次,但每一次调整,只给以一定的比例。

^① 杨继绳:《按劳分配:难道是皇帝的新衣?》,载1993年1月22日《南方周末》。

因而把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化为工人之间的互相争夺。1980年我对当时的工资调整进行了一次调查,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调工资的情况,现将它抄录如下:

天津市在调整工资中出现多起恶性事件

应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工资制度

从年初到七月底,天津市在评定工资过程中,发生了服毒、投河、跳楼、自焚等自杀事件21起(死亡3人),行凶杀人未遂事件9起,绝食5起,出走4起,还发生了多次打人事件。

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27岁的二级工黄德江,由于没有评上工资,往自己身上倒柴油,自焚身死。库工石敏(21岁)、王岚(20岁)在调资中喝了敌敌畏,经抢救,王岚脱险,石敏死亡。二轻局锅炉修造厂女工孔庆延,评资时第二榜无名,她找领导反映评分不合理。后来她听说第三榜又没有她,就喝了一瓶敌敌畏。经抢救脱险后,她说:“评不上还得死。”在一些单位还发现有人身带匕首,准备和人拼命。

天津市在这次调整工资中矛盾十分尖锐。有人用影片的名字描述评工资的几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是《沉默的人》,谁也不表态;发榜前是《激战前夜》,都在想办法如何压倒竞争对手;从头榜到三榜之间是《生死搏斗》,打架、斗殴、凶杀事件多是在这时发生的。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工人殴打,不得不逃到外地去避难。

一些负责调资工作的干部说:“其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调资政策有问题,工资制度本身不合理。”

天津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反映,这次调资工作有很多不

妥之处。首先,这次调资和1977年的调资在政策上缺乏必要的连续性。上次基本是按工作年限,解决低工资问题。但是,由于升级比例的限制,当时有一些年限长、工资低的人没有升级。由于这次不考虑工作年限,这批人还有可能升不了级。他们的抵触情绪最大。同时,这次规定的三条原则(贡献大小,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在具体执行上很难掌握。特别是一些集体操作的工种(如炼钢、轧钢等)和科室干部,要分清谁的贡献大小是很困难的。因此,有些单位不得不在没有差别中找差别,在没有矛盾中找矛盾,人为地制造了很多不团结因素。

很多同志认为,这种每隔几年提高一部分人的工资的作法有很多弊病。确定升级的比例不是根据实际上有多少人需要升级来确定,而是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来确定。国家能拿出多少钱,就让多少人升级。这样确定的比例(如这次的百分之四十)和实际需要升级的人数相差悬殊。

在我国目前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工资本来是劳动者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他付出了多少劳动,国家给他多少工资。调整工资应该是调整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现在评工资却变成了劳动者之间相互争夺的关系。把国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劳动者之间去了。这是很不合理的,也是有害的。

很多同志认为,要改变这种调整工资的办法,真正把工资作为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杠杆,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按劳分配原则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试验,是不成功的。在改革以前,分配一直是平均主义。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懒汉。这是中国的经济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理论战：“市场经济论”获胜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品。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低效率的。它不仅使中国人贫穷，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不论是在改革之初，还是在改革已经全面开展以后的很多年，都是不明确的。人们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改革缺乏理论准备。

其实，中国原有经济体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的本质特点是，不是用经济活动自身的运行规律去组织经济，而是用行政权力去组织经济，把国民经济变成一架大机器，仅靠掌握权力的少数人去操纵它、指挥它。

这种运行机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但是，一旦真正剥夺了个人利益和动机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社会弊端：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幸运的是，中国仍然能够放手大胆进行改革的实践。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先跳到河里去，在实践中去探索。“草鞋没样，越打越像”。随着实践的深入，新体制的模样也就慢慢地清晰起来了。

把“异教徒”请入社会主义的圣殿

对中国原有经济体制的诊断，对改革目标的设计，首先必须明

确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商品经济。

根据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备，最终还是要消灭它。这一传统理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碰到的“拦路虎”。

虽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否定商品经济，但也是一种暂时（也许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利用而已。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否定更加强烈，以致把商品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异物，或者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改革一开始，中国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就在社会主义的殿堂里为这个“异教徒”寻找合法的地位，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为这种探索开拓了空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框，根据现实状况进行探索。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解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就是不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约束；实事求是，就是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怎么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怎么有利于增强国力，就怎么干。可见，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有些人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深入一段时间以后才提出来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要为商品经济寻找合法的地位，首先要为商品经济的灵魂——价值规律寻找恰当的位置。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

1979年4月，近400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近半个月的

大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约束。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起调节作用。

1958年，毛泽东讲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人们把毛泽东的这句话理解为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来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做好计划工作。但当时的经济学家还是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价值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①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60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

^① 关梦觉：《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载《经济研究》1959年第2期。

方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②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根本不存在“有计划”的规律,而所谓“有计划”的规律,阻碍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③。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指出国民经济各大部类、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也认为,所谓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

直到1978年,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仍

① 《红旗》杂志1970年第2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② 见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来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己一人的名字。

③ 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载《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5期。

然有影响,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单位,仍然会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倾向,甚至出现自由生产自由种植的现象,这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①不过,这时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因违犯价值规律已经受到了严厉惩罚。

至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的界限,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规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起经济核算作用的界限,认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也起调节作用。在无锡市的那次大规模讨论会上,尽管还有不同看法,但有相当多的经济学者同意上述两个突破。而在广大干部中的突破则是在以后的改革实践中实现的。广州市放开鱼价的成功实践,对价值规律调节经济的作用,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广东人爱吃鱼。但是,在改革之前,鱼米之乡却吃不上鱼。每年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或是节日,广州水产总公司派人到四面八方去找鱼。1979年,广州市放开了鱼的价格。一下子涨到四五元一斤。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10来斤鱼。消息传到内地,一时舆论大哗,认为广东人胡来。但是鱼价一涨,养鱼的人多起来了,鱼的供应量大幅度增加。仅一两年后,鱼价就跌下来了。广州人吃上了廉价的活鱼。这时人们才看到价值规律的威力。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其影响却是很大的。很多人在讲价值规律时,都引用这个例子。

“商品经济”怎样写进共产党的文件?

在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中,商品经济一直是不能登上社

^① 刘炽光、龚益鸣:《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制度问题的讨论》,载《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会主义大雅之堂的。不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在少数经济学家中提出过商品经济的问题。李炳炎(李早)著文说,广东的经济学家卓炯在1962年就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厦门大学胡培兆先生给本书作者来信说,王学文、漆琪二人195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就提出了“有计划发展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学界没有专利,一个新思想谁先提出很难确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学者就多了起来。如胡培兆1979年4月,在无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就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应当按照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来改革经济体制;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多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必须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里进行。邓小平持前一种看法;陈云持后一种看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争论。当然,这种争论不再是中国有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点早就解决了。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这种意见当时在政治上占据有利地位,因为这和过去的教科书是一致的。既然是计划经济,那么经济体制也应当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因为只有产品经济才和商品经济是相对应的概念;而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1979年,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第11期上发表文章,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1980年9月8日,成立不久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起

草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个文件一开头就写道：“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据参加起草的杨启先教授对我说，这段话是薛暮桥加上去的。这段话明确地把商品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尽管在前面加了两个定语。

然而，1981年12月风云突变。22日，陈云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强调“按计划办事”。1982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陈云在中南海办公室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等人的谈话。陈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①在这期间，陈云还批评薛暮桥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时，高层内部把经济学家们分为4类：坚持马列主义传统理论的作为第一类，主张商品经济的列入第四类。“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原来持“商品经济论”观点的人感到有压力。1982年就不再提商品经济了。

1982年5月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一个大型讨论会，讨论经济改革的理论问题。研讨会共分8个组，有200多人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主调就是肯定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一些学者指

① 在1986年出版的《陈云文选》中，在《人民日报》这个公开报道的基础上，删去了“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两句话。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78页和1982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出,商品经济是现实生活在理论上的概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没有本质差别。^①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说就存在着商品经济。因此,在1982年9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出:“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

在1982年和1983年,报纸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提出批评的文章不少。“我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有计划’被抽象了,计划经济既然不复存在,‘有计划’又是从何而来呢?”^②“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③“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事实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也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了。”^④这样一来,1982年原来主张商品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不得不让步了:“社会主义还广泛存在着商品生产、商

① 《经济学动态》1982年第8期,第8页。

② 李震中:《也谈计划与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③ 有林:《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红旗》杂志1982年第20期。

④ 陶大镛:《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1982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品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商品经济也是可以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① 1983年,《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第一版发表长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经济学家刘国光。因为刘国光发表了强调指导性计划的文章。刘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送给《人民日报》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后发表,这就和十二大的精神相抵触。胡乔木一方面让刘国光作检查,一方面让有林在《人民日报》上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有林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即原先的《红旗》杂志)的主编。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83年,保卫指令性计划的力量相当强大。1979年写文章主张“商品经济”的邓力群也站在批评商品经济的行列。

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反精神污染。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有人把“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承认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对前两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结论。参加起草这个决定的杨启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过程。

这个起草班子的成员是从起草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留下的,有袁木、高尚全、桂世镛、王忍之、谢明干、杨启先等。开始是

① 薛暮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1982年6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

由袁木负责,先写提纲。提纲讨论了多次,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这时其中一些人认为要跳出这个圈子,就必须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所突破,即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起草小组内的看法不一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组对提纲讨论了两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他再三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他还说经济问题要听赵紫阳的意见,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润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润青。从北戴河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分别上山主持过讨论。谈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赵紫阳说,我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期间,曾有不少人向赵紫阳提出过建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弼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一件事。八月间,董辅弼、童大林、于光远等10多位经济学家在百万庄开了一个会,坚决主张写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们向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陈述了理由。可见,赵紫阳初步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听取了多方面意见的。赵紫阳又召集起草小组在中南海讨论了两次。在最后一次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请来了邓力群。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赵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退场了,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

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建议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概括为以下4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赵紫阳的这封信很快得到了4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邓小平认为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封信的4点内容也全都写进了这个决定之中。

事后,邓小平说:“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好,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但是,这个决定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它为两种看法留下了活动空间。坚持计划经济看法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坚持商品经济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来说,两方面的人都可以各执一端:有的强调“有计划”,有的强调“商品经济”。这个决定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从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公布以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了城市。从计划管理来说，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市场调节的部分也相应扩大了。但是，如何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世界难题。难就难在，在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能不能采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就中国来说，虽然承认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又明确指出，还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

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为此进行了终生研究，写了《第三条道路》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但是，我仔细研读了这两本书，也没看懂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东欧和前苏联都没有从这第三条道路上走过来，也没有找到计划和市场之间有机结合的办法。

中国也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分量，减少计划调节的分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这是当时人们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都承认过去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太大了。在这种加大市场调节的趋向中，还没有达到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之前，不会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意见。

到80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计划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

本特征。这样,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从而发起“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1992年以前,计划经济这个大前提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提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他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

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

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

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他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我在《经济参考报》担任理论部主任。这是一家经邓小平和陈云批准创办的权威性报纸。当时有人建议在理论版开展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讨论。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我的考虑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如何结合,得看大前提: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考虑二者结合,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虑二者结合。那时这个大前提还没有确定,是无法讨论清楚的。后来《经济日报》开展了这一讨论,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花了很多篇幅,发了大量的文章,而认识上却没有任何进展。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1986年6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

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党的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①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践和结合实际的理论探讨,改变了人们对计划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随着改革的深入,上述看法有了重大改变:计划不一定都是指令性的,也可以有指导性计划,而且将来主要是指导性计划;计划主要管宏观参数,除了极个别的重要产品以外,计划不必管微观领域;计划的实施不一定都采用计划指标(特别是实物指标)体系,而应当更多地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参数来调节经济活动。

对计划的认识的这种改变具有重大意义。它在不改变“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个传统看法的前提下,把“计划经济”的具体内容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条经验:先不改

^① 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见1986年1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

变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传统提法,而是改变它的内容。其内容一步一步地从量变到质变,已经成为既成现实之后,再推翻传统提法。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中赵紫阳下台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息。到1989年至1991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①

在这个期间,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不仅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还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吴敬琏在1990年、1991年两年内发表了多篇文章,大力宣扬市场经济。在这期间由于有林大力主张计划经济,吴敬琏大力主张市场经济,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新大力主张承包制,所以,出现了“有计划,吴市场,杨承包”的说法。这个说法的另一个意思是,批评当时政府和管理经济中的现状:有计划,无市场,扬承包。即,只有计划手段,没有市场手段,大力提倡承包制。

我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中国改革过程中理论争鸣的不同看法,绝对没有褒此贬彼之意。在任何社会改革中,每一种看法都代表

^① 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载《经济纵横》1989年第12期。

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正是在这种种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前进的，而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结果都留下了各种力量作用的印记。对每一种看法的是与非，当代人的评价不一定正确，应当由历史来作结论。对人物和观点的评价必须有历史眼光，我在本书中力求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写这本书时有可能难以超越自己。不过，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读者，我是激进改革中的稳健派。我给出了这个坐标系，读者就可以用这个坐标来修正本书中的偏颇之处了。

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市场经济

1991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上海度过的。3月下旬，《解放日报》发表了三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其中，透露了邓小平春节期间在上海的一些谈话内容。“皇甫平”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中写道：“有人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还说：“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在《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一文中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9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愿意看报纸，但是，只要报纸上真有新的内容，很快就不径而走。很多人反过来纷纷找报纸，将报纸复印下来互相传阅。“皇甫平”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北京的关注。人们不仅到处谈论“皇甫平”的文章，而且到处打听文章的背景。现在查阅1993年9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只有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那一段话，却没有后面两段话。也许是在编文选时删除了。但在当时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们确信邓小平讲

过这些话。他们显得非常活跃。而持另一种看法的人们则抓住不能“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这句话进行批判。这些批判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进行的。

批判归批判,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坚持搞市场经济的人们,相信他们的看法总有一天会被采纳,正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采用他们关于商品经济的看法一样。

1992年1月到2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而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事实上,邓小平早就有这些想法了。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发表了一篇10多年没有公开的谈话。这篇谈话于1994年编

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才公布于世。这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6年我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讨论这一个问题：这段话是不是说明邓小平在1979年就对改革的目标模式很明确了？吴敬琏认为，这段话不能说明邓小平那时就有明确的目标模式。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在1979年那个时候，他不一定知道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但是，吴敬琏的老师、老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邓小平和吉布尼的谈话是自觉的，10多年没有公布的原因是他不愿把自己的看法强制干部们勉强接受，而是耐心引导广大干部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

在1979年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的政界和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简直是异端邪说，而邓小平却向外国人说出来了。不过，他没有向国内公开。在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也没有收入这篇谈话，大概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吧。从这一谈话中我们可以窥测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了。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说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是江泽民的首创。他把这个提法先向邓小平汇报过，邓说先听一听有没有不同意见。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果，没有反对意见。在向邓小平汇报这一情况之后，邓也很高兴。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就被全党接受，也成了江泽民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旗帜。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

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这个几代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

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1年的酝酿，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理论的认识，是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明确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工作要重视价值规律。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以计划调节为主的体制。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提法中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经济”，更强调了计划经济体制。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采用了陈云的建议，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吸收市场调节为辅助手段。

1984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还是第一次把“商品经济”写进党的决议。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

1992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

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20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人的眼光总是有限度的。当初,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在那种背景下也是顺理成章的。将来的历史怎样来评判今天这次选择呢?会不会像20世纪末批评20世纪50年代一样,来批判这一次选择?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4个字,不管当时的初衷如何,若干年后也许被认为是历史的明智。

第三节 私有经济的回归

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同时并进的是所有制的改革。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是一个不断提高公有经济比重、减小私有经济比重的过程的话,那么,改革期间所进行的,是一个恰恰相反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因为消灭私有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又是共产党人的行动目标。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对共产党人理想之光的冒犯。

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这是毛泽东为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状况、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政策。但是，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大多数青年下乡以后生计无着，这使城市里千万个慈母牵肠挂肚。除了极少数青年在农村能够生根以外，大多数人不可能进入农民这个群体之中。回城，是下乡青年一致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父母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愿望被压抑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粉碎，如冰川解冻，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但是，城市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

上海知青抗议活动是在1978年11月25日开始发生的。自1966年以来，上海大约有200万青年被分派到农村。后来陆续回来了一些。到1978年，还有100多万仍留在农村。没有回来的要求回来，回来的要求工作。这些在农村吃尽苦头的年轻人，怀着强烈的对抗情绪向各级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没有满足以后，他们逐渐聚集起来，举行抗议活动。

当时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上海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会》。下设12个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一系列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抗议中，他们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

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就业，就业，这是当时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当时人们选择工作的标准第一是国营工厂，第二是国营商业，第三是集体工厂。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那时，

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职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耀武扬威起来了。他们心理上很不平衡。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顺口溜,正是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心理。如:

上班穷,下班富,
开除就成万元户;
家里有个劳改犯,
一年就赚好几万。

一辆摩托两个筐,
收入超过胡耀邦;
骑着铃木背着秤,
跟着小平干革命。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理不平衡的话,对党政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难题。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1980年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们的困难。

上海有一个居民叫×××,40多岁。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现已平反。他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落实政策后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最近他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想买一部载重汽车搞运输专业户。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难以答复。他们倾向不批准发证。

上海崇明县裕安公社社员×××,用1300元向这个公社十四大队购买拖拉机一台,个人搞运输。县委认为,拖拉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不能搞个人经营。已令他将拖拉机退回原队。

广州市个体户×××,继承了外祖父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种熏鸡早年曾闻名省港。50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歇业。1979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由于人手不够,他一天只能制作50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雇工?没有人明确答复。

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的确使基层干部为难。不是他们无知,也不是他们保守,因为过去20多年的政治学习中,在当时的政策中,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他们不愿意用这些答案回答,但又没有新的答案。

现实使理论尴尬。怎样用过去一再宣扬的理论来回答现实问题呢?1980年,北京的一个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十个理论难题:第一,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现在,私人开始占有生产资料了。对这一新情况是限制还是鼓励?第二,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私人雇工。现在私人雇工现象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解

释？第三，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剥削。现在剥削现象也出现了，是允许还是取缔？如果允许，以多大限度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众集资办厂，实行按股金分红。从传统理论看，这是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允不允许这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五，过去我们把私人老板当资本家。过去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了。现在又开始出现私人老板。怎样看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等等。

80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和传统理论相违背的敏感问题的政策也是很微妙的。关于雇工问题，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可以雇七个人呢？说来很可笑。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这个界限。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经过一百多年，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可见，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对马克思的超越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一颗瓜子千斤重

邓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一个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这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一个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很会经营，生意越做

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200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他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4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三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勉强接受。随着经营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多，1983年初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140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发展这么快，除了私营经济有强大的活力以外，还得力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尽管如此，他的迅速发迹，引起了各方面议论和指摘。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等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于原来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马克思说的资本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而年广久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贫困。相反，他雇佣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

年广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以1982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0%和43.33%。

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还带来了很多好处。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60家瓜子企业，瓜子销售量达3000万斤，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

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人们从多方面分析,看来私有经济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么危险。

一颗小小的瓜子,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人们从中央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得到了胆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的私营企业的经营形式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个人承包或租赁集体企业而逐步演变为私营企业。在承包之初,有些地方把当时经营很困难的集体企业“一脚踢”式的包给个人。承包者向集体交纳定额的积累、折旧费或管理费后,剩下利润全归自己。承包者可以雇工,可以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经营方式。几年以后,企业中个人的财产占绝对优势,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但名义上还是集体企业。

二是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是城乡个体工商户或家庭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是合伙经营的企业。两人以上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这类企业一般都列入合作经济之中。

四是集股经营的私营企业。由企业主个人互相参股,或在社会上集股,或亲朋好友出资入股。由董事会推举经营人员或由大股东负责经营。福建的晋江和浙江的温州这类企业比较多。

五是中外合资的私营企业。境外资金和国内的私人资本相结合而开办的企业。这类企业多分布在沿海或华侨较多的地区。

六是靠技术成果起家的私营企业。如珠海的巨人集团就是它的总经理在攻读研究生时发明的一项成果,自筹几千元资金制成了产品,并迅速占领了市场,从而成为一家很有影响的企业。1993年,巨人公司请我和几位经济学家去咨询,问到他们的所有制性质时,我们明确地回答,这家企业应当属于总经理个人所有。

在私营企业出现的初期,大部分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

务业。后来发展到工业、交通运输、食品加工、高科技、金融、采矿、建筑材料等各行各业。还有的从事航空、卫星发射等事业。

私营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过去是社会的弃儿。开始政府让他们“自谋出路”。所谓“自谋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内没有他们的出路。仅靠共产主义的宽容,他们才在国营经济顾及不到的小角落里,为他们让出了可怜的一席谋生之地。开始他们是多么希望迈进堂皇的国营企业的大门阿,但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很不情愿地摆起了小摊,叫卖街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在商品经济的不毛之地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是不毛之地,他们是先行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先发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旧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他们不受旧体制的约束,却在旧体制正在崩溃的混乱中大占便宜。

进入 80 年代中期,从事私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小了。发财机会的诱惑,自我实现价值的愿望,使得不少人抛弃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的“铁饭碗”,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一批人和早期进入这个领域里的人不同,他们是有充足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准备,有很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其中有的人还有种种权力背景。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一“下海”,就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为主”两个字的分量

有心人会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了微小的却是微妙的变化。

1981 年全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到所有制改革问题:“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

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请注意，这里在“一定范围”所允许的仅仅是“劳动者个体经济”，也就是相对于集体经济的个体劳动者。

1982年4月2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指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里的提法还是“个体劳动者经济”。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又一次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要鼓励个体劳动者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里第一次提出“鼓励适当发展”。

1984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还说，“要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发展全民、集体、个体经济相互之间灵活多样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决定》还提出“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这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请注意，这个《决定》在所有制问题上和过去相比，有几处突破。一是个体经济可以和全民经济、集体经济进行联合。如果全民经济和个体经济联合了，全民经济也就不是单纯的全民经济了。这对过去那种追求“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来说，不能不是突破。二是小型全民企业可以租赁或承包给个人经营，对于传统理论来

说,这是和共产主义理想是相悖的。三是把全民、集体、个人、三资企业都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决策已具雏形。四是除了允许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外,还允许发展多种经营形式。这主要是指国有经济。过去一直称为国营经济,现在可以国有民营。过去一直提“国营经济”为主导,从此以后,就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了。也就是说,国有民营经济也是主导经济。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公有制占90%以上,与此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①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之一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公有制应当是百分之百的。邓小平这里在公有制后面加上了“为主体”三个字,就不是百分之百的了。这就为非公有制经济让出了发展空间。什么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全社会所有。恩格斯说过,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列宁时代的苏联,由于不能剥夺农民,所以在农村不得不实行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但总认为这种公有制是低级的,总有一天要变成全社会所有。邓小平这里明确指出,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在80年代的中国,新兴起的乡镇企业也是列入集体经济之中的。这样,全民和集体占90%以上。什么叫“主体”呢?60%,70%,也可以叫做主体吧。如此说来,非公有经济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直到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所允许发展的还是“个体经济”,还没有开“私有经济”这个口子。其实,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这时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雇工，也就是没有剥削，而后者有雇工，有剥削。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私有经济上终于有了突破。赵紫阳在这个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太多了，而是发展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

“私有经济”，长期被共产主义者视为罪恶的渊藪，在共产党的决议中成为鼓励发展的对象。对这种奇特的现象，“十三大”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雇工，剥削，还是允许的。以消灭剥削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公开允许剥削，这不能不是“大踏步的后退”。当然，这种后退是为了将来“大踏步地前进”。

私有经济：还在理论和实践中彷徨

到9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实践中还在迅猛发展，理论上还受到限制。

由于私营经济的非凡活力，可以快速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也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把发展私营经济作为地方经济的增长点。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公布之后，这个情况尤其显著。报纸上充分报道了这一情况。

《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3月11日报道：“甘肃省副省长崔正华在近日召集的有关委、办、厅和工商联负责人研究如何加快甘肃

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问题时指出,应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甘肃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并把它纳入全省地方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要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重要性,而且应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强调,要根据甘肃的实际,切实把省委、省政府发布的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几条措施落到实处。”

《中华工商时报》在1994年3月23日报道:“最近湖北省委、省政府在确定1994年经济发展目标时,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力争今年全省个体私营企业达到100万户、200万人,产值、营业额达到300亿元。”

同一天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据广东省工商局最近统计,目前广东私营企业注册资金逾百万元的已超过3300户,45家私营企业集团公司的注册资金均在1000万元以上……”,广东的私营企业正在追求规模效益。

1994年春天,《改革月报》记者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期间采访了7个地、市的市长、专员,谈到1994年经济工作时,几乎都谈到所有制改革。舟山市市长夏阿国说:“我们准备出台一系列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措施,1994年个体私营经济规模要比1993年翻一番。”温州市市长陈文宪表示:“温州的私营经济主要在上规模、上水平下功夫。”

私营企业中发展最快要算科技民办企业(一直到90年代,中国人还是尽可能回避“私”字,把私营叫作民营)。这是以技术开发、技术贸易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是由科技人员创办的。中国的科技民办企业是在80年代初出现的。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发展成如此强大的实力。到1993年底,全国民办科技企业有

55000 多家,技工贸总收入超过了 500 亿元。1993 年,北京市从 5 万多家企业中评出“经济百强”,其中,12 家是民办科技企业。

私营企业在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以致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也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发展没有多少年,是我国经济的构成部分。有委员说非公有经济是国有、集体经济的补充。谁补充谁呢?一张桌子四条腿,哪条腿补充哪条腿很难说。”^①

叶选平作为实际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如果从理论上这么说,就有人要出来批评了。《中华工商时报》曾发表过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弼的一篇文章,意思是私有经济理论需要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都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是平等的,不能说谁为主,谁是补充。权威人士看到后,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通知所有的报纸不能转载。《经济参考报》的《理论文摘》的编辑不知道上面有这个通知,摘发了董辅弼的这个观点。为此,办了多年的、很受读者欢迎的《理论文摘》在上级的责令下被迫停刊。我也为此受到牵连。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现在允许私有经济适当发展是不得已的事。它迟早是要被消灭的。消灭它只是时间问题。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就是消灭私有制的决心不动摇。到底多长时间能消灭?当然理想实现得越早越好。过去太着急了碰了壁,吃了亏。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有理由把这个时间放得很长了。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妙得很。对实践者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经济的问题是后代人的事。对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来说,我们并没有放弃理想,只不过是实现时间的问题。

^① 《中华工商时报》1994 年 3 月 11 日。

私营企业主:是否已经形成一个阶级?

经过 50 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私人企业主早就不存在了。不管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是否愿意,改革和开放又重新造就了一批新的私营企业主。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随着中国的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十三大”以后,私营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到 1988 年第一季度,私营企业已有 25 万户,雇工 400 多万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 1% 以上。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中,资本 10 万元以上的占 45%。^① 1989 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私营企业大量减少。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以后又迅速回升。1993 年底,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 23.8 万户,投资者人数有 51.4 万。私营企业户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70.4%,^②。到 1994 年底,又增加到 43.2 万户,比上一年又增长了 81.5%。^③ 当然,这些数字不是私营企业的全部。有不少私营企业为了躲避政治风险,每年给村里交上一些钱,挂上了集体企业的牌子,俗称戴上了“红帽子”。1992 年我到广西采访,一位县乡镇企业局长对我说,“红帽子”企业占乡镇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为了取得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不少私营企业戴上了“洋帽子”(戴上“三资企业”的帽子)。隐形于上述“帽子”下面的私营企

① 王克忠主编:《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版,第 262—263 页。

② 张厚义:《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③ 惠鲁生:《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大环境宽松》,见《工人日报》1995 年 2 月 17 日。

业的数目恐怕要远远超过公开登记的数目。

从传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也许会把他们说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现在,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他们人数虽然在总人数中占的比重不大,却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和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农村的有些地方,他们能呼风唤雨。有很多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传统理论来看,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人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有剥削。但是,有些地方的私营企业主却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些人是先入党后来才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曾有一位县领导人向我介绍,他们破例用这批人当村支部书记以后,效果很好。因为他们有能力使村里早日摆脱贫困。

私营企业主是由什么样的角色转换来的呢?前面介绍过,他们中间有一批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弃儿。但是,后加入这个队伍中的人,不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宠儿。他们利用在计划经济时得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大发其财。

这一点在农村表现尤其突出。在农村办私营企业的多是农村基层干部、社队企业厂长和采购员。其中不少是担任过大队长、生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他们都是农村中的“能人”,有经营能力。他们在长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工作和经营活动中,建立了搞私营企业所需要的社会关系。例如,他们可以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可以利用国家商业的供销渠道。这些,普通农民就很难做到。

城市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内退出来的人还是占多数。1987年,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和劳动局对市区271位私营企业主调查的结果是,待业人员占24%,无业人员占18.8%,这两部分人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弃儿,离退休人员占23.3%,

停薪留职的占 1.1%，辞职的占 23.2%，这三部分人是来自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占整个私营企业主的一半。^①当然，在 80 年代早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人占少数，后来随着政治风险的减小，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人纷纷加入了这个队伍。

私营企业家的起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国有资产流到个人口袋。国有资产之所以能流向个人口袋，是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的混乱。管理上的空白，政府官员的腐败，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员里应外合，权钱交易等等不正常的因素。对这一点，老百姓意见很大。

从整体来看，私营企业有相当强的、而且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1993 年，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注册资本 680 亿元，比上年底增长了 207.7%，相当于 1991 年的 6 倍。^②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 1988 年对全国一百家私营企业调查，企业资产年递增率为 56%。全国首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是，1992 年年底，私营企业的户均资金比它们开办时增加了 5 倍，资金年递增率为 31%，其中，注册资金百万元以上的占 23.8%，实际使用资金在百万元以上的占 33.7%。1993 年年底，私营企业注册资金百万元以上的全国有 8784 家，比 1991 年增长了 5 倍，有些地区出现了企业资产达千万元、亿元、几十亿元的大户。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戴各种“帽子”隐藏于其他经济形式中的私营企业的资本。^③

据另一个材料介绍，到 1994 年 6 月底，全国雇工 8 人以上注

① 《北京城镇的私人雇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 2 月版，第 51 页。

② 张厚义：《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

③ 张厚义：《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

册私营企业主 32.8 万户，注册资金 1041 亿元，从业人员 500.8 万人。平均每户雇工 14.2 人。这个材料称，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 2000 元，工业雇工 3 人，商业服务业雇工 2 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 1979 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 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 16 万个。这个材料忧心忡忡地说：“人们公认我国 1955 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情况同 1955 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从绝对人数上，还是从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 1955 年以前。何况我们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①

从政治上看，私营企业主是不是形成了一个阶级？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一文认为：“我们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它至少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是一个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社会阶层，还不是一个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从政府这方面来看，只希望他们在经济上发挥作用，不希望他们有独立的政治意识，更不允许他们成立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但是，随着他们的队伍日益庞大，经济实力日益雄厚，他们的政治意识会不断加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如果这种政治要求过于强烈，如果他们的政治要求变成政治行动，就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

寻找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私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

^①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的所有制的突破。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不能自己和自己做买卖。所以,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都是国家的),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利益主体。所有制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单一国家主体,建立国有经济、城乡集体合作经济(包括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经济、私有经济等多元经济主体。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种途径是对国有企业实行非国有化(按国外的说法就是私有化)。中国主要是采取第一种途径,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到90年代中期也采取了第二种途径,先是对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在这方面意识形态阻力较小),后对一些大企业实行资本开放(即在单一的国有企业中吸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使之资本多元化。所以,改革过程是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见表1)。和改革初期相比,改革18年以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见表2)。它还要继续发生变化。

对于改革时代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来说,它不能总停留在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状况下。一家一户的私有经济只能是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是激烈竞争的经济,没有一定的规模,是很难站得住的。要扩大规模,仅靠本身积累是不行的,必须实行资本联合或吸收社会资本。这样,一家一户的小私有企业就变成了合资企业或股份公司。此外,各种所有制经济会互相参股,互相融合也会使所有状况发生新的变化。正如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第9条中所说的:“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

表 1: 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情况(以工业为例)

| 年 代 | 1978 | 1980 | 1985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 国有工业比重(%) | 77.6 | 76.0 | 64.9 | 54.6 | 56.2 | 51.5 | 46.5 | 37.3 | 34.0 | 28.5 |

资料来源:按 1997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413 页数字计算。

表 2: 1996 年所有制结构状况(%)

| | 国有经济 | 集体经济 | 其他经济 | 个体经济 |
|----------------|------|------|------|------|
| 工业产值所有制结构 | 28.5 | 39.4 | 16.6 | 15.5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所有制结构 | 27.2 | 18.4 | 21.8 | 32.0 |
| 城镇职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 56.7 | 15.4 | 19.9 | 8.62 |

资料来源:1997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第四节 难点:国有企业的改革

到 80 年代后期,中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构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包括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5 个方面。市场主体即交换主体,也就是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的企业等;市场机制主要是指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市场:普通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中生产要素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土地使用权市场等。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企业产权市场等。宏观调控体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如何使经济发展符合长远利益、如何整合各个经济主体的个别利益、整合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一系列调控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必要时也要采取行政手段;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社会安定的措施,使那些在竞争中的失败者有基本的生活保证。

在上述5个方面当中,市场主体的培育是最重要的。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的企业基本都是国营的。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最重要的就是使国营企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是从国营企业开始的。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这个改革并不是把国有企业引导到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而主要是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这个圈子里打转转。

在进行改革的头10年,人们对旧体制的认识还很肤浅,以为旧体制的缺陷只是过度集中而已。这种认识表现在企业改革上,就是向企业放权,给企业让利。

放权让利的改革分为几个阶段。开始是利润留成,后来改为承包制,中间试图搞利改税,没有成功。承包制一直进行到90年代初期。

过去国家不承认企业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承认企业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的计划部门确定。企业的利润全部上交给国家,企业要花钱再向国家申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统收统支”。企业的原材料由国家供应,企业的产品由国家包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统购包销”。企业不能参与国际贸易,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出口产品,都由外贸部门统一对外,这就是人们说的“统进统出”。当然,这样的企业更没有投资权,连建一个厕所也要层层申报,层层审批,经过十几个部门,盖十几个图章才能施工。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是企业里的最高领导人。书记和厂长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党政官员。那时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

最典型的例子是重庆钢铁公司的两台蒸汽机。这两台机器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年我到“重钢”采

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马力和生产年代:一台是7500马力,是1905年生产的;另一台6400马力,是1887年生产的。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80年代修建成渝铁路的钢轨就是它们轧制的。到80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4%。动力科的负责人告诉我,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达180万元,但需要先投入技术改造费475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一直没有批下来。到我前去采访的1982年,为了等这475万元的技术改造费用,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就达数千万元。

所谓“放权让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国营企业改革最早是实行“企业基金”。这是针对过去企业毫无财权的情况,由国家财政给企业留下少量的钱,让企业自己支配。这部分钱称为“企业基金”。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两年时间,就被“利润留成”所代替。

所谓“利润留成”,就是由过去的利润全额上交,改为留一部分给企业自己支配。而从1979年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即是在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中按一定的比例留给企业。这个比例就是上一年企业所有的开销(按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福利费、奖金、企业基金、以及国家拨付的科研经费和职工培训费、新产品试制费等)和上一年实现利润之比(也有的取前三年的平均值)。这个比例3年不变。

这种全额分成的做法使企业千方百计地提高分成比例,例如在帐目上扩大开销。只要争得了满意的留成比例,企业的日子就很好过了。为了防止下一轮比例不致于降低,企业不愿意让利润增长太多。为了提高企业增长利润的积极性,就把全额分成改为增长分成,即在利润增长部分按比例留成。增长越多,企业留得越多。但这样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原来利润基数越低,企业得到的

好处就越多。基数大的企业就吃了亏,人们批评这种政策是“鞭打快牛”。于是,又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实行基数分成加上增长分成的办法。

“利润留成”是一个一个的企业来确定利润基数、增长幅度和留成比例,要有一个庞大的算帐班子。说是算帐,实际是讨价还价。政府一家对万家,总是算计不过企业。地方政府也倾向于企业这一边。最后还是国家财政吃亏。苦乐不均、“鞭打快牛”的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

在让利的同时,也实行放权。企业留下了利润可以自主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再生产。在国家控制指标的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职工奖金分配,等等。

四川省首先在 100 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接着全国各地也展开了。说是“试点”,由于这种“试点”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实际上企业普遍都要求参加,因此很快就在全国推开了。中国长期实行“统收统支”、“统购包销”的政策,现在一旦放权让利,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华社记者李峰在 1979 年报道四川 100 个试点企业时写道:“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一些不适应‘四化’建设的上层建筑,像是古庙顶端涂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朽木断瓦,一块一块地塌落下来了。”

由于“利润留成”是国家和企业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很不规范。由于苦乐不均的问题解决不了,企业不能平等竞争。人们就寻求统一的规范的办法,使企业间能平等竞争。这个办法就是“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按一定税率上交税金。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税收,千家万户应当是同一税率。税收还有强制性,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都得照章纳税。但是,由于当时价格还很不合理,企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企业经营的结果,而是价格因素造成的。例如,当时原油的价格只有国际市场的 1/5,而成品油的价格和国际市场差不多。所以,生产原油的企业利润

很少,炼油行业的利润却很高。在这个情况下怎能实行统一的税率呢?当时想了一个办法,把“利改税”分为两步。第一步“利改税”规定所有的企业都上交 55% 的所得税,剩下的 45% 还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一户一户地确定企业留多少,上交国家多少利润。这就是“税利并存”。第一步“利改税”确保财政拿到了 55% 的税收,把国家和企业讨价还价的范围缩小到 45% 之内。第二步“利改税”就在 45% 的利润上做文章,把剩下的利润尾巴改为“调节税”,即调节价格因素造成的不合理分配。“调节税”实质上不是税,它不是统一税率,还是一户一个税率。

在“利改税”之前,不少企业实行上缴利润承包制。实行“利改税”以后,许多企业的承包制中止,也有少数企业保留了下来。首都钢铁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在“利改税”期间,还进行了其他的探索,如租赁制、股份制等。1984 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之后,股份制在 1985 年又有所发展,到 1988 年底全国有了 6000 家股份企业,共发行 60 亿元股票。这时的股份制企业都是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的,并没有按现代股份公司的规则运营。

从 1983 年 1 月开始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到 1984 年 10 月 1 日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利改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财政收入,所以财政部门很积极。但企业和经委系统不满意。税率太高了,国家先拿走了 55% 的利润,还要拿调节税。企业感到比利润留成严酷多了。第二步“利改税”对企业作了点让步,允许企业在征收所得税之前归还银行贷款。实行的结果是,企业连续 26 个月没有完成财政上交任务。1986 年底落实 1987 年的财政任务时,怎么也落实不下去。这时天津市在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财政包干的办法。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搞“利改税”最积极,赵紫阳开始也很支持。后来从财政考虑,赵紫阳转而支持承包制,并且很快在全国推广。

企业承包制的内容是“包死基数,保证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

补”。这是从农村学来的经验。在这之前，城市也搞过一次承包制。由于弊端很多和其他种种原因，被“利改税”取代了。1987年是“包字第二次进城”。这次承包和前几年不同的是，不仅仅是为了落实财政任务，而且是作为一种企业经营形式，称为“资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是，“包”字这次进城争议还是很多。主要是，承包制会不会使企业只顾追求眼前的利益，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承包制会不会使企业只包盈不包亏，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承包制使企业有可能扩大奖金发放，会不会造成消费基金失控？承包制是企业 and 政府一对一的谈判，会不会强化行政干预，阻碍政企分开？以1986年实现利润为基数搞承包，会不会造成“鞭打快牛”？等等。

不管有多大的争议，承包制还是全面推开了。而且连续搞了两轮（每轮3年）。这是企业改革中实行得最长的做法。承包制的理论依据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即国家掌握所有权，承包人掌握经营权。

从利润留成到承包制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经营自主权。过去那种“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已经完全打破了。企业在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以后，由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由自己决定产品价格，由自己销售。企业因此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有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自主地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改造。1987年我再一次到重庆钢铁公司采访时，不仅那两台老蒸汽机被电动机代替了，而且全公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从法律上确认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到198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实行治理整顿，工业增长速度大

幅度下降,企业的利润也随之下降(中国的工业企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速度下降,利润必然下降)。出现了1/3的企业亏损,1/3的企业虚盈实亏,只有1/3的企业盈利。承包,就是承包利润。2/3的企业没有利润,承包就很困难了。一些企业只好搞减亏承包。企业保证在承包期内减少多少亏损。也有一些地方承包流转税。流转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强制性征收的。流转税一承包,财政收入就没有保证了。在财政部的极力反对下,制止了流转税的承包。

从80年代后期以来,放权让利式改革的弊端日益突出。治理整顿结束以后,企业改革又采用了新思路:将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7月,国务院发出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条例。其目的是让企业把和过去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机制,转换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机制。但是,这个条例缺乏制度创新的实质性内容,对企业改革没有多大推动。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为推动企业进入市场,总编辑亲自下去组织稿件,提出要用“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来砸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引起了企业界的恐慌和不满。企业界纷纷发问:为什么不砸国家干部的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却要砸企业职工的呢?在社会保障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砸了铁饭碗,工人怎么办?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公司制度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试点在80年代中就已开始,但到90年代中期虽然搞了不少股份公司,却没有一个是规范的。

改革十五年后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经过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两轮承包,又经过贯彻《企业法》和转换经营机制,历时15年,效果怎么样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说它有效果,是指和改革前相比,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其中确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发展得很快,不仅在国内市场上举足轻重,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一系列的难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

一是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70%以上投给了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部分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只占20%(1993年为20%,1994年还不到20%)。1994年“GDP”增长11.8%,而国有企业增长不到3%。^①有人利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的理论计算,改革15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增长的净产值中,靠提高效率得到的只占12.2%,靠增加投入增长的占87.8%。国有企业中有一半是亏损的。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逐年增加:1980年亏损34.3亿元,1989年亏损180.19亿元,1991年亏损367亿元,1994年亏损482.59亿元,1995年亏损额又比1994年增加20%。1980年亏损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3.1%,1994年亏损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9.3%。

二是资产负债率高,而且不断提高。1992—1995年间,每年提高3—5个百分点。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到77.1%,如果考虑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资产负债率高达85%。

^① 杨启先的《认清形势,抓住要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樊纲的《当前制度创新的四个问题》都提供了这个数据。

企业的利润不够交银行的利息,企业完全是为银行打工。

资产负债率多高才算合理?有一个简单公式可以计算:

资产负债率极限 = 资本收益率 ÷ 贷款利率

国营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大约 6% 左右,银行贷款利率大约 12%,按这个公式计算,国营企业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 50%。

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 1995 年度的全国体改会的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对比资料:欧、美国家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第一产业为 20%,第二产业为 50%,而第三产业为 70%。显然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太高了。1994 年,国家有关部门对 12.4 万户清产核资的国有企业统计,资不抵债的企业达 27%,如果加上实际资产已经损失和各种资金挂帐,资不抵债的比重还要大得多。^①

三是在非国有经济面前竞争力差,国有经济比重日益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纯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78 年为 81.56%,1994 年下降到 38.23%,16 年下降了 43.3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2.71 个百分点。从劳动力来看,国有企业比重由 50.07%,下降到 28.24%,16 年下降了 21.83 个百分点。从资产来看,国有企业的比重由 87.98%,下降到 55.59%。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制的比重相应上升。^②

四是大批国有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这 15 年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但由于企业效益差,负担重,没有能力进行较

① 杨启先:《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1995 年年会上的讲话》。

② 新华社 1995 年 8 月 14 日电:《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记者张锦胜报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对同一事情前后发布的数字是不一致的。如 1978 年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本书引用国家统计局不同时间公布的数字已有三种:80.8%;77.6%;81.56%。

大的投入。中国工业经济协会 1990 年曾对 134 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有 39% 的设备是超期服役的。在“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役龄超过 30 年的占 31%。有相当多的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经消耗完毕,有的企业固定资产是负值。

另一个资料指出,90 年代中国的机床行业相当于国际 70 年代的技术水平,数控机床只占 5%。在冶金工业中,钢的连铸比只有 45%,低于同期世界水平 30 个百分点,连轧比只占总产量的 1/3。而国外基本全是连轧生产。

更令人头疼的是,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大批国有企业开工不足,还有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 1994 年底的估计,国有企业中失业和待业人数达 1500 万人,他们拿不到正常工资,更谈不上发奖金了。还有 50 万名国有企业退休职工领不到退休金。在通货膨胀率高达 20% 以上的情况下,这批职工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在大城市,拿不到工资的职工在马路旁边理发、修自行车、摆小摊,以维持生计。在矿区,职工就毫无办法了。在陕西的铜川煤矿,在黑龙江的鸡西煤矿,有的矿工不得不靠吃饲料为生,有的国有企业职工因生活无着而自杀。这些国有企业职工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上访、请愿、闹事,时有发生。

1994 年 8 月,全国政协组织了一个小组到辽宁调查,辽宁省的 1320 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真正好的只占 10.4%,但这类企业问题也不少;比较好的占 22.1%,但问题很多;企业很困难、资产负债比重很大,但还有救的占 49.6%;很困难,已经资不抵债,没法救的占 18%,而且情况还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其中 49.6% 的虽然困难但还有救的企业,有一部分正向没有救的方向发展。辽宁的干部说:“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很大,但问题更大,搞不好就成了‘心腹之患’。”

中国经济中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大批农民进城,并没有导致城市简单劳动力过剩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随着改革的深

人,劳动力价格反而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国有企业的工人并没有市场化。农民大批进城以后,这批工人不仅没有和进城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反而“贵族化”了。我们在工厂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一边是农民忙碌着从事繁重的劳动,一边是正式工人在悠闲地聊天。自从农民大批进城以后,国营企业的工人再也不干苦活、脏活、笨活和危险活了。如果国营企业工人真正进入市场,劳动力价格会降低,企业也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随时吞吐劳动力,但是却很难做到。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对这批工人没有给以足额的工资。所谓足额工资,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它包括:吃饭穿衣、住房、退休养老、医疗保险、劳动力技能再培训费用、子女教育费用等。而在国有企业,国家支付给工人的只有吃穿的费用,连住房也不能保证。工人为工厂干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住房都没有。现在要让工人进入市场,就必须偿还工人应该包括在工资之内的其他费用。也就是说,由于国家还不起工人这笔旧债,只好把这批工人养起来。国有企业的工人不能市场化,国有企业也就不能真正市场化。

1995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成都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会上不少代表(大都是各省体改委主任)对国有企业的现状既感到忧虑,又感到惶惑:“改革搞了十五六年,各种办法都试验了,为什么国有企业还这么困难?”1996年5月,这个研究会在厦门开年会,主题是国有企业改革,但还是没有满意的办法。

在困境中找到了新思路

15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安志文以及刘国光、吴敬琏等一批头面经济学家都认为,过去的改革回避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企业产权。

15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理论上存在3个悖论,因而国有

企业的改革方向长期模糊不清。

第一是传统理论的要求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最基本的常识是,人们不能自己和自己做买卖。也就是说,市场上不能只有一个所有者。按传统理论,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一个所有者,都姓“国”。这样,就出现两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国有企业内部,谁是所有者(国家)的代表就不很明晰。

第二个是国家所有制和企业自负盈亏相悖。企业法中规定国有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改革以来,也天天喊企业要自负盈亏。实际上,没有一家国有企业真正自负盈亏。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只有所有者才能自负盈亏,企业不是这笔财产的所有者,它怎能为别人负盈亏责任?所以,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只能由国家负盈亏责任。企业要破产,也只能破国家的产。

第三是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职能和社会行政管理者的职能相悖。对国有企业来说,各级政府既是社会的行政管理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这两个职能的运行规律不同,作用方式不同,纠缠在一起,既削弱了行政管理能力,又影响所有者的经济职能的有效实施。作为所有者职能,由于有成千上万个企业,是由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来执行的。这样,国家的所有权就被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政权分割了。国家所有实际上变成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所有。而地方政府和部门又将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进一步分散到各种职能的行政官员手中,而管理国有资产的这些行政官员,谁也不可能行使所有者的职能。从企业这个角度看,谁都可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但谁也不对自己的指令和行为负责。理论界称这种现象为“所有者缺位”。企业界称之为“全民所有,就是无人所有”。

中国的理论界把这三个悖论都归结为“产权问题”。“产权”这个概念很复杂,但在90年代的中国改革中,却有它确定的含义。

它是从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中提出来的,是为了寻求国有资产有效的管理方式而提出来的。产权,就是财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就是为国有企业的财产寻找一个合理的占有和支配的形式。

根据上述问题,理论界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分3个层次。在政府这一级上,把所有者的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分开,即把所有者的职能划归一个独立部门管理。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国有资产所有权整合在一起。例如,上海成立了一个很有权威性的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中间层次,成立若干个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个公司把国有资产当作资本来经营。它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是若干个企业控股的的股东。这样,就把原来一个老板变成了多个老板。在微观层次上,给企业以法人财产权。这法人财产权是由各个投资者的股本构成的。它不仅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股份,也可以吸收外资、公民、其他法人入股。企业的法人财产在数量上就是企业的注册资本。企业就在法人财产的范围内自负盈亏。股东(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只在投入的资本限度内承担责任,对企业不负连带责任。对十分重要的企业,不能吸收其他股份,是国家独资企业。对重要企业,由国家控股。对大多数企业,是由多种经济成分参股的混合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都按现代公司制度组成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股份公司。对一些小企业,可以通过拍卖、租赁、承包等多种方式,交给民间经营。

这个思路被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采纳,其基本内容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4句话中把“产权明晰”放在第一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后,产权改革进展加快。吉林省提出了“一个中心,四条主线”的改革思路。即:一个中心,以产权改革

为中心；四条主线，股份制、租赁、拍卖、公司制改组。1993年7月，吉林省政府在四平市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五个一批”的“四平模式”。即出售一批，转让一批，兼并一批，股份制一批，破产一批。不少省对县一级国有企业采取了较大的动作。因为县一级国有企业普遍亏损，成为县级财政的一个大包袱。不少县属企业通过拍卖、租赁、兼并等多种方式，变成非国有企业或国有民营企业。有的通过兼并、联合、控股等方式组建企业集团。有的地方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卖给境外企业。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在两年时间内，向内地国有企业投资3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外合资企业100多家。其中既有中小企业，也有人数达几千人的大企业；既有原来效益不好的企业，也有原来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办合资企业中，中策公司都占51%的股份，实行控股。合资以后，这些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益。这成为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吸收境外资金来购买国有企业的股份，从而实现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普遍采用了。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春天，以重构产权为中心的企业改革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产权改革出现争议

1994年春天，我在任《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期间，几次接到上级的通知，产权改革的稿件不要发。这时，传来了“搞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的风声。从这时开始，正在升温的产权改革开始降温了。

但是，在基层，产权改革还在继续进行。在那时的产权改革中，的确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有的地方借产权改革之名，把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得到利益的主要是当地有权势的人和企业经营者。国有资产流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为反对产权改革

的人找到了口实。

1994年底，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企业改革。一贯积极主张产权改革的国家体改委也不得不降低了产权改革的调子。吉林省体改委事先准备好的、介绍吉林产权改革经验的发言被取消。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关于企业改革的大会报告稿发下去了又被收回，修改以后重新下发。修改后的稿子删去了不少关于产权改革方面的内容。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的全国经贸会上，其中心议题也是企业改革，这个会没有提产权改革，而把企业管理提到很高的程度，和国家体改委的调子不一样。

1995年，过去报纸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产权，几乎消失了。

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明晰”放在第一位。完全否定产权问题，显然是不妥当的。过了不久，又传达了江泽民的指示，现代企业制度中的16个字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四句话都要讲，不可偏废。

从1994年开始就说1995年的改革重点是企业改革。到了1995年，企业改革却没有多大的动静。国有企业继续在困难中挣扎。

为什么在企业改革的重点年，企业改革却停滞不前？因为认识不一致。认识不一致造成思想混乱，使改革的目标和途径模糊。1994年底，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某部体改司司长对我说：“我在这里连续开了3个会，听了8个和企业改革有关的报告。不听报告还清楚，越听越糊涂了。我看明年的企业改革够呛！”1995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年会上，一位浙江代表发言说：“现在改革思想很混乱，我们下面的体改部门无所适从。现在的改革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后退了，我们体改部门压力

很大。”

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每当某项改革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常常就要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突破。

在1994年到1995年春，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争论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第一，怎样评价国有企业的现状。

一种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困难十分严重；经济效益越来越低，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严重，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在同非国有经济竞争中缺乏生命力。如果处置不当，不出几年，有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危险。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评价不能过于悲观；亏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国有企业较多地承担财政税收，承担了不合理的价格负担，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负担和较多的人员负担。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就整体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低于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要有信心。

这两种意见对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没有多种经济成分，国有企业会更加困难；后者认为没有国有企业承担如此多的社会责任，其他经济成分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前一种意见认为后一种意见为国有企业护短，客观上会阻碍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后一种意见指摘前一种意见把国有企业说得一团漆黑，客观上为私有化制造舆论。

持前一种意见的多为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持后一种意见的多为官员。

第二，在以后的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应当占多大比重？

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国有经济的范围过广,应当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可以采取“控制关键点,让出一大片”的方针,在有战略地位的行业或企业中集中优势力量。对大多数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或租赁的办法,改造为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以由现在的50%左右,进一步降到30%,甚至20%。这不仅不会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反而会加强其主导地位。还有一些理论工作者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认为国有企业应当退出公共产品以外的领域。

一些人士对上述意见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在近年来国有经济比重已明显下降和在国有资产正大量流失的情况下,盲目提倡国有经济比重应进一步大幅度下降的主张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付诸实施是危险的”。^①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

一种意见认为,所谓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又是计划经济的主体;计划经济体制既是国有经济的依托框架,又是国有经济的运行工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也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首要的是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过程。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多。将来的企业大多数是各种经济成分参股的混合经济。国有经济在微观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国有控股。国有独资企业只能是极少数。

另一种意见反对“脱胎换骨”说,对产权的流动和重组也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不应不加分析地批评全民所有制‘产权虚置’,不能认为‘全民所有’即‘全民皆无’”,反对“国有企业只有通

^① 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

过产权改革实现股份化并进而将股份量化到个人,国有企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看法;认为,“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是统一完整的体系。这是国有经济保持自身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①

1995年到1996年起主导作用的想法是,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要防止私有化。

实际上,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因为公有制既包括全民所有制,也包括集体所有制。即使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20%,公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60%以上,还是占主体地位。尽管如此,持传统看法的人还是一再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其意思是,必须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公有经济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要使非公有经济成分从属于公有制经济,……而不是让其他经济成分独立于其外,使它成为冲击公有制的力量”。^②按照这个意思,非公有经济不能和公有经济处于平等竞争地位。显然,这就和市场经济原则相悖。

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私有化问题是意识形态上最为尖锐的问题。

其实,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展了多次关于私有化问题的理论研讨会。外国学者关于私有化的定义有10多种。其中最广义的解释是,凡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的过程,都可以称之为私有化。如果按这种解释,私有化问题在中国没有争论,市场化过程就是私有化过程。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私有化,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人所有制,由少数私人老板控制国家经济。而这些私人老板

①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② 同上。

又是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残酷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私有化”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在20世纪末期,就是西方的大企业(小企业除外)也不是私有企业,而是社会所有制企业。它的股权高度分散,任何一个私人都不能支配这个企业。社会化才是当今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中国人批评得最凶的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非国有化,即对小型企业进行拍卖和租赁,对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这也是中国正在做的,而且中国比俄国做得更彻底。1993年我到俄罗斯专就其私有化问题进行过调查,发表了《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的私有化》一文,曾客观地介绍过这一情况。

既然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不存在,公有制为主体也不成问题,为什么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呢?这是因为,关于私有化的争论,是前几年“姓资”还是“姓社”争论的另一种形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批评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之后,“姓资姓社”的争论就转为“姓公姓私”的争论了。

对此,一些人士已有坦率的论述。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认为,如果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思路搞下去,就“根本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①“如果一旦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将沦为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将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权将会变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消解,社会主义精神支柱将会倒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②

1994年,中国流行一本畅销书,这就是借一个德国人的名义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从社会政

① 袁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

②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中国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这段话,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认为缺乏时代感,是外行话,对它不以为然,想不到竟得到了一些领导干部的赞同。1995年秋天,我同国务院研究室的同志到廊坊调查县级经济所有制结构问题,才对这种态度有所理解。这些县都有一部分县办国有企业,其经济效益远不如其他所有制企业。但县里的领导人还下大力量抓这部分国有企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坦率地说,这些企业虽然效益不好,但对县里的财政贡献大,是县长的“钱口袋”,没有这个“钱口袋”,县里的政权机构无法运转,官员无法养活。一县如此,一国也是如此。从维持和维护政权这个角度着想,政府必须抓住国有企业不放。其实,政府的运转资金应当靠税收,不应靠自己办企业。政府其所以靠办来养活自己,是因为中国收税能力太差,大量非国有经济的税没有收上来。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境,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抓大放小”和诸城经验

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除了认识上不一致以外,还有一些很难解决的实际难题。这就是三个历史包袱。

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5%。在高达1万亿以上的不良债务中,大约有6000—8000亿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如果负债率降到60%,需要注入资金2万亿元。

国有企业富余职工按职工总数的1/3计算,有3000多万人。如果以平均每人每年2万元的安置成本,则需要近7000亿元。

国有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据统计,1994年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共办有各类学校1.6783万所,医疗卫生机构3619个,全年需要

支付教育经费 15 亿元,卫生经费 20 亿元,支付所办学校、卫生单位工资 30 亿元,支付离退休统筹资金 170 亿元,购买职工住房支出 50 亿元,这些支出相当于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 1.1 倍。现在国有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占固定资产的 10% 左右,非经营性人员占在职职工人数的 12%,非经营性支出占合理费用支出的 40% 左右。要分离这部分负担,又需耗去大笔资金。

企业不放掉这三个历史包袱,自负盈亏就无从谈起,也很难转换经营机制。而要解决这三个历史难题,又需要数万亿元的资金。这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江泽民主席于 1995 年初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尽管这个提法的科学内涵在理论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有推动作用的。人们对“抓大放小”四个字最感兴趣的是后面两个字:放小。小企业不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了。1995 年春天以后进展较快的是国有小型企业。在这期间,山东诸城市的经验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山东诸城是一个县级市。有国有企业 50 家,从 1993 年开始,对其中的 37 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诸城在进行改革之前,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 4 套班子的领导成员都在改革方案上签字划押,表示一旦出事,大家共担风险。颇有点当年安徽小岗农民搞联产承包时的味道。近两年来,新闻界没有宣传它,领导人没有介绍它,却有 10 多万人次、5000 个学习团到诸城学习经验。1996 年 1 月,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会议组织者和部分与会人員向朱镕基汇报会上的情况时,其中汇报了诸城经验。朱当场就一些重要问题提问。诸城的人作了回答。朱说:“你说的情况是不是有水分?”朱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带一个联合调查组到诸城调查。洪虎带领国家 9 个部委的共 23 人到诸城调查了一个星期。

诸城到底做了些什么呢?据参加洪虎调查组的国家体改委企

业司长吴天林介绍，诸城探索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产权重组和转让的办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一是组建企业集团，搞规模经营。二是无偿把产权转让给另一家优势企业。由这家企业承担债务和职工安排。三是由内部职工出资买下本企业的国有资产。其做法是，经过清产核资以后，冲销历史包袱，即资产评估后的总资产减去企业债务，剔除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再剔除职工住房，剩下净资产进行出售。32户企业的净资产为1.5亿元，扣除上述各项后，能出售的只有1550万元。从1993年到1995年经过3年运转，这32户企业有26户经济效益明显增长，只有6户效益下降，但不亏损。32户企业总利润增长2倍。这一部分是诸城经验的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如引用西方的概念，这就是私有化。但诸城极力避免这一说法。

第二，在处理企业的历史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做到了国有资产不流失，银行债务不悬空，富余职工都得到了安置。

第三，政企分开做得好。产权属于职工共同所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正在形成。政府不审批项目，不决定用人。经理由职工选举。

不管诸城以后是否成功，人们看重的是诸城突破了“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障碍，在所有制改革上迈出了步伐。实际上，全国有很多地方县一级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放开了。因为不这么做没有别的出路。县里再也背不起这个包袱了，不放不行。

小企业这么大面积地放开，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也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一个好的社会环境。

大调整 大改组 大联合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比过去有所松动：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体现标准，即国有资产在

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体现主要在控制力，而不在比重。第一次提出了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可以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一次明确了非公有经济的地位，由“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给股份制定性，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制。这些，就给自1994年以来“姓公姓私”的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也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扫除了一些思想障碍。这样，企业改革从小企业为主开始转向大中型企业。

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前透露了十五大的这些精神。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思想界也活跃了起来。7月份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院请我为研究生们作一次讲座。我的讲演题目是《新一轮姓资姓社之争初见分晓》，很受学生欢迎。我之所以敢大胆地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到各地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采访，看到很多地方已经根据江泽民的讲话精神行起来了。

我写的报道《大调整 大改组 大联合》大体反映了十五大前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现摘要如下：

1997年6月，我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采访，看到了一种新的壮观景象：国有经济的存量资产正在重新组合。国有企业在场大调整、大改组、大联合中，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

上海：700多户企业被兼并，58户企业破产。上海的纺织行业有164户企业被撤销，22万职工被精减。轻工行业有50家企业破产和被兼并，数以百计的小企业被合并。钢铁行业有40多家企业向三个企业集团靠拢。

河北：正在组织23家支柱性产业集团。这23家集团在三年内销售收入都要达到50亿元以上，利税要达到10亿元

以上。围绕这23家集团的组建,要对数百家企业的资产进行重组。

大连:对28户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近15亿元的国有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对44户国有企业实施兼并,对8户企业进行划转,从而形成10个大型企业集团。

沪深股市600多家挂牌的上市公司中,资产重新组合、购并案例就有60多起,平均不到一个交易周就有一起案例发生。

在一些大中城市,通过资产重组还实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之间的调整。北京、上海、大连等大中城市,把第一、第二产业向城外迁移,腾出繁华市区发展第三产业。这种开发式的搬迁改造,既为第一、第二产业找到了发展空间,也发挥了级差地租的效益。

根据江泽民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国有小型企业已经全部放开。所谓放开,就是通过租赁、拍卖、承包等多种形式转为民间经营。其中一个重要形式就是股份合作制。即把企业的资产折成股份卖给内部职工,职工既是这个企业的劳动者,又是这个企业的股东。

自十四届五中全会将“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写进决议以后,各地都推出了鼓励资产重组的政策。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联合之潮,此起彼伏。今天这里有不景气的企业破产,明天那里有新的企业集团成立。伴随着资产的重新组合,是厂房的改造,设备的搬迁和大量职工的流动。例如上海随着资产重组,有109万职工下岗,其中89万人重新就业。这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几十年来几乎处于凝固状态的国有资产存量,现在开始奔腾地流动起来了。

这次规模空前的国有资产存量的战略重组,有其深刻的

背景。

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末,全国国有工业资产总额47472.1亿元,占全部工业的53.7%;工业增加值8307.2亿元,占全部工业的34.1%;产品销售收入26103亿元,只占全部的33.8%。这说明,国有工业占用了一半以上的资产,而增加值和销售额只有三分之一。可见国有工业效率之低下。

国有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是国有资产存量的组合不合理。

一是产品结构和市场需要脱节,大量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据权威部门调查,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有三分之一产品的生产能力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二是企业规模太小,大多数处于经济规模以下。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中国5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总销售收入还不及美国500家大企业前两家之和,总利润还不及美国500家大企业前三家之和。

三是区域结构不合理,地区之间产业趋同,各地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据国家计委测算,中国地区内工业部门产业结构与全国部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达0.9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22个。如果除去几个资源偏在型产业,相似系数达0.9以上的省区有26个。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进入了不应当进入的领域:竞争性领域。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收缩国有经济的产业领域,调整所有制结构在主导层形成了共识。

过去十八年的改革只是在增量上做工作,对存量很少触动。最近的改革不同寻常之处是在存量上下功夫。今日存量资产能够重新组合,是由于十八年的改革造就了实施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产品有市场、技术有前景、竞争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在很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增加生产能力;在很多企业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们需要扩大规模。有了这样一批优势企业,这次资产重组就有了核心和动力。

另一个条件是国民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水落石出,短缺经济掩盖的一大批无效企业已无法生存。过去这些无效企业不愿意被兼并,现在主动要求兼并。

认识上的突破是资产存量重组的又一个原因。过去人们总是担心国有企业的比重缩小。现在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能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对国有企业应当缩小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极少数的特殊企业实行国有独资。重点企业实行国有控股。其余大量企业可以采用其他公有制形式。什么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目前还在探索这中。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都可以作为公有制形式。原来“身份不明”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了。股份制又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所以,目前的资产存量重组和股份制改组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1997年形成高潮的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但也可以看出其趋势:从分散、小型流向大型企业集团。从困难企业流向优势企业。从劣势产品流向名牌产品。从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流向生产能力不足的产业。还有强强联合,形成“联合舰队”,以壮大竞争实力。总的来说,是从低回报率的产业、企业,流向高回报率的产业和企业,从低效率的组合方式转变为高效率的组合方式。

国有资产重组不是“洗牌”,而是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是对国民经济痼疾的根除。过去长期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有了解决希望。

小而全的问题有可能解决。1996年,全国列入国家目录以内的汽车厂家从127家减少到116家。这116家中有56家名存实亡。产量居前的13家制造厂的产量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83%。这种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彩电生产厂家也由100多家减少到90多家,行家们预计,经过资产重组,五年以后可能只剩20家左右。

行政区划分割、地区产业趋同的问题也有了新亮点。目前资产跨地区重组。广东科龙电器公司吸纳了成都航空发动机公司和营口冷藏箱总厂的存量资产,在西南、东北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康佳收购了牡丹江电视机厂又和咸阳一家电视机厂联合。青岛汽车厂和拖拉机厂并入了长春第一汽集团。无锡小天鹅公司资本经营的触角伸向了武汉和营口。

为优势企业创造了低成本扩张的条件。优势企业可以直接利用社会上的资产存量,减少投资成本,缩短产出周期,尽快达到经济规模,并实现跨入新行业的战略目标。一些困难企业也可以由此走出困境。优势企业扩张和劣势企业解困,是在不花钱、少花钱的条件下实现的,是投资少、收效大、见效快的路子。

打破了所有制界限,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正在优化。国有企业正在退出一些不必要由国家出资的领域。大量非国有资本进入了国有企业。私人资本到国有企业参股,实力雄厚的私人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吸收社会资本,中国企业吸收外国资本……这些情况在各地都可以看到。

在这一场剧烈变动中,国有经济有可能走出困境。但是,将来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将不是原有的国有企业,而是经过重组以后的新企业。

但是,在国有资产重组中,面临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在计划

经济的基础上重组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组？用计划经济的方法重组还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重组？政府在这次资产重组中应当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一些优势企业不顾经济效益盲目扩大规模会不会出现不良后果？所以，我们采访后除了正面报道《大调整大改组 大联合》之外，还发了《资产重组不能搞运动》（针对各地政府一轰而起的现象），《一边是馅饼，一边是陷阱》（针对一些大型优势企业盲目兼并的现象），《政府有情 市场无情》（针对地方政府搞“拉郎配”，强迫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的现象）。

第五节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所谓市场力量就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价值规律的力量是由价值规律的矛盾运动产生的。这一矛盾运动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如果某个厂家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同一产品的社会平均价值，出售时就要亏损；如果某一厂家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它就可以得到超额利润。这对矛盾运动激励企业不断地降低个别价值，而采用先进技术是最有效的手段。二是价格和价值的矛盾。如果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它的价格就低于价值，生产这种商品就不合算，就把生产要素转向合算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这种商品的价格就高于它的价值，就赚钱，就吸引生产要素向这种产品流动。这就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对市场经济来说，价格有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是激励企业提高技术、降低成本。第二种作用是市场信号，告诉企业应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现摘引其中部分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如果根据这个数字断定印染厂比纺纱厂对国家贡献大，那就大错特错了。问题在于，国家确定的产品价格使得印染厂的利润率比纺纱厂高得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国营工业平均利润率为24%，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样是机械工业，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而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9%。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使价格不能成为经济比较和经济核算的工具，挫伤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利润率过高的企业“一美遮百丑”，在“对国家贡献

大”的外衣下,掩盖着惊人的浪费;利润率低的企业深知,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去,他们也就不去赶了。二、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例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是目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原因之一。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展。当前利润留成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苦乐不均。……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价格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应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市场变化,价格也应随之变化。而现在的价格体系是僵死的。这主要是价格管理过于集中,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品的企业丝毫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

在这种集中体制下,确定或改变一种商品的价格,程序复杂,周期很长。工厂试制出一种新产品,提出成本资料和出厂价意见,先报工、商两个公司协调,再报工、商两个局协调,还要报市物价局或中央工、商两部批准。经常是新产品试制出来了,价格几个月批不下来,致使企业无法安排生产。天津的小学生作业本、圆珠笔等商品的价格五六个月批不下来,学生要开学了,也无法安排生产。

价格管理过死,使商品的价格不能随着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使价格和价值偏离过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价值必然降低。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3倍,化学工业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业只提高了12%,但是它们的价格还保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状况。有些商品,如化纤织物、尼龙袜、电子产品等,这些年发展很快,价值量已经大大下降,而价格一直不

变，致使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家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价格统得过死，商品的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天津东风手表过去供不应求时，每只 120 元，现在市场滞销，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后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用不变的计划价格，来应付变动的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哪有不扭曲的？当然，价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反市场政策造成的。自建国以来，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这种选择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产业，在当时，资本十分缺乏，靠市场机制无法积累资金。所以，只有采用一系列的反市场的行政手段来积累资金。这些反市场政策的核心是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其具体表现就是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政策，低原料价格，低生活必需品价格。这样强制性地压低一部分要素的价格，必然会造成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只是一个经济核算工具，不起调节经济的作用。由于价格扭曲，连经济核算工具的作用也不能发挥。在 80 年代初期，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所以，那时的价格改革，仅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当时叫“理顺价格”。所谓理顺价格，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调价，主要是提高价格，比价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调低的，只能把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从 1979 年到 1984 年，主要是调整价格。

1979 年夏天，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 18 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 25%。同年底，提高了 8 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 30%。1979 年和 1980 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 30% 左右。1983 年，全面

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 31%,纯棉布提价 19%。1983 年和 1985 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 20% 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当时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 年比 1978 年缩小了 14.2,两年以后就恢复到了 1978 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理顺”价格,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哪一个超人能够把握千百万种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且“理顺”它呢?各种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是能够“理顺”的,而是在价格放开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形成的。

双轨价:一颗难咽的苦果

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比原来前进了一步,商品经济第一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理论界在这之前就有过“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的说法。到这时,这些看法开始付诸实施了。

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有前车可鉴:

1948年，联邦德国放开物价，一个月之内食品价格涨了两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示威者高呼“绞死艾哈德”的口号。主管经济工作的艾哈德咬紧牙关，坚持放开物价，同时实行货币改革，终于渡过了难关；

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价格上涨，影响职工生活，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罢工，盖莱克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通货膨胀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例如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如果以1950年的价格水平为100，则1966年为134.2，1976年为132.3）。这样的价格稳定，是用行政手段冻结物价的结果。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表现为价格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包括，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年初，

根据冶金部的介绍,全国 33 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 1984 年到 1987 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 124.6 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 1000 多万吨钢。而最近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 1000 多万吨钢。

市场价格在刺激紧缺物资增加生产的同时,也促进了紧缺物资的节约。天津市最大的钢材用户——天津机械工业局,1988 年钢材综合利用率比 1984 年提高了 2.92%,即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一年可以少投入 6000 吨钢材。

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实行双轨价格以后,提高了原材料的价格水平。使原材料和加工工业品的不合理比价渐趋合理。1986 年同 1978 年比较,采掘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了 55%,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上升了 45%,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仅上升了 13%。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计划内产品,多生产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使一些计划合同不能兑现;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了,到 1988 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1988 年,普通钢材的计划价格是每吨 700 元,市场价格是

1800元。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几万元。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地位就越高。

条子，成了金钱和权力的结合点。通过它，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金钱也可以收买权力。当时湖北省一名罪犯在供词中写道：“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

于是，金钱在腐蚀着干部队伍。从1985年到1988年3年间，天津市物资局每年有一个县团级干部带上了镣铐，还有10多名县团级以下的干部进了牢房。当时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某某高干子弟倒卖钢材发了大财，某某高干子弟倒卖“彩电”成了百万富翁等。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

“双轨价”是“倒爷”的天堂。两种价差越大，“倒爷”发财的机会越大。而物资越短缺，双轨的价差就越大。

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市场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藪，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1988:价格闯关失败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邓小平当时具体怎么说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他5月19日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

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①

6月1日,我们听了一个传达。这是赵紫阳在5月30日的一个讲话,其大概内容是在北戴河会议前中央考虑的8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物价问题。赵紫阳这个谈话,相信是李鹏在政治局传达邓小平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的意见之后形成的集体意见: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2—263页。

物价问题:今年上升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是改革以来波动最大的一年,是改革的关口。这一关闯过去了就好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不解决问题就越来越大。现在议论很多,不满情绪不少。解决的方向总的是放开,接近国际价格。少数商品计划控制。要下决心改革。不改是不行的。但具体工作要慎重……今年和今后都要过好物价关……全党全国都要十分重视物价问题。要把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社会主义改革中最不好过、又必须过的难关就是物价改革和工资改革。不能拖,拖几年难度越大。今年暑期,中央和国务院要重点研究这个问题……

……避难就易、避重就轻搞改革的结果,是把所有的难题都留在后期去解决,把能够利用的时机贻误了。最后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完全丧失,无法解决了。世界经验告诉我们晚解决不如早解决。

……今后几年是改革的险关。过好这些关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任务。这是回避不了的。匈牙利就是改了一些地方,把关键的问题拖下去。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今后几年如果不碰这些难点,过好这几关,也可能会出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局面。要有勇气,不要怕风险,不进则退。

中央最高层下定了 1988 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 4 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 4 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 4 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 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 31.7%,食糖每公斤涨价 0.80 元。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 10 元,其他城市补贴少一些。

谁也没有想到,因补贴问题天津塘沽渔民还闹了一场大事。塘沽有一部分渔民多年以前就进工厂当了工人。但他们的身份还是渔民(进工厂时各种关系都没有转成工人),因此,现在他们拿不到物价补贴,数千人到天津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市政府解决问题。中共天津市委和塘沽区委组织了100多人的工作组,来平息这个事件。当时,我到北塘镇去采访这个事件。看到北塘镇5700多名镇办企业职工全体罢工,工厂一片沉寂。在自行车气筒厂(这个厂不少工人原来是渔民),一位老工人“扑通”在我面前跪了下来,说:“请您务必向上面反映我们的情况。我们一不打鱼,二不种地,别让我们吃高价粮、高价菜了!”这些渔民从物价上涨想到解放前的情况,看到当前物价的涨势,感到惶恐不安。放开物价,广大群众还缺乏心理准备。价格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最容易牵动人们情绪的。

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做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当时政府曾设想,逐步形成工资补贴和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挂钩的办法。后来由于消费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无法控制,工资和价格挂钩,就会进入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停止了这种办法。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以后,涨价幅度这么大。茅台酒的零售价由二三十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当时报纸上宣传改革要付出代价。什么样的代价呢?过去不清楚,现在有了一个形象的答案;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这叫群众怎么不恐慌呢?

在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

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份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1988年的价格改革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由过去的“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变成了“以放为主”。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不放开价格，不让它回到供求关系中去，是不可能达到价格改革的目的的。

但是，当时决策者忽视了一个问题：中国物价放开以后，除了要释放长期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以外，还要释放1984年以来新的通货膨胀因素。这就是国民收入超分配和货币的过量发行。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就是被分配的国民收入超过了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1985年到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6.0%（《中国统计年鉴》），而广义货币（M2）增长了94.26%，货币（M1）增加了79.17%，现金流通量（M0）增长了116%（《中国金融年鉴》）。

从社会上看，物价上涨势头已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从经济本身看，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

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各种家用电器抢购一空。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一个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漫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九3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仅仅动用了300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抢购和挤兑，使社会安定受到威胁。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的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治理整顿：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剂猛药

中央下决心开展治理整顿是从多方面考虑的。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夏阳的一篇调查报告也是促使中央下决心的因素之一。

王志纲、夏阳两人历时两个月，上下几千里的调查，最后写了《中国走势探访录》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当时经济秩序混乱、宏观失控的状况。赵紫阳和李鹏都很重视这篇调查报告。

几年以后，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我谈起当时的情况。他曾对赵紫阳说，治理整顿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纠偏。他建议还是用“十三大”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提法。当时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1993年，安志文去看望在家中赋闲的赵紫阳。赵紫阳对他说，你当时认为治理整顿的提法不妥，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

改革期间的通货膨胀，和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关系的。当时称之为“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是靠增加投入来支撑的。增加投入又是靠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缩。自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次过热和收缩。而过热都是由于各级领导人急于求成造成的。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同客观环境对增长速度的承受能力形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反复碰撞，就是过热和收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又一次的经济收缩，通过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当时认为经济过热。主要是乡镇企业增长太快，所以提出压缩乡镇企业。邓小平还要各级干部用“党性”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但强行压缩对乡镇企业要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到大连市郊区采访，乡镇企业干部用激烈的言词指名道姓地批评邓小平压缩乡镇企业的说法。1988年压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

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治理整顿提出了6项目标:一、降低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幅度降到10%以下;二、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三、财政收支平衡,逐步消灭财政赤字;四、在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5%—6%;五、改善产业结构;六、建立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

稍微熟悉经济的人都知道,这6项目标在短短的治理整顿期间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1990年,参加起草这个《决定》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到《经济参考报》社座谈。我向他提问:“改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是经济改革的长远目标,怎能在3年的整顿期间完成呢?”他无言以对。

目标是目标,实际做的是对经济进行紧缩,改变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局面。当时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1988年的抢购把人们吓怕了,因而下了一剂猛药,算是把扶摇直上的物价控制住了。1989年,社会零售物价指数的17.8%。但它带来了3年的经济萧条,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在治理整顿的6个目标中,不管其他目标实现得如何,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算是达到了。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为17.8%,1990年为2.1%,1991年为2.9%。当然,为实现这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经济增长率如此大幅度下降,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

1992:价格全面放开

治理整顿,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双轨价”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在差额已经大大缩小,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会有多大的冲击了。

更为重要的是,1992年,政治环境也显得宽松了。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此是后话。

因此,从1987年以来进入困境的价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

过去几年的价格改革,凡是供求关系不是很紧张的商品,基本都放开了。而供不应求的商品(称为短线商品),还是由国家控制。结果是,价格放开的商品发展得快,国家控制的商品发展得慢。这就是人们说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这些供求紧张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这是因为加工业的发展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发展。

放开,放开。1992年也许是价格放开最多的一年。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得最多。到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他工业品价格也大步地放开。1991年底,国家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有60种,

1992年就放开了5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都全部放开了。

最惊险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

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长期以来,国营粮店对城镇职工的粮食的销售价格,低于国家从农民那里的收购价格。差额由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用这些钱可买好大米100公斤,这是将近一年的口粮。理论界早就算出了这一笔帐,建议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过去一直把粮食价格当政治问题。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作好充分的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现在全面放开粮价的确需要勇气。但是,在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比较多,这些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还希望抢购走一部分。所以,这次全面放开粮价,比过去玉米面提一分钱还简单。事先没有保密,也没人去抢购。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价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按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计算,95%已经放开;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90%已经放开;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85%已经放开。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价格也有20%左右,中国放开价格的比重不比西方国家低。可以说,价格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这时,不少人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价格放开到这么大的程度,但价格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价格能否正常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作用,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看价格是否由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能否反映供求关系。从1993年的情况来看,价格虽然放开了,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例如:

同一种商品在相同的销售条件下,价格相差悬殊。同一种商品对不同的顾客索价不同,要价的根据既不是商品的价值,也不是供求关系,而是能要多高就要多高。同样一件衣服,在这个商店买花 100 元,在另一个商店也可能花 50 元买到。任意“宰”顾客,几乎是普遍现象。

国家虽然放开了价格,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并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国营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宁可烂在仓库里,也不降价卖;有些国营企业的采购员,并不是择优选购,而是按回扣多少选购——国营企业对价格并不敏感。

有些商品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现象。价格放开以后,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当时还有一种“暴利现象”。有些商品,有些行业,利润率高达 100%,甚至更多。《经济日报》报道北京一家大商场的有些商品,利润率高达几十倍!

这些情况说明了,计划价格虽然废除了,但是市场定价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价格处于一种无序的混沌状态。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放,还要立。要建立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价格的法制体系。价格放开不等于价格自流,要用种种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如“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对价格很敏感的企业,为了防止价格混乱,价格管理部门还不能立即退出市场,还要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管理办法。

作为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价格是指广义价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价格。所以,价格改革还应当包括后两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地租),外汇的价格(即汇率),技术的价格(即技术转让费)等。其中最关键是利率。从理论上说,为了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应当由市场来形成和调节。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革,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因为这些都是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结果。没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市场利率;没有外汇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自由汇率;没有完善的技术市场,就没有合理的技术价格。

如果说要素价格的改革取决于各方面改革的进展的话,那么产权价格的改革更是取决于各方面改革的深度。例如,作为产权价格的一种——股票行情,应当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前景。中国的股市状况离这个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第六节 财富分配:中国新的富人和穷人

从改革开放的10多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跟踪采访,发表过数十篇新闻稿件和分析文章。我认为,中国的分配改革的总趋势是由平等分配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演进的。我这里用“平等”而不用“公平”,是因为“平等”意味着“平均”,“平等”却远非“公平”,而“公平”却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平等分配不等于公平分配。而效率分配则是依据劳动效率的高低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也是刺激劳动效率提高的一种分配方式。

收入分配改革的大体历程

1977年秋天,天津市工业生产指挥部(经济委员会的前身)主任王占赢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中央同意恢复奖金制度。

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消息。50年代初期,工厂里曾经有过奖金制度。1957年以后,它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取消了,原来作为奖金的那一部分资金当作“附加工资”平均发放到每一个人(4元钱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里革命大批判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批判“物质刺激”。那时我到工厂采访时,不管到哪一个单位,不管参加哪一个工厂的批判会,都能听到工人们慷慨激昂的控诉:“奖金挂帅”如何腐蚀工人阶级,如何影响工人之间的团结,如何影响政治挂帅等等。1972年,一位工业界的朋友私下向我表示,如果把“附加工资”拿出来奖励贡献大的人,生产至少可以增长百分之五十。这种悄悄话如果公开出来,一定会被作为修正主义言论加以批判。

1978年冬,天津拖拉机厂铸造车间大箱体工段作为恢复奖金的试点单位。我在这里跟班劳动了一个月。刚刚恢复奖金时,考核很严格,效果也很明显。我写了一篇《效果显著,势在必行》的调查报告。发表后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与此同时,广州的黄埔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度。计件工资制度和奖金一样,过去也被作为“物质刺激”的手段而屡受批判。

这些,在当时都算是大胆的尝试。这些尝试打破了20年的平均主义,拉开了分配改革的序幕。

1978年,国家规定奖金制度的试行面控制在30%以内。实行奖励制度的企业,奖金总额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10%。

随着奖励制度的全面推开,在奖金分配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恢复奖金制度和企业利润留成差不多是同时推进的。在考虑企业

的留成比例时,要考虑给企业留下多少奖励基金,这是国家和企业讨价还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始规定一年的奖金不能超过一个月的工资,后来又放松到不超过一个半月、两个月的工资。企业还是认为奖金“封顶”限制了职工的积极性。这时有的煤矿试行“吨煤工资含量包干”,建筑行业则试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挖的煤越多,或创造的产值越多,工资就越多。这才解决了奖金“封顶”的问题。

1984年,随着企业实行利改税。国家规定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税利增加的前提下,发放奖金可以不“封顶”,但要交纳奖金税。奖金税是超额累进制,奖金在两个半月工资以内不征奖金税,四个月以内交30%所得税,半年以内交100%的奖金税,半年以上交300%的奖金税。各企业提取的奖金额,可以用于发放奖金,也可以用于实行浮动工资升级。

分配改革开始只限于奖金范围之内,到80年代初还没有触动工资制度。还是实行每隔几年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一次工资的做法。每一次调整,只给以一定的比例,不是每个工人都能升级。因而把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转化为工人之间的互相争夺。到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企业的工资制度。

1985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的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总额与上交利税挂钩;国家对企业工资实行分级管理,除核定挂钩方案以外,不再统一进行企业的工资改革和调整。从此,企业的工资由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定。国家只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

1986年12月和1987年3月,国务院分别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和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奖金也在工资总额之内)和政策范围内,对企业内部职工工资、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以及调、升级时间、对象等,由企业自主决定,国家一般不

作统一规定。这时企业奖金税的30%的最低税率和300%的最高税率也分别降为20%和200%。

国家怎样规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呢？一般是工资总额和上缴利税挂钩。上缴得多就可以按比例提取较多的工资总额。上缴得少，工资总额就提取得少。企业亏损，一般就不能提取奖金。属于政策性亏损企业，工资总额就和减少亏损的额度挂钩，亏损减少得多，工资总额就提取得多。

在企业内部，一般把企业的经营目标层层分解成若干指标，落实到车间、班组、个人，再按完成指标的情况进行分配。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原来实行的工资制度是50年代制订的。到80年代各种积累的问题很多。这部分人员的工资和企业职工的工资分开以后，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他们的工资由4部分组成，即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从1986年起，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改革职称制度，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按照专业技术职务确定工资。到90年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务员制，其职务工资是主体。

在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进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过去，企业的职工是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到企业的。绝大多数人一次分配定终身。企业不能选择职工，劳动者不能选择就业单位。通过10多年的改革，逐步实行劳动合同制。这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198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对新招工人试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将劳动合同制扩大到所有的新招职工。1991年才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过去，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直到1993年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才正式确认劳动力是商品，确认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也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工资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它的高低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然，劳动力是商品，并不等于劳动者是商品。因为劳动力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者出卖的是他的劳动能力，而不是他自己。这个观点

在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得到了确认。

确认劳动力是商品对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劳动力还没有真正商品化。

工资和劳动的改革,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系统内,即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其改革方向,是由国家制衡逐步转向市场制衡,由平均主义转为效率优先。而在计划经济系统之外,如私有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从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市场的性质,但由于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其分配是很不规范的。

非工资性收入:脱缰之马

工资改革只限于工资性收入方面。在这方面虽然不断地走向合理化、规范化,但非工资性收入却像一匹脱缰之马,失去了控制。

由于工资外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在职工总的货币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1982年这个比重为74.9%,1989年为55.9%,到90年代降到50%左右。这是个平均数,对有些人来说,工资外收入大大超过工资收入。改革以来,城镇居民工资总额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几,而他们的储蓄存款的增加幅度,每年平均却达30%—40%。这是工资外收入快速增长的结果。

工资外收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本单位发放的各种工资外收入,如劳保福利费,以各种名目发放的补贴,等等;二是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通过额外劳动取得的收入。如第二职业的收入、兼职收入、稿费、讲课费、咨询费、劳务费等;三是各种灰色收入,主要是“寻租”收入;四是资产性收入,其中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收入。

由单位发放的工资外收入,随各单位的经济效益状况不同而

有很大的差别。我在深圳采访中得知，中央某部门驻深圳一家公司，1993年底每个职工发4万元，相当于一般单位3年的工资，当然，公司领导人拿的就更多了。在一些不赚钱的单位，这样的收入就很少，特别是那些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就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保证。

职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通过额外劳动取得的收入，其数量因人而异。第二职业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到90年代几乎半数以上的职工都有收入不等的第二职业。最一般的是下班后在马路边修自行车、理发；还有一些人上班干活，下班做买卖。稿费、讲课费、咨询费，是知识分子的工资以外的收入。这依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名望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从名义收入中，的确有“体脑倒挂”的情况（即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如果加上这部分收入，“体脑倒挂”的情况就不存在了。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市场对那些有真才实学、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偿。

在改革之前，中国人是很少有资产性收入的。那时把非劳动收入看成是剥削。到80年代后期，这类收入开始多起来了。资产收入中有地租、金融资产的收益等。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价猛烈升值，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用土地在一些企业里入股，就可以得到巨额收入，这实际上是地租。在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地租。在广东的城镇郊区，凡是有农村户口的，他们坐在家，就可以得到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收入。在金融资产中，股票收益也是重要的一项。金融资产收入中最普遍的是存款利息和债券利息。从1985年到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利息大体占同期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按当年价格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新增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四分之一变成了居民的利息收入。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地上升，1986年到1990年分别为13.8%、13.8%、11.9%、32.2%和

39.2%。^①当然,这笔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因为80%的存款余额掌握在20%的人手里。

灰色收入一般指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正当但不违法的收入。另一种就是违法收入。也有人把前者称为灰色收入,把后者称为黑色收入。在社会转轨时期,原有的法律、规定,有不少已经失效,新的法规还没有建立起来,法与非法的界限有时难以划清。掌握各种权力的官员,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但生活水平不低,人们说这些人的工资“含金量”高。在双轨时期,“寻租”收入是一项重要的灰色收入。计划价格和 market 价格的差价,计划利率和 market 利率的差额,称为“租金”。“寻租”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这些“租金”的活动。紧缺的计划内商品、计划内贷款,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员掌握着的。通过行贿受贿手段,行贿者得到“租金”,官员们得到贿金(贿金也是对租金的一种分配)。另外,在转轨时期,不少赚钱机会(如办营业执照、股票上市、进出口许可证、土地批租等)也要官员们审批。追求这些赚钱机会,也是一种“寻租”过程。灰色收入的透明度很低,很难作出明确的描述。更多的情况下,不是一笔“贿金”换一笔“租金”,而是平时对掌权者大量的“感情投资”(各种形式的高额送礼),在需要审批的时候,掌权者就会给以方便。只有老百姓才“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商家对掌权者经常“烧香”。

职工的工资外收入名目繁多,渠道复杂,隐蔽性强,也是一笔“说不清、查不明、管不了”的糊涂帐,是一种很不规范,很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人们抱怨说,在这个领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胆分胆”和“按权分配”,结果是“撑死胆大的,坑了胆小的”。

工资外收入失去控制,是和放权让利的企业改革相伴随的。在国有企业里,谁真正代表国家的利益呢?厂长基本上是代表企

① 郑廉明:《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的症结和态势》,载《经济管理》1992年第4期。

业利益的，但他的目标就是在任期内为职工办几件事，能多分就多分，亏损是国家的。由于工资性收入要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工资外收入就是逃避这种控制的一种手段。80年代中期以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办经济实体，都搞“创收”。赚来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成了这些单位职工的工资外收入。

工资外收入还有重要一项，就是住房。在这方面，国家机关干部占有优势。在企业里，除了领导干部外，普通职工是很难分到住房的。住房是以官阶高低来分配的。在北京，司局级干部可以分到100平方米左右。按每平方米4000元计，价值40万元，每年的利息就是4万多元，而他一年所交的房租却只有五六百元。住房的分配方式是改革前遗留下来的问题，虽然邓小平提出房屋商品化，但进展十分缓慢。

非工资性收入大大超过工资收入，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已经崩溃，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工资制度。

转轨时期收入分配的几个特征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分配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国民收入的分配向个人倾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49.3%，1984年为59.6%，1985年为58.7%，1986年为58.9%，1987年为59.6%，1988年为61.7%，1989年为62.9%，到1990年为61.7%。^①

国家计委综合司的白和金等人计算的结果是：在初次分配中，1978年居民所得为162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8%；到

^① 胡海峰、白明本：《对当前国民收分配格局倾斜问题的考察》。

1995年分别为3.3889万亿元和58.7%。与1978年相比,居民个人所得增长19.9倍,年均增长19.6%,高于同期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个百分点,所占比例提高了13.9个百分点。再分配后,1978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179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6%,到1995年分别变为3.793万亿元和65.7%,与1978年相比,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增长了20.1倍,年增长率为19.7%,高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两个百分点,所占比例提高了16.1个百分点。^①

改革以来,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逐年加大了。对这种现象,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但多数的意见是,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是合理的。在改革以前的几十年中,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把居民弄得很贫困。现在适当向个人倾斜,是对居民的一种补偿。

第二,体制内收入的均等化和体制外收入的差别过大同时并存。

体制内是指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体制外是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不受国家计划控制的单位。

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的调查,1988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的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缩小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

90年代初,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制度、事业单位实行专业技术职称聘任制以后,工资性收入差距有所拉开。但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的比重缩小,单位内部的非工资性收入又是平

^① 白和金等:《17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分析与“九五”调控建议》,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6期。

均发放的，所以收入差距还是不大。

在体制内，虽然一再强调拉开收入差距，但差距拉开以后，人们又千方百计地去向高处攀登，结果又出现在更高的层次上比较利益的复归。

与此同时，体制内人员的收入和体制外人员收入之间，差别也十分悬殊。体制外，一般劳动者和企业主、“三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差别很大。一些从事合法或非法的特殊职业和进行特殊经济活动的个人，收入比普通人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教授计算，1988年，在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中，20%的最低收入的人占总收入的10%左右，基尼系数为0.2321；在非国有经济的工作人员中，20%的最低收入的人只占总收入的3%，20%最高收入的人占总收入的54%，基尼系数为0.4929。^①

基尼系数是度量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它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吉尼首先提出的。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变动。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平等。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占有。从赵人伟教授的数字中可见，在体制内的分配比较平均，在体制外收入悬殊很大。

体制内收入均等化表明，在国有经济系统，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而在非国有经济领域，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改革以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比较大。1957年，城市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3.48倍。1978年为2.36倍。差别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一边是现代工

① 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城市农村和区域》，载《改革》1992年第2期。

业,另一边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农产品低价政策和严格控制农民进入城市,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几年,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农村改革先行一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9年开始缩小。1983年这个差距最小,城市居民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收入的1.85倍。这种缩小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提高农产品价格)和突变性质(体制的变更使潜在生产能力的释放),但是这种动因是不可能持久的。

事实正是如此。从1983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逐渐扩大了。到1990年,达2.42倍,超过了1987年的2.36倍。1993年扩大到2.8倍。1994年为2.86倍。

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忧虑。

第四,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东部地区是指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西部地区是指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学界把粤、闽、浙、赣、苏、鲁、皖、京、津、沪10个省市称为东部地区;把桂、黔、川、滇、陕、甘、宁、青、新疆、内蒙、西藏11个省区称为西部地区。

1988年,我以“中国东西经济关系”为题,到东西部1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过调查,发现改革以来东西部经济差距正在急剧拉大:

工农业总产值的差距:1981年2561.6亿元

1985年4359.9亿元

1986年5390.7亿元

1987年6785.9亿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1981年72.07元

1985年170.67元

1986年 259.622元

1987年 331.622元^①

在调查中，西部省份的负责人强烈地向我反映，改革以来东西差距急剧拉大，在经济、政治、民族等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我这次调查以后，东西部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以典型的西部省份甘肃和东部省份江苏比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是：1978年 53.7元，1985年 237.4元，1990年 528.08元，1992年 522.3元，1994年 1107.8元。

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缩小东西部差距一直是西部地区的人民代表的强烈呼声。

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地区均衡发展战略。那时，国家以廉价从西部调出资源（西部资源丰富），交给东部加工成产品（东部加工工业发达）。东部把加工得到的利润全部交给国家。国家财政再投资开发西部资源，并给西部以财政补贴。中央政府统筹全局，兼顾东西。改革以后，国家放弃了均衡发展战略，给东部沿海地区以优惠政策，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这是80年代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原因。进入90年代后，全国市场化进程加快。以资金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根据其自身和运动规律向增值最快的方向流动，也就是从西部向东部流动。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

中国的两极：富人和穷人

邓小平在1978年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呢？后来在经过整理的讲话稿中说得比较明确：“在经济

^① 杨继绳：《大地没有万里平》，载1989年2月27日《瞭望》周刊。

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①

在中国,这是最富有刺激性的一句话:它使那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恼怒,它使一些有能力的人跃跃欲试,它也使一些孱弱者忧心忡忡。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展,的确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先富起来的并不完全是“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到90年代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富裕群体。这个群体是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的:

——股票经营中的获高利者。这些人主要在广东(主要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成都等大城市。其中获利高的一年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主要在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靠炒股票发财的机会很少了。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其中百万富翁不在少数,亿万富翁也不断增多。

——歌星、影星、少数体育运动员。他们以自己的特殊才能和知名度,获得了特高的收入。特别著名的歌星、影星,每一次出场费的收入就有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有点名气的也有数千元。出场费多少是以其知名度大小而定的。

——乡镇企业及其他集体企业承包人。一年下来得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承包收入者不在少数。而承包基数小、承包条件优越的企业,一般都是和乡镇干部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得到的。

——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和办事人员。如银行信贷员、税务稽查员、工商行政管理员以及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这些人所得的大多是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其数量多少很难说清。

——企业经理人员,特别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经理人员。一般年收入有二三万元,多的有四五万元,也有十来万元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建筑承包商，即承包建筑工程的“工头”。如果承包了比较“肥”的大工程，其收入十分可观。为了得到这样的工程，还得给有发包权的官员行贿。

——“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外方独资企业的中国高级雇员。因企业不同收入在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之间不等。

——部分新办公司的负责人。不管是那个单位兴办的公司，经理人员是个“肥缺”。不管公司是赚是赔，经理是不会吃亏的。

——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这些人有比较丰厚的收入。特别是以家庭工业为主的地方（如温州），他们从外面承接生产任务，再分给各个家庭加工，再从家庭里收购上来向外推销。他们获利比搞家庭工业要高得多。

此外，还有能拉到“饭局”（不是为散客服务的）的餐饮娱乐业主，搞服装贩运赚差价的批发商，为个体书亭搞批发的书商，等等。他们的年收入也是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

上面所列都是 90 年代初的情况。

上述 10 多种人虽然数量不大，但掌握的财富较多。据分析，1995 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975 亿元，其中占全国人口 2% 的高收入者的储蓄约占其中的 30%。另据世界银行 1997 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 1980 年基尼系数为 0.28，1995 年为 0.38。不仅收入差距拉大速度较快，现在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国家。

中国到底有多少百万富翁？各方面的说法不一样。国家工商管理部说，1994 年有 5000 多人。这个数字他们也说是很不完全的。一位经济学家估算，中国拥有 100 万元以上资产的至少有 100 万人。据 1996 年第 6 期《求是》杂志资料，全国拥有 100 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 100 万人。个别地区的富翁更多。《金融时报》载，深圳宝安县大坑新村，39 户 130 多口人，拥有宝安股票近 4 亿。按时价计算，人均占有股票面值就达 300 万元。

除了上述高收入者以外,有些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很高,而且很稳定。如金融保险业、外贸外经业、电力运输业、邮电业等,其收入比其他行业要高出一到两倍。他们不是富翁,但早早地达到了“小康”水平。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高收入群体,使一些普通老百姓不敢问津的高档商品销售不衰;正是这一个高收入群体,才使得燕莎、赛特这种高价商店生意兴隆。出入歌厅酒楼的,乘私家汽车的,送子女进“贵族学校”的,都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引导着消费潮流,改变着社会风气。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议论对象。有人迷惑不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先富起来的应该是这些人吗?用过去“勤劳致富”的标准来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因经商成功而致富,因有特殊才能而致富的;但是,其中确有一批人,是利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漏洞,运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大发其财的。

与上述高收入群体相对应的是一个低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抽选了全国 550 个市县、15 万户居民家庭的生活资料,测算出 1993 年的贫困标准为人均月收入 94.2 元,困难标准为人均月收入 112.9 元。1993 年各地贫困标准(人均月收入)是:北京,143 元;天津,97.4 元;山西,67.6 元;吉林,70 元;上海,168 元;江苏,108 元;浙江,142 元;福建,106 元;江西,62 元;山东,101 元;广东,157.6 元;河南,87.3 元;海南,91.2 元;贵州,73.2 元;新疆,60 元。1996 年第 6 期《求是》杂志称,农村有 7000 万人人均年收入不足 300 元,城镇有 2000 万人人均月收入不足 200 元。

贫困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以北京为例,1993 年在机关食堂一餐普通饭也得 3 元,如果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一个月得 225 元。这一年北京的贫困标准是 143 元,连吃饭都很困难,更不用添置衣物了。随着物价上涨,贫困标准也相应提高了。

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是:经济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职工,离、退

休干部,中小学校教师,没有经济管理权力的一般机关干部。他们的生活清苦,不少单位连看病的医疗费也不能报销。

在农村,贫困的人数更多一些,贫困的程度更为严重一些。1993年国家公布的数字是,全国有8000万农民还不能得到温饱。

90年代中期,中国最贫穷的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还是摘引部分资料来说明:

一个资料是我1994年到新疆同新华社记者柴怀吉、王伯瑜共同写的一篇调查中一部分:

据调查,全疆85个县市中发生赤字的有73个,在这些县中,有32个县和250个乡镇党政机关与公检法机关,在50年代建造的土房里办公,有40多个乡镇机关租用群众的房子办公。相当一部分职工住宅年久失修,已属危房。还有122个乡镇没有卫生院,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缺医少药。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4地州,仍有84万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农牧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农户全部家产只有两间篱笆门窗的破土房、两条毡子和一口锅。部分贫困户甚至连毡子也没有。他们人均每天生活费只有0.55元到0.68元。生活困难致使大批学生辍学。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仅和田地区就有2953名初中学生中途退学,退学率达25%。到1993年,全疆仍有370万农牧民的饮水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农牧民继续饮用有严重污染的涝坝(池塘)水导致某些地方传染病连年发生。

另一个资料是我1996年到湖南采访时了解到的:

安化和新化是湖南省的贫困县。共有人口220万,其中有60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贫困人口,有不少家庭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蔽风雨”。有些地方，十五六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有些农户靠蕨根填饱肚子，很多三十多岁的男子找不到妻子。在这些贫困山村，还流行着各种地方疾病。125万人的新化县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的占总人口的40%，人均收入不足150元的占总人口的19.4%。57万人缺粮。30岁以上的光棍有3万多人。文盲、半文盲占全县总人口的47.4%。这两个县如此贫困与地理环境恶劣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60年代修建柘溪水库，淹没了部分良田，切断了资江的航运，库区的移民安置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有森林过度采伐，破坏了生态环境。此外，县级财政十分困难，缺乏自我开发、自我脱贫能力。安化县29个乡镇，能发出工资的只有6个乡镇。今年1—3月，全县财政收入只有900万元，而仅是工资开支就需要1800多万元。全县一年财政收入是7200万元，而860名退休教师，一年需工资5500万元，行政干部工资需要3600万元。结果，教师工资只能安排3100万元，干部工资只能安排3000万元。

还有一个资料是新华社贵州分社两位记者提供的：

据贵州省1994年统计，全省人均年收入400元以下的900万贫困人口中，人均收入200元以下（其中75%—80%是自产粮折价）的极度贫困人口就有392万。离丹寨县城只有6里的龙洞村，全村40多户，几乎都是贫困户。52岁的王国云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家里只有几只鸭子和几件捐赠的衣服，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两口子的“床”是石块垒起来的，“床”上唯一的東西是干草。杨国梅住在只有茅草围四面的、无墙的牛棚里。剑河县久仰乡久丢村146户781人，全村仅有164床棉被（其中61条是捐赠的），118件棉衣，688套

完整的单衣,每人还不到一套完整的单衣。这 900 万贫困人口主要居住在岩石裸露的大山区,自然环境差,有许多县不通乡级公路,没有电,没有电话。信息不灵,文化水平又低,使这些极度贫困户缺乏改变生活条件的精神和能力。

从全国来看,极度贫困的人口为数很少,而且有居住地理环境上的原因。但是,和那些为数很少的暴富形成强烈的反差。一部分人花天酒地,一部分人食不果腹;一部分人在豪华宾馆里大肆挥霍,一部分人衣不蔽寒,住不蔽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毕竟是人们心理上难以忍受的事。这是中国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进入 90 年代以来,贫富悬殊成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据《经济研究》1995 年第 8 期张问敏的文章介绍,1988 年到 1993 年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财产收入差距,以每年 52.3% 的速度扩大。在人均储蓄存款中,1988 年到 1993 年,最低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之间的高低差以 27% 的速度扩大。张问敏说,上述是居民自己的填报数,实际的财产差距比这要大得多。

贫富悬殊使人们的心理不平衡,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方面,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使那些以权谋私的人暴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原因使得一部分国营企业职工、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农民处于贫困境地。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愤愤不平。贫富差距拉大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钱权交易的作用。人们强烈要求打击钱权交易,杜绝黑色收入。

为了防止市场机制造成收入差别过大,对微观收入层次上的分配效率优先,主要是由市场起作用的,这是第一次分配。国家还要从公平的角度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手段一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二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在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由于在转轨时期收入很不透明,特别是它将损害一些官员的利益,个人收入所得

税可以说是失败的。它根本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是按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度。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应当是比较完善的。但是,由于经济落后,国家贫穷,其社会保障还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北欧一些国家更无法相比。

改革以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实施范围很窄。当时的社会保障只有全民所有制职工和部分集体所有制职工才能享受。城市的其他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在城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才能享受社会保障。在农村,广大农民更没有享受的权利了。从全国总人口来看,能享受社会保障的人仅为10%左右。

原来的社会保障都由企业承担。劳动者的生、老、病、死、残都依赖企业。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保障质量就很差。企业破产,劳动者就失去保障。一些老企业退休人员的比重很大,养老保险的负担很重。有的企业一个在职人员要负担一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新建企业的养老负担就很轻。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程度加强,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适应了。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1984年就开始试行,当时改革的内容是国营企业退休费由单位负责改为社会统筹。即每个企业按职工人数向统筹部门交纳退休基金,退休后由统筹部门发退休金。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大方面之一。从此,社会保障改革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不过,在90年代初筹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劳动部、卫生部、民政部、全国总工会、保险公司等多个部门都想承办这项事业,实际上是想控制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由于部门之争,意见就很难一致。直到1994年底,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人们称之为“多龙治水”。因此,人们要求在国务院设立统管社会保障的部门(可称社会保障部)。在有的地方,社会保障部门大楼是最好的,职工收入是最高

的,任意挥霍职工的保险费的情况也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中国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很长一段艰难的路程。

第七节 复杂艰难的财政体制改革

中国的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计划改革、劳动工资改革,都和财政改革互相关联。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十分艰难的历程。

从统收统支到财政包干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指令性计划的工具。它的特征是:

一、几乎囊括了全社会的一切资金收支活动,实行全社会的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它不仅包括国家预算,也包括银行信贷、国营企业财务、基本建设财务和社会文教卫生各方面的财务。

二、既管宏观,也管微观。作为国家财政,它除了管国家预算以外,还直接介入每一家国营企业的生产、投资、分配等微观经济活动。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国家财政部及其各级财政局,是成千上万家企业共同的财务科。

三、无偿使用资金。国家按预算规定的数量、用途和程序,分配、拨付给使用单位的财政资金,是无偿使用、不付利息、不必归还的。

四、国家预算按单式预算方法编制。即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合二为一。二者互相挤占。当强调发展经济时,建设资金就挤占经常性资金;当财政赤字太大时,经常性资金就挤占建设资

金。

五、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没有规范的关系。一会儿扩大地方财政权限，一会儿集中财权。20多年来变动频繁。

六、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国营企业上交的利润，占第二位的是各项税收。改革前的1978年财政收入中企业收入占51%，各项税收占46%。当时认为国营企业是国家所有，不能向国家交所得税，只能上交利润。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税收已经失去了税收的一般含义，只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手段，没有调节经济的作用。

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对集中财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起过积极作用。但它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助长了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资金使用效益和投资效益很差；财政税收失去了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

财政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改变过去统收统支的做法，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且增强财政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功能。改革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一是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二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是改革财政管理，增强调节经济的功能。

调整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让利。自1978年以来，先后对国营企业实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两步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但是效果如何却是争论不休。财政部门说：从1981年到1990年，国家通过各项减税让利措施，增加国营工交企业财力4200亿元。扣除同期出台的新税种，征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等收回1100亿元后，企业净增加财力3100亿元。财政部还有另外的一组数字，说1988年企业自留利润的比率为55.6%，比1978年提高了51.9个百分点。但是，工交企业部门却另有一笔帐。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在1990年6月对193户国营企业进行调查，结论是：1989年，在这

193户企业的纯收入中,81.6%通过税、利、费、券等形式上交各级政府了;10.02%用于归还专项贷款;企业实际留利只占纯收入的8.2%。改革十几年,财政部门 and 工交企业部门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激烈的是对首都钢铁公司承包问题争论。财政部门认为,首钢通过承包使财政受到损失,在利润的增量中首钢拿了“大头”,国家只拿“小头”。首钢和一批支持者认为,通过承包,首钢对国家的贡献比不承包的企业大得多。这些争论表明,放权让利,并没有真正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

在调整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同时,也调整了中央财政同地方财政的关系。由过去中央和地方共吃“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这也是中央向地方的放权让利。

1977年,国家选择了比较富裕的江苏省试行“固定比例包干”办法。1978年又在10个省市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办法。应该说,这些办法都扩大了地方的财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并决定当年执行。这是一项重大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所谓划分收支,就是把收入分为3类:一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中央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和中央其他收入,是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地方企业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地方税和地方其他收入,是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二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成的收入。如原来是地方企业后来上划给中央部属企业,其收入中央分80%,地方分20%。三是调剂收入,工商税是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分配比例根据各地收支情况确定。在支出方面,分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经常性支出按企业和事业的隶属关系划分资金来源;专项支出仍由中央财政以专款形式下拨。所谓“分级包干”,就是按上述收支范围,以1979年收支预计执行数为基础,经过适当调整,计算出包干基数。凡是收入大于支出的地方,多余的部分按一定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

地方,不足部分由工商税进行调剂。个别地方工商税全部留下还
不够的,由中央给以定额补贴。

大部分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对有一些省、
市、自治区有一些灵活措施。如,对广东、福建两省给以更多的预
算自主权;对江苏省继续实行固定比例包干的办法;对5个民族自
治区和少数民族比较多的青海、云南、贵州,通过划分收支范围,确
定中央给这些地区的补贴数额,并在这个基础上每年递增10%
(到1994年就不递增了)。对3个直辖市,仍采用“收支挂钩,总额
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

这个办法把过去的全国“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将预算
“条条”(即中央部门)为主,改为“块块”(即地方)为主;将过去收支
指标一年一变,改为五年不变。

1985年3月,为了适应第二步利改税的改革,又实行了“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这是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
改进。其改进之处在于,改变了按企业、事业行政隶属关系的划分
收入的办法,以划分税种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依据。
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这为探索分税制
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9年以后才真正实行分税制。

1988年,又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办法,各省市采取不同的形式,
向中央财政实行收入承包,一定三年不变。包干有不同的形式。
一是收入递增包干,以某年为基数,再确定递增率,地方保证在这
个基数上每年上交递增多少,剩余的都是自己的。二是总额分成。
在收入总额中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三是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

在中央对各省、市实行财政包干的基础上,省对地市,地市对
县,也都仿照中央对省的办法,层层实行财政包干。对乡、镇也是
如此。

改革以前,地方和企业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财政包干
使地方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这一变化,大大调动了地方发

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改革中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大量增加，地方财政管理权限扩大了。各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使地方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这是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各级政府的手中有了钱，办了一些过去多年想办而无力办的好事。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市政建设和职工住宅的建设规模，都远远超过了过去 30 年的总和。各地多年荒废的文化古迹、旅游名胜，也修缮一新。有不少地方还用地方的财力修公路，建桥梁，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

“诸侯经济”

放权让利和地方财政包干，实际上是调整国家和企业、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它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给企业、给地方一些支配财富的权力。从实行的结果来看，对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有好处，但也带来了不少负效应。

首先是造成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壁垒，形成市场分割。也就是形成了们所说的“诸侯经济”。为了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当资源紧缺时，各地一方面禁止本地资源外流，还想方设法到外地寻求资源。于是，羊毛大战、蚕茧大战、烟草大战、苧麻大战、有色金属大战等等，烽烟四起，愈演愈烈。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有的省动用了大量的人力，采取种种措施来“保境戍边”，常备不懈。1988 年，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为了防止蚕茧流向外地，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的山境检查。防护越严，突破的手段就越高。1988 年，四川省各级政府严令控制生丝外流，而广东省一些单位却用高额回扣，甚至用军事押运的办法，瓦解了四川的防线。经济壁垒不仅阻碍商品流动，也阻碍资金流动。当资金紧张时，当地银行常常不让资金外流。这是企业间的“三角债”、

“连环债”的一个原因。

“诸侯经济”造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甚至表现在经济犯罪的案件审理上：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总是有利于本地的当事人，因为本地的当事人打输了官司，本地经济要受到损失。

“诸侯经济”是假冒伪劣商品“打”之不尽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放纵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四川一位名牌商品的经理向我讲了他的苦恼。他的商品被一些地方假冒，他到这些地方请求当地的主管部门查处。还每个地方给10万元的查处费用（由于这些部门经费不足，照例由当事人给钱）。当时停止了生产，但半年以后就又开始生产了。他们不得不再给10万元，请求当地于查处。当地查处伪劣商品的部门从此有了一笔固定收入，如果伪劣商品消灭了，这笔收入也就没有了。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走私十分猖獗，其中不少是地方政府支持甚至直接参与的。除了参与的官员中饱私囊以外，发展地方经济也是一个动机。

“诸侯经济”使得各地在建设上只看局部利益，不看全局利益。什么商品赚钱，各地就都上什么商品。造成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例如彩电生产线一下子上了100多条、2000万台的生产能力。而当时市场对彩电的需求量不到1000万台。由于加工工业利润大，收效快，各地大上加工工业。结果，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

“诸侯经济”刺激各级政府追求高速度，推动了经济过热。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千方百计地追求产值的增长。而增加产值的途径就是搞基建、铺摊子，从而造成了“投资饥饿症”。每当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要压缩基建投资，总是压不下来，而经济过热又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诸侯经济”使中央政策到地方变形走样，很多政策无法落实。有的地方用“见了黄灯抢着走，见了红灯绕道走”的办法，来逃避中央的宏观调控。中央一项政策出台以后，各地不是研究如何贯彻

落实,而是研究这项政策有哪些空子可钻,如何利用这些空子为地方利益服务。

“诸侯经济”使不少人忧虑。有人担心经济割据会引起政治上的离心力。两位到厦门大学访问的美国教授认为,中国省一级的权力在某些方面比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一个州的权力还要大。

鉴于地方财政包干的种种弊端,各方面都提出要用“分税制”来取代地方财政包干。

赤字时代

自改革以来,除了1985年略有盈余以外,其他都是年年赤字。而且赤字逐年加大。

改革年代的赤字和债务(单位:亿元)

| 年份 | 1978 | 1980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 赤字 | -10.17 | 68.90 | 42.57 | 58.16 | -0.57 | 82.90 | 62.83 | 134.0 | 237.1 | 258.8 | 293.4 | 574.5 | 581.5 | 529.6 |
| 债务 | 0 | 43.01 | 79.41 | 77.34 | 89.85 | 138.3 | 169.3 | 270.8 | 461.4 | 669.7 | 739.2 | 1175. | 1549 | 1967.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中国的财政帐目中,债务被列入收入栏。真正的赤字是上表中和赤字加上债务。例如,1994年的真正赤字不是574.52亿元,而是1749.82亿元。上面列的仅是中央财政的赤字,地方财政也有赤字。到1990年底,全国有1091个县发生赤字,赤字县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的50%以上。有的县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1992年3月2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江苏省韩培信省长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江苏省的赤字县越来越多。1991年11个省辖市有10个发生赤字,64个县(含县级市)49个发生赤字。财

政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全省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江苏这么一个富省尚且如此,其他省份的状况可想而知。

为什么在改革期间财政赤字问题这么严重?

一是放权让利和地方财政包干,使得原来高度集中的财力分散了。其结果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9年是26.7%,到1992年,下降到14.5%。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重,1979年是46.8%,1992年下降到38.6%,而世界上多数国家这个比重都是60%左右。^①

二是财政补贴负担太重。财政补贴名目繁多,有价格补贴、外贸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贫困地区财政补贴等。1978年,全国财政补贴共93.68亿元,1987年增加到669.54亿元,1988年又增加到762.78亿元。1991年,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外贸补贴共达1090亿元。财政补贴实质是一种“负税”,它也是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在价格扭曲、汇率扭曲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起作用。通过“负税”这种手段,使经济运行得以维持下去。但是,财政补贴这种手段弊端太多。随着价格改革和外贸改革的深入,财政补贴应该逐渐减少。

由于各级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政府财力薄弱,因而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情况:

官员收入低。一方面不能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更不能以丰养廉。中央机关的局长们月薪700多元,而北京外资企业的雇员月薪四五千元。当然,他们的住房条件要好一些。但和外面工资差别这么多,心理上总是难以平衡。所以,一些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年青人不安心长期在这里工作。一些不安于清贫的人就借

^① 《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分税制》,见《光明日报》1994年4月5日第4版。

助自己的权力谋取利益。本来,用金钱换权力是找上门来的生意,只要官员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权钱交易就很自然地完成了。

财政困难,本来应当是政府办的事无力去办,于是就鼓励各单位自己去创收。怎样创收呢?还是利用权力。例如,国家办的报纸,创收就是公开地或变相地卖版面,谁出钱就为谁讲话。这样的报纸,既是权力的奴隶,又是金钱的奴隶。一仆二主。报纸要说真话,要客观公正就很难了。公安办案,要让当事人出办案费用,其结果是“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方面说重视科学技术,而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出版不了,因为出版也要自负盈亏。普及义务教育,本来应由国家掏钱,国家没有钱,只好搞“希望工程”,要群众捐款……由于国家财政困难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到。

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一方面要适当集中财力,另一方面要减少政府的事权和大量裁减冗员。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事权和财权不相适应。在中央政府控制财力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家的事权并没有减少。很多可以由地方、由企业干的事情,国家还没有放出去。减少政府的事权就是解决财政赤字的根本办法。冗员过多,也是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1990年,由国家财政开支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达3000万人,比10年前翻了一番多。1978年,全国行政管理费支出52.9亿元,1985年上升到171.06亿元,1990年上升到414.56亿元,1994年又上升到847.68亿元。16年间增长了15倍。而在同期,社会文教费支出只增长9.2倍,经济建设费支出只增长2.52倍。

税利分流和分税制

前面说过,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经过多次调整,还是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模式。对国有企业来说,中央政府既是行政权力的代表,

又是企业所有者的代表。作为中央行政权力的代表,政府有权用强制手段对自主经营的企业征收所得税;而作为所有者的代表,政府还有权获得企业的利润。过去人们把政府这个双重身份混淆了。改革前,忽视企业的自主经营,把企业的利润全部拿走了;“利改税”又忽视了国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希望企业都以税收形式向国家纳贡。实际上,上交的利润和上缴的税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财富。作为企业所有者的利润,应当按照经济运行法则,继续投入运营,使它在运营中增值。作为国家的税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则按照财政预算的规则运用。所以,必须实行利税分流,即在企业实现的利润中,一部分作为所得税交给作为行政代表的国家,剩下的利润一部分交给作为所有者的代表的国家。让利润和税收按两种渠道、两种规则运行。

这种税利分流的思路是1987年提出来的。从1988年起,国家就在重庆、厦门等地开始了试点。到1990年,试点企业达2000户。

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全国实行全面的税制改革,即对企业实行新税制。就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而言,新出台的税制的内容可归结为:统一税收,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证财政收入。

对所得税来说,原来按不同所有制来分设不同的税率。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率不一样。新税制不分所有制,一律按33%的税率征收所得税,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一致。所有的企业都在同一税负上开始竞争。国营企业原来的所得税率是55%,降到33%以后,把国营企业的“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

“税前还贷”是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折中办法。从1979年4月开始,企业的改建和扩建不再由财政拨款,由企业向银行贷款。经过几年局部试行以后,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

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银行贷款。这就是“拨改贷”。拨改贷,企业对基本建设投资要负偿还本息的责任。企业成了投资主体。这本应是投资改革的方向。但当时企业还无力完全承担还贷的责任。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企业可以先归还贷款,剩下的钱再交所得税。这实际上是先预支一部分所得税来归还贷款。这是企业成为投资主体的一种过渡形式。新税制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所得税率,一方面又让企业先交税,后还贷。让企业承担归还全部贷款的责任。当时没有想到,“拨改贷”造成了另一个不良后果: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为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造成了困难。

国家收取的所得税,通过财政预算用于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对税后利润,由国家资产管理部门运营,作为进一步增值的资本。

在新税制中,对流转税也进行了改革。所谓流转税,是向商品的每一个流通环节征税。它和所得税不同。所得税是对其盈利征税。流转税,只要商品在流转,不管盈利与否,都得纳税。这是财政收入的可靠保证,它在财政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流转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商品的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口,全面实行增值税。所谓增值税是指课税对象而言。它以每个环节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在计税时扣除了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生产资源的转移价值,避免了重复征税。对某些商品(如烟、酒、化妆品、贵重首饰等)在征收增值税以后,再征收消费税。对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通过营业税的形式交纳流转税。

这次税制改革还对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都作了相应改革。

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是有重大意义的一项改革。所谓分税制,就是在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把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开。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自1986年以来,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划分事权就是分清中央政府干哪些事,地方政府干哪些事。干的事多花的钱就多,财权服从事权。根据干的事所要花多少钱,把税收分开: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同时建立两套税务机构: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税。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后再按共享比例分给地方。

国防、外交、武警、重点建设、外债还本付息支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中央直属行政、事业单位的开支,都是中央的事权,都由中央财政开支。地方财政则负责地方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转和本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过去各地大办小烟厂,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新税制规定,消费税是中央税,地方无权收取。这就抑制了地方办烟厂的积极性。增值税是共享税,但大头(75%)归中央,这就抑制了地方大办加工工业的积极性。从而通过税收手段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鉴于当时财力过于分散,1994年1月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集中财力,中央希望通过分税制,逐步把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60%。二是制度创新。主要是解决地方财政包干造成的“诸侯经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对于后一个目标,各方面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为了实现前一个目标,中央和地方进行了艰难的讨价还价。

由于前14年的改革是放权让利,而分税制是要集中财力,要触动地方的利益,因而阻力较大。各级地方政府都认真地算帐。有好处的地方热情高,有损失的地方,或明或暗地抵制。分税制是以1993年各地完成财政收入为基数的,基数越大,地方越有利。所以,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不少地方采取种种手段提高基数。在1993年下半年各地突击征收,有的地方甚至“寅吃卯粮”,把本应是1994年1月征收的税项,提前到1993年征收了。

为了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务

院副总理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地协商。据事先估计，实行分税制广东的利益可能影响比较大。朱镕基首先做好广东的工作，提出广东可以接受的方案。广东反复计算后，每年上交国库仅比原来多10亿元，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严重。广东心里有了底，支持了分税制。其他省市看到广东都没有意见，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分税制也就全面推开了。

第八节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它只是政府的出纳而已。这样的银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金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商业银行，使银行企业化，使资金市场化。同时还要建立调控宏观经济的金融手段，保持币值稳定。

从“大一统”到多家金融机构并存

改革以前，全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和若干个农业信用社。但从金融意义来说，中国人民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月成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金融体制又按照前苏联的模式作了改变。其他所有金融机构，都归并在中国人民银行之中。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机构，又是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的银行业务。它从属于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既是国家机关，又是经济组织。

中国人民银行在各省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从上到下实行垂

直领导,一切业务活动必须按总行下达的计划办理。而总行的综合信贷计划和现金收支计划,则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并由国家进行统一平衡。

从1954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企业间的商品购销贷款和资金往来,一律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结算。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对资金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

改革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范围很小。在流动资金中,定额以内由财政拨款,银行只发放超额流动资金和临时贷款。那时企业没有投资权,固定资产投资都是由财政无偿拨款。所以,1954年成立的建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后来还一度改为“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司”、“财政部基建业务小组”。

改革前的银行实行的是资金供给制,存款向上交,贷款分指标,没钱向上要。那时货币不是商品,银行不是货币商品的经营者,而只是货币供给处。

改革前的财政和银行业务经常“穿连裆裤”。财政钱不够花,可以任意向银行透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干脆合署办公。银行只不过是财政部的出纳机构。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开办公,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并且恢复了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恢复和加强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破坏的有关货币发行、信贷管理、结算管理、工资基金管理等一系列业务。这一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邓小平这句话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恢复了中国人民银行之后,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的加深,金融改革也逐步展开。

首先,建立和恢复几个专业银行,打破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的通知》，使农业银行成为专管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于1951年10月（当时称为“农业合作银行”），1952年撤销。1955年3月，正式成立中国农业银行。1957年4月又被撤销。1963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再次成立，1965年12月再次撤销。在三次撤销期间，其业务都划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1979年2月，是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成立。由于中国农村改革先走了一步，农业银行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先导。

在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之后，紧接着就恢复中国银行。1979年3月13日，国务院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同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负责外汇收支平衡和检查监督。中国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这是一个政企不分的单位。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即将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时，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天津有一位69岁的李姓居民，40年代买过一些外国公司的股票。因年代较久，股票已经失落。解放以后种种政治运动，他也不敢提起此事。刚恢复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有一位叫刘继曾的老业务员，从旧档案中发现这一情况，就找李姓居民核对。李姓居民矢口否认。刘继曾等反复向他讲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李才向中国银行如实介绍了情况，结果，中国银行帮助李姓居民从国外找回了29万美元。本书作者当时在天津采访得知此事，于1979年1月9日发布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一居民找回了失落在国外的29万美元》的新闻，全国几十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登出，一时引起了轰动。事后，中国银行收到了很多类似天津李姓居民的信，从国外调回了一大笔资金。这条新闻不仅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也为新恢复的中国银行作了一次很好的宣传，所以，中国银行向新华社写了感谢信。

1982年8月，国务院正式确定了中国银行的地位，成为国家外汇的专业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4年成立的大清银行。1912年经孙中山批准，改组为中国银行。1928年10月，成为特许

的国际汇兑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其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1982年才正式成为国家外汇专业银行。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到1989年,国内机构达1300多个,在海外设有422个分支机构和代表处。

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它接管了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经营的全部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1989年,中国工商银行在全国设有机构3.14万个,拥有48万职工,与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有境外代理业务关系。

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建设银行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决定将建设银行改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全国性金融机构,是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1954年10月1日。在实行改革之前也经历了三起两落的过程。1983年正式恢复以后,其业务发展很快。1989年末在全国设有17352个机构。到1991年末建设银行贷款余额达2400亿元,拥有20多万个贷款户。

在以上4大专业银行之外,198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投资银行。1986年7月,又重新组建了交通银行。1987年4月,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到1994年底,一共组建了10家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蛇口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烟台住房储蓄银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首钢华夏银行等。1995年,还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即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于1979年4月恢复了国内的保险业务。

除了上述金融机构以外,还建立了大量的金融公司。到1993年末,全国有金融信托投资公司388家,金融租赁公司11家,证券公司87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51家,农村信用社5.86万家,城市信用社4798家。遍布各地的金融机构达19.9992万个,从业人员

267.5921 万人。

到 1993 年,外资及港、澳、台金融机构也在大陆设立了 393 个金融机构。其中,银行 250 个,财务公司 4 个,投资公司 7 个,保险公司 70 个,证券公司 40 个,信用卡公司 4 个,其他 18 个。

在打破大一统局面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本身也逐步向中央银行转变。198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从此,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集中精力做好全国金融的宏观调控工作,对专业银行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多种金融工具和多种信用形式也发展起来了。过去的银行只办理存贷款业务,而且只允许银行办理金融业务。现在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民间信用等多种信用形式都发展起来了。各种信用工具,如股票、债券、大额可转让存单、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各种保险品种和信托租赁业务都开展起来了。

到此为止,以中央银行(尽管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框架大体形成。

资金市场化的历程

改革以前,资金不是商品,当然没有资金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生活各方面逐步市场化了,也就提出了对资金市场化的要求。

一、对信贷资金管理的改革。

资金市场是随着国家资金管理的逐步放开而形成的。

从 1979 年起,就试图改变“存款向上交,贷款分指标,没钱向上要”的“统存统贷”体制,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办法。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统一信贷计划内,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划定部分存款、贷款项目,交给所属省、

市、自治区分行管理安排。各地区在不突破差额的情况下,多吸收存款,多收回贷款,就可以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1985年,在资金市场化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就是推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办法。各专业银行的信贷收支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的范围内,给各专业银行划分一定的营运资金,让专业银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中国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过去分配计划指标、无偿供应改为借贷关系。专业银行根据资金来源发放贷款,资金不足可以在银行间拆借,也可以向中央银行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关于完善信贷资金管理办法》,对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资金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改进。1988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又实行限额管理的办法。

以上种种改革措施的目标在于,既要改变过去对资金的行政管理办法,逐步放开搞活,又要加强对倾向的控制,保持经济稳定。这些措施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的。当然,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在国家对货币管理不断改革的过程中,资金市场也逐步形成了。

二、短期资金市场。

在金融市场形成之初,主要的是短期金融市场。

一是同业拆借市场。为了弥补专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不足,票据清算差额和解决临时性的周转资金的需要,各专业银行之间、各地区之间相互进行资金融通,这就是同业拆借。1986年1月,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开放和发展同业拆借市场的决定,拆借方式、期限和利率由拆借双方自行议定。同业拆借因而迅速发展。1986年,拆出拆入单方累计发生额达300亿元,1987年2300亿元,1988年5200亿元,1989年由于治理整顿,同业拆借减

少到 3000 亿元,1990 年减少到 2400 亿元。1992 年以后才又大幅度上升。

二是票据贴现市场。票据是由债务人按期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并且可以转让的流通债券。如商业汇票、银行汇票等。拿票据去兑取现金就是贴现。1980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安徽、河北、重庆、沈阳等地试办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业务。从 1985 年 4 月起,这项业务在全国普遍开办。1988 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了对专业银行贴进的票据进行再贴现的业务。从此,商业票据的承兑、贴现、再贴现的业务开始在全国展开。

三是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是银行发给存款人的书面凭证。它和定期存款不同的是在到期以前可以在市场上转让,以兑取现金。这种存单是 1986 年由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的。1989 年以后,其他银行也开办了这项业务。

四是企业短期融资券。企业为了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向市面发行期限不超过 9 个月的融资券。这种融资券是 1987 年在个别企业试行的,1989 年已在全国企业正式推广。

三、长期资金市场。

除了发展上述短期资金市场以外,还发展了长期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市场实际上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分为债券发行市场和股票发行市场两类。二级市场主要是证券流通市场。

债券发行市场分为国家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三类。国家债券包括国库券、重点建设债券、财政债券、基本建设债券、保值公债、特种国债等。金融债券是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的期限 1 到 5 年不等。企业债券,一种是重点企业债券,由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批准,向市面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另一种是地方企业债券,1987 年以前多在企业内部向职工集资。1987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开

始走上正轨。

股票券发行市场。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首次公开发行了股票。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3年的股票。随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偿还本金的股票。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全部股票向社会公开发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一批发行股票的企业。但是,其中多数是出于集资目的,还算不上是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1994年股票总市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称为证券化率),美国,70%;日本,30%;法国,136%;德国,97%;韩国,149%;瑞士,79%;荷兰,60%;加拿大,51%;印尼,85%(1990年数);马来西亚,119%;新加坡,140%(1990年数)。中国证券化率只有6.76%,这还包括不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如果扣除这两项不流通部分,中国的证券化率只有1.83%。可见,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股票市场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尽管如此,股票市场对企业筹集资金还是起了重要作用。1996年,我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采访得知,这个证交所1990年成立以来,虽然几经起落,但是5年间上交税收65亿元。国家没有投资,成立时从人民银行借了200万元,还了2000万元。5年来上海证券市场为企业集资700多亿元。这还不包括B股所吸引的外资。

上海大众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是1992年上市的,后来又把不能上市的法人股转为B股上市,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他们还按照公司制度对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制。改制后,真正实行了政企分开,它的主管机关上海公用局再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企业机制转换得比较好,经济效益就明显提高。1993年税后利润只有6667.82万元,1995年增加到1.00817亿元。公司的净

资产 1993 年只有 3.5399 亿元,1995 年增加到 6.3719 亿元。我去采访时,这家公司已建立了 9 家跨省市的连锁企业,参股 5 家金融企业,形成了以交通运输、房地产、金融保险、旅游、商贸等多元化资本的营运格局。

四、证券流通市场。

长期金融市场的二级市场就是证券流通市场。如果说,一级市场是证券发行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交易的话,那么,二级市场就是持券者之间的交易。即持券者根据自己对行情预期的判断,抛出和购进证券的交易市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证券交易。1930 年,上海外滩附近九江路一座八层高楼,是远东最大的交易所。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因上海股票交易所恶炒银元,危及人民生活,危及新政权。1949 年 6 月初,陈毅市长和当时正在上海的刘伯承、邓小平会商,决定取缔股市,请示毛泽东批准。1949 年 6 月 10 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及公安总队师长刘德胜带两个营的解放军和 400 名便衣公安人员分五路出动,突然包围了整个证券大楼。宣布:停止一切交易,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 2000 多人全吓蒙了。各组人员迅速进入房间查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将 238 名重要投机分子逮捕。从此,中国股票市场停止了 40 多年。

1986 年秋天,我到沈阳采访时,正赶上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试办企业债券二级市场,买进和卖出沈阳市 6 家企业发行的 8 种债券,同时开办上述债券的抵押业务。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在全国引起了一阵轰动,也引起了争议。当时我采访了辽宁省年轻的省长李长春,他对这一试验满怀热情,说:“有人问我,你们搞这些东西姓‘社’还是姓‘资’?我回答说,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出现了一件新事,不看它的实际效果,先用头脑中既定的框框来套,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988年4月,经国家批准,沈阳、哈尔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7个城市同时开办国库券转让业务。同年6月,全国28个省市的54个大中城市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一项重大突破。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成立。连同1990年12月5日成立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形成了证券集中交易市场。到1991年底,全国有较大的证券公司6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370多家,各种可以代办证券业务的代办网点2000多个。有5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参与证券市场的业务。

1993年:全国金融大整顿

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资金管理逐步市场化了,但是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利率市场化问题和资金供给制的状况都没有根本改变。在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货币这种商品的价格(即利率)还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完全由国家决定,不能随资金供求状况而变化。一方面,一些利润率很高的产业资金短缺,希望以更高的利率得到资金,但没有合法的渠道。另一方面,国家银行还实行资金供给制,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把资金注入无效或效益低的国有企业,使大量资金呆滞。自1992年以来,这两种情况就以非法的方式连通,出现了资金的“黑市”。专业银行本身也处于矛盾状况,一方面,资金供给制使银行承担了全部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国家还要考核它的利润指标。因此,专业银行把资金以高于法定利率拆借出去,或用资金支持银行自己办的经济实体,以获得利润。让资金进入“黑市”,也就成了银行摆脱这一困境的一条出路。这样一来,银行里掌握信贷权力的人,就成了四面八方的“公关”对象。其中有不少人受贿。资金越紧张,

追求资金的不正当现象就越严重。而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大量资金非法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行业,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过热。同时农产品收购资金和重点建设工程资金等却得不到保证。由于社会集资利率比在银行储蓄高,使银行储蓄滑坡。当时,人们称这种现象为“金融混乱”,也有人称之为“金融腐败”。

除了金融混乱以外,由于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反映在金融方面,一是货币过量投放。在1992年M2(广义货币)比上一年增长31.1%的基础上,1993年上半年又大幅度增长。二是外汇调剂市场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一美元兑换人民币突破了11元,而且还有下贬之势。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波动。

但是,解决利率市场化和资金供给制的问题,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解金融混乱的燃眉之急。这就促使国务院不得不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首先,解决“长城集资案”。长城公司沈太福因非法集资9亿元被处决。支持他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20年徒刑。

不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去职,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7月5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约法三章”: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借的资金,限期收回;二、不准任何金融机构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存款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他说,“各级银行要认真贯彻执行‘约法三章’,否则,将严肃追究当事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整顿金融秩序取得了成效。到年末,金融系统共收回违章拆借资金830多亿元。居民储蓄不仅补了上半年下滑的损失,比上年同期还增加了1007亿元。全国金融系统查处了一大批大案要案,金融秩序也有所好转。

为了抑制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首次进入市场买卖外汇,

消除了外汇调剂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消除了人民币还会贬值的心理预期。很快使汇价稳定在一美元兑换人民币 8.7 元左右。

然而,整顿金融秩序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其实上述危机的出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反映在金融方面,还是金融改革滞后所致。其中最根本的是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高效的资金市场。银行也没有建立起管理资金市场的有效体制和手段。

改革进行到 90 年代,中国的资金运行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 90 年代初,在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中,70% 来源于财政之外。即使是在国家投资的“盘子”里,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也是主要的资金来源。这和改革之初资金由财政统收统支完全不同。这一变化使得金融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金融调控制度的改革还没有跟上这一变化。例如,还沿用过去信贷分配的办法来管理金融。对各种证券的发行,仍套用了对信贷资金管理的办法,人为地控制规模。对于国家控制的直接融资之外的、企业自行运筹的各种集资活动,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这是出现金融混乱的重要原因。

整顿金融秩序是很必要的,也有成效。但是,1992 年以来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除了违反金融纪律和腐败之风以外,从根本上说是新的金融形势和旧的管理方式的一次剧烈碰撞。当时经济增量的主要部分,是非国有经济,是沿海地区,是第三产业。但是,在国家的信贷计划中,这些最活跃、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经济成分、产业和地区,却没有相应的位置。资金需求格局和供应格局严重错位。由于旧的管理方式的制约,资金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对这种错位进行调剂。于是,就出现了非法的资金拆借。从国有银行拆借到非国有银行,从内地拆借到沿海,从第一产业拆借到第三产业。银行更有它的苦衷:它对储户必须保证随时兑现,而它的主要贷款户——国有企业却不能保证还款。它必须给储蓄户的资金寻找可靠的、高收益的出路。这也是将资金从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

企业的一个原因。在这些所谓非法拆借的过程中，因“寻租”而产生的腐败现象也就出现了。

1992年以后出现的金融混乱，呼唤着加速金融改革。

全面展开金融改革

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部署，在1993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作出。而改革的全面展开，却是在1994年。

这一轮金融改革的目标，一是把专业银行逐步改变为商业银行；二是把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三是为了把原来专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贷款分离出来，重新建立几家政策银行。

新一轮的金融改革经过1994年一年的舆论酝酿和实务准备以后，在1995年以法律形式付诸实施。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前一个法律，真正确立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后一个法律，则奠定了中国金融法律的基石。

商业银行，是实际经营货币的企业。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也像一般企业一样，它必须一副担子挑两头：一头是它的“商品”来源——主要是储户，另一头是它的“商品”的“买主”——它的贷款对象。也就是说，它必须吸收足够的存款，也要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可靠的贷款机会。它的利润来自存、贷利率之差，而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则是它的经营原则。

既然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它就应当像所有的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把这“四自”写进了它的“总则”之中。

商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它不能去“救济”那些亏损企业。它

必须认真选择贷款对象,确保贷出去的钱能按时收回来。没有还款能力的,坚决不贷;不讲信用的,坚决不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强调对借款人的资信审查。

商业银行不是政府。它没有义务承担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能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在80年代后期,工厂效益差,发不出工资,地方政府就令银行发放贷款用于发工资,称为“安定团结贷款”)。它更不是市长的“钱口袋”,不能按照官员的意志,从这里拿钱投入没有收益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提供担保,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要求其发放贷款和提供担保。”

居民把钱存入银行,最起码的要求是保证金钱的安全。必须保证客户能够随时提取自己的存款。为保证这一点,它不能把客户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赚钱,它必须留下足够的钱来准备客户来提款。这留下来用来应付客户提款的钱叫做准备金和备付金。准备金交给中央银行管理,万一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以支持。备付金由商业银行自己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准备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备付金符合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

对存款的安全最关键的是商业银行能正常运营而不致于倒闭。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开办商业银行的资格审查作了严格的规定。还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等5个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作了限定。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

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和投资期限长、难以承受一般市场利率、而该项目对社会有重大利益的贷款;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

从1993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专门办理国家重点建设(包括基建和技改)贷款及贴息业务。从而把建设银行从政策性业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接受了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出口信贷银行是为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提供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分担了中国银行这方面的业务。

为了防止众多商业银行各行其是造成的不良后果。必须有一个机构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管理和支持。这个机构要既能控制总的货币流通量,也要保证各家银行的安全,防止出现金融危机。这个机构就是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1月1日就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但在很长时间内,它不能完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是因为,第一,它还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陷入一般货币信贷事务之中;第二,国家对中国人民银行还考核利润指标,实行利润留成,逼迫它从事经营活动,失去了超脱的地位;第三,各级政府对它的干扰太多,无法独立执行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根本任务:“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提法把过去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重目标变成了单一目标:保持币值稳定。为行使好这个职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有其独立性。

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有三类情况:一是德国、美国、瑞士、瑞典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不受政府干预;二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政

府影响,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里有一个较超脱的决策机构,使得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三是意大利等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受到政府的约束,人事由政府任免,业务上依赖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工作。这有点近似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但不依赖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一规定旨在防止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为坚持货币的经济发行,杜绝财政发行创造了条件。这个法律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这就为防止地方政府干预中央银行各分行的业务,把中央银行变成“地方银行”的不良倾向,为保证银行的独立性提供了法律保证。

中央银行如何行使调控金融市场、保障货币稳定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二条列出了6种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即要求金融机构按照法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规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再贴现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及外汇等。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这些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从而稳定币值。

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

中国的银行要成为真正的银行,还要走很漫长的道路。改革大幕拉开了,法律公布了,但是,把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段很长的艰难的历程。

这涉及到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滞后,就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

到 90 年代,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 90% 以上的流动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投资靠银行,流动资金靠银行。生产靠贷款,还贷靠举债。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了。1993 年末,天津市 648 家预算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121.8 亿元,占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96.25%。这就是说,企业的固定资产几乎全是由银行的贷款形成的。这个市 47 户一、二级批发企业,有 38 户资产负债率在 100% 以上。其中,一商局 7 个一级站平均负债率达 216.8%。天津百货站自有流动资金 200 万元,贷款余额高达 2.1 亿元,1994 年实现销售利润 1129 万元,而同期要付银行利息却高达 2000 万元。不仅不能还本,连利息也还不起。天津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95 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85.15%。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达 1 万亿元以上,其中大约有 6000 亿到 8000 亿表现为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在国有企业,形成了赖帐机制。什么叫“赖帐机制”? 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注资,你不注资,企业也不应当承担债务责任。第二个是企业负债越多,他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银行与国有企业形成了“注入——压死——再注入——再压死”的恶性循环。这样,什么提高利率、降低利率企业都不在乎了。连本都不想还,还管你利率高低? 国家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这个手段就不起作用了。

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也好,公开市场业务也好,再贴现率也好,这“三大法宝”的运用,最终还是要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就要求企业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中国的国有企业失去了对利率的敏感。谁都知道,用控制贷款额度的办法来防止企业过度贷款,从而防止投资膨胀,这不是市场经济应当采用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还要采用呢? 朱镕基副总理在一次

报告中一语道破了个中苦衷：“我们的厂长从银行借钱时根本没想到要还的。利率对他们不起作用。控制贷款额度，是因为企业改革不到位，是不得已而为之。”

借债不还，有商业道德问题，有法制建设问题，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种情况能够发生，至少有3个条件。一是借钱的人无法独立承担责任。二是贷款方不收回钱也可以维持下去。三是借贷双方的财产关系不明晰。中国正好具备了这3个条件：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它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它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责任。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它并不靠自身和盈利来生存、来发展。银行和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开的，都姓“国”，烂帐，肉烂在锅里。

银行和企业的问题是互相缠绕的。只要一方面的改革不到位，就牵制着另一方面的改革不能到位。只要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只要政府死死抱着国有企业不放手，商业银行就办不起来，中央银行就无法行使职能。

1994年7月21日，我为《经济参考报》写了一篇评论，题为《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评论指出，“直到现在，我国既没有真正的企业，又无真正的银行”。要建立市场经济，既要加速金融改革，又要加速企业改革，还要加速政府职能转换。而这几个方面谁也不能一步到位，只能轮番推进，逐步达到目标。

过去，财政通过透支的方式挤银行。1994年以后，不让财政向银行透支，而实际上却通过另外两个渠道挤银行。一是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渠道，二是通过地方政府这个渠道。国有企业，本应由财政注入资本，现在却由银行注入资本。本应流动性很强的银行资金却变成了长期性垫支——信贷资金财政化。地方政府也常常压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用来发工资；地方要上项目，地方财政没有钱，也压银行贷款。地方首先满足自己的资金需要，把非花钱不可的事情给中央留下资金的“硬缺口”，逼着

银行发票子。过去说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到90年代，“布连裆裤”变成了“铁连裆裤”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迫使信贷财政化，加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央银行就不能行使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整个国有经济的风险几乎都集中到银行。在90年代中期，社会上的融资利率在20%以上，国家银行的利率也在10%，而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却只有6%—7%，产业界显然亏本经营，这个差额最后还是由银行承担。国有经济的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

到1996年底，全国居民金融资产近5亿元。老百姓期望这些金融资产能够保值和增值。如果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居民的金融资产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也保不住。金融风险涉及千家万户财产的安全。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居民金融资产增加，银行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增加，金融风险也在增加。

在中国，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存在。引起巴林银行破产的那种事件也发生过多起。但没有一家银行破产。金融危机没有公开爆发，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事业是国家银行唱主角。用整个国有资产作担保，用国家政权来维护，所以，金融危机被掩盖起来了，没有爆发成公开的灾难性的社会事件。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长期拖下去，这些潜在危机会进一步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难以控制。

第九节 邓小平的“硬道理”

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他设想，从80年代初算起，分两步走，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值 800 美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花 30—50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就是他的发展战略,也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在接见各国首脑时,在国内各种会议上,他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述这个设想。

要使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中国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近百年的奋斗,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群众生活富裕吗?

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确推动了经济发展。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3588 万亿元,1996 年达 67560 万亿元,相当于 1978 年的 18.83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73 元,增长到 1996 年的 5220 元,增长了 12.99 倍。

在外国人的眼中,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统计的要高。按汇率换算,1994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443 美元。而外国人估计,这个数字在 1500—1800 美元之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劳伦斯·萨默斯估计,根据购买力评价法,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即 2500 美元。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外国人的这种估计。

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除了改革开放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外,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一系列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首先,在产业政策上,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历史的产物。建国之初,中国的重工业几乎是空白。当时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新生的政权就得不到保障;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工业的基础。所以,当时很自然地

那里学来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这一政策在不长时间内打下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但是,它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它使中国市场长期匮乏。但它的影响远不止如此。重工业是高度资本密集产业,在当时资本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重工业的发展成本,就要使它能得到廉价的生产要素:低利率政策使它能得到廉价的资金;低汇率政策使它能得到廉价的进口设备;低工资政策使它能得到廉价劳动力;低原料价格使它能得到廉价原料。而要保持低工资政策,就必须压低农产品价格。但是,上述和经济规律不相一致的政策体系,只有采取行政手段才能维持。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先生有过精湛的研究。不过,林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源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结论恐怕过于简单。

中国在改革的头几年就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积极扶持轻工业的发展。到90年代初,国家还提倡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对应的,人为压低利率、工资、原料价格等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些生产要素虽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但市场对它们价格形成的作用日益显著。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中国经济一下子显得丰富了。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区域之间,由过去的均衡发展战略改为地区倾斜战略,让那些有条件发展快的地方先发展起来。这样,使东南沿海半壁江山迅速崛起,成为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在全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量中,东南沿海占了很大的比重。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天津等沿海7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42.8%。这7省市人口2.54亿,相当于欧洲共同体的人口,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这些省市的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其发达程度和发达国家几乎看不出差别。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争论。

沿海地区主张“梯度发展”(即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赵紫阳曾经支持这一提法),而西部地区主张“跳跃发展”,或“反梯度发展”。由于80年代对沿海地区(主要是广东、福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东西部经济差距急剧拉大,缩小差距的呼声日益强烈。到90年代初,区域倾斜政策转向产业倾斜政策,即由扶持某个地区的优先发展,改为扶持某个产业优先发展。到90年代中期,把80年代的区域倾斜战略改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把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九五”期间和今后15年的重要方针。

体制转型期的经济波动

整个改革过程,虽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但也是经济剧烈波动的过程。中国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不同于西方经济波动,很难用市场经济的波动规律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波动是在经济转型期发生的,而且政治形势、国家领导人的推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大。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周期”。

第一次波动:1978—1981年。

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普遍要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1978年,工业提出大干快上,这一年国家在基本建设上的拨款比上一年增加了40%以上,又大量引进外国设备。1978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达480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96亿元,比1976年增加了102亿元。1978年积累率达36.5%。财政集中过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37.2%,但中央财政还很困难。1978年进口钢材800多万吨,比1977年增加60%以上,但仍供不应求。

1979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要求把当年基本建设投资从450

多亿元压缩到 360 亿元,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压不下来,1980 年整个基本建设规模达 539 亿元。而改善人民生活幅度却突破了预定的计划。结果出现了 127.5 亿元的财政赤字,推动了 1980 年的物价上涨,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增长了 6%。本来,这个幅度跟 80 年代后期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人们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承受不了。

1980 年的 10 月、11 月,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全体会议和省长会议,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决策。把全社会的基本建设投资压到 300 亿元(后来又追加 80 亿元,实际完成 433 亿元),同时紧缩了银行信贷。国家计划把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压到 3%(实际完成 4.1%)还压缩了包括军费在内的各项开支,使 1981 年财政赤字减少到 25 亿元。

1978 年,是这次经济波动的最高点,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 11.7%。1981 年达到最低点,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 6.7%。

这次调整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调整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加快了轻工业的发展。由于在执行中增加轻工业的贷款,增加了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增加了用于进口轻工原料的外汇,1979 年重工业增长 7.7%,轻工业却增长了 9.6%;1980 年,重工业增长了 1.4%,轻工业增长了 18.4%。1981 年,轻工业又增长了 14.1%。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43.7%,增加到 1981 年的 51.4%。纺织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等耐用消费品有的增长百分之几十,有的成倍增长。多少年来,这些商品都是凭证供应,为了买一辆自行车还要“走后门”。通过调整,日用消费品市场几年之内就发生了变化。

第二次波动:1982—1986 年。

1981年增长速度下降之后,1982年又开始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1983年比上年增长11.8%。1984年下半年又开始出现了经济过热。

1984年四季度工业生产增长17.3%,其中,12月份增长达到20.6%。1985年第一季度增长达23%。工业高速增长主要来自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刺激。1984年全国职工工资性现金支出比上一年增长了22.3%。到年底大发奖金、补贴和各种实物。到1985年的1、2月份,工资和其他对个人的支出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0.6%。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膨胀。消费和投资双膨胀,使得社会总需求超过了社会总供给。

1984年底银行工业贷款余额比上一年增加了35%,大大超过了工业增长幅度。1984年货币投放相当于1949—1983年总投放量的一半,实际投放为计划投放的3倍多。1985年初货币投放又大幅度增加。1985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提高了8.8%,是20多年来最高的。1985年社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6.2%,是改革以来最高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1984年的24.5%的基础上,又增长了39.4%。1985年是这一轮经济波动的波峰。

为了解决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问题,1985年初实行“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抽紧银根,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膨胀。这实际上也是一次调整。但是,人们对这次调整认识不一致,特别是地方政府采取抵制态度,都说自己所在地方经济不“过热”,要求中央在调整中要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也就是说,你可以压缩别的地区的信贷规模,但千万不要压缩我这里的。所以,这次调控虽然有一定成效,使过热的经济有所稳定,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1986年1月13日,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计划、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然

存在,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他提出“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消费基金膨胀”。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电力、原料、交通都很紧张。据当时水电部的测算,全国缺电力 1200 万千瓦,相当于全国总装机容量的 15%,缺电量 450—500 亿度,相当于全国总发电量的 12%。京津唐电网 1 月份累计拉闸 1.0011 万次。华东电网 1 月份拉电近 400 万千瓦,影响工业产值 4000 多万元。全国有 20%的生产能力因缺电得不到正常发挥。

1986 年,国家采取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使经济形势由紧变松、趋于平稳。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为 6%,比上一年的 8.8%降了下来。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消费需求仍然增长过快,国家财政在利用内外债来弥补后,仍发生 70.5 亿元赤字。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加 29.3%,现金流通量(M0)增加 23.3%。

1987 年中央提出的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还是把稳定经济放在第一位。针对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这一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减缓,社会总供给有所改善。可以说,1984 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过热”基本得到了控制,1987 年末,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大体控制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但是,社会总需求仍然超过总供给。到年末,现金流通量比上年底增加 19.4%,国内信贷规模增长 21.2%。社会零售物价指数高于 1986 年,达到 7.3%。和 1985 年不同的是,1985 年物价指数上升 8.8%,其中有物价改革的措施出台的影响,而 1987 年没有物价改革的措施出台,物价上涨基本是货币过多所致。

第三次波动:1987—1990 年。

第二轮波动刚趋平稳,又来了一次更大的经济波动。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7 年增长 11.6%的基础上,1988 年又增长 11.3%。

1988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高达18.5%，引起社会恐慌。

1988年，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进一步失衡。这与1984年以来积累的问题有关。从1984年到1987年4年中，国民收入按现价计算，平均每年递增17.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递增26.3%，居民货币收入平均年递增21.8%，社会集团购买力平均年递增21.2%。投资与消费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这就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连年超过社会总供给。而1988年的社会总需求又比上一年增长了22.1%，总供给却只增长19.3%。供需差率由上一年的13.6%扩大到16.2%，全年市场货源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达800亿元。^①

1988年，全国物价大幅度上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达18.5%，是历史最高水平。中央作出物价闯关的决定只是导火线。1988年物价涨幅这么高，是1984年以来供需不平衡的结果。

1988年，产业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首先是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的发展。农业增长3.1%，工业增长20.7%，二者之比约为1:7。在工业内部基础产业的发展赶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1988年又是经济秩序混乱十分突出的一年。在“双轨价格”条件下，一种商品多种价格，巨额价差的诱惑引发了“经商热”：“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官倒”“私倒”横行于市，权力和金钱的肮脏交易盛行。群众日益不满，政府对此无能为力。1988年实际上是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1988年秋天开始的治理整顿与其说是一轮经济紧缩，不如说是为了挽救这场危机。

由于1984年以来所采取的所谓“软着陆”效果不明显，所以这次下的是一剂“猛药”。从1988年9月就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控制信贷，收紧银根。1989年，考虑到价格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实际下降了30%，这是1950年以来少有的和仅次于1961

^① 李成瑞：《1988年的中国经济：成就、困难、希望》。

年的大调整。

这剂“猛药”产生了很强烈的反应。通货膨胀的势头控制住，但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经济紧缩的本意是把过高的速度压到适当的水平。1988年9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过高的工业速度开始下降。1989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8%。1989年下半年出现了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从8月份以后，工业生产直线下降。有的月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中国的工业是靠速度来维持的。速度低到一定限度，就没有利润。例如，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低于15%，就无法开门。低速运行，必然经济效益下降。1989年1月，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月增长了55.3%，实现利税下降了27.4%。这种趋势随着生产的下降继续发展，使得企业界叫苦不迭。

1989年春天，我同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交谈，那时他们对1988年的抢购风潮惊魂未定，几乎都提出要控制需求。但是，不出几个月，实际情况和经济学家们的忧虑相反，不是需求过旺，而是市场“疲软”。“疲软”，实际就是萧条。1988年群众急于抢购的商品，现在堆在仓库里，摆在柜台上，无人问津。居民储蓄几千亿元，就是不愿意拿出来买东西。市场疲软，受打击的是工厂。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8年只增长8.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了7.7%。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一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全国估计有1000万乡镇企业职工回乡务农。城市职工的名义工资增长率比物价涨幅低3.8个百分点。1990年2月份，全国停产半停产的职工达600万人。城市待业人数接近待业人数最多的1979年。

由于市场疲软，工业下滑，就业不足，效益下降，各方面的呼声十分强烈。所以，到1989年11月就结束了货币紧缩政策。从11月开始，大规模地投放“启动”资金，希望使经济复苏。11—12月就增加贷款1000亿元。从1988年9月到1989年10月，这14个

月高力度的货币紧缩政策,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受到严重的压缩。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时间滞后,过去14个月的紧缩政策在货币松动时还在起作用。所以,投入了大量的启动资金,却启而不动。市场照样疲软,失业还在增加,经济还在衰退。进入1990年,迫于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央银行仍然采取了较为松动的货币政策。上半年银行贷款增加了612亿元,是历史上上半年贷款增加最多的一年。贷款增加,启动了生产,但市场没有启动起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压在库里。企业产成品库存大量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十分紧张。企业间的债务拖欠严重,“三角债”达3000多亿元。

由于市场疲软,1989—1991年的价格调整很多没有到位。工厂卖出的价格比国家新规定的价格还要低。原来的价格还卖不出去,提价以后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价格调整没有反映到市场上,而是挤在企业身上。产品成本上升,但价格涨不上去。企业背的这个大包袱,在3年以后形成了成本推动式的价格上涨。

1990年4月和8月,银行两次降低利率,再加上其他一些启动措施,到三季度,经济走出谷底,开始缓慢回升。回升缓慢的直接原因还是即期需求不足。到1990年底,人们的忧虑是两方面的,既担心市场疲软和工业回升缓慢,又担心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后一个担心是因为从1989年四季度以来,货币流通量增长太多了。经济的复苏是以巨额的货币投放为代价的。

1991年,货币政策还是比较松动的。这一年的年初,北京的经济学界普遍预计物价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到年底一看,全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只有2.9%,大大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

从1989年四季度到1990年,这5个季度共增发贷款4300多亿元。其中,1989年四季度增发1257亿元,1990年增发3043亿元。1991年又继续增发贷款。货币投放增加这么多,为什么这两年通胀率却在3%以下呢?当时很多人迷惑不解。

过了几年之后才知道,经济衰退时投入大量货币,由于时间滞

后,当年显不出来,而是在经济复苏以后,甚至在经济进入下一个高峰期才表现出来,形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高峰。1993年到1995年连续3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和90年代初沉积的大量货币有关。当然,1991年物价没有上涨,除了时滞效应以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1991年农业大丰收,稳住了食品价格,而稳住了食品价格就稳住了大头。二是社会心理预期。这时的社会心理预期是价格不会涨,和1988年的社会心理预期不大一样。1991年的社会心理预期,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多少,储蓄就增加多少。消费基金并没有消费,而转化为储蓄。

这次治理整顿,影响最大的还是国有企业。治理整顿多用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对非国有经济的影响比国有经济小得多。在这几年的工业增长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要快得多。例如,199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8%,其中,全民工业仅增长3%(其中预算内国营工业仅增长1.5%),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9%(其中乡办工业增长12.5%),个体及私营工业增长21%,"三资"企业增长56%。所以,在治理整顿结束时,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国有经济。在治理整顿期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也扩大了。

治理整顿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扭转了中国30多年的“短缺经济”。在治理整顿以前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市场一直是“卖方市场”,也就是卖方主宰一切,买方只能听卖方摆布。要买一件东西,得排队,得“走后门”。谁有了商品,谁就是皇帝。价格、质量、品种,都由卖方决定。现在不同了,现在卖方得对买方笑脸相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

第四次波动:1991—1996年。

两年多的低速运行带来的种种困难,使各方面都盼望提高经济发展速度。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各地相继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有的提出“超常规”发展战略,

有的抢“快车道”，都想加快本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代表们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很多意见。最后，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了150多处。但是，代表们反映很强烈、很集中的一点意见却没有采纳。这就是90年代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多代表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上写的6%太低，建议改为9%。但是，定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是以6%公布于世。一时舆论哗然。

《政府工作报告》坚持6%是有考虑的。按照本世纪末GNP翻两番的目标，前10年平均增长已达9%，今后每年只要平均增长5.5%，就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才定为6%。又考虑到前几轮经济“过热”的教训，认为还是稳当一点好。

但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周边国家发展很快。以亚洲“四小龙”（指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韩国）为例，到本世纪末，按人均GNP计，韩国将达1万美元，其他“三小”将达到1.5万—1.8万美元之间。而中国按6%的速度，到本世纪末也不到1000美元。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有待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例如，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隐忧——巨大数目的过剩人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造饭碗”，即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需要加快经济发展。

快一点，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快一点，是民族统一大业的需要；快一点，是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既然前10年已经达到了9%的速度，后10年为什么要硬压到6%呢？5月下旬，邓小平到首钢视察时，明确指出6%不行。后来各方面的意见基本一致：90年代，GNP保持9%的增长速度。

1992年下半年，经济生活开始显露出过热的苗头。这时经济界关于是否“过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少人担心物价会有大幅度上涨，但到年底才知道全年物价指数仅上涨5.6%。从1991

年开始,理论界,尤其是金融界一直喊“狼来了!”喊了两年,“狼”还是没有来。到1993年上半年物价连月上升,这时经济界还在争论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尽管对经济过热的判断各有差异,但持各种看法的人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资源紧张、金融混乱、投机猖獗、物价上涨。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3%,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3.4%。由于各地大上基本建设,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价格暴涨,全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3.7%。同时,全国约有3000亿元以上的投机资本在房地产、期货市场、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消费品市场价格涨幅很大,但供应十分充裕,没有抢购现象。

这时,人们既怕物价继续上涨,又怕再来一次“治理整顿”。国家一方面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一方面采取“点刹车,软着陆”的方针。所谓“点刹车”,是针对急刹车而言。希望既能防止经济过热,又不致于造成“治理整顿”那样大的副作用。这次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泡沫经济,对房地产业打击很大,大批商品房卖不出去,还有不少正在施工的商品房被迫停了下来。结果,这次“软着陆”还比较成功,通货膨胀问题解决了,经济增长下降得不多。

从1978年到1996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波动,第一次波动(1978—1981)GDP振幅为6.5个百分点,第二次波动(1982—1986)GDP振幅为6.4个百分点,第三次波动(1987—1990)GDP振幅为7.8个百分点,第四次波动(1991—1996)GDP振幅为4.5个百分点。在这四次调整中,第一次从通货膨胀率由6.0%降到1.5%,降低了4.5个百分点;第二次8.8%降到6.0%,降低了2.8个百分点;第三次由18.5%降到2.1%,降低了16.4个百分点;第四次由21.7%降到6.1%,降低了15.6个百分点。第四次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效果很大,而经济振幅最小。是真正的“软着陆”。见下表:

| | 第一周期 | 第二周期 | 第三周期 | 第四周期 |
|----------|-----------|-----------|-----------|-----------|
| 年 代 | 1978—1981 | 1982—1986 | 1987—1990 | 1991—1996 |
| GDP 振动幅度 | 6.5 个百分点 | 6.4 个百分点 | 7.8 个百分点 | 4.5 个百分点 |
| 通胀降低幅度 | 4.5 个百分点 | 2.8 个百分点 | 16.4 个百分点 | 15.6 个百分点 |

对中国的将近 20 年的几次经济波动,人们概括为“一松就热,一热就胀,一胀就紧,一紧就冷,一冷就叫,一叫就松”。这和改革之前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

中国的经济每次出问题都是在宏观上,即总量失衡。总量失衡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在转轨时期,过去那些行政的直接调控办法已经失效,而经济的间接调控办法还没有形成。在新旧交替中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难免出现总量失衡。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中还有不少非经济目的,宏观调节难免会失效。宏观调节失效后,又用过度的行政集权的办法来“纠偏”,使旧体制的某些东西复归。这就是造成经济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次经济波动中,国家宏观调控水平比以往有所提高,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

转轨时期的经济难题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难题。如:通货膨胀,东西部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而在处理这些难题时,常常面临两难选择:要控制需求,平抑物价,又怕市场不景气,影响发展速度和减少就业;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又怕经济“过热”,引起物价上涨。不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难以调整结构,增加后劲;增加

基础产业投资,又可能扩大总需求,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让生产要素按市场机制流动,会加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为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在资源配置中加强政府调控,又会抑制刚刚发育的市场机制,也会挫伤沿海地区的积极性。为了增强活力,刺激经济发展,放开收入控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会造成收入过分悬殊;采取防止贫富差别过大的政策,又会出现平均主义,影响能人的积极性,等等。决策者的困难不仅在于选择的两难,而且在这两难中,还有各执一端的意见,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的人,既有学术界的,也有政界的。决策者无论作何种选择,都会招来一方的指摘。

第一个难题:通货膨胀。

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通货膨胀的折磨。在这里,我不讨论通货膨胀的确切概念,而把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上涨当作同义词使用。改革以来,中国通货膨胀情况如下:

| 年 份 | 零售价格指数 | 居民消费指数 | 城市消费指数 | 农村消费指数 |
|------|--------|--------|--------|--------|
| 1978 | 0.7 | | 0.7 | |
| 1979 | 2.0 | | 1.9 | |
| 1980 | 6.0 | | 7.5 | |
| 1981 | 2.4 | | 2.5 | |
| 1982 | 1.9 | | 2.0 | |
| 1983 | 1.5 | | 2.0 | |
| 1984 | 2.8 | | 2.7 | |
| 1985 | 8.8 | 9.3 | 11.9 | 7.6 |
| 1986 | 6.0 | 6.5 | 7.0 | 6.1 |
| 1987 | 7.3 | 7.3 | 8.8 | 6.2 |
| 1988 | 18.5 | 18.8 | 20.7 | 17.5 |
| 1989 | 17.8 | 18.0 | 16.3 | 19.3 |

| 年 份 | 零售价格指数 | 居民消费指数 | 城市消费指数 | 农村消费指数 |
|------|--------|--------|--------|--------|
| 1990 | 2.1 | 3.1 | 1.3 | 4.5 |
| 1991 | 2.9 | 3.4 | 5.1 | 2.3 |
| 1992 | 5.4 | 6.4 | 8.6 | 4.7 |
| 1993 | 13.2 | 14.7 | 16.1 | 13.7 |
| 1994 | 21.7 | 24.1 | 25.0 | 23.4 |
| 1995 | 14.8 | 17.1 | 16.8 | 7.5 |
| 1996 | 6.1 | 8.3 | 8.8 | 7.9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通货膨胀高潮。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比上一年上升了6%。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非议。因为多年来稳定物价是基本国策。1985年,是通货膨胀的第二个高峰,物价涨幅达到8.8%,随后两年也没有大的回落。1988年达18.5%,1989年为17.8%。经过治理整顿,物价涨幅有较大的回落。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第四个高峰。1993年13.4%,1994年21.7%,1995年14.8%。从1993年3月开始,物价在两位数的月份连续30个月。这在中国是空前的。4次涨价高峰,每经过一个高峰,物价就上一个台阶。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就再也下不来了。

通货膨胀是货币发行者对货币持有者的剥夺,也就是政府对居民的剥夺。因此,通货膨胀造成民怨沸腾。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这种再分配拉大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拉大了城乡差距。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时期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价格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价格改革,是从计划价格转向自由价格。不管是哪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价格都是大幅度上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改革过程中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如此。在统制价格下,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

物价上涨。例如,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6—1977年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还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这是用行政手段冻结物价的结果。其实,在这期间大批无效企业进行着大量的无效消耗;没有节制的无效投资和有效投资严重不足;职工生活大量欠债和大量的财政补贴,等等,都是隐性通货膨胀的根源。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逐步释放出来,表现为显性通货膨胀。改革前各种产业各种商品间的比价不合理,农产品和基础产品价格偏低。调整比价一般是就高不就低。过去的隐性通货膨胀,是过去经济留下的窟窿。过去的隐性通货膨胀现在表现出来,是现在为过去还债。

二是工资成本推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职工的住房、退休养老、医疗保健、劳动就业技能再培训费用、子女教育费用等,都不包括在工资之中。这种工资是不完整的,因而,成本也是不完整的,价格也是非足值的价格。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些开支的相当部分必须进入工资,而且企业还要交大量的社会保障基金,所以成本必然提高,价格也就随之上升。工资成本上升,其中一部分也是还历史旧债。

除了前两个历史原因以外,还有发展过程本身的原因。

第一是货币供给过多。1978年底,市场现金流通量(M0)只有212亿元。到1994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到7289亿元,累计增长33.4倍,年平均增长24.1%。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9.5%,零售物价水平上涨2.1倍,年均增长7.3%。也就是说,货币年均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加物价增长速度7.9个百分点。^①当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伴随着货币化的过程。原来不使用货币交换的,现在也要用货币交换,政府要

^① 马建堂:《1995上半年宏观经济分析》,载1995年8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

多印一些票子以保证交换,但不会增加购买力。尽管马建堂没有考虑货币化的因素,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改革以来几次大的通货膨胀都是在货币发行过多的前提下发生的。而货币发行过多除了货币化的需要以外,也是由于基建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等多种因素逼出来的。放权让利和承包,使企业侵蚀了国家对利润的使用权,承包者把更多的利润转化为工资,这是消费基金膨胀的一个原因。税前还贷,使企业侵蚀了国家对税收的使用权,企业事先把税收的一部分转化为投资,这是基建投资膨胀的一个原因。从上到下都有希望加快发展速度的强烈冲动,而加快发展速度又主要靠铺摊子,搞基建。这就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过热”,每一轮经济“过热”,都是靠货币投入启动的,而每一轮经济“过热”,都把价格推向一个更高的新台阶。

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单位:亿元)

| 年代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 M2 | 5198.9 | 6720.9 | 8330.9 | 10099 | 11949 | 15293 | 19349 | 25402 | 34879 | 46923 | 60750 | 76094 |
| M1 | 3340.9 | 4232.2 | 4948.6 | 5985.9 | 6382.2 | 6950.7 | 8633.3 | 11731 | 16280 | 20541 | 23987 | 28515 |
| M0 | 987.8 | 1218.4 | 1454.5 | 2134.0 | 2344.0 | 2644.4 | 3177.8 | 4336.0 | 5864.7 | 7288.6 | 7885.3 | 8802.0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 年代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 M2 | | 29.3 | 24.0 | 21.2 | 18.3 | 28.0 | 26.5 | 31.3 | | 34.5 | 29.5 | 25.3 |
| M1 | | 26.7 | 16.9 | 21.0 | 6.6 | 19.2 | 24.2 | 35.9 | | 26.2 | 16.8 | 18.9 |
| M0 | | 23.3 | 19.4 | 46.7 | 9.8 | 12.8 | 20.2 | 36.4 | | 24.3 | 8.2 | 11.6 |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上两表中M0, M1, M2, 是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金融界根据货币流动性强弱程度, 货币供应量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 + 企业活期存款 + 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 农村存款 + 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 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 + 外币存款 + 信托类存款;

M1,即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流动性较强。M2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经济效益差,社会浪费大,是产生新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亏损企业发工资(90年代初只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新的会计制度实行以后,有一半的企业亏损),巨大的社会浪费,政府机构的迅速膨胀……这些钱向哪里“报销”?用通货膨胀的形式向广大的持币者“报销”。以1994年居民储蓄和手持现金2.5万亿元计算,21.7%的物价指数就被剥夺了5400多亿元,扣除储蓄的2000多亿的利息,持币者这一年被无偿剥夺2000多亿元。这笔钱一部分用来“报销”了上述各项开支,一部分用于历史上隐性通货膨胀的补偿。

产业结构不合理对价格的推动也是很明显的。几次物价高峰,不是农产品的推动,就是原材料等基础产品的推动。1988年的那一次涨价高峰就是由基础产品推动的。当时原材料奇缺,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了价格全面上涨。1994年的涨价高峰,是农产品推动的。在这一次涨价中,食品价格占有很大比重。结构性涨价带动价格全面上涨,而结构性涨价是薄弱产业引起的。

在经济转轨时期,和俄国、巴西那种4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相比,中国还是很幸运的。这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略有关,也和中国政府注重防止通货膨胀有关。改革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同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些斗争还是很有成效的。

第二个难题:经济效益低下。

在改革期间的经济效益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1982年赵紫

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的讲话中,首先就讲经济效益问题。他针对当时“为了追求产值,盲目生产造成大量积压”的情况,提出生产要“符合社会需要”。

所谓经济效益就是投入和产出的比值。投入少,产出多,就是经济效益好。但是,由于对所考察的投入和产出的主体不同,社会上对改革以来的经济效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把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或者把工业系统作为所考察的投入产出主体,这样就会得出经济效益极差的结论。

另一种看法把整个社会作为所考察的投入产出的主体,得出的结论就不同。这种看法认为,企业效益不够理想,但是社会效益相当可观;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向社会转移了。第一是向社会转移。例如,解决上山下乡回城青年就业问题,国营企业兴办了不少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后,由企业承担职工的价格补贴;国营企业的贷款由过去不付利息到支付利息,由低利率付息到高利率付息;在加强重点建设中采取征收电力建设基金等措施,直接转移了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二是在工业系统内部转移。最明显的是企业实现利润向流转税转移。第二步利改税以后,流转税年年都在增加。这直接推动企业成本上升,或在指标上表现为资金利税率下降。第三是向长远效益转移,如治理污染,改善职工劳动条件等。

尽管后一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的经济效益不能说是很高的。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如果把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和国外相比,效益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经济效益差和效率低、消耗高是直接相关的。中国钢的实物劳动生产率为人均20—40吨,国际水平为人均500—800吨。中国700万煤炭职工生产11亿吨煤,美国生产10亿吨煤只有15万职工。中国一名职工一年生产0.24辆汽车,日本为17辆,美国为13辆。中国机械工业的钢材利用率仅为60%,而国际先进水平为80%以上。中国每单

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5—6倍。所以,从改革之初到改革进行了16年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提高经济效益摆到重要位置。199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再次强调“着力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效益差不是在改革中造成的。病根在于原有的经济体制。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特别是不能很好地依靠科学技术,不能很好地依靠提高管理水平。这是因为,企业还不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缺乏采用新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的积极性。而且在改革年代,由于宏观管理上漏洞多,企业不必花大力气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善管理,从其他途径可能比较轻松地得到效益。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大量无效企业存在,因而影响总体经济效益。

第三个难题: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过去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产业结构形成“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国民经济“有骨无肉”,消费品长期匮乏的局面。改革以来,改变了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开始运用经济规律进行资源配置。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它最明显的效果是扭转了多年的商品匮乏的状况。

但是,即使完善的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的形成上也表现出它的缺陷,何况,在改革时期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计划手段又失效,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工业和农业: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与农业低速增长形成尖锐矛盾。自1985年以来,农业徘徊不前。1985—1988年间,农业平均每年增长3.9%,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7.8%。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4.5。差率大于1953—1978年的1:3.5。到90年代这个比例还在扩大。1994年,这个比例为1:5.29。农业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投入不足,耕地减少也是一个原因。而投入不足是因为农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较利益差别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无力同第二、第三产业争夺生产要素。农业落后是1993—1995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农产品的另一部分是工业原料,农业落后直接制约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工业和农业不协调的发展比例,使这类工业的发展十分困难。受影响最大的是纺织工业。为了维持纺织工业对棉花的需要,1994年不得不对棉花收购采取了强硬的行政措施。

在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基础产业发展不协调。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基础产业发展缓慢。因此,基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每当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基础产业就承受不了。就出现基础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经济秩序混乱。这时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这是经济震荡的原因之一。产业结构过分轻型化,不仅加剧了工业内部的“瓶颈”约束,也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加工业内部,产品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不适应,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统计显示:

生产能力利用比较充分(80%以上)的有33种产品,占35.1%,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和个别冶金、轻工产品。如,天然气117.3%,原煤(产量含小窑煤,能力未含小窑煤)114.4%,合成橡胶102.6%,机制纸浆97.0%,原油96.4%。90%以上还有组合音响和生铁。还有26种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为80%—90%。

生产能力闲置1/3到1/5的产品有26种,比重为27.7%。主要是轻工产品、机械产品、化工产品和主要冶金产品,以及个别电子建材产品。

生产能力闲置一半左右的产品有17种,占18.1%。如电冰箱50.4%,中成药50.7%,电话单机51.4%。

生产能力利用不到一半,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有18种,占19.1%。主要是部分机械产品、轻工产品和药品。生产能力利用率:金属切削机床46.2%,彩电46.1%,汽车44.3%,内燃机

43.9%，洗衣机 43.6%，录像机 40.3%，微波炉 38.5%，室用空调器 33.5%。

这就是说，生产能力闲置一半左右的产品占被调查产品总数的 37.2%。所以，90 年代中期，相当多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各地都上利润率高的产业，原料产地和加工业基地的分工日益模糊。原料产地大力发展加工业，对原材料进行就地加工。新疆、内蒙、青海、甘肃等羊毛产地大力发展毛纺织工业，使沿海城市的毛纺织业不得不用进口羊毛。原来的加工业基地从过去的原料基地得不到原料，也发展原材料工业。如上海、天津在改革期间，都上了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产业的大型项目。

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能力已经很微弱，主要是依靠利益机制进行调控。决定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是利润率的差别，而不是宏观的整体经济效益。决定产业结构变化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成千上万个企业，而不是中央政府。这样，在市场竞争中的天生弱质产业——农业，自然就被相对削弱了；利润率比加工业低、投资大、见效周期长的基础产业的发展也就相对落后。在改革的十几年中，产业失衡反复出现，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

结构失衡和前面介绍的总量膨胀互为因果，循环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以后，为了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为了提高企业利润，都千方百计扩大投资，从而使经济过热；而投资又都涌向利润率高的“短平快”项目，使基础产业显得更加短缺。短缺迫使政府“调整”，而首先受到“调整”的又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恰恰是基础产业的骨干企业。那些搞“短平快”的多是非国有企业，“调整”对它们的影响不大。这样，基础产业更加短缺，产业结构问题更加突出。

第八章

“两个基本点”的碰撞

社会之所以要变革,是因为有些社会矛盾,不变革就不能解决。社会变革就其彻底程度和激烈程度而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另一种是在现有社会制度下的改良。革命要以巨大的破坏为代价,它以一代人的动乱和牺牲换取几代人的安定。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使社会失去了自我改良的条件和能力,革命才会发生。所以,一些开明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主动地进行社会改良。这种改良可以延缓甚至避免革命。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存在着不少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未达到不革命就不能解决的程度。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果断地进行改革,也就是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邓小平也说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但这是指改革的决心和改革的艰巨性,而不是毛泽东说的“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那种革命。

要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

棘手的问题。这就是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又要不伤害现有制度的根基。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改革中的一切重大争论、斗争和波折,都是这个两难问题造成的。经过实践的磨难,邓小平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统一这一矛盾。“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另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除了那些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之外,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党内外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传统一点,有的激进一点。大体说来,有的比较倾向于这个“基本点”,有的比较偏爱另一个“基本点”。我们不必指摘他们是“右派”或是“左派”,不必批评他们“激进”还是“保守”,不要讥讽这个主张或那个主张,我相信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的人大多数是出于爱国目的,都有自己的逻辑。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是推动中国改革前进的“合力”中的一支“分力”。我在本书中记录了各种看法之间的某些冲突,并没有褒贬哪一方的意思,只是对历史轨迹的客观描述而已。

第一节 “两个基本点”的形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一提法取代了多年来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很得人心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对这一点没多大争议。每到关键时候,邓小平总是要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不变。因而一直没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只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人提出把反对和平演变摆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是主张“两个中心”。邓小平不仅坚决不同意,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变”。

改革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动力,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途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没有人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只是在改革的方针、方法上,在开放的程度上有不同的意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 1979 年 3 月 30 日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正在探索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各执一辞,如何坚持这两项基本原则,其操作性比较差。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这一条也好操作。于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对刑事犯进行专政,给人们以安全的社会环境,这是大家都赞同的,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对把专政用于思想领域,历来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两个基本点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 10 多年的改革过程中,这两个基本点经常因各人的不同看法而发生碰撞,有时甚至是非常猛烈的碰撞。

改革,就意味着要接纳一些理论、制度、政策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制度、政策和方法在中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了几十年,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异物”而深入人心了。怎样实现这个全民认识的大转弯呢?国际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理直气壮地搞资本主义。这是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做法。第二种做法是,承认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不放弃社会主义。这是古巴的做法。古巴的卡斯特罗在改革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经济中引进资本主义成分。他在作这种宣称后强调,“我们在经济中引进资本主义成分,并不意味着古巴转向资本主义。”怎样保证不转向资本主义呢?卡斯特罗回

答说：“人民拥有权力，人民决不能丧失权力。”^① 他这里说的“人民的权力”当然是指古巴共产党的权力。第三种做法是不认为现在搞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的。在过去当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这就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重新作出解释。这是邓小平的做法。这样，在广大干部的理解上和实践中就不好掌握，经常要引发一些关于“姓资姓社”的疑虑和争论。邓小平力图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争论统一起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种归纳性语言最早出现于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一次讲话中。1987年5月13日这位负责人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在这一年的10月底，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两个基本点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报告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上述这段话的简要叙述。“十三大”政治报告在这段话后有两句关键的话：“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第一句的意思是，不能用传统的看法来解释四项基本原则，而应当用改革开放的观点重新作出解释。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在改

^① 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8月7日电，《卡斯特罗在国际青年节闭幕式上的讲话》。

革开放中不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轨道。

对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是很满意的。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以后,他还多次肯定这个报告。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①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明确地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他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② 同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③ 同年11月23日,他在接见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时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④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刺激”作为中心工作来推动,还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另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宗旨。这两个对立的東西又统一在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这个基础上。而除了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之外,在两个基本点问题上,人们也由于认识的不同而产生摩擦和碰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② 同上书,第305—307页。

③ 同上书,第324页。

④ 同上书,第345页。

撞。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人们在两个基本点问题上不断碰撞的过程。

第二节 第一次碰撞:1983年反精神污染

第一次碰撞,是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实际上,这场斗争的酝酿,在198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1980年,农村经济改革不仅迈开了大步,也从较深的层次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政治局于8月30日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这个讲话还指出:“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揭露后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兴无灭资”的口号,认为“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够

准确”，有些同志“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受到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一年的7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波兰过去是靠财政补贴维持较低价格的。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外国逼债，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很快影响到中国。人们由此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也有动摇的危险。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

1983年，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也出现一些新情况。这就是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有些人根据这些现象，认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具体说就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召开的。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

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3个月以前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在这之前，一个叫翁永曦的下乡知识青年上书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针。

波兰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百般警惕，“缓改革”的建议对政策产生了影响，也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当时最突出的事例一是对著名军人作家白桦写的《苦恋》的批判。二是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苦恋》是一部揭露极“左”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影射了毛泽东。1980年底，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该片在审查时不仅没有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造成的伤痕。实际上，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也揭露和批判了制度的阴暗面。《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后离开了军队，他的诗作《将军阿，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后来他到各处演讲，毫无顾忌地批评腐败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弊端。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苦恋》。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合人

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① 8月3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

胡耀邦对批判《苦恋》的态度不是很积极的。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回答说：“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电影，我没去看，听说有人反对你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我们家就是两派，一派是我的秘书，他反对。一派是我的儿子，他支持。”他一再表示，在这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批判以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10月，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②

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使命，在不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他们是不会让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原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在对有损共产党的言论给以适当打击之后，他会敲击钢琴的另一个键，使改革开放的音调再度高昂起来。

“异化论”风波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对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1页。

② 白桦：《我理解他》，载《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第90页。

义制度中某些弊端的批评也大胆起来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发表《社会主义异化论》，说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异化现象，人民把权力给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这权力，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王若水在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一文中说，人道主义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是用以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的武器。

1983年3月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报告会，请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历史学家胡绳等几位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人作报告。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会议。周扬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身体不好，念了开头就由电台广播员代念。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

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乔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7日晚上的电视我看过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又看，还

是交给了秦川。

次日或第三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到周扬家中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发表周扬讲话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两个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回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时,胡乔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而胡乔木说当时一直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

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4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

1998年5月,本书作者就这段历史到秦川家中(木樨地)访问了他。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向我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一场小风波。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秦川对作者说,邓力群和他在延安是同学)。邓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在9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说:“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他还解释,春节前周扬请王若水帮助起草讲话稿,他不愿意去。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去去为好。”文章发表后邓力群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3月21日,中央决定,由胡乔木、邓力群将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和被批评的人见面,核对事实听取意见,再报告中央。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胡乔木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

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听到过不让发表。两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周扬则再次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这次会议的核实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清污”运动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是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污的任务。

1983年9月2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9月24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

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中委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说:

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

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①

10月15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10月1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级纪委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42页。

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同一天的一个会上发言也讲,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二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11月3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级团组织都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11月5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是因为胡乔木多次给周扬打电话说,小平同志要周扬表态。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11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还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

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在这期间,胡耀邦和赵紫阳让人对基层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的进行。他们把这些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担心影响改革开放,点头刹车。

11月28日,据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定,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11月30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握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说,“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12月7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

12月13日和22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长篇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胡乔木这本小册子是专为批评周扬而作的,1984年1月出版。1月26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周扬两年后成为植物人，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1985年4月14日，胡耀邦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说：“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央全会一致同意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事实上也做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不用这个名词。”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28天）。对此，有的人高兴，有的人很不满意。不满意的人总结了“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

第三节 第二次碰撞：1986年反自由化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4—1986年，中国形势波澜起伏。

本来,1984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发表南方讲话,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可是,1985年,改革中的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1985年的9月是个多事之秋。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了40多亿美元,达164.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108.3亿美元,出口额56.1亿美元。逆差52.2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传言很多。因此,群众中有一种不满情绪,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很伤中国人的感情,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游行。

“九一八”以后,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还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一直到放寒假才平息。

在这次学潮中,出现了一些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

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人看到,在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

当时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①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学潮平息以后,1986年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

4月13日到16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1985年9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4月12日在中国音协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时,提出思想理论界要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4月22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政治气氛进一步宽松了。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①

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②

7月12日,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9月3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现在经济体制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0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1980年8月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朋友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如此集中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了。

显然,中国的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是布满地雷的。人们对政治改革的看法也很不一致。一提起政治改革,立刻就会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十二月学潮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1986年,虽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在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等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一些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上海的王若望提出实

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等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会上有不少发言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1986年12月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由于对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的某些做法不满，贴出大字报，在副校长方励之的鼓动和支持下举行游行，揭开了学潮序幕。随后，上海各高校学生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12月18日下午1点半钟，上海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坐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会场秩序十分混乱，江泽民希望和学生对话，但是无法进行下去。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5点半钟，江泽民得到了讲话的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把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江泽民接着说：“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

22日到23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多所高

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月5日、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12月29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

12月30日上午10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处理。”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方面态度更加坚决。政府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1月1日,北京严寒。广场实行戒严。政府已经组织了3600名优秀少先队员在纪念碑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大队会。下午一点钟数百名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言论自由”等口号。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

白天的游行被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步行向天安门进发。2日凌晨1时30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400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3时30分游行到天安门。于5时30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18个省市,28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

胡耀邦所主持的党中央对学潮束手无策。他们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

胡耀邦手软,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7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事后,邓小平让秘书安排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12月30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来到邓家,邓小平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①

1月6日,邓小平这个谈话以中共中央1987年1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4—196页。

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等职务,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

1月13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14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

1月1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要受到党纪处分”。

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的党籍。这个决定在方励之所在的党支部宣布;

1月23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

“四号文件”

学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其中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

自由化”起作用。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少数人是想从根本上否定,多数人是希望加速改革。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维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

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一批人被开除党籍,造成了一个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下旬,宣布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管理。2月初,朱厚泽失去了中宣部长的职务,由王忍之代替。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

有些地方,在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1987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听说这个城市一夜之间就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1984年到1986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48%。1987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

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 16%，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 32 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

改革和开放受阻，使一些改革者忧虑。邓小平是不会允许改革开放受阻的。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四号文件”。《通知》指出，“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要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在“四号文件”范围之内也很不容易。有人提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

5 月 13 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他说：“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他接着说：“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了“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批评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等看法，批评了“有人要打破四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倾向，然后说：“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

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四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

“四号文件”和“5·13”讲话,使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赵紫阳下台以后,有一篇批判赵紫阳的文章写道:“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1987年5月13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5·13”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①

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安排。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3月19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告7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几年以后,又用“邓小平的建设

^① 《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载1990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级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8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

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常委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邓小平不参加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

赵紫阳由代总书记成为总书记。江泽民、李瑞环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是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候补书记。

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当时我和同事陈大斌、姬乃甫在会上合作采写《第二次飞跃》的稿件,亲身感受到这种轻松气氛。在新的政治局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5个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他们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幽默。经电视转播后,群众也很满意。公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味道。

第四节 第三次碰撞:1989年北京风波

1989年面临的社会矛盾

从1988年夏秋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就有逐渐加剧之势。

1988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经济的确比过去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多。人们在改革深抱期望的同时,也发泄着满腹的牢骚。

这一年,改革遇到的种种困扰充分暴露出来,使人们有进退维谷之感。特别是物价闯关失败以后,更使人们感到惶惶不安。

当时的改革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是在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以后,贫富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了。由于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发出种种怨言和牢骚。这些怨言和牢骚也的确有它的理由。因为相当多的人发财不是靠诚实劳动。当时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与非、法与非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过去被人们看成是胆大妄为的人,现在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条件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大发其财。当时,反映这种情况的民谣很多,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从全国来看,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西部地区的干部意见很大。

第二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正是“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有些不法分子向掌握销售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

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第一种表现就是全民经商。党、政、军、民、学都做起买卖来了。民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没有制度约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不少人混水摸鱼。“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第二种表现是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

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首先是农村改革停滞。农

村改革从1984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粮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的双轨价格,既不能退到以计划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又不能前进到以市场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原有的计划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城市改革局面难以打开,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厂长们经常在报纸上发出要求企业自主权、改善经营环境的呼吁;改革方向不明。就企业改革而言,放权让利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希望;价格闯关失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事也只好搁置起来。宏观调控还是采用原来的老办法,没有新的手段。

从1988年秋实行治理整顿,着重于治理通货膨胀和整顿经济秩序。改革的步子放慢了,有些方面的改革停顿了。治理整顿中资金紧张,市场萎缩,企业困难重重。当时不少人对改革失去了信心。

在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来。“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

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1988年、1989年是群众中传播顺口溜最多的时候。在火车上,在食堂里,在茶馆,在军营,在朋友相聚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都是牢骚,都是怨言。彷徨,烦躁,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改善了怨气却多了。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交通事故特别多。出现了几次大的铁路事故,发

生了上海真如车站两列客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飞机、轮船也事故频频。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攻击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评“反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

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等。方励之、严家其等人经常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

1月28日，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

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越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2月13日，由陈军出面，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

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作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

2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26日晚，他在长城饭店

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方励之、钦本立、严家其等人出席。

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这种矛盾的公开化,本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愿。有了公开化才能逐步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组织化,有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政府的态度是,绝不让步,绝不迎合。政府认为,“迎合只能搞乱政局,一让步他们就寸进尺。我们要作中流砥柱,要对历史负责。”

政府的这种强硬态度与东欧形势有关。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垄断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波兰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党执政变成了三党竞争(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雅鲁泽尔斯基一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时又承认其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力量迅猛扩大。对东欧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防止东欧的事态波及到中国。

在内地政治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西藏又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起义”10周年(3月10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3月5日,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实行了戒严。这在当时已经比较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又增加了一分紧张。

如果说,1988秋到1989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立场、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

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是建国40周年,是改革10周年。有人提出反思70年,有人提出反思40年,也有人提出反思10年。这些反思是要对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对10年改革从根本上提出疑问。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对新闻界发出指示,要引导舆论。

1989年春天,中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人们感到狂风暴雨将要来临。

从胡耀邦逝世到“4.26社论”

4月15日,早晨7时48分,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3岁。他是在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的。此前不久他曾去广西作过调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很不够,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说完后有点激动,心脏病突发。中国人是习惯于同情弱者的。胡耀邦1987年下台以后,为他抱不平者很多。在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有这样一个人逝世,终于成了一场重大政治风波的导火线。4月15日下午,北京一些大学里就出现了大字报、传单、挽联,批评政府、反对腐败、为胡耀邦鸣不平。据国家教委16日统计,“北京17所高校出现挽联、标语、大小字报约500余份,其中属正常悼念的占80%,发泄不满的占10%,攻击党和政府、煽动闹事的占10%。”^①可见这时正常的占绝大多数。北京、上海有学生借悼念胡耀邦的名义上街游行,提出了一些为胡耀邦鸣不平的口号。

在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学潮。新华社22日的报道中说,“今天西安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围攻陕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材料,共烧汽车10辆,烧毁民房20多间。……有100多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人员被打伤。”新华社23日发出的关于长沙的报道中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火

^①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第18页。

车站及黄兴路等繁华地段,昨晚连续发生不法分子抢砸商店事件。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有 28 家商店被砸被抢,部分商店被洗劫一空。”矛盾继续激化。北京市有几十所高校罢课,并且通电全国,宣布无限期罢课。

4月23日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第二天,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从北京市汇报的情况看,问题很严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十分活跃。根据北京市的汇报,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4月25日讲话”。

4月26日,据邓小平4月25日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经新华社发通稿,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社论。

局势全面失控

4月25日晚街头所有的喇叭都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广播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的10条规定;禁止在街头讲演、募捐。

4月27日,北京38所高校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要求政府收回“4·26”社论”。

经过几天平静之后,波澜陡起。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前绝食。政府劝说学生不要绝食。学生继续坚持绝食。

5月以来,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

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后来,外地学生乘火车到北京不要钱,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串联一样。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北京访问。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只好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由于仓促,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时,苏联国旗也没有挂,地上只有一小块地毯。

5月17日,北京各界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的规模也是空前的。除北京以外,全国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

从戒严到“六四”

矛盾越来越激化。政府决定出动军队,实行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群众堵军车的情况,军队一直无法进城执行戒严。这种军民对峙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反对政府的人会得寸进尺;真要强行进城,可反对政府的人和大批真正希望反腐败、促进民主的人混在一起,势必造成流血。在两难面前,政府选择了坚决执行戒严。

后来听军队里的朋友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6月10日清场,执行戒严任务。6月3日,化装进城的部队被群众发现,而且装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附近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在六部口军警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6月3日清晨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所以,6月3日下午3时30分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晚上10点左右,各路军队向市内推进,受到群众阻拦。从而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军队的进城使戒严得以实施,也使持续了56天的北京风波终于平息。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①

他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同时,他强调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在6月9日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强调“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他说:

这件事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②

在这之后层层开会,用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统一思想。

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表明,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有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2页—303页。

② 同上书,第304页。

的倾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你就得下台。对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明白: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①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对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②

① 1989年同李政道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第九章

邓小平的最后辉煌

政治上的北京风波和经济上的治理整顿,使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传统思想活跃,改革踟蹰不前,经济发展速度放慢。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年迈,他还要用生命中蕴藏的最后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

第一节 “皇甫平”事件

1989年以后,当时有的报刊开始登载文章,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等。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

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针对当时改革停滞不前的形势,邓小平 1991 年春节在上海发表了具有突破性的谈话。主要意思是:

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90 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 月 2 日、12 日,4 月 12 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 3 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播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但是,北京的报纸对这几篇评论持冷淡态度,有的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调查。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到上海去不找上海市委,不找市委宣传部,而是直接找有关部门。所以有人称他这次行动是“微服私访”。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

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和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

《求是》杂志1991年第九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报》8月7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求是》杂志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是在批邓。因为邓小平在上海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历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思想,我为《半月谈》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谈》1991年第1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影响稳定的一些社会矛盾之后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还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稳定,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如果把停滞当稳定,或者为了求得暂时稳定,不去触动社会矛盾,矛盾就会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大爆炸,酿成严重和不稳定。”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徐惟诚

的严厉批评。他们说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两位部长的批评在新华社传达以后，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可见，当时群众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谈》这次遭批评的还有该刊副总编于有海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资姓社”的诘难。因此，两位部长对于有海的这篇文章的批评更为严厉。

这股“批邓”风越来越强劲。一直到1991年9月2日，才开始转折。这种转折发生在一个小小的事件上，人称“九·二社论事件”。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报社领导人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广播电台也当晚广播了。中央领导人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就在这新一轮批邓的时候，党内还出现了一种新舆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自然结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九”事件的影响。

“八·一九”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在1985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背离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人对他开始不满了,不少人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九”信息的。

1991年8月18日16时50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8月19日6时零5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8月19日6时25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6时34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

1991年8月19日,新华社连发了3条消息:1.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2.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3.“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知道情况的,消息发得很及时。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8月19日11时46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

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 110 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 3 天的政变喜剧宣告失败。

戈尔巴乔夫复职以后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在这之后，一些苏共党的负责人受到查处。几万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间失了业，收入、看病没有着落，生活成了问题。不久，苏联解体。

苏联的剧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不引起震动。当时的报纸反复宣传：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实际上，最怕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人们纷纷总结苏联教训。

苏联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一是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对群众缺乏教育。当然，经济没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不少学者对这 4 条提出了批评，说这 4 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确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同时把改革中的很多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着挑战。改革面临挑战。当时的确存在着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邓”风。对此，邓小平当然是不会让步的。

邓小平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后来，在 16 个字后面加

上了“有所作为”，成为 20 字方针。

第二节 在南国卷起的邓旋风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因为在中国也有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导权会对国家和民族产生严重后果。

邓小平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当然是十分坚定的。但对改革和开放他也是很坚定的。

邓小平既怕丧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又怕葬送他开创的改革大业。1991 年，邓小平对政治宣传上说大话、说空话不满意，对治理整顿中否定改革的倾向不满意，对经济发展速度低不满意。

在他 88 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刻在他身后的历史上。把有点冷却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据说，他让周围的人为他准备了 3 个材料：一、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这 10 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二、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三、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邓小平根据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这大概是他南巡的准

备。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少,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首先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他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

“左”的思潮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解释: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现在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像以往每一次谈话一样,邓小平在提到一个“基本点”时,必须要强调另一个“基本点”。南方讲话也是如此。他说: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只二十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流传着许多从广东、从香港传来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2月4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方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播。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话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合适的。

然而,江泽民接受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3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针对社会上对这个讲话的不同看法,乔石3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4月,田纪云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有些人,是风派,一有机会,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否定、批判改革开放。这些风派人物掌了大权,就是中国的灾难。

小平同志强调,要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对此一定要深刻体会。

“左”的表现形式:一提起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说是否定集体主义道路;一提引进外资,说就是卖国;一提股份制,说就是资本主义……

有人攻击特区,1984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

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他4个月以后视察首都钢铁公司的讲话,一再讲经济要发展快一点。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这样,全国又掀起了一个建设热潮。各地都在搞“开发区”,都想吸引外资。但是,速度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也跟着上去了,以致1993年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节 为身后确定了改革路线

邓小平已经88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不过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为了防止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他必须让改革开放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造就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南方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

线、方针,从而用党的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有2035名代表出席会议。60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14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九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又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方讲话中的解释。总纲中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新产生的十四届189名中央委员中,新进的占46.7%,平均年龄56.3岁。55岁以下的占61%,大专以上文化的占83.7%,有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占44.5%。就文化水平来说,“十四大”的中委比前13届都要高。

邓小平对“十四大”是满意的。大会结束时他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体代表见面。他身穿银灰色中山装,踏着红色地毯,一边走,一边向代表们频频致意。不时停下来和代表握手。在江泽民等的陪同下,他沿着宴会大厅走了一周。代表们不停地向他致意;

“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铁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共50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可以完全放心了。

第四节 两代人权力稳定交接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来,所有的电视频道和广播都传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我下楼去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邓小平死了。”她没有悲伤,还是平日的那种神情。

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着,想寻找21年前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然而却是徒劳。

平静。这是邓小平逝世时的特点。和毛泽东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18日下跌,以后却是一连几天的升势。

邓小平逝世没有什么震动,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努力的结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党政第一把手。但他把比他年轻的人推上台,这其中就有他在自己逝世时不引起社会震动的考虑。以后他又逐步卸下身上的担子,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事实证明,这种考虑是正确的。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特地召见杨尚昆、万里和“六四”以后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他说:

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是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天,他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代表道别。但是,他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舞台。1992年,他以一名普通公民、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刮起了一阵政治旋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路线。

以江泽民为首的的领导集体在1994年就完全挑起了领导中国的重担。应当说,邓小平是从1994年就已经结束了他的权力生涯了。当然,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新的领导集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自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新的领导集体牢牢地掌握了权力。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6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6个字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新领导人能否站住脚与人选有关。如果选的人各方面不能接受,就很难站住了。这一点邓小平等几位老人做好了。江泽民是各方面能接受的。但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新领导人还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也显示了他的治国才干。

就是在邓小平还健在的时候,他做到了几点:

第一,独立地主持全面工作,不搞大树底下好乘凉。虽然邓健在,一般不请示,不汇报,由新的领导集体负责。据说,江泽民每年和邓只见两次面,一次是春节,一次是生日,而且时间很短,一般是不说多少话。

第二,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但不搞“两个凡是”,不搞“句句是真理”。这一点是和华国锋接班时是大不一样。邓南巡以后的经济过热,虽然邓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批评经济发展速度低。但新的领导班子还是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速度和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软着陆”。在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增强了人们对新一代领导人的信任感。

第三,在邓逝世前就亮出了自己的旗帜。在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使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同时提出“讲政治”的口号。这不仅是一个对社会现状很有针对性的口号,又是一个有弹性、有丰富内涵的口号。

第四,在内政外交上都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特色。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八点方针”,在外交上,新一代领导人积极活动,频频出访,基本消除了“六四”造成的阴影。

第五,处理重大问题基本上不“投鼠忌器”,对大案要案态度坚决。例如,处理陈希同、周北方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表现使人们相信,两代领导人之间已经平稳地完成了权力过渡。在邓以后不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

邓小平逝世没有出现社会震动并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恰恰相反,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舆论对他逝世的反应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他说:“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他推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在致江泽民的唁电中说:“邓小平将作为中国过去20年发生变

革的主要设计师载入史册。”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邓小平使中国向世界开放，并给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了现代化和繁荣。这些成就使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突出位置。”

韩国总统金泳三对邓小平逝世感到悲痛，说邓是“谱写世界历史新篇章的杰出政治领导人”。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是这样赞扬邓小平的：“他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说邓小平是“打开中国未来希望之门的领导人”。“中国人民世代代将会永远怀念这位非常杰出的人物”。

一些国际新闻机构也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共同社说“邓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同建国之父的毛泽东并列的‘中兴始祖’肯定将名垂青史”。德新社称赞邓小平“把中国带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7年零3个月。他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领导人都发来了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的所有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邓小平，这位近20年来中国最响亮的名字就这样载入了史册。邓小平的名字其所以光辉，是因为和中国这场深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第十章

中国的改革推进方略

20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这一体制过渡到另一体制是对历史大峡谷的跨越。除了要克服重重阻力、排除种种干扰以外,还有很多事先不可预料的困难。跨越这个历史大峡谷势必要经历很多磨难。

有人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改革家,得出了一个凄壮的结果: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曾经三起三落、历经多次惊涛骇浪的邓小平深知他的危险处境,也深知在险中取胜的奥妙。

我曾用两句话来比喻中国改革:“在正在航行的船上修船”,“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在航行的船上修船,既要把船修好,又要保持一定的航速,更不能把船搞翻。这就不能把所有需要修理的设备统统拆掉。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时,要有步骤地进行。有了新的立足点,才能够再挖掉原来的立足点。否则,改革者本人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渐进式改革策略。

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就是选择了一种阻力小、风险小的推进

策略——渐进式改革策略。当然,这种策略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完整的。下面介绍的看法中有不少是作者的事后分析,邓小平事先是不是这样想过不得而知。

第一节 改革的思想动员策略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① 马克思还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②

马克思说的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改革要在旧的思想海洋中创新。要使改革取得合法和合理的地位,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支持,常用的办法就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武库中寻找适合的武器,在传统理论体系中寻找改革的根据。晚清的改革者康有为把这种办法称之为“托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585页。

② 同上书,第586页。

古改制”。

然而,要实行“托古改制”,就需要一个大政治家出来,对传统理论进行一番更新改造的工作,使之适合改革的需要。

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位大政治家。

首先,邓小平巧妙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寻找改革的理论根据。为此,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认定,使它从“句句是真理”的死胡同里走出来,变成了具有广阔回旋余地的“思想体系”。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作出了解释,使它从意识形态的天空回到了经济建设的实地。

此外,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还创造了一些容量很大、很有伸缩性的提法。这些提法既能大体上体现改革的方向,使多数人能够接受,又不会成为教条,束缚改革者的手脚,为改革的探索留下广阔的活动余地。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肯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又强调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肯定现在是社会主义,这就保证了政治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强调目前是初级阶段,就不会被经典作家的一些条条框框所约束,可以放手进行改革。也就是说,有了“初级阶段”这4个字,就可以放手发展私营经济,可以按资分配,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干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不允许干的事情了。又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既肯定了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又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了一个定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实,也是统一思想的旗帜。但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束缚着改革者的手脚,现在有了“中国特色”4个字,就可以不再照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了。显然,这可以为改革实践开拓广阔的空间。

但是,要改革就得否定一些过时的、传统的理论,否则就不能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思维。但这种否定必须逐步进行,否定得也要适度。如果不注意时机、不注意适度,就会造成思想混乱,甚至会失去控制。批判了“两个凡是”,打开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禁区,人

们思想活跃了,但是,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又产生了强大的惯性,出现了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本人比别人更深知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因为他就是直接的受害者之一。然而,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不会从个人恩怨来评价一个政治领袖。他深知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自己进行改革的基础,也会招来更多的人反对对自己。所以,邓小平只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却肯定了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

要改革,还要揭露旧体制的弊端。不揭露旧体制的弊端,就不能说清楚改革的必要性,就不能动员全民齐心协力地去改革。但是,这种揭露也得有分寸。如果一开始就来个全面否定,也就否定了10亿人的过去,否定了几十万名干部的过去,就会引起大震荡。过去的事情是这些干部们干的,他们现在还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改革中的事还得要他们去做,因此不能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什么时候揭露什么,否定什么,否定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对当时形势的估量,还要为今后工作留有回旋余地。有些事情甚至从事实上否定,但不从名义上否定。对60多万“右派分子”几乎全部改正平反,但还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样,60多万“右派分子”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也没有伤害当年反右的积极分子,还为今后的反右(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留下了余地。有些事情是先去干,干到一定的程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过去不合理的事就自然否定了。例如处理“人民公社”问题。先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搞起来,把乡村政权建立起来。这时人民公社就成了空壳,没有用了,再取消人民公社就没人反对了。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改良。改良,就不可能像有些人希望的那么彻底;而彻底又可能引起社会动乱。稳妥的选择是,宁可通过改良取得可期望的成果,也不去冒社会动乱的危险,去追求没有把握的成果。基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改革过程中

的政治稳定,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力求使改革成为一种可控的过程;既能快,又能慢;既能放,又能收。

“不争论”,这是邓小平在处理认识问题上的一大发明。他防止因争论而干扰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但邓小平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演化为公开的争论。他期望在实践中逐渐统一认识。关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开始认识上分歧大,中央没有强行统一认识,经过几年的实践以后,认识逐渐取得了一致。不争论,使广大群众全心倾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中,不致于被卷入政治斗争,从而防止“政治过热”。人们都知道“经济过热”不利于经济稳定,殊不知“政治过热”也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对某些国事问题的争吵上,不仅会冲击经济建设的中心,也会使一大批政治激进分子和“职业政治家”空前活跃起来,政治派别和政治组织互相争斗,就会出现政治失控的局面。

第二节 渐进式改革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种稳妥的改革方略。第一,在地域关系上,是先划出一片与广大内地相隔绝的地区,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进行新体制的试验。第二,在部门上,是先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围开始,逐步向核心部分推进。第三,在增量和存量上,存量暂且不动,而让增量按新体制运行;第四,在改革时序上,不搞原苏联那种“五百天计划”,不搞“休克疗法”,而是一段时期一个改革重点,一步一步地前进。第五,在切入点上,先从微观入手,在微观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进行宏观改革。

在一个隔绝的地区搞试验,失败了也无关大局。后来证明是成功的时候,才由4个特区扩大到沿海14个城市,再从沿海扩大到沿边、沿江,最后“全面开放”,包括内陆腹地。

价格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最典型的一例。将行政统制价格转变成市场自由价格,中国花了8年多时间(从1984年5月国务院67号文件到1992年全面放开价格)。在统制价格条件下,中国是有严重通货膨胀的。但由于价格冻结,通货膨胀没有表现为物价上涨,是隐性的通货膨胀。统制价格条件下的隐性通货膨胀,是过去大量的无效企业、无效投资、大量的财政补贴、对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欠帐等方面构成的。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亏空。一旦放开价格,多年压制的隐性通货膨胀就要表现为物价上涨。所以,放开价格的关键是补上过去的亏空。如何补上这个亏空,依据国情不同,国际上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是艾哈德方式。1946年在联邦德国主持经济工作的艾哈德教授搞了个货币改革,10个旧马克只能换1个新马克。然后放开价格。二是俄罗斯方式。价格全部放开,任其货币贬值。这两种方式都是持币者作出牺牲,持币者为弥补过去的亏空作出贡献。持币(旧马克、卢布)最多的人为价格改革的贡献最大。这两种方式都是一次性地补上过去的亏空,一次放开价格。中国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共同补偿过去的亏空。价格逐步放开,让过去积累的隐性通货膨胀逐步释放。以广东放开价格为例,可以看到中国价格改革的稳妥。

广东是鱼米之乡,但改革之前没有鱼吃。80年代初放开了鱼价,几角钱一斤一下子涨到4元多钱一斤。在放开鱼价的时候,保证计划价肉的供应。吃不起鱼的人可以吃肉。鱼价上涨以后,养鱼的人多了,鱼价稳住了,再放开肉价。对蔬菜价格也是如此。先放开细菜价格,同时保证大路菜的供应。吃不起细菜的人吃大路菜。细菜多了,价格下来了,再放开大路菜的价格。放开价格,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收入。1979年,广东火柴的价格由2分钱一盒涨

到3分钱一盒,社会上一片叫喊声:“不得了啦,涨了百分之五十啦!”1992年4月放开粮食价格,提前几天公布消息,希望人们抢购(当时粮食库存多,占压资金多),结果是没有人抢购,也没有人叫苦。为什么呢?因为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从1980年到1992年,广东物价上涨了1.7倍,工资增长了2.7倍,国民收入增长了5.3倍。物价上涨不会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先从容易改革的部分着手,容易的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难改革的部分创造改革的条件和增加改革动力。具体操作是:

先农村后城市。对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城市经济是其核心部分,农村是其外围和薄弱环节。中国农民受计划经济之害最深:国家以剪刀差形式从农村拿走了五六千亿元,把农村推到了赤贫境地;城乡分割,使农村和城市成了两个差别悬殊的世界。改革,对农民来说,失去的是计划经济的锁链,期盼的是自由和富裕。所以,农民改革的积极性最高。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很自然的。在1984年以前,中国改革的重点一直在农村(城市只在工厂里搞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5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经济繁荣起来,农民吃饱了肚子,购买力也大大提高了,为城市加工业造就了新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改革的成果,形成了一个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市场环境,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使城市经济体制非改革不可。因此,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正式从农村转向城市。

先增量后存量。存量,就是指改革前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增量,是指在改革中间发展起来的资产。在实践中,这个概念延伸了,改革前业已存在的人和事都称存量,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人和事都统称增量。中国改革的做法是,增量部分先按新规则运行,对存量资源不急于进行重新配置,即“新人新事新办法,旧人旧事暂按

老办法”。具体说来,改革中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先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国有经济逐步改革。改革以来,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到90年代中期,在国民经济中,非国有经济占总量的比重已达一半以上。这些按新体制运行的经济成分一方面使社会繁荣,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竞争,增加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压力,同时也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增量改革先行一步,为存量改革创造了条件,减少了阻力。

先微观后宏观。先对企业放权让利,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把微观的活力激发起来。微观的活力的发挥,增加了社会资源。这部分资源是按利益原则配置的,因而其使用效率高。这就使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了。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蛋糕大了,尽管分配比例有所变化,但每个人所分到的绝对量还是大了。这样,在利益调整过程中,没有一个利益集团的绝对量受到损害。改革的阻力就小了。微观搞活以后,宏观不适应,为宏观改革提出了问题,增加了动力。

这种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改革策略,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撑着改革继续深入;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经济繁荣再支持改革。这种良性循环是中国改革避免了出现苏东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有非良性循环,使某些方面的改革陷入了泥潭,例如国有企业。

第三节 “摸着石头过河”

1980年,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也就是‘摸

着石头过河’。”^①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把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鉴。怎样减少失误?“摸着石头过河”是最稳妥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水中脚不着地不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学习改革。

摸着石头过河,不仅表现在具体操作上,也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上。

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改革最终目标的,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适时地逐次接近改革目标。正像南方农民编草鞋那样:草鞋无样,越编越像。

1978年12月通过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改革的认识是,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当时,建立商品经济的看法还没有取得共识,当然也没有列入改革目标。

1979年12月3日,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第一个总体设想:《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设想认为,现有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是过多地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计划统得太死,企业权力太小,没有很好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认为计划经济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1980年9月8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体改委”的前身)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的改革目标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由于党内的传统力量对“商品经济”的反对,这个提法受到批评。国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51页。

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在1982年2月25日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没有提“商品经济”，只提“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也没有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目标的提法深化了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又提出了“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为体，市场调节为用”，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时还没有肯定“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10月25日，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并指出，计划调节不等于指令性计划。在这以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的舆论造得很浓，为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指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进一步强调了上海谈话的观点。社会上关于搞市场经济在舆论上占了优势。这时，才亮出了邓小平的底牌，公布了他在1979年11月26日同美国人吉布尼等的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92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接受了这一提法。到这时，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才真正清晰起来。从改革开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改革目标的明确（1992年10月十四大）共花了14年时间。这14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对于这种逐步明确改革目标的做法,在90年代中期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改革之初对改革目标也不很明确,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逐步明确的。邓小平1979年虽然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他不是经济学家,不一定了解市场经济的真谛。另一种看法是,邓小平心里早就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由于怕党内和社会上一时接受不了,才逐步亮出底牌。

在改革目标上“摸着石头过河”,在操作上,也没有搞出一个大家满意的总体规划。改革措施是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提出的,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解决某个问题时,将直接相关的几个方面进行“小配套”,以免单项改革孤军前进。改革的力度是依据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物质承受能力和精神承受能力)而确定的。社会不能承受的改革暂时不出台。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第四节 渐进式改革得与失

中国这种渐进式改革方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一是没有出现东欧和原苏联那种剧变,保持了社会稳定;二是在改革期间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增强;三是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生活水平提高;四是在以上三个前提下,经济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些和苏联、东欧等国相比,显得特别突出。

当然,中国和苏联也有不可比之处。1993年秋,我到俄国访问才知道他们不像中国这么做的的原因,是苏联的计划程度比中国高得多,它的国有化程度也比中国高得多。中国的改革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而苏联没有“体制外”。他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包

括了所有人口,甚至农业也包括在内。他们的集体农庄也是国有经济,改革也不能像中国那样从农村开始。苏联的改革一开始就得改国有经济。一开始就得去攻克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而这些核心部分阻力是很大的。苏联在国外也没有富有的“俄侨”,十月革命时,对白俄是扫地出门的。他们不能像中国一样,对外开放从吸引在国外侨民的外资开始。面对巨大的阻力,他们只好从政治改革开始,希望用政治改革去排除经济改革的阻力。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这就是中国虽然没有像苏联那样先搞政治改革,却在政治权力的最高层有一个极力推进改革的、很有权威的邓小平。他不断地排除经济改革中的阻力。有人向俄国政府建议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当时任总理的盖达尔解释没有采纳的原因说:“俄国没有邓小平!”

渐进改革使中国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同时,这种改革策略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渐进改革,造就了“双轨病”。渐进改革,使得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场,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体制同时起作用。这像一条马路上实行两种交通规则一样,难免发生碰撞:新体制要求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旧体制要求企业还承担指令性计划。结果是,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不能完成执行指令性计划。新体制要求价格随行就市,旧体制还要对价格进行管制。结果是,价格既不能随行就市,也不能完全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

旧体制处在崩溃之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但新体制还没有建成,它还幼稚无力。两种体制都起作用,但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这样,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必然漏洞百出。很多经济活动无法可依,无政策可循。胆子大的人,就利用这些漏洞,大发其财;胆小的人无所适从。由于新旧体制之间的漏洞,没有确定的政策和法规,就实行审批制:审批土地,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

机会。有审批权的官员就成了“糖衣炮弹”的重点进攻对象。

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况下，一种商品两种价格，一样的贷款两种利率，一样的外汇两种汇率，一样的事情两种政策，等等。两种政策，对谁宽，对谁严，也无法可依，主管官员有很大的随意性。贷款有两种不同的利率，而低利率的资金分配权掌握在银行信贷员手中，为了争得这低利率的资金，必然会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这是出现腐败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人计算过，双轨价格、双轨利率等造成的利益差一年就是几千亿元。这几千亿元没有规范的分配办法，就掌握在有审批权的官员手中。如果其中的百分之一漏到私人口袋里，这能造就多少百万富翁！

上述问题，我把它称之为“双轨病”。“双轨病”是社会转型期间的一种“过渡病”。渐进改革把这种社会病加重了，时间拖长了，使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无序状态。

“过渡病”的另一表现是政府行为。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上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有很多优越性。制度创新也包括政府机构自身的创新。政府机构，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的对象。没有政府的组织，改革无法进行。体制转型期间失去政府控制，就会天下大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政府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机构的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改革对象怎样组织人去改革自己呢？一个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外科大夫能为自己开刀吗？然而，中国的改革恰恰就是这样。

政企分开，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目标，可是，改革进行了十六七年之后，政企还是没有分开。政府对企业的非正常干预还是那么多。1995年，我写了一篇评论：《一个讲了十几年的老话

题》^①中指出：只要各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政企分开这个老话题还得讲下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改革对象的政府，它的管理能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应该管的事，它却没有管好。1996年我又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过度行政干预和内部控制同时并存——当前国有企业的一种病态》，^②这篇评论指出，一方面，政府部门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力又在企业里失落了。

要顺利实现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职能转换的效果为什么会和初衷相悖呢？因为政府本身也有利益。从理论上说，一个好政府，其本身的利益应当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没有得到和谐的统一。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和目标相扭曲，政府有些行为不是按照制度创新的目标行事，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政府行为扭曲，就造成市场混乱；市场混乱，政府又用传统手段进行治理整顿，这样就又强化了旧的政府职能。

中国改革从微观入手，先改微观，后改宏观，这使宏观改革滞后。微观释放出来的活力没有市场环境的约束，没有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控制，这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要治乱，又只好用旧的宏观手段进行紧缩，使经济几年震荡一次，改革也随之进两步，退一步。这是中国改革策略的又一问题。

渐进改革，把最难改革的部分留在最后，也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的改革留到最后。改革越到后期，困难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就是一例。从外围和增量方面改革，绕过了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改革迟迟不能突破，使得国有企业、银行、财政等国有经济的三个主要方面相互锁定，一家拖住另一家，谁也不能前

① 刊于1995年的《南方周末》。

② 1996年6月3日《经济参考报》。

进。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银行大笔贷款成为呆帐、死帐,银行商业化难以进展;银行改革不前进,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也就建不起来,资金也不能市场化,这又使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环境。国有企业长期不能摆脱困境,财政收入就受到影响。导致国家财力不足,无力向国有企业注入资金,使国有企业更加困难。

这些就是直到 90 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这些核心部分的改革还是困难重重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十一章

邓小平的遗产

邓小平还有一个遗产,那就是未完成的改革事业。这需要他的后继者去完成。中国改革的成就是辉煌的,但继续改革的困难更加艰巨。因为渐进式改革把最困难的任务留在后面。邓小平的后继者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棘手的难题。

第一节 繁荣的经济

邓小平最重要的遗产是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

我们还是用《中国统计摘要——1998》上的数字来说明问题,时限取1978年到1996年。在这期间:

人口由9.6259亿增加到12.2389亿,增加的人口为2.613亿。也就是说,在邓小平时代,增加的人口相当于4.6个法国。如果经济发展缓慢,中国将比毛泽东时代更加贫困。

国民生产总值由 3624.1 亿增长到 66850.5 万亿,增长了 17.45 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379 元增加到 5462 元,增长了 13.41 倍。

按汇率换算,1996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658 美元,而西方一些人士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 2000 美元。

国家财政收入由 1132.3 亿元增长到 7408.0 亿元,增长了 5.54 倍。

粮食产量由 30477 万吨增长到 50454 万吨,增长了 65.5%。虽然人口增长了 2.613 亿,人均粮食却由 316.6 公斤增长到 412.2 公斤。

棉花产量由 216.7 万吨增长到 420.3 万吨。同时化纤产量由 28.46 万吨增长到 375.45 万吨。1978 年以前,连国家干部也穿打补丁的衣服;到了邓小平时代,补丁只出现在青年人时髦的牛仔服上,成了他们的装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真正解决了。

钢产量由 3178 万吨增长到 10723 万吨。在毛泽东时代,曾倾全国之力发展钢铁工业,但从 1958 年到 1976 年的 18 年间,钢产量增长不到 1 倍,而 1978 年到 1996 年的 18 年间,钢产量不声不响地增长了 2.38 倍。

发电量由 2566 亿度增长到 10813 亿度,增长了 3.21 倍。城市家庭的耗电量成几十倍地增长。生活电气化成了现实。

原煤由 6.18 亿吨增长到 13.97 亿吨,增长了 1.26 倍。

汽车由 14.91 万辆增长到 147.52 万辆,增长了 8.89 倍。

化肥由 869.3 万吨增长到 2809.0 万吨,增长了 2.23 倍。

上面的数字无可争议地表明,邓小平时代的国家经济实力的确大大增强了。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与人民生活质量相关的工业产品产量也成数倍增长:

电视机由 51.73 万台增长到 3541.81 万台。

家用电冰箱由 2.8 万台增加到 979.65 万台。

家用洗衣机由 0.04 万台增长到 1074.7 万台。

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是用品都是几倍、十几倍地增长。过去长期凭证供应的日用工业品空前丰富起来,各种票证进了历史博物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生产者主宰消费者变成消费者主宰生产者。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短缺经济”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了。

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 1978 年的 184 元增加到 1996 年的 2726 元,增加了 13.82 倍。扣除物价因素,消费水平也提高了 2.69 倍。

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大幅度增长,而且档次不断提高。

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

| | 1981 | 1996 |
|-----|---------|----------|
| 洗衣机 | 6.34 台 | 90.06 台 |
| 电冰箱 | 0.22 台 | 69.67 台 |
| 彩电 | 0.59 台 | 93.5 台 |
| 录音机 | 12.97 台 | 72.66 台 |
| 照相机 | 4.29 架 | 32.13 架 |
| 电风扇 | 42.62 台 | 168.1 台 |
| 沙发 | 89.3 个 | 213.84 个 |
| 写字台 | 55.17 个 | 87.89 个 |

1996 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空调器 11.61 台,拥有钢琴 0.85 台,拥有淋浴热水器 34.16 台,拥有吸尘器 10.35 台。拥有电脑的家庭也不少,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在 80 年代,这些东西都没有进入家庭。

改革前农村家徒四壁。1996年,农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也多了起来。由于1978年很多东西农民家庭没有,所以只好拿1985年和1996年进行比较。

每百户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 | 1985 | 1996 |
|------|----------|----------|
| 自行车 | 80.64 辆 | 139.82 辆 |
| 缝纫机 | 43.21 架 | 64.62 架 |
| 彩电 | 0.80 台 | 22.91 台 |
| 电冰箱 | 0.06 台 | 7.27 台 |
| 收录机 | 4.33 台 | 31.35 台 |
| 大型家具 | 217.53 件 | 720.57 件 |
| 洗衣机 | 1.90 台 | 20.54 台 |
| 照相机 | | 1.94 台 |
| 摩托车 | | 8.45 台 |

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恩格尔系数):

| | 1978年 | 1996年 |
|-------|-------------|-------|
| 城镇居民为 | 0.576(1981) | 0.486 |
| 农村居民为 | 0.677 | 0.563 |

恩格尔系数降低,说明群众用在衣着、用品和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增加。这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高于西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住房费用低廉,住的费用占的比重比西方小得多。

从1978年到1996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由3.6平方米增加到8.5平方米。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城市居住恶劣状况,已经改善了不少。

在1978年以前,在街头所见,不分男女,不分长幼,一律穿着蓝色、灰色或黑色的衣服。到80年代以后,整齐的衣着替换了补丁,五彩缤纷替换了灰蓝。在农村,衣着艳丽的姑娘把绿色的田野点缀得像一幅幅图画。到90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衣着整齐和颜色,开始追求穿着的面料和款式了。

过去,每到春季,长江流域乍暖还寒,农民不得不咬牙赤脚下到冰冷的秧田里。到了1995年,我到湖南湘乡农村采访,看到整理秧田的农民穿上了长筒胶靴。在北方农村,农民下地一般都骑自行车。在珠江三角洲,还可以看到骑摩托车下田的农民。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邓小平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和一些靠近大城市的乡村,造就了一个富裕发达的地带。在过去的荒野山坡上,一片一片的小洋房令人赏心悦目;在过去的乡间小道上出现了一条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中国沿海的某些地方,其发达程度不次于某些发达国家。驱车在珠江三角洲,和在美国加州的感觉差不多。

90年代我到各地采访还看到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各地的文化古迹大量修复。这种修复的规模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当然有创造旅游资源的考虑。但是,不可忽视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在战乱年代和经济萧条的年代,文化古迹常遭厄运;大凡太平盛世,文化古迹大量修复。当代对文化古迹的大修复,没有政府号召,没有国家投资,完全是地方政府和民间集资进行的。这也应当反映出太平盛世的一种社会心理。

说邓小平时代是太平盛世是不是过分?对这个问题我反复考虑过。从经济上来说,邓小平时代不仅是建国以来经济最繁荣、社会财力最雄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时代。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最高、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经济最繁荣的时代。

在90年代,中国还有六七千万贫困人口。这是事实,但这些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比过去也有所改善。他们中的多数人还能吃

饱肚子。在城市,不少国有企业职工生活也很困难。但由于有了一个经济繁荣的环境,国家不能发足的工资,他们可以在市场上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一定的补偿。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留下的不仅是繁荣和富裕,而且为创造一个繁荣和富裕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对这样的一个新体制,在邓小平时代还仅仅破题,还要经过许多磨难。有一种乐观的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个体制就具备雏形。再经过 20 年的努力,这个体制就比较完整、比较成熟。

不管中国的新体制何时成熟,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的估计十分乐观。据世界银行推算,21 世纪伊始,中国将以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出现。到 2002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 9.8 万亿美元,超过 9.7 万亿美元的美国。届时,日本为 4.9 万亿美元,德国为 3.1 万亿美元。^① 世界银行的推算也许过高,但是,不管中国经济实力有多么强大,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只有受外国侵略的历史,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中国的国内市场是 21 世纪最广阔的市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邓小平留下的这个经济繁荣的社会,又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对贫富差别问题,本书第七章第六节已作了详尽的介绍。

第二节 有待改革的政治体制

在邓小平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多了。过去那种在政治上人整人、人

^① 金大中:《未来世界趋势与韩中经济合作方向》,载《太平洋学报》1994 年第 2 期。

斗人的现象很少见了,民主化程度也比毛泽东时代好多了。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政治生活的宽松程度。1991年,我在《半月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化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受到了当时中央某部长的批评。1993年,我访俄罗斯归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跨越历史大峡谷的磨难》的长篇访问记(其主要内容已经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过)。中央某部长批评了这篇文章。事后据单位领导人传达,部长认为有两处提法混淆了资本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界限。这两处提法是:“仅从经济改革而言,俄国改革和中国改革没有多大差别”(我是指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和“俄国经济改革比中国落后10年”(因为俄国从政治改革开始)。1995年,在成都中国改革研究会年会上,从俄国回来不久的广东省原体改委副主任曾广灿介绍了俄国改革情况。没想到老曾的观点和《跨越历史大峡谷的磨难》惊人地相似。会后我同他谈话,他说,我是带着你这篇文章去俄国的,在那里呆了半年(住在他当年留学时的老师家里),经过考察,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看法是正确的。说着,他拿出了已经很旧的《南方周末》,上面划满了圈圈点点。问题不在这两次批评是否正确,而在于一名普通记者,在两年之内接连受到宣传界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如果在毛泽东时代,非家破人亡不可。而现在,批评归批评,工作归工作。我照常采访,照常发表文章,照常外出演讲。而且请我讲课的人比挨批评前更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次直接组织的专家外出休假,我还是休假成员之一。

但是,和改革进程的要求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甚微,对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大的触动。十几年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上层建筑变化很少。邓小平留下的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矛盾。由过去的国家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

人等多个利益主体,而后三者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

地方利益的强化要求相应放松中央控制,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

企业要求政、企分开,要求政府不要在法律以外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

私营经济力量的兴起,要求有表达自己意志的政治条件。

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体制,必然漏洞百出,问题丛生。中央政权必须由过去那种集中一切、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职能,向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寻求最佳利益结合点的职能转变。

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客观上要求用民主政治取代高度集中的政治。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但在实践中进展不大。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控制力量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调控能力的削弱首先表现在财政上。预算外收入占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过大。1979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1146.4亿元,预算外收入为452.9亿元,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为39.5%,1992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是3483.4亿元,预算外收入是3854.9亿元,后者是前者的是110.66%。所谓预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财政收入。从1993年开始,朱镕基集中财力,预算外收入比重下降,但1996年还高达52.65%。与预算外收入增加相关联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而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力分散了,但事权还没有相应分散。国家管了一些它无力管、不该管的事。

中央财政能力削弱,政府又管了一些它不必管的事,而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办事无力去办。于是提倡各级政府、各个部门自

己去“创收”，以补财政经费之不足。各部门怎样去“创收”呢？我在湖南冷水江市听到一个顺口溜说：“政府吃图章，老师吃学生，医师吃病人，工商（指工商管理干部）吃贩子，公安吃婊子。”这个顺口溜说的是，所谓的“创收”就是乱收费乱罚款。这种现象在全国很普遍。在有些地方，某单位的财产被偷了，请公安局破案，还得由被盗单位为公安人员出差旅费，因为公安局经费不足。

三是日益膨胀的行政机构和日益增多的冗员使社会无法承受。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一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唐代 3900 比 1；明代 2900 比 1；解放初期为 297 比 1；1994 年为 29 比 1。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 年，湖南安化县向我提供了一个数字：94 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 3 人，县、团级干部 100 多人，科、局级干部 1500 多人，股级和一般干部 500 多人。群众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机构和冗员膨胀使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急剧增加：据《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中国行政管理费开支数字：1970 年 25.27 亿，1980 年 66.79 亿，1990 年 303.10 亿，1996 年 1040.80 亿。从 1980 年到 1996 年，行政管理费增长了 15.58 倍，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 5.38 倍，财政不堪重负。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1970 年 4.9%，1980 年 6.15%，1990 年 13.45%，1995 年 14.6%，1996 年 13.11%。这是统计局提供的行政管理费的数字。实际上，仅靠这部分行政管理费是远远不够的。实际消耗的行政管理费相当于上述数字的一倍以上。为弥补财政不足，各级政权

还征收各种费用。“费”的数字远远超过了“税”。各种名目的摊派使民怨沸腾。这是中国八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重的一个原因。1993年湖北省一个农民因交不起上级的摊派款被迫自杀。这个事件曾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种种要求。但是,1996年,又是在湖北省,又一个农民因交不起摊派款被迫自杀。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并不太复杂的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几乎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委,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捣黄龙府”,请首长“拍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南方某省省委书记的司机被推上了一个地级市副市长的宝座。他有什么才干?他可以直接找省委书记!他这种作用是任何有才能的人都无法取代的。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和高干子弟等被推上了领导位置。

四是高度集中的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和不规范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使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

权力的腐败引起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未经改革的权力系统还掌握着种种经济审批权。例如审批建设项目,审批进口物资,审批贷款额度,审批公司的营业执照,审批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中间存在着大量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权力缺乏制衡,公务活动又不透明,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使得权力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加剧。

1995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犯中,涉及党政领导机关

工作人员 3206 人,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 2258 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 3792 人,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3597 人。^① 人们最为担忧的是,司法机关的案犯人数最多。司法机关应当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出了毛病,这个社会不就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爱滋病”吗?与司法系统腐败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吏治腐败。到 90 年代中期,媒体不断揭露卖官鬻爵的案件。显然,被处处的和媒体揭露的案件仅仅是冰山一角。

1995 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大案 29419 件,其中,100 万元以上的 504 件。1995 年,全国人民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金额在万元以上的案件有 14402 件,比上年上升了 15.92%。其中 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 296 件,上升了 71.1%。例如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贪污、占用、挥霍国家资财就有数亿元之巨。^②

100 万元是多大一个数字呢?1995 年,一名教授的月薪是 800 元,100 万元相当于 100 名教授一年的收入。深圳市计划局财务处长王建业受贿人民币 450 万元,美元 75 万元(当时汇率:1 美元兑换 8.3 元人民币),总共相当于 1000 多名教授一年的工资。

从 1991 年到 1994 年,因各类腐败问题而受到处理的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干部人数,与 1986 年到 1989 年同类数字相比,分别上升了 100%、64.1% 和 61.1%。1995 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干部 2262 人,比上年增加 27.9%。^③

五是开放的经济、信息全球化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留下的经济是开放的经济。1994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386 页。

② 同上书,第 386 页。

③ 同上书,第 387 页。

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45.3%，中国的经济再也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正在汇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到 1996 年底，在中国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 240447 家，这些企业无时无刻不在与全球各地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这一年中国还接待 674.4 万外国游客，他们也带进带出大量的信息。自 1994 年美国同意中国可以“访问”INTERNET 网（国际信息互联网）以后，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全球信息共享的大家庭之中。信息全球化的洪流冲击着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

六是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

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五六年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几乎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邓小平 1986 年 9 月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可是到他逝世之前，他所说的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了。到 1996 年一季度，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停顿不前，使国有企业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净亏损局面，而且使大批国有企业职工拿不到工资。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停顿，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此外，中国金融改革进展困难、中国的严重隐性金融危机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这就是说，维持原有的政治体制不仅阻碍经济体制改革，也影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定。

由于以上种种矛盾的存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一些清醒人士都认为，由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适应，中国的政治体制迟早要发生变化。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事实上，中国在政治体制的有些方面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是很深刻的。例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坚持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再追求出身纯之又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为中国共同的理想一起奋斗的人们……中国共产

党的作风,它的成分,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人们都知道,这些变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95年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俗称“万言书”)中,就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五大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只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了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这样的领导班子政治领导能力低,不能正确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除了第五条有一些偏见以外,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问题比“万言书”中说的还要严重。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不管站在改革的立场还是传统的立场来看,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改革。当然,不同立场的人提出的改革方向是不会相同的。

应当说,邓小平不是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在《中国改革推进方略》一章中,我分析了政治改革

延缓的原因。另一方面,邓小平年纪太大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力量完成这件事。这件事太难了,太敏感了。弄不好就影响社会稳定。邓小平是宁可给后人留下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难题,也不愿意给后人留下一个动乱的社会。他不愿意在他垂暮之年看到社会动乱。

第三节 没有上帝的社会

邓小平留下的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上帝”是一种多数人认同、并作为行为规范的价值体系。传统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们空虚,彷徨,焦虑,没意思,无所事事。“游戏人生”、“过把瘾就死”这一类玩世不恭的思想,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艺舞台。写着“别碰我,烦着呢!”一类词的文化衫,青年人争相购买,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封建迷信活动空前泛滥起来。1994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的一篇题为《刹住乱建庙宇风》的报道说:有个县近年来修建中等规模以上的庙宇就有121座。有的地方几乎村村建庙,有的村还不只一座。什么土地庙、山神庙、城隍庙、关帝庙等争相而起。有个村甚至把庙建在村办小学的校园中央,每天前来进香者络绎不绝,到了初一、十五,更是热闹,搅扰得小学生们不能正常学习。这股风也刮进了一些中小城市。有的城市,即使在一些小街小巷,也可以看到不知叫什么的小庙里香烟袅袅。这篇报道还写道:生病闹灾,不是求医问药,而是去拜神像,抓香灰。久旱无雨,不是引水抗旱,而是求神卜卦,祈求玉皇。民间巫婆神汉也活跃起来,重操旧业,坑人骗钱。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使群众的愚昧性消

费大大增加了。曾经被打掉的神权枷锁又重新套在农民的脖子上。

《陕西日报经济特刊》在1994年9月7日报道，陕西某县有庙宇520多座，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学校。“一座座庙宇金碧辉煌，一尊尊神像光辉照人，每逢庙会香烟升腾，歌乐齐鸣。……前来烧香还愿，求神问卜者，达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这种情况在农村有，在城市也有。1995年春天，我到西安出差，正是农历正月初十。这是陕西的鬼节。连续两个晚上，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有人为死人烧纸钱。据当地人说，烧纸钱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超过了建国之前。可见，40年的无神论教育的效果，已经荡然无存。

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是唯利是图。如果把这个准则推广到人际关系中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所以还需要有道德、信仰、宗教的约束，这些精神上的约束是对人类劣根性的约束。信仰一旦崩溃，约束一旦放松，人们的物欲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泄千里，四野横流。物欲的浊浪，冲垮了精神大坝，冲垮了制约人的劣根性的一切道德和法规。在经济交易中的市场准则，无限制地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不愿这样等待。”这位作家这种情绪在一些年长者当中颇有知音。对现状的不满意常常引发出怀旧。于是，“毛泽东热”莫名其妙地时兴起来了。

相对来说，毛泽东时代贫穷、封闭，但社会平等、清廉；邓小平时代富裕、开放，但污浊、不平等。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在贫困中

安于现状,在封闭中没有追求,很少有人公开发泄不满;在邓小平时代,人们能吃饱、穿暖,但对种种社会问题愤愤不平,到处有人公开发泄不满。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到毛泽东的故乡去朝觐的人越来越多。韶山管理局文辉抗局长向我提供了16年来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的人数(根据门票统计):

1980年23万人;

1981年25万人;

1982年27万人;

1983年40万人;

1984年45万人;

1985年50万人;

1986年56万人;

1987年61万人;

1988年60万人;

1989年65万人。

到“六四”以后的1990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的人数,猛增到91万人。以后各年是:1991年104万人;1992年108万人;1993年150万人;1994年156万人,1995年130万人。

留言簿上瞻仰人写的留言是耐人寻味的:“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不以权谋私。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敬的领袖。”“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

这些留言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2月26日,到毛泽东故居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就有20多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自发来的。这一天,老百姓杀猪、杀鸡、烧纸、送花篮,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纪念。凌晨两点钟就有人放鞭炮,鞭炮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打扫了满

满四卡车鞭炮碎末。

为什么在贫穷的毛泽东时代不满情绪比富裕的邓小平时代要少？这有一个社会心理问题。老百姓常常把贫困更多地归结于自己的命运，把社会秩序不好的责任归结于掌权者。

虽然有人怀旧，但是，我们在清理被物欲的浊浪冲毁的精神废墟时发现，原来的理想大厦是那样的脆弱。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自70年代末就产生了，并不是改革造成的。所以，虽然有“毛泽东热”，但是没有人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当人们在“上帝”千呼万唤时，没有人想到去照原样去重塑它；当人们要恢复过去的精神文明时，一部分人回应说：“没有‘精神’，谈何文明？”

“上帝”死了，但人们并没有停止对“上帝”的寻找。在冷落了马克思之后，人们又回过头去找尼采、找萨特。在80年代初，连地摊上也摆满了尼采和萨特的书。两三年后，又掀起了“弗洛伊德热”，一大批青年人进入了《梦的解析》的梦幻之中。但是，不出几年，“弗洛伊德热”又冷了下来，书商们又组织人们以“二十世纪文库”之名，译出了一批西方思想名著。如《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等等。这期间，还有一大批西方理论名著也进入国内。这对于长期只能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引进了一批批新的思想资料。青年们读起来如醉如痴。在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现代西方名著热”，都没有持久地“热”起来。通常都是升温快，冷却更快。人们来不及思考，时尚又发生了变化。在80年代初，人们以批判毛泽东为时髦，到90年代，“毛泽东热”又成了时髦。“文化大革命”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弥漫着社会的空间，只是把“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战斗的旋律改成了轻松的旋律。人们在寻找“上帝”时，像夜行者碰到“鬼打墙”一样，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人们不得不继续不停地寻找。于是，现代儒学又成了热门。

熊十力的著作从尘封中被请了出来。“亚洲价值”又被崇尚起来。“亚洲价值”其所以风行,是1994年底出了一本书:《亚洲能够说“不”》。作者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这使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些兴奋:亚洲价值的根源不还是在中国吗?当然,作者之一石原慎太郎和中国有些芥蒂。他死不承认日本曾经侵略过亚洲国家,甚至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捏造。这一芥蒂影响这本书在中国传播。对“亚洲价值”阐述得最清楚的还是新加坡的五大原则:一、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都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这五条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寻找“上帝”,找来找去,又找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去了。是不是又碰上了“鬼打墙”?难道自“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全都错了?

然而,在邓小平时代,虽然思想十分混乱,但是稍加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几个特点:

第一,邓小平时代是价值体系分化和冲突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一整套行为规范、道德标准,都要受到邓小平所发动的变革的激流的审视和淘汰。西方的价值观随着资金、技术、信息的引进也大量进入。过去40年被批判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又卷土重来。各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在邓小平时代以及以后更长的时期内,相互撞击、摩擦和融合。

第二,邓小平时代正在造就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价值体系。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国家的要求就是个人的要求,国家提倡和推崇的就是个人的选择目标。大家只按照国家提供的行为目标、是非标准去思考就行了。个人无须去分辨和思考。那时个人的价值观是消极的、被动的、不自觉的。到了邓小平

时代,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独立自主、自我负责、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是不可少的。随之,个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加强。人们开始追求自觉的价值观,寻求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思考。由此,过去全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就开始向多元价值观演化。

第三,一种新的趋向合理的价值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以价值体系最基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例,可见端倪。

个人和社会到底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古今中外讨论了千百年的老话题。由这个问题可以引发出“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纪律与自由”、“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论题。任何一位学者都可以站在论点的一方找到充足的论据。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当今世界,脚踏中国实地,找到能够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答案。

作为一个社会,如果每个成员各行其是,这个社会就难以协调共存。人是社会动物,没有社会,个人就不能生活。作为个人,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也难以生存发展。没有个人的活力,也就没有社会的活力。在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社会利益,否定了个人利益。在改革初期,个性的觉醒,个人的活力明显加强。但对毛泽东时代矫枉过正,在有些方面,在有些人群当中,天平过分向个人倾斜,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而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必然创造着它自己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力量会对倾斜的天平进行校正。

90年代初期的一份对青年人的问卷调查表明,有93%的人主张“先公后私,有公有私”,只有3%的人主张“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同意“自私自利,损公肥私”的也只有2%。^①另一份关于“索取与奉献”的关系的问卷中,有65.81%的人主张“奉献与索取相结合”。^②在一份“对自我的看法”的调查中,有74.7%的人“应兼顾社会、他人和自我”,有23.9%的人认为“自我应当是一切言行

①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440页。

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 5.7% 的人认为“他人应高于自我”。^①

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由完全否定个人转向个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趋势，新的价值体系形成还须走很长的路。当旧的秩序业已崩溃、新的秩序正在建立之时，人们的精神也在分裂。因此，思想混乱，精神痛苦。这是正常的现象。新、旧价值体系在混乱中此消彼长，新的价值体系将在整个社会的痛苦挣扎中脱颖而出。当然，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

第四节 邓小平留下的难题

邓小平在执政的短短十几年中，解决了毛泽东留下的不少社会难题：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把中国从乌托邦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引上了市场经济这个世界经济的主流体制；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由过去用马、列、毛的本本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改变成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安于清贫、安全、稳定的生活方式，转变为追求富裕、勇于竞争、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

但是，邓小平留下的难题并不少于他所解决的难题。在这些难题中，有一些是带有长远性质的，如又紧迫又棘手又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全世界都关注、全世界都提不出办法的中国人口问题；影响民族团结的东西部经济差距拉大的问题。有一些难题是带有紧迫性的，例如，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困境问题，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金融死结和金融危机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执政党的腐败

^①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第 449 页。

问题,等等。上述问题,除了人口问题以外,都带有邓小平色彩。这些问题是在邓小平时代产生的,它解决得好坏,又决定着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成败。

人口过多是中国最基本的难题

从1978年到1996年,中国人口增加了26130万人,在这期间,耕地面积却由99838.5千公顷,减少到94970.9千公顷,减少了4867.6千公顷,相当于江苏省全省的耕地面积的1.094倍。从1978年到1996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由0.10325公顷减少到0.08149公顷,减少了21%。

1996年,中国的人口已达12.2389亿,超过了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达15—16亿,届时全世界发达国家总人口才12.15亿。

人口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由这个基本问题派生出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等等。与人口问题相关联的有城市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粮食市场价格问题,等等。总之,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人口过多有关系。中国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考虑人口过多这个因素。外国人同中国打交道,也要考虑中国人口过多这个情况。不过,人口问题不是邓小平留下来的。它是毛泽东的遗产。平心而论,即使没有毛泽东的错误人口政策(批马寅初,反对“人口论”,强调“人手论”),中国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只不过是人口压力比现在小一些而已。由于人口过多,中国已经是粮食净进口国和石油净进口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项净进口,不仅关系到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会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十分棘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农业问题是经济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先说农业问题。

农业的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其他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资本总是向增值最大的方向流动的。由于农业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其他产业,所以资本很难向农业流动,特别向粮食生产流动。相反,一些本应是农业的投资却大量向非农业转移。这就使得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良种培育等一些维系农业生产正常运行的条件得不到保证。中国现有 8.4 万座水库,有 1/3 带病运行。1993 年有 7.31 亿亩有效灌溉面积,基本上是 1980 年以前的 30 年中修建的。80 年代 10 年新增的灌溉面积只有 1.19 亿亩,而老的灌溉面积减少了 1.26 亿亩。由于投入不足,中国的良种培育和推广工作很差。1988 年,日本种植的 10 种优质大米的面积占水稻总面积的 61%,韩国 1991 年优质稻谷面积占总面积的 59%。而中国的优质稻谷的比重很小。中国粮食单产虽然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50% 左右,但比日本、德国、法国低 35%—50%,良种上不去是主要原因。

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经营规模太小。

中国每个劳动力承担的耕作面积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6。按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谷物计算,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 0.8%,加拿大的 0.6%,日本的 25%,世界平均水平的 50%。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的肉类,只有美国的 0.6%,日本的 7%,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按质量好坏搭配分配,所以,每个家庭分得的土地是好坏搭配的若干个小块。到 90 年代初,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开始探索土地集中的路子,但缺乏全面推广的条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对农业进行周期性的伤害。这些年来,一会儿卖粮难,一会儿卖水果难,一会儿卖棉难。而这些难卖的产品,大都是国家鼓励种植的。1995年,国家大力提倡种棉花,而且不让农民自己卖,由国家统一收购,1996年棉纺织行业销售难,大面积停产,棉花也卖不出去。种棉省的棉花大量积压,叫苦连天。改革以来,这种情况出现过多次。由于市场变幻莫测,种植业的风险很大,而这些风险一般由农民承担。

农业的第四个问题是工农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在改革前30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剥夺了大约6000亿元,用于工业建设。在80年代初期,剪刀差有所缩小,到80年代中期以后,剪刀差又很快扩大。这种扩大的势头还在继续。

再说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有农村基层组织瘫痪问题、农村干部作风问题、对农民乱摊派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等。这类问题危及中国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组织瘫痪问题本书第五章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河北省有“三个百分之八十”的判断,即上访告状的80%是农民,反映的问题80%涉及农村干部,反映的情况80%是准确的。据河南省农村调查队统计,1995年全省农民负担总量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1%,仅省信访局和省农监办受理的农民负担信访就达1899起。河南省确山县1995年7月4日到8月3日一个月內,接连发生13起农民到地委、行署集体上访的事件,总人数达4000多人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是600多名农民开动了50多台拖拉机到地委请愿。1996年一季度,黑龙江省农民上访事件急剧增多,仅4月份各地农民到省政府上访的就有73起。打着横幅、堵住政府大门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民上访一是反映负担重,二是反映村干部贪污腐败,大吃大喝,对生产乱指挥。

农民问题是最为棘手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

农民问题主要是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1994年底,全

国农村人口 8.5549 亿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男 16—59 岁,女 16—54 岁)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67%,即农村劳动力为 5.7317 亿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的约占 75%,即 4.2987 亿人,农村需要多少劳动力呢?考虑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1949 年全国耕地总面积 14.68 亿亩,农村劳动力 1.73 亿人,平均每个劳动力承担耕地面积为 8.845 亩。1994 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到 14.24 亿亩,按 1949 年的劳动生产率,只需要劳动力 1.61 亿人,剩余劳动力为 2.69 亿人。若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更多。全世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为 24.25 亩(1979 年数),按这个标准算,14.24 亿亩耕地只需要劳动力 5872 万人,则剩余农业劳动力为 3.71 亿人。如果按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更多了。当然,这是按土地需要的劳动力来计算的。由于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上述数字要小一些,但按世界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也有 2.5 亿左右。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通过不断的流动来摆脱他们事实上的失业地位,从而形成了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全国流动人口常年有 5000 万人,高潮时达 8000 万人。这支流动大军的流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主力来自长江流域的 10 多个省,因为这些地方地少人多。他们的“南下军团”奔向广东、海南;他们的“北伐纵队”挺进北京、天津;他们的“东进劲旅”直逼上海、江苏。但是,他们常常有出师不利的时候。一旦找不到工作,这支队伍就很快回流。回流的队伍东奔西突,相互交叉,来回激荡。回流的农民口袋里有限的路费花得差不多了,他们进退两难:回家,白赔了路费;不回家,可能衣食无着。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如果有 1% 的人生活无着,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犯罪分子中,70% 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员。

金融死结难解,金融风险增大

到 1996 年底,全国居民金融资产近 5 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余额 38520.8 亿元,债券 1 万多亿元)。老百姓期望这些金融资产能够保值、增值。如果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居民的金融资产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也保不住。金融风险涉及千家万户财产的安全。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居民金融资产增加,金融风险也在增加。据我 1996 年春天在北京市和南方两个省、市的调查,中国的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超经济发行。货币超经济发行,使货币贬值。如俄国、巴西,通货膨胀率高达 2000% 以上,原来的货币成了一堆废纸。要防止这一风险,就必须使狭义货币 M1 的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即 GNP 的增长率)加上物价增长率。从 1986 年到 1995 年,中国货币供给量 M1 增长幅度平均为 22.4%,GNP 平均增长 9.84%,物价平均增长 10.97%。货币量的增长高于后二者增长之和 1.59 个百分点。这说明,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不过,由于政府一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重要任务,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情况还不算太严重。一旦放弃“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出现严重的超经济发行。

二、国家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其表现,一是资本充足率不够。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差,有些银行亏损经营。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整个国有经济的风险几乎都集中到银行。国有企业还本付息能力差,使得银行的不良债权的数量相当庞大。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就将银行信用当财政拨款使用,想方设法赖掉银行债务。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注入——压死——再注入——再压死”的恶性循环。

三、国家银行帐外经营。国家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近几年来

大量向企业投资、参股。为了逃避监督,这些国有银行还大力发展帐外业务。帐外业务管理和约束不严,经营漏洞较多,是国有银行违法经营的防空洞,一旦出现亏空,最终还是危及国家银行的资产,也就是危及居民的储蓄。

四、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经营。一些证券公司高息集资,再把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股市,房地产和股市都不景气,大量资金被套住,债券到期不能支付。

五、金融机构境外机构投资失控,资金流失。近几年来,一些金融机构在境外投资连连失利,给银行的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六、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失败(外汇期货,国库券回购等)。金融期货(包括商品期货),用少量定金进行巨额的交易,风险很大。1994年春天,万国证券公司在国库券回购业务中,由于种种原因投机失败,出现了轰动全国的“3·27”事件,造成10多亿元的损失。同年,武汉、天津、北京三个证券市场回购国库券,用10%的抵押形成回购债务链,涉及资金上千亿元(实质性债务100亿元左右),也出现了支付危机。

七、商业银行代理企业发行的债券到期不能兑现。商业银行代理企业发行债券,企业用这些钱进行投资,有的投资失误,根本无法收回;有的资金回报率很低,不能还本付息。债券期限到了,就发生支付危机,引起广大投资者不满。

八、金融诈骗。90年代初发生的大案、要案中有50%与金融界有关。金融界是犯罪频发的领域,金融诈骗案时有发生。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外面难以监管,一家金融机构兴风作浪就会搞乱全局。

九、外国投机性资本流入,用外币换成本币在境内投机,一旦无利可图就突然抽走。中国还没有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投机资本还不能自由进出,但是还有种种非法进出渠道。

在中国,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还是银行的困难处境。一方面,银

行对居民欠下了4万多亿元的债务,必须保证居民随时兑现;另一方面,银行把居民的存款中的大部分借给了没有偿还能力或不愿意偿还的国有企业,使银行失去兑现能力。这本身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实际已经存在,但没有公开爆发。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事业是国家银行唱主角。用整个国有资产作担保,用国家政权来维护。所以,金融危机被掩盖起来了,没有爆发成公开的灾难性的社会事件。

我们会不会公开爆发金融危机呢?笔者在1996年听到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有爆发的可能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现在老百姓手中的金融资产相当于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3倍,相当于1995年财政收入的7.5倍,一旦出现支付危机,国家竭尽全力也赔不起。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国不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其理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条件是,经济大波动,政局不稳定,社会大动荡,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出。只要处置得当,中国短期内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国有企业处境困难

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亏损额逐年增加。1980年亏损34.3亿元,1994年亏损482.59亿元。到1996年一季度末,全国6.8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净亏损的局面。盈亏相抵,净亏34.1亿元。

国有企业亏损,使不少企业发不出奖金,有的还发不出工资,有的长期拖欠职工的医药费,各地都发生多起职工集体上访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据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统计,1995年各地向总工会报送的职工突发事件162起。其中,包括集体上访、静坐、请愿、集会游行、罢工等。拖欠职工的工资、退休金、医疗费,使得职工生活失去保障而引起的突发事件占上述突发事

件的60%。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企业兼并、转让、拍卖、破产过程中,影响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有职工33131人的辽宁某矿务局,全局平均拖欠职工6个月工资,最多的拖欠14个月工资。人均收入120元以下的职工占总职工数的72.2%。

在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国有企业处于劣势,这是国有企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所致。而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又必须卸掉压在国有企业身上的3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3个历史包袱是:

第一,企业过度负债,资产负债率太高。1983年实行了一项改革——“拨改贷”,即由原来财政向国有企业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到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90%以上的流动资金,都是来自银行的贷款。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1996年一季度国有企业的利息净支出31.6亿元,相当于国有盈利企业实现利润的1.24倍。这是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原因之一。很多企业技术水平低,不进行技术改造就缺乏竞争能力,要搞技术改造,技术改造项目的收益率又低于银行利率。厂长们说:“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

第二,企业内部冗员过多,使企业无法提高效率。据有关部门测算,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占全部在职职工总人数的1/3左右。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冗员至少有3000万人。企业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把这批冗员裁减出去。说没有理由,是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没有得到足额的工资。工资的一部分由国家集中起来,作为职工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之用。现在要把这批工人辞退,就得把本来属于工人的、却被国家集中起来的这一笔钱退还给工人。如果给每人补偿2万元(这对安置一名工人来说是不够的),则国家要拿出6000亿元,这相当于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5倍。这还不包括已经退休的老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的欠帐。

第三,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除了生产以外,还要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非生产机构,有的大企业还办公安局等政府应办的机构。据典型调查数据表明,在国有企业办社会方面,非经营性资产占企业固定资产的10%左右,非经营性人员占在职职工人数的12%,非经营性费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40%左右。要把企业“办社会”这部分负担分离出去,又需要一笔巨额支出。

实行市场经济,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必须卸下这些包袱。要卸下这些包袱,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是邓小平的继任者面对的两难处境。

国有企业的种种矛盾有可能在职工下岗问题上引起总爆发。到90年代末必将有一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失业。失业高潮是由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就业岗位总量小于需要就业的人数;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冗员吐出企业;经济不景气,工厂开工不足。这四个由于经济景气度不高而总爆发,失业职工剧增,将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90年代末两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失业,70年代末两千万回城知青失业。二十年一循环。70年代末失业的是社会的未来,90年代末失业的是国家的功臣。

第十二章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 50 年的战争和 50 年的和平。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有深刻意义的变革,最终选定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21 世纪的中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只会对世界有好处,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21 世纪的中国还会发生什么呢?历史是连续的,但有时也是突变的。不管是连续还是突变,21 世纪的中国必然以邓小平的遗产作为出发点。

第一节 新世纪之初,是否有一次大的政治冲突?

中国改革的进程中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的焦点就是“姓资”还是“姓社”。本书在前面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已有详尽的介绍。邓小平用“不争论”把不同看法的争论压下去了。但是,争论是客观存在的。邓小平从政治舞台真正淡出以后,争论又起

来了。

有一篇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使争论公开化了。这是中国改革过程中“两个基本点”的又一次碰撞。人们称这篇文章为“批邓万言书”。这篇文章大约是1995年夏秋之间成稿的。下半年就在政界和知识界私下广为传播。

这篇文章预言：未来10年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定性冲突的10年。按照这个说法，这次政治冲突如果发生的话，就在新世纪之初。

谁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文章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股力量，他们用传统的目光观察改革，用传统的思维忧国忧民。

这篇文章之所以不胫而走，是因为它从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入手，触及了一系列现实中的敏感问题。使不少忧国忧民之士产生共鸣，使持传统观点的人称快，使私营企业主们胆寒，使改革积极分子们感到是一次全面挑战。

这篇文章是着眼于政治斗争的，但从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出发。首先，文章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私有经济比重上升表示忧虑。认为“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提出要“控制私有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范围”，认为“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公有制经济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文章还认为，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过大，“使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

文章在谈到大量私营企业主的出现时说，无论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经济实力上，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

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与此同时，“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开始出现”。资产阶级“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资产阶级若从经济上的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

文章说：“自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这里实际上是指责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帮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忙。文章列举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认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等等。“近3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为是好的东西，现在认为是坏的。”

文章最后用大量篇幅阐述执政党的变化。如，党组织的弱化；部分党员的思想变化；党和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党政干部政治素质下降，等等。

这篇文章是以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对国家的前途的无比忧虑的面目出现的。它批评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很容易引起部分工农群众和部分老干部的共鸣。在改革者看来，现实中的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不应是指摘改革的口实。文章作者由于站在传统的立场，用传统的理论来思考问题，从而使人感到，从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是让经济改革退回去的结论，是阻挠政治改革的结论。

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国有企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强调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要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正在此时,国有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又提不出解决办法,一些有效的改革举措都可能被他们指摘为“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刻,此论的提出无疑为改革者出了一道难题。

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加大,经济主体多元化,最终必然要导致政治体制的变化。这是激进改革者的看法,也就是被“左”派称为“右派”的看法。想不到“左”派和“右派”对经济主体多元化在政治上产生的结果看法一致。但是,激进改革者认为这一趋势是进步,应当顺应这种趋势,推进这一变化;持传统看法的人认为这一趋势是反动,要全力阻止这一变化。而阻止这一变化的基本手段还是加强国有经济、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除了这篇“万言书”以外,有些文章还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称为“新社会主义论”而加以批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作出解释,从而为他所领导的改革事业开拓了理论空间。显然,批判“新社会主义论”的人是要保卫传统的社会主义。署名辛未易(“心不变”的谐音。心不变者,即思想不变也,表示坚持传统思想)的文章作者写道:“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更加剧了人民的忧虑,担心中国也会重蹈覆辙,使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缔造出来、又经过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用汗水建设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毁于一旦。这些忧虑,即使往往被那些以‘改革派’自居的‘新社会主义论’者视为‘保守’和‘僵化’,甚至被斥为反对改革开放的‘异端’,但它却是有大量事实为依据的。”^①

“任何社会都要关心发展生产力,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要将发展生产作为它的目的,否则它一个星期也生存不下去,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此。发展生产力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① 《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极其重要的任务,但如果我们说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那就无法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绝不是说,一个社会具有很高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① 1995年第二期《当代思潮》还撰文大声疾呼:难道共产党应该改名为生产力党吗?显然,这是针对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

对种种传统言论当局没有理睬。但是,1996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求是》杂志主篇邢贲思的一篇长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文章说,“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绝对不是说,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对大局的干扰,我们也听之任之,安之若素。暗指“万言书”一类文章干扰了大局。说“现在‘左’的东西主要表现在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有怀疑”。“邓小平理论是我们今天判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坐标。”6月8日,江泽民给出差在江西的邢贲思打电话,表扬了他这篇文章。6月9日,新华社转播,各家报纸都采用了。人们说这是对“批邓万言书”的一次权威性回答。但据知内情的人士说,邢的文章不仅批“左”,也批了右,批了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一书。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中有这么一段话:“未来10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10年。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10年。”当然也是传统力量奋起反击的10年。对未来10年,一些坚持改革的人也认为不可能平静。因为改革造就的经济基础和没有多大变化的上层建筑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情况就是这样清楚:要么,改变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经济基础;要么,让经济基础退回去,使之适应没有怎么改革的上层建筑。显然,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如果上层建筑坚持不改革,势必要发生冲突。这新的一场冲突将是本书前面介绍

^① 《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4期。

的“两个基本点的碰撞”的又一回合,也是决定性的一回合。当然,避免重大冲突的办法是有的,这就是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动地化解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 新世纪的前二十年之内应有突破

新世纪之初会不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甚至动乱,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是否顺利。

政治改革失控有可能发生动乱,不搞政治改革也有可能发生动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因而可以避免动乱;不搞政治改革矛盾就会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炸(动乱)。向民主化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是平稳过渡。政治动乱是暴力过渡。而暴力过渡有可能要以一两代人的动乱为代价。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后,被长期压抑的社会活力会释放出来,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种种社会矛盾会化解。政治改革的成功,会使中国出现空前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生产力会更加蓬勃发展。因此,人们把中国政治改革看成是“一座还没有开采的富矿”。然而,这也是一个布满地雷的富矿。政治改革如果操之过急或处置不当,就会引发地雷。政治改革的时机选择很重要。

20世纪末期,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两方面的国际实践:一是原苏联和东欧因政治体制改革而诱发天下大乱的教训;二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先搞经济市场化,经过一代人以后,再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这一正一反的经验,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踟蹰不前。

其实,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东欧不同。苏联、东欧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成果,中国的经济改革成果累累。也就是说,在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比苏联、东欧当年要好得多。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及巴西的经验只是说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定同步进行,不能证明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恰恰证明经济市场化以后迟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为政治改革作了不少铺垫。中国多数人从事的产业——农业已经商品化;合同法的广泛推行,平等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正在建立;政府的社会功能的范围在缩小,政府的事权正在向社会让渡;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分工任务和组织、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任务开始由市场力量分担;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之中;全民法制观念在加强,立法工作已有进展;农村数以千计的乡村政权开始由选举产生,这是一种民主训练,等等。尽管以上这些还处在发育过程之中,但确实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不管怎么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时机还是要取决于多种因素:第一,俄国、东欧国家如果继续处于混乱状态、经济还没好转,这就给中国造就了不能搞政治改革的参照系;如果他们经济上去了,社会状况也很好,这就给中国以应当加快政治改革的参照系。第二,美国如果采取激化中国民族情绪的政策,就会延缓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中美关系较好,政治改革就会提前。第三,国内力量对比,也就是传统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对比。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自由化,传统力量也会削弱,也就是阻碍民主化的力量会削弱。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力量还很强大。考虑诸多因素,估计下世纪的前 20 年左右政治改革会有所突破。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的信息主要是垂直(纵向)传播,上层向下层传

达指令,下层向上层反馈执行信息;市场经济的信息是平面(横向)传播,是各个层次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叉传播。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权力结构的变化。垂直传播信息的政治体制必然是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结构;平面和交叉传播信息的政治体制应当是民主的。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是中国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这里说的政治民主化是指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政治民主化不仅是经济市场化的需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梁启超、余天休两人统计,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国家规模)的内乱的次数,从秦帝国的公元前221年到1920年的2141年间,共有160次,战乱所费的时间达896年。也就是说,每3年就有一年生活在战乱之中。另据专家统计,自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6年)到清德宗驾崩(1908年)为止,除自称、僭称的皇帝及生卒年月无法考证的以外,两千年间,共有皇帝208人。其中因自杀或他杀而终的计63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皇帝将近1/3的人死于非命。可见,专制政体并不能保证社会稳定。接班人平稳过渡是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接班人问题困扰着毛泽东整个晚年。两位成为他的接班人的幸运儿都落个悲惨的结局。

二、建立权力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防止以权谋私,防止个人专断。民主限制了执政者人的劣根性的一面,是防止政权恶化的比较有效的办法。民主还能防止重大决策中的个人行为,是防止决策失误的重要手段。

三、民主是开展思想竞争,发展科学,开发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手段。民主为国家的前途探索方向,避免弯路。这种探索是集中全民智慧的探索,是全民意志的选择。

四、民主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它让“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让相互激荡的力量互相渗透,而这种激荡、渗透,是推动历

史进步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曾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实际上,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不是知识分子自由清谈的茶馆,不是政客们争夺权力的擂台,它应当是集中全民意志、全民智慧的方式,它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平衡器,是社会前进的方向盘。

我在这里重复这些本应是常识的内容,是因为90年代中期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民主只是知识分子的需要,老百姓只要求过好生活。”持这种看法的人把老百姓看作“饮食男女”,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

当然,民主不是灵丹妙药,对民主不能过分迷信。

如果说,在20世纪末的中国,对要不要民主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对如何实现民主的看法就更不一致了。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理想的、没有缺点的民主制度。

西方的民主也是有缺点的。代议制就会出现一些职业政客。与其说他们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说他们往往更注意自己的当选或连任。他们具有专门说服选民而取得权力的办法。不少政客就是靠专门钻研这种说服选民的伎俩(正像专制政体下有些人专门钻研如何讨好当权者取得权力一样)在选举中取胜的。他们掌权以后,不一定兑现自己的承诺。

由于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理想的民主制度,于是,只能选择一种比较好的制度,然后吸取其他制度的优点,形成一种更好的制度。

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在80年代中期,我曾撰文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当时我把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刚性联系,柔性联系,相对独立。中国在新闻改革以前是刚性联系。对刚性模式下的新闻事业我作了如下描述:

“在刚性模式中,记者(包括编辑)的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紧跟。记者的工作成绩取决于能否紧跟政治权力。权力

的意志就是记者的意志。同一件事情,权力今天说好,记者跟着说好,权力明天说坏,记者就跟着说坏。记者很大部分精力用于揣摩权力的意图,并琢磨如何紧跟这一意图。

(二)近视。记者的视力、思维和劳动投入一般局限在权力机构眼前重视的范围之内。记者的眼光不能超越权力的眼光,记者的思路不能突破权力的思路。

(三)官员化。由于新闻机构是官方机构,报纸的言论常常代表权力机构的言论,往往造成记者的官员化和特权化。

在刚性模式中,新闻内容常常出现以下问题:

(一)舆论一律。和政治权力不一致的文章不能发表,只有一种舆论。

(二)客观性和真实性得不到保证。如果新闻事业成了权力的恭顺婢女,则新闻无客观可言,也无真实可言。

(三)一阵风。政治权力一旦有什么意图,所有的新闻单位都一哄而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政治权力的意图变了,新闻又跟着刮起另一股风。

(四)信息量小,真正的新闻不多。在刚性模式中,新闻价值的大小是由该条新闻所反映的权力层次的高低和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确定的。很多真正的新闻在报纸上得不到重视。”

显然,这样的新闻事业对民主化不会有什么好作用。所以,当时我提出,新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将刚性联系改为柔性联系。新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新闻和政治权力采取相对独立的模式。“在相对独立的模式下,记者可以自由地评论政治,批评政策,分析时局,法律是言论自由的唯一界定”。

新闻改革实际是调整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笔杆子”不应当是权力的“笔杆子”,而应当是社会的、人民的“笔杆子”。应当成

为制衡权力的一支重要力量。^①

这里说的是政治民主化的长远目标。实际上,政治民主化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由于经济市场化,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这里说的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社会而言,它是政治国家之外的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领域。它的含义是,它的活动主体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而不是国家;它的活动原则是自主的,契约性的,而不是强制的;市民社会的交往目的是实现个人的物质利益,满足人的交往需要,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基础,那么市民社会又是实现民主的基础。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国家垄断着全部资源,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控制和管理。一个人从生到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通过近20年的改革,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多元化,国家控制能力削弱,控制范围缩小,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增强。新的社会力量、新的角色群体开始出现。大批社团组织和非政治性的盈利机构逐步取代政治的某些职能。

显然,市民社会是以完善的法制来规范的。所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管理法制化相互联系,并且构成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和目标。

第三节 中国将为解决世界三大难题作出重大贡献

21世纪世界面临三大矛盾: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

^① 杨继绳:《试论新闻和政治权力的关系》,载《新闻记者》1988年第3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7期转摘。

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的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这三大矛盾也是 21 世纪的世界三大难题。

中国在处理第一种矛盾中的作为

全球化的趋势将是影响 21 世纪的重要因素:

核武器结束了靠武力征服他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从而失去了通过战争取胜的动机。在核武器时代,世界大战就是世界毁灭。人类还是有防止自我毁灭的理智的。联合国大厦前面“化剑为犁”、和“扭曲枪管”的雕塑,正是这种理智的象征。今后的战争只能是局部战争。当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是理智的产物,至今也没有人断言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也没有人否认人类的理智的作用,没有人断言一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信息全球化冲垮了意识形态的樊篱。信息高速公路伸到了每个国家、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和越来越多的家庭。计算机网络网罗了全球的一切信息,网罗了各种不同看法,不同信仰的人共享这些信息。从此,全球每个遥远的角落“鸡犬之声相闻”。这为全人类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向老百姓封锁信息是历代封建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法宝。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术彻底失效了。

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哥伦布 70 多天的行程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地球变得太小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人员、物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边界轻而易举地被越过、被冲垮。

经济全球化。工厂为全球生产,在全球择优配套;用户在全球

范围内择优选购。谁的商品最优,谁就可以在全球得到用户。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分工协作,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买到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商品。商品的洪流不仅跨越重洋和关山,而且最终会把所有的国界围墙夷为平地。

金融全球化。资金以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流动。1995年,我在洛杉矶美洲银行外汇交易中心看到一个情景:业务员在电脑的键盘上轻轻一敲,东京和伦敦之间的巨额外汇交易就已经完成。她是通过电脑网络完成这笔交易的。在当今世界,资金已经没有国界,哪里增值最快就流向哪里。

全球化,不仅“利”全球化,“害”也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人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延缓地球资源枯竭,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救救地球”是人类共同呼声,也必须由人类共同行动。生存危机又把人类活动联结在一起了。新技术革命已经把人类活动推向了宇宙空间。为了逃避将来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地球灾难,人们共同走向宇宙,向外星进军。对宇宙来说,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向外星进军的人类,就像过去地球的一个部落向新的生存空间进军一样,无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不过,我们对全球化也不能抱着过于天真、过于乐观的态度,还有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力量。

当今世界有强国,也有弱国;有富国,也有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已经太大。在资源分配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占有很大优势。如果按全球化原则(即市场原则)行事,就会使两极拉得更大。而全球化的种种规则的制定,强国、富国的发言权实际上要大于弱国和穷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证,他们不会甘心受强国主宰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全球化必然伴随着一个利益摩擦过程。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全球化的趋势扩大本国利益,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

了维护本国利益,抵制全球化原则(贸易自由,信息传播自由,人才流动自由)。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霸权主义者借全球化的理由企图成为全球的霸主,强制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原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专制政权,借维护国家利益的理由,强化专制统治。发展中国家用民族主义来保卫自己,发达国家用世界主义来压制民族主义。全球化是大趋势,而民族利益又是不可逾越的现实,霸权主义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造成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扭曲,是和非的扭曲;反对大趋势的人高举民族利益的大旗;高喊“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的人也许是霸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发问:

难道全球化就是开除发展中国家的“球籍”吗?

难道全球论就是让发达国家“吃掉”发展中国家吗?

难道只能由发达国家来支配人类的命运吗?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的态度表现为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描述了这一冲突:

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形成对照的是,民族主义者也无法理解有些国家怎么竟然允许其他国家侵犯其神圣的独立。然而第三次浪潮推动的商业和金融的“全球化”,经常穿透新民族主义者视为无上神圣的国家“主权”。……当经济落后地区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在创造国歌的时候,第三次浪潮国家的诗人和知识分子已在讴歌“无国界世界”和“星球意识”的理念了。……在未来世界里,这一冲突可能会招致最坏的流血事件。”^①

^① 《创造一个新的文明》,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9页。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问题基本解决;而南北问题解决起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南北问题不解决,全球化就难以实现。

全球化是人类几千年来理想。国家之间经济差距太大,就难以平等联合。当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缩小了,各国以平等的资格进行合作,矛盾就小了。欧洲能实现“一体化”,是因为欧洲国家之间经济差距很小。“全球化”是不是要等南北差距缩小了才能谈呢?现在谈全球化是不是太超前了?这倒不一定。全球化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的过程,是霸权主义逐渐消失和民族主义逐渐淡化的过程,是国家之间协作和摩擦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过程之中。21世纪这个过程将会加速。

全球化必须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这是个自愿的联合过程。某些拥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国,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统一”世界。靠军事力量来征服、靠经济力量来控制,把全球都“化”到自己的名下,这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世界”的。从成吉思汗到凯撒大帝,都证明了这一点。霸权主义不仅影响世界安定,也会阻碍全球化进程。在霸权主义的威逼下,民族主义的出现是难免的。对一个受霸权主义凌辱的国家来说,它有两项任务:要实现民族解放,也要现代化。而且民族解放的紧迫性高于现代化的紧迫性,民族解放是第一位的。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全球化的障碍。但这二者不是半斤八两,霸权主义是主导方面。霸权主义消失了,民族主义才会消失。因此,站在历史大趋势的角度,我们要反对霸权主义,也不应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也是很危险的。这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对《中国也要说不》这本书持冷淡态度的原因。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将起积极作用。中国已经汇入了全球化的潮流。就经济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已经打开的

大门再不可能重新关上。中国一定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推进经济全球化的组织)。由于中国和世界已经不可分割,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损中国利益。中国会积极推动全球化。不过,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先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企业还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在一定的时期内,适当的保护是必要的。但保护不会违背中国对国际贸易组织的种种承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中国的存在,就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的分量,从而抵制某些国家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推行霸权主义。也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时,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都有利于加速全球化进程。

中国在处理第二种矛盾中的作为

在甘肃省白银市,我采访过一个铜矿已被采尽的矿山。我看到的是两个直径130米、深100多米的被废弃的矿坑。大坑底部的一汪粉兰色的液体,这是铜盐的溶液。大坑周围草不生,鸟不飞,虫不鸣。苍凉、寂寞、目不忍睹。采矿工人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给大自然留下了创伤。在其他地方,我也看到过类似的矿山。

人口的急剧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对大自然的无限压榨。市场经济是一架没有限速器的发动机,它只能加速,加速,再加速。高消费,高增长,永无止境。对人类来说,追求享受是无止境的,因而追求经济的增长也是没有极限的。但是,大自然有极限。

现在,人们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方面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一方面依靠科学技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并且开辟资源新天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要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低消耗、高幸福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的。美国每天消耗石油 1700 万桶,美国的能源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水平(不包括美国)的 6.6 倍和发展中国家的 10 倍。美国哪里来的这么多能源呢?靠进口。进口石油占美国石油消耗总量的一半。据美国独立石油协会预测,到 2000 年,美国每天要进口 1110 万桶石油,进口油在石油总耗量中,将上升到 60%。也有人预测,这个数字将是 70%。

高能耗生活方式并不一定幸福。居家时,生命被局限在钢铁和水泥构筑的狭窄空间里。出行时,血肉之躯被裹挟在钢铁的洪流之中。吃的是含有农药和化肥残留物的食品,呼吸着被工业和汽车尾气污染的空气。没有节制的欲望,紧张的生活节奏,无休止的激烈竞争,使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情趣。虽然在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感到不很幸福,但是,一旦被置于这个高速传送带上,就身不由己,想下也下不来了。如是,假日一到,就迫不及待地涌向那些没有被高能耗生活方式所破坏的海滨和山野。然而,这样的海滨和山野越来越少了。

高能耗生活方式加速了地球资源枯竭的过程,现在全世界都在叫喊保护生态环境,谁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呢?就是高能耗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到 6%,为了维持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水平,每年要耗费全世界 1/3 的能源。所以,有了美国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再进入这种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打破现存的能源分配格局(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能源总量不足,全世界也无法实现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可悲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以追求美国这种生活方式为时尚。

既然美国这种高能耗生活方式是靠进口能源来维持的,那么,

世界能源的生产、销售、储运、价格,必然和美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不到6亿桶,只够35天的消耗量。一旦进口石油中断,必然造成空前的大混乱、大恐慌。石油供应,是危及美国社会安全的大事。为了保证社会安全,美国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加强国内油田的开发,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二是用武力保证石油的供应渠道。美国国内的石油储量有限(美国的石油储量为280亿桶,仅为中东石油储量的4%),无论怎样加强开发,也不可能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所以,用军事手段来保卫油管,就是保卫美国的生命线。这一点,美国历届总统是毫不讳言的,并且采取了实际行动。中东地区目前已探明石油储量为6200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的61%。美国21世纪将更加依赖中东石油。美国着眼于21世纪,就千方百计地控制海湾。1995年7月正式组建的第五舰队已经部署在海湾。美国国防部还建议在海湾地区永久部署2万名美国士兵,以保证21世纪石油输出畅通无阻。

高能耗生活方式不仅加速了地球生态的破坏,也是当今世界战乱的重要根源。

因此,从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以美国为代表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必须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耗求得最大限度的幸福。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一旦具体化,它将改变人们的衣食住行,它将从各个方面刷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当然,这不是中国一国的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口最多,过去又有低消耗生活的习惯,还有崇尚节俭传统。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中国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国的人口、土地、环境、资源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

中国人一定不要步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后尘,这应作为基本国策。

中国在处理第三种矛盾中的作为

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唯利是图”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行为准则。但是,市场经济原则是互利原则。妨碍他人利益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也不是市场经济原则。

市场经济需要个人奋斗,需要个人创造性发挥。尊重个人权益是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基础。但是,极端个人主义会妨碍他人创造性的发挥,有损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消费至上的经济,也是“寅吃卯粮”的经济,享乐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品。但是,超过社会承受能力和环境承受能力的消费也有损于市场经济。

唯利是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不仅有损市场经济本身,也会危害社会。它会使家庭解体,社会冲突加剧。

就是在西方国家,对唯利是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有制约,也不是让它无限制地膨胀,无限制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制约是通过法律、道德、宗教等等多方面进行的。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道德江河日下,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引发出了种种社会危机。西方国家一些明智之士纷纷著文指出了这种危机。1995年第1号美国《读者文摘》写道:“难道我们不应该为骇人听闻的罪行、道德沦丧和公共行为准则江河日下感到羞愧吗?……如同人类需要空气一样,自由需要道德。”《明镜》周刊则说:“德国从一个团结的社会走向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团结友爱的精神在衰落,人们在毫不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唯利是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膨胀趋势是人的劣根性。这一劣根性是和人的社会性相悖的。因此,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抑制人的劣根性的种种办法。各种宗教、各种法律、各种道德规范都是为了抑制人的劣根性的。但是,这些不同的抑制人的劣根性的办法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构成了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这样,一些本来是抑制人的劣根性的方法之争,变成了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人的劣根性又在这些权力和利益之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演,造就了一幕又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这些不同的抑制人的劣根性的方法其所以发展为冲突,信息闭塞是一个重要原因。假如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经常互相对话,几位先哲思想会不会发生碰撞和融合呢?这种设想近于荒谬。但是在今天可能成为现实。信息高速公路有可能使全球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相互融合。当然,融合过程也是伴随着摩擦和碰撞的。

21世纪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这是兼容了人类所有精神财富的价值体系。它既不是亚洲价值,也不是欧洲价值,也不是伊斯兰价值,而是全球价值。

正是这种价值体系制约着人的劣根性,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我同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朱厚泽先生讨论过21世纪的中国。他同意我上述“三大矛盾”的看法。他认为,这三大矛盾最后都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这“五个一般”是: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

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 20 世纪反复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制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没有权力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也就是现代民间生活一般。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 20 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民族国家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有它一定的进步意义。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在殖民主义瓦解以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成为有害的东西。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而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却成为 20 世纪的一大灾难。21 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即从 20 世纪所发生的国家主义的危害中走出来,恢复社会生活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但国家要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通过社会之间的协商、对话,用契约来联结相互利益。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也逃避不了信息化的浪潮。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 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

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朱先生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我认为这“五个一般”就是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不过，在其每一个方面都将和中国的民族基因相对接，都会带有中国特色。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过急，不要迷信突变。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稳妥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只要按照邓小平以后的趋势，稳步走下去，不再搞大折腾，中国是有希望的。

后 记

我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近 20 年的跟踪采访和研究。我亲身经历了改革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名记者，我感到有一种责任，必须把这 20 年不平凡的历史告诉后人。80 年代后期我就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为此，除了采访工厂、农村、研究单位以外，我还专门采访了数十名重要高层人士。从收集材料到写作完成，整整花了 10 年时间。我力求用历史学家的科学态度来选择事实，用经济学家的知识来评述经济体制改革，用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眼光来评述这 20 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本书是用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为的是将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作为这段历史的人证。为了可读性，我用记者的文笔来表述学者的思想。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一点是相通的，这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中国历代重视修史。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有一种确凿可靠的编年史，那就是中国人的上及天、下及地的编年史”，伏尔泰称赞道，在这些史籍中，“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闻”。中国史学家历来重视“史德”，他们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

书必直言。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甚至不惜殉之以生命。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我不敢以这些无畏的史家自比,但是,在写这本书时,他们的精神一直在支持着我。

1997年2月,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几天,我就完了70万字的书稿。这些文字我是秉笔直书的。在这一年中,我又批阅了两次。在这次出版时,我删去一些内容。所以,现在只有50万字左右。

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广东何天静先生的关心。1990年他就鼓励我加速这本书的写作。书稿完成后,任仲夷、朱厚泽、秦川等同志对有关章节的事实进行了核对,何天静先生是第一位读者,他还对书稿进行了初步编辑。对以上同志表示谢忱。天津刘国政先生认真阅读了本书的修改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也表示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本书的付梓,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 1998年4月于北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 下

作者=

页数=594

SS号=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刘吉

绪言

第一章 毛泽东的遗产

第一节 黑色的九月九日

第二节 权力的集中——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党指挥枪

第三节 强盛的贫困——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第四节 面临改革浪潮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的制度遗产

第五节 有待重新构筑的价值体系——毛泽东的思想遗产

理想

斗争哲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

第二章 十月六日的风雷

第一节 毛泽东病床前的政治斗争

围绕邓小平第二次出山的明争暗斗

1975：邓小平初试锋芒受挫

邓小平第三次下台

第二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

叶剑英西山串联

投鼠忌器

先下手为强

第三节 过渡人物华国锋

他的仕途一帆风顺

“两个凡是”

“洋跃进”的是是非非

他只能是过渡人物

第三章 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节 邓小平怎样向“两个凡是”挑战

第二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坚冰已经打破

第三节 理论务虚会和“西单墙”

第四节 历史的新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五节 思想解放的限度：“四项基本原则”

第六节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挂下去

第四章 经济改革的组织准备

第一节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

第二节 天翻地覆大平反

第三节 干部队伍大改组

第四节 改革者掌握了最高权力

第五章 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

第一节 一个古老的事实被重新确认

饥饿逼出来的自发改革

安徽面临四面楚歌

在曲折中全面推广

第二节 乡镇企业：计划经济的“异军”

拿起“榔头”对付“剪刀”

从计划经济的岩层里挤出一条缝隙

中国乡镇企业的几种模式

“异军”占领了“半壁江山”

第三节 “魔鬼”在田野里游荡

解除了一条枷锁：“统购统销”

商品经济：从魔鬼到神仙

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和学大寨

第四节 农村改革的新矛盾和新发展

1984年以后的波折

中国农民两个伟大创造的发展

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

“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形成

第六章 敞开大门 走向世界

第一节 国门是怎样打开的？

夜郎大国

国门先从这里打开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第二节 香香臭臭话广东

1982：两省会议冲击波

海南汽车事件

“变通”不通

第三节 开放向纵深发展

外贸体制改革

外汇管理的改革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

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第四节 文化层次上的对外开放

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回应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新时代的“西化”之争

第五节 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

“铁女人”碰上了“钢铁公司”

关键在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第七章 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到核心

第一节 城市经济：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试验场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消灭私有制

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第二节 理论战：“市场经济论”获胜

把“异教徒”请入社会主义的圣殿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

“商品经济”怎样写进共产党的文件？

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市场经济

第三节 私有经济的回归

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

一颗瓜子千斤重

“为主”两个字的分量

私有经济：还在理论和实践中彷徨

私营企业主：是否已经形成一个阶级？

寻找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第四节 难点：国有企业的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改革十五年后的国有企业

在困境中找到了新思路

产权改革出现争议

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抓大放小”和诸城经验

大调整 大改组 大联合

第五节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双轨价：一颗难咽的苦果

1988：价格闯关失败

治理整顿：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剂猛药

1992：价格全面放开

第六节 财富分配：中国新的富人和穷人

收入分配改革的大体历程

非工资性收入：脱缰之马
转轨时期收入分配的几个特征
中国的两极：富人和穷人

第七节 复杂艰难的财政体制改革

从统收统支到财政包干
“诸侯经济”

赤字时代

税利分流和分税制

第八节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从“大一统”到多家金融机构并存
资金市场化的历程

1993年：全国金融大整顿

全面展开金融改革

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

第九节 邓小平的“硬道理”

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体制转型期的经济波动

转轨时期的经济难题

第八章 “两个基本点”的碰撞

第一节 “两个基本点”的形成

第二节 第一次碰撞：1983年反精神污染

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异化论”风波

“清污”运动

第三节 第二次碰撞：1986年反自由化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十二月学潮

“四号文件”

第四节 第三次碰撞：1989年北京风波

1989年面临的社会矛盾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胡耀邦逝世到“4.26社论”

局势全面失控

从戒严到“六四”

第九章 邓小平的最后辉煌

第一节 “皇甫平”事件

第二节 在南国卷起的邓旋风

第三节 为身后确定了改革路线

第四节 两代人权力稳定交接

第十章 中国的改革推进方略

第一节 改革的思想动员策略

第二节 渐进式改革

第三节 “摸着石头过河”

第四节 渐进式改革得与失

第十一章 邓小平的遗产

第一节 繁荣的经济

第二节 有待改革的政治体制

第三节 没有上帝的社会

第四节 邓小平留下的难题

人口过多是中国最基本的难题

十分棘手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金融死结难解，金融风险增大

国有企业处境困难

第十二章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第一节 新世纪之初：是否有一次大的政治冲突？

第二节 政治体制改革：新世纪的前二十年之内应有突破

破

第三节 中国将为解决世界三大难题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在处理第一种矛盾中的作为

中国在处理第二种矛盾中的作为

中国在处理第三种矛盾中的作为

后记